爱恨交织

——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

谭 松

前 言

从2008年9月重返讲台到今天，快六年了。从一个学校到另一个学校、从一个讲台到另一个讲台、从一门课程到另一门课程、从一届学生到另一届学生、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从一个感受到另一个感受，点点滴滴，滚滚涛涛，时而春雨细润，时而秋潮乱涌，时而爱意温婉，时而恨怨深沉。

多少块垒，淤积心头，渴盼长风出谷，肆意详狂，一泄千里！

这是一块我耕耘了整整20年的土地，我的整个青春岁月都挥洒在这块土地上。这也是一个我累积了太多爱恨情仇的世界，我曾在绝望中摔门而去，又在无奈里返身折回。我曾好几次面临被赶下讲台逐出校门的风险，我也无数次产生挂冠隐去挥手作别的冲动。

20多年前的枪声，打碎了自由女神的头颅，也打断了我教书生涯的轨迹。我从此在另一个世界摸爬滚打，头破血流。

16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我又回到校园——一个早已不是当年的校园。

也许，该60退休之后或者离开讲台之后再来描写这些年的“爱恨交织”，然而，一种隐隐的不安促使我匆匆拿起笔来。

我零零碎碎写下重返校园后这些年来的点点滴滴，是我个人一段人生旅途的记忆，也是中国高校里一些真实场景的展示。

谭松 2014年3月19日

目 录

前言.....2

一，可怜天下父母心.....6
二，现代鸦片馆.....7
三，“老师，千万别去！”.....8
四，辅导员（一）.....9
五，辅导员（二）.....10
六，生财有道.....11
七，大学校园，危险的雷区（一）.....12
八，大学校园，危险的雷区（二）.....13
九，大学校园，危险的雷区（三）.....14
十，“捧着一颗心来”.....16
十一，教《中外文化交流》课的感慨.....37
十二，附录一：《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生留言.....38
十三，“崇洋媚外”的“愤青”.....43
1，老师，你太激进！.....43
2，老师，你太崇洋媚外！.....45
十四，“成功的教改”.....48
十五，“因为爱国，所以反党”.....49
十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54
十七，“优秀人才”.....56
十八，秋日感怀.....57
十九，新闻课堂上的迷失.....61
1，不幸的学生.....61
2，可怜的教师.....62
3，“优秀的”教材.....62
4，“对口的”生源.....63
5，无奈的讲台.....65
二十，附录二，新闻系学生留言.....67
二十一，我经历的两个小故事.....72
二十二，一本“好”教材.....73
二十三，与人民币同贬.....76
二十四，现代“东亚病夫”？.....78
二十五，青楼女子的呼叫.....80

二十六，过英语四级，校园里的“买官卖官”.....82
二十七，如此办学天理难容.....84
二十八，“老师，我不当老师！”.....86
二十九，教师节，一份特殊的礼物.....87
三十，在又一个“8964”纪念日.....89
三十一，“没有良心”的多媒体.....91
三十二，点名，课堂上的“父母之命”.....91
三十三，“这个问题很敏感”.....93
三十四，如此“科研成果”.....95
三十五，本末倒置的“科研”.....97
三十六，我是一个罪人？.....99
三十七，《中国地理区域文化》课.....100
三十八，附录三：《中国地理区域文化》课学生留言.....101
三十九，上天的安排.....106
四十，毕业的关爱：祝“要发”.....107
四十一，写在“党庆国殇”之日.....108
四十二，一本“点亮心中蜡光”的教材.....110
四十三，灭绝民族灵性的教育体制——读赵林教授《西方文化概论》前言.....112
四十四，教《西方文化概论》.....121
四十五，附录四：《西方文化概论》课学生留言.....121
四十六，“光明教育”.....127
四十七，训练有素的“统一”.....128
四十八，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128
四十九，雄猛的普京大帝.....131
五十，一个怪胎.....132
五十一，消解善恶是非的“一分为二”.....137
五十二，父母们.....138
五十三，“社会主义新人”.....139
五十四，“更坚定我入党的决心！”.....141
五十五，“信息员”.....143
五十六，我真的如此失败?.....145
五十七，怎样为你祈祷？.....148
五十八，对牛弹琴.....150
五十九，“缺乏认同”.....151
六十，纯属想象，对否不知.....153
六十一，“聪明”的学生.....155
六十二，功夫在课外.....156
六十三，师范生，阿哥有心来相会.....158
六十四，“一票否决”.....168
六十五，鞠躬与合影.....170
六十六，过去的，都会是美好的回忆？.....173
1，天，越来越冷.....173
2，心，依然充满希望.....174

六十七，我终于被扫地出门了.....176
六十八，沉默和喧嚣.....178
六十九，到越南“练摊”.....179
七十，最后的“讲台”.....181
七十一，葬火.....183
七十二，告别教师和教师节.....184
七十三，教师节，一位毕业生的来信.....185
七十四，爱恨交织（结束语）.....190
七十五，后记.....193

在“厚德”、“笃学”的校园里，写下教与学的点点“手记”

可怜天下父母心

新生报到，拥有一万五千多名学生的校园更加热闹，来自全国各地和各民族（包括新疆维族和西藏藏族）的青春男女们让校园里更加青春四溢。

学生们都属于一个等级——三本院校，报到现场却“等级鲜明”——拼爹的等级。不少家长亲自驾车送子赴校，“豫”“湘”“川”五花八门，宝马、别克、飞度各有高低。

但更多的是以步当车。

以步当车中有不少乡下人的面孔，在报到点缴费处，他们举手投足与城里人和“车上人”有明显差异，但爱子之心都一样。

山城的“秋老虎”威力四射，父母们在酷热下挥汗如雨。

一位50来岁的女人，从缴费点出来，独自走到一个角落坐下。她的衣着和神情吸引了我，我停住脚步，默默地看着她。

她从一个蓝布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杯，仰着脖子咕噜咕噜喝了几大口，几滴水滴落在陈旧的灰布衬衫上。初秋灿灿的阳光，照在她脸上——一张疲惫而苍白的脸。我盯着她的眼睛，那里面依然是疲惫（还有隐隐的忧虑），仿佛不堪重负，或者说被重负压得疲惫不堪。她发现我在看她，下意识地把伸直的脚收回去。那脚上穿着一双泛白的解放牌胶鞋。

距学生宿舍不远，有一个绿树环绕的操场，当晚我从那儿路过时，发现操场边的树丛下，有人躺在铺了报纸的地上——那是一些新生的家长，他们在这儿过夜。

我们学校在郊外，远离城镇，校内只有一个招待所，但据说收费较贵。在操场露宿的家长们也许是因为客满，也许是为了省钱，只得选择“野营”。

灯光昏暗，树影婆娑，看不清他们的面容，也没有一点声音，他们就地静静地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重庆九月气温还高，他们也许不会受凉，但眼前的冷寂让我有些困惑：白天这儿各种收费，场面火热，可是，收获了沉甸甸银子的校方为何不对这些交付了高昂学费（每年一万多）的家长施予一点火热？

我是教师，也是家长（女儿就在这所学校就读），想起那位母亲眼中的疲惫，望着眼前蜷缩在地的身影，整个身心体会到父母们的酸苦。

我更感到一位教师沉甸甸的责任。

在黑沉沉的夜空下，我望着操场上静悄悄的“野营”，心中暗暗发誓：只要我在讲台上站立一天——

现代鸦片馆

校园周围很难看到一个书店，多的是大大小小的网吧。我一向都是在家里上网，因此，从未涉足过网吧世界。到学校后，一次因急事要发邮件，便随便走进了一家。

爆满，座无虚席。

换一家，座无虚席，爆满。

再换一家，爆满……

“你可以等一会，有了空位我马上安排你。”柜台后的小妹见我焦急，好心地说。

只有这样了，再走几家也会是同样的结局。

我生平第一次在光线昏暗，烟雾腾腾的网吧体验生活。举目望去，一张张屏幕上正进行着惊心动魄的厮杀，手持尖端武器的威猛勇士，翻腾跳跃，一路横扫千军。屏幕前的勇士们个个双目圆睁，血脉贲张，正全神贯注地投入“战斗”。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喊和高亢的回应，循声望去，原来是一群男子正在进行群体作战。（我第一次知道，网络游戏还可以一群玩家共享。）

密室般的网吧里也不全是男人们的天下。转过一道弯，柳暗花明，一群靓丽青春，双手在键盘上灵巧地翻飞，随着纤纤玉指的弹跳，屏幕上一群少男少女，动作划一，步调一致地翩翩起舞。（后来得知，这是有名的“劲舞团”游戏。）一些佳丽的桌上，还燃着一支香烟，散乱着一堆烟头。

网吧里，空气混浊，光线阴暗，我觉得有些气闷，但我身旁这些青春男女莘莘学子们却毫不在意，一个个沉迷在你死我活的搏杀中，忘情于欢歌劲舞的美境里。

凝目良久，我突然生出一个怪念：如果我是个女人，我愿意嫁给那些点着鼠标，呼着口号的男子吗？如果我是个男人（当然我是个男人），我愿意娶那些敲着键盘，叼着香烟的女子吗？

可他们都是大学生呐！是父母怀抱着希望，祖国寄托着未来的大学生呐！

不知道这座无虚席中有没有那满面疲惫的妇女的后代，有没有那蜷缩在操场上的老人的儿女。

一年多后，我跳到另一所院校，曾见到一个更精彩的场面：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学校干脆让网吧开到教学楼里。

那栋教学楼正对着宽敞气派的大校门，一进校门，顺着开阔的大道望去，教学楼巍然挺立，顶上几个大字“厚德，笃学，励志，创新”。顿时，高等学校的气派、知识殿堂的儒雅，扑面而来。不过，走进大楼，向右一拐，便会看到我前面叙述的一幕。

我就在楼上上课，上下课都要从一楼的网吧前过，我从没进去，用不着，站在门口一望，里面一派你死我活兼欢歌劲舞。热天里，我和学生在教室里挥汗如雨，但网吧里却凉风送爽，十分怡人。想来这也符合商业原则，为了招来生意，自然要为顾客提供良好条件。（后来，大概是实在觉得有损形象，校方终于“忍痛割爱”。）

我的一个朋友，留美归来的刘教授，曾对我说：“我觉得我们的下一代已经无法同美国的下一代竞争了。我儿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书，我亲眼见到他和他的同学是如何在学习，我现在在这所重点大学教书，亲眼见到我的学生是如何在生活。你看我们校园周围，被餐馆、酒吧、网吧层层包围！”最后，他忧心忡忡地说：“当年，是鸦片毒害了我们的身体，现在，是网络游戏摧残我们的心智……”

其实不用同美国比，就在这块土地上，30年前就不是这样。1979年，朋友刘教授和我分别在重庆大学和四川外语学院读书。那时学生常常通宵达旦苦读，重大如此，川外如此，与川外毗邻的西南政法学院也如此。记得政法有学生寒暑假都不回家，留在学校苦读，在那一批学生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贺卫方等人。在朋友刘教授的班上，还发生过一件“拼读”的事。一个周末的晚上，一位同学听说其他几位同学要去看电影，于是他也去了电影院。晚上回来正是熄灯睡觉时间，他上床后突然得知，其他几位同学当晚并未去看电影，而是在教室读书。该同学马上翻身而起，走到外面，在过道的灯光下，在寒冷的夜色中，披衣捧书，读了三个多小时，以此补回“失去的光阴”。

同一块地方，同一个人种，同样的体制，同样的文凭，为什么反差如此巨大？

这二三十年来，我们经历了什么沧海桑田？

难道，仅仅是因为当年网络游戏还没有横空出世？

“老师，千万别去！”

班上有位学生，家境十分贫困，每天都要到校门外的餐馆去打工，以求一顿免费午餐和200元月薪。

高校有两种对贫困生的补助，一种是助学金（分为三等，最高的一等每年4000元，最低的三等2000元），另一种是奖学金，受助者除了贫困以外，主要科目成绩必须达到90分以上。这两种补助都需要学生提供贫困证明。交上证明和申请之后，第一也是最最重要的审批者就是辅导员了，申请和发放都由辅导员掌握。

一天，我在路上遇到这位同学，关心地问起她助学金的情况。

“发放下来了，但是没给我。”她十分委屈地说。

“为什么？”

“辅导员把钱给了另一个同学——他的老乡。”

“有这样的事？是真的？”

“真的！以我的名义申报的，那位同学不是贫困生申报不了。”

“是哪位辅导员？”我勃然大怒，“我去找他！”

“哎呀，老师！”她满脸的委屈转眼变成满脸的惊慌。“千万别去！”

“为什么？”

“我不想得罪他。”

“一个辅导员你都怕？”

“哎，老师你不明白……”

“我不怕他，你把名字告诉我，我去找他！”

“老师，你千万别去，这事我真不该告诉你。”

我盯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是真真实实的惊慌。她知道我的脾气和性格，我教他们大半年了。

“老师，”她几乎是恳求地说，“千万别去，他答应下次一定给我。”

我转身走了，走了好一段路，后面还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喊：“老师千万别去呦……”

我暮地感到一阵透彻魂灵的悲哀。

马上就是“六•四”纪念日了，20年前，大学生们面对坦克和刺刀，慷慨悲歌，热血贲张……

20年前喋血街头的学生们，你们沸腾的热血已是最后的风景？

辅导员（一）

辅导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震慑能量？我有些不解，我离开高校16年了，很多新生事物和现象我都不了解。

我开始留心，并有意无意地问起他们的辅导员。

中学，我们有班主任，大学，我们有辅导员，两者的功能有些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最显著的一点就是：要当辅导员必须“政治合格”——正式的中共党员。这是一个硬指标，毕业生如果想留校当辅导员，不管你各方面多么优秀，只要不是党员，便一票否决。

于是，高校辅导员这个庞大的群体，都由“特殊材料”组成。

他们在院系专职的党支部书记领导下工作，具体职责分管学生的纪律、思想、入党、鉴定、“财政”——助（奖）学金的申请发放等。

其他先不谈，只说“财政”。助（奖）学金是关系贫困生学习和生活的一件大事，可是，名额就那么几个，僧多粥少，有限的一点粥“舀”给谁呢？“舀”多少呢？决定权就在辅导员手里。这可是一项“挟助学金以令贫困生”的实权。如果该辅导员属于党报里和新闻联播里那种“一心为公”和“大公无私”的中共党员，自然天下太平，否则，便会出现“强权”、“霸气”、“专横”、“以权谋私”和与之相对的“恭顺”、“奴性”、“阿谀”、“心怀不满”（或敢怒不敢言）。

有学生对我说：“老师，我不敢吭声呀，辅导员说，谁不听话，休想吃助（奖）学金，已经吃到嘴里的，只要不听话，下次就休想。”

当年搞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时，党的干部掌握每一个人的生死——准吃和不准吃，以及准吃多少。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了民众的肠胃，好多人，就是被认为“不听话”而被扣饭，活活饿死在公共食堂前。（杨继绳的《墓碑》一书对此有详细记载。）

辅导员掌握的“财政”权利，自然不能与党干部掌握的“扣饭”权利相比，但其深

层结构都一样。

2012年6月，我的一位学生来向我告辞。她刚考上了一所重点院校的研究生。她是班干部也是一位优秀生，曾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奖学金、重庆市“三好学生”、优秀共青团干部等一大堆荣誉，其照片和先进事迹在校园宣传栏上列为榜首。她也是一位贫困生——极其贫困的学生。在入学报到时，她因交不起高昂的学费（三本院校的学费比由国家办的一、二本院校学费贵一倍以上），面临退学（其父就叫她退学）。最后，她是流着眼泪向高中同学几百、一千地讨借才入了学。在随后的日子，她知道她必须获得奖学金（还不是助学金）才能完成学业。奖学金在贫困之外还有一个条件，各科成绩达到90分以上（当然此外还有诸如思想先进、政治进步、纪律良好、工作出色等“政治”指标）。大学四年她居然全部达标，年年获得奖学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并考上研究生。

我向她表示祝贺，并欣赏她的勤奋。

她目光烁烁地盯着我，突然说：“老师，你知道我是怎么忍受过来的吗？”

“忍受，什么忍受？”

她告诉我，那位掌握“财政大权”的辅导员，是一位非常傲慢而专制的女人。她非常清楚每年这笔奖学金对她意味着什么，钱虽不是她的，但她有发放决定权。

“这几年来，我不得不忍气吞声，她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成了她的听差、她的佣人、她的奴仆。她叫我帮她打饭，帮她取信，帮她做家务，不管白天夜晚，不管酷暑寒冬，必须随叫随到。远的不说，就说考研期间吧，我正紧张背英语，她一个电话来，叫我去给她买馒头，一会儿又叫我给她的家人送钥匙。你知道我们学校校园大，又是上坡下坡，跑一趟一个小时就没了。我常常走在路上想哭……可是我还得装出笑脸，又要尽量让她满意……”

她滔滔不绝地倾吐，我分明感到，那是积压已久的屈辱和痛苦，此时，闸门顿开，洪水滚滚而出。

她终于熬出头了，不需要再隐忍。但是，在成长期间落下的创伤——人格屈辱和人格分裂，会一下子从此消失？

辅导员（二）

我在学校这几年发现，学生们往往敢得罪老师，但不敢得罪辅导员。我是教师，课堂上就有曾有学生站起来当众反驳我，至于在卷子上，在作业上，在纸条上谴责我的也有不下几十起。但是，鲜有听说敢于反抗辅导员的。

是不是辅导员拥有给每个学生写各种评语和鉴定（要装入档案）的特权？

我知道当年装入档案的评语和鉴定，可以决定一个人一生的荣辱成败，可怕得很。现在辅导员的评语鉴定权，还有这等威力吗？

由于分工的原因，我很少与辅导员接触，对他们中有些人的八面威风和巧取豪夺只有耳闻，如：有一个辅导员进入学生宿舍检查，要求学生都站起来迎接，就像官员大驾

光临一样；一些辅导员还向学生索要钱财和礼品……

在我的教学中，我只亲自领教过一次辅导员“温和的霸气”。

2012年的一天，在第二节快上课时，走进一位年近30的女人。“谭老师，我有点事情要跟学生讲。”她面无表情地说。我看了下表，还有三分钟就要上课了。我不知道她是谁，但想到学校正在搞评估，事情又多又急，便勉强点了下头。

她面对学生，板着脸，三娘教子般地一口气讲了十多分钟。我以为她会因耽误了课时对我表示歉意，没有，讲完她目不斜视，昂首而去。

她径自走到后排，落坐在一位学生旁边。我以为她要听我的课，不料她旁若无人地对那位同学“交待工作”。又过了10分钟，她交待完毕，大大咧咧地站起来扬长而去。

从讲台到后排，从进教室到出教室，她高视阔步，如入无人之境！

我心头徒然火起：“她是谁？”

“我们的辅导员。”

“叫什么名字？”

“叫XXX”

“好，你们下了课就去告诉她，叫她今后不准随便进出我的课堂！”说完，我补充一句：“就说是我说的！”

学生一片欢呼，一个个脸上笑逐颜开。

几天之后，另一班的学生问我：“老师，你几天前是不是骂了一个叫XXX的辅导员？”

“你怎么知道的？”

“网上看到的。”

原来，那个班的学生把这事儿放到网上去了，他们借我的发作，宣泄他们积压已久的不满和怨气。

以她养成的脾气，我以为她会找上门来。没有，毕竟是中共党员，“特殊材料”，修养比我高。

生财有道

学生们被迫购买任课老师的大作，以及因为领导出了一本大作而专门开设“大作”课，是我重返校园后见到的另一特色。

学院领导写了一本关于毛泽东诗词鉴赏方面的书，于是，因书开课，作者亲自任教，教材就是该领导的大作。我们学院（二级学院）三千多学生，人手一册，每年，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源源不断的新生，源源不断的销售。卖书的哗哗银子，自然哗哗入了作者腰包。

销路不愁，按照商业规律，自然就可以涨价。果然如此，该书封面改了一下，纸张

略作调整，新版问世，价格从25元直升到39元！

莘莘学子们一个个叫苦不迭，课一结束，书便是一堆废纸。有学生想换几个钱，贱卖到3元都没人要。毕业生离校或者早在离校前，“毛泽东”和他的诗词，不是被当废纸卖了就是被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学生们怨声载道，终于群起抵制。学院立马启动“应急机制”，建全的党团组织和威严的辅导员队伍，高效率地压灭民怨，为“毛泽东”保驾护航，一边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继续源源不断地照耀学生课堂，一边让白花花的银子继续源源不断地流入作者腰包。

以前我在一家公司工作时，亲自经历了不少强行“搭配”。比如在一年一度的公司年审时，必须订一份党报——全年的重庆日报（有时还要订人民日报）。如果不订，便不给你年审。大大小小成千上万的公司们束手无策，只得掏出血汗钱来“倾听党的声音”。

一样的叫苦不迭，一样的怨声载道。谁说我们的学校与社会脱节？

有了领导带头，一些老师也不甘落后，他们没有行政大权促销，但握有考试评分的红笔。于是课堂内外，便成了一些老师推销大作的商场。更为奇绝的是，一位名片上印满了各种头衔的教授，干脆决定，必须买了他的书才能参加考试！他找了一个促销的理由：“我讲的这门课上很多东西我的书上都有，必须买！”

我也出版了好几本“大作”，其中3本还有一千多册积压在家里。不过，我唯一动了念头卖给学生的是一本我主编的《在旅途》杂志。该杂志是为重庆2009年旅游节出的专刊，主要介绍重庆各地的旅游风光。该刊物图文十分漂亮，印刷质量也很好，每本印刷成本就是16元。不料，该刊物多印了3000多本积压在仓库，如果不销售出去很可能就要进入废品站。我很想以每本3元的价格卖给学生，全国各地的学生花这点钱看看重庆风光是值得的。

但我最终放弃了。

我不想面对学生时，发出推销员的声音；我不想对不起那满脸疲惫的母亲，那蜷缩在操场地上的身影；我不愿让他们节衣缩食的铜板，花在一些可有可无的书籍上。

到今天为止，大约共有上百学生手里有我的“大作”（那些在网上购买的《工艺之旅》和《血火与堡垒》的学生除外），主要有两本，一是杂文集《看着我的眼睛》，二是纪实作品《长寿湖》，这些书我全部免费赠送，没收过一分钱。（其中《长寿湖》自费印刷，每本近30元。）

大学校园，危险的雷区（一）

大学本应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的园地。只有让各种观点各种学派各种见解在这儿交融碰撞，才能培养出思想活跃，见解深刻，人格独立，具有创造性的人才。可是，恰好在这块培养祖国未来的园地里，当局倾注了移山之力反其道而行之。从小的洗脑教育、无数的谎言教科书就不用说了，天天可见的，是各级领导和

党团组织，都把抓“学生思想”（也包括教师思想）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网络监控、摄像录音、思想禁锢、言论打压、告密汇报、行政处罚、公安驾临……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铁蹄声声，刀光闪闪，终于把本应百花齐放，万木争艳的校园整肃得一片死寂。

2011年圣诞前，学校几十个加入了基督教和对基督教感兴趣的学生在校外一个场地聚会，他们放着圣歌让心灵接受洗礼和飘升。正在烛光闪闪，歌声绕梁之际，十多个“天兵天将”劈空而降，闪电战似的包围，歼灭战似的胜利。

几十人无一漏网。

登记、搜查、审查、检查笔记本电脑……

学生们一个个失魂落魄，面色苍白。

学校紧密配合公安，训话、威胁、警告……

从小饱受“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和“党啊，亲爱的妈妈”教育的学子们，初次遭遇现实风暴，一个个措手不及，惊恐万状。一些女同学吓得花容失色甚至泪如雨下。

这几十个学生中有我教的五名学生。事后（放假前）一名学生来看我，他说：“老师，这次我好险！”

我经历过大风大浪，不屑地说：“这有什么，总不会把你们抓起来，也不会因此把你开除”。

“不是，是我在最后一刻没有把笔记本电脑带过去！”

“带去又怎样？”

“我上面有‘九评共产党’等大量违禁品！”他一副侥幸逃脱，劫后余生的庆幸状。

与我相好的一名老师杨教授被领导找去“诫勉谈话”。其过错是“煽动”学生信教。该教师是基督徒，他发扬当年罗马早期基督徒的殉道精神，拒不认错，并且说，如果学校容不下他，他走人就是了。

学校最终没有开除他，也许是出于功利的考虑——杨教授是全校人气最旺的老师，评师网上排名第一。他们要办学赚钱，总得保留几个能招徕学生的香饵吧。

不过，第二学期开学时，学院全体会上，第一个不点名警告的就是他。（第二个就是我，警告的内容是：课堂上不要乱说，要同党保持一致，维护稳定和谐等等。）

大学校园，危险的雷区（二）

前些天，学校网管主任告诉我，他的前任“被迫走人”了。该主任年富力强，技术一流，不幸的是，他思想异端，不同党保持一致，还不时在网上发表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一天晚上，几个便衣驾临校园，便衣身手不凡，轻而易举打开了一道道铁门，并破解了他在办公室设置的复杂的电脑密码，查到了他“反党”的证据。

第二天，这位主任便被抓捕。

不过，他只被关押了一个多星期。

学校居然没开除他，只是撤职，调离岗位。这位思想异端的老师终于在这“思想统一”的学校里呆不下去，卷铺盖走人了。

“你要注意”，现任网管主任提醒我，“学校的网络是公安重点关注的。校园里每个网络用户都被监控，都建有日志，公安来查，一调出日志，你做的一切都将曝光。”

2011年“六•四”之前，学校发生了一件胆大包天的“叛逆”事件。一个学生获得了他朋友传来的一段天安门“六•四”录像，该学生看了深受震撼，这么好的东西不分享太可惜了。于是，他居然把这个“高危爆炸品”挂到了校园网上！

转眼，就有几十个学生点击观看；

转眼，监控者就发现了这个“大逆不道”！

中共当局在很多方面反应很迟钝，如：生态毁坏、环境污染、食品卫生、儿童失踪、民间冤情等等，但在处理此类“维稳”事件上却是“迅雷不及掩耳”。传播者立马被盯上。紧接着追查后果，共有30多个学生点击观看。这30多个学生全部被清查，分别受到了记过、留校查看等不同程度的惩罚，而那位“肇事者”则被公安带走了。(他后来的情况我不清楚了。)

大学校园，危险的雷区（三）

2012年六月的一天，新闻10级的几位同学请我吃饭——我不再教他们了，算是告别。饭桌上一位同学突然说：“谭老师，你知不知道李XX的事？”

“什么事？”

“就是她被处分的事。”

“被处分？为什么？”

原来，该同学在网上发表了几篇“不和谐”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关注，公安查出来后，把她抓去审问，追问原因、背景等等。公安没有关押她，只是通报了学校。学校雷厉风行，立马处罚。她所属的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有一位专职党支部书记，该书记不仅给她记了一个大过，而且坚持要她把父母叫到学校。该生苦苦哀求，说处罚她可以，但求放过父母。不行！于是，该生父母千里迢迢从外地赶来，同该生一块接受党支部书记的训话。

公安在审问该学生时，问到她是如何产生这些观点、看法和思想（包括反党），该学生说出了给她上“新闻采访与写作”课老师的名字——谭松。这样，公安便把我作为“教唆犯”或者“煽动犯”给学校通报了。

但是，学校一直都没找我“诫勉谈话”，不过在5月份时，一位熟识的退休领导给我打来电话，提醒我注意课堂上的言行，因为公安在“注意”。

当时，我没把这事同这名学生的事联系起来。

重庆六月的天气十分炎热，我在炎热的饭桌上得知此事，顿时觉得一股热血往上涌，加上酒精的作用，我差点忍不住跳起来去找那位党书记。要处罚就处罚我，我是始作俑者。拿学生开刀，还要搭上父母！公安处罚学生，学校不仅不保护，还要加重处罚！

学生们看我冲动，赶紧说，这事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他们一直没告诉我，就是怕我冲动。

一个老师，在学生遭受不白之冤时不挺身而出是一种耻辱。

可是，我最终又这么耻辱了一回。以我的个性，我是敢打上门去的。

我的女儿正在学校实习，本月就想调入学校，我要闹得惊天动地对她十分不利，于是，我只得吞下这口气，很屈辱也很耻辱地又当了一次缩头乌龟。

出了这件事，我才专门同这位学生交流，这才发现，她果然与众不同，有思想、有见识、有独立的意志、也有相当的文采。我不禁仰天长叹：如果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党妈妈”，把这样的学生都剿杀完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也就完了。

在期末的试卷上，我给这位学生打了全年级最高分——98分，以此来表示我极度的不满和怯懦的反抗。另外，在放暑假时，我专门送了她一本我在美国出版的“禁书”《长寿湖》，我在赠言上写道：“……这是他们的耻辱，你的荣耀……”

另外，我对她说：“你假期回家告诉你父母，就说谭老师为你感到骄傲，为他们有你这种孩子感到欣慰。”

我没对她说的是，你父母的血汗钱，你们所交纳的高昂学费，养了学校一大帮子党政干部，他们可以动辄就把供养他们的衣食父母叫到学校来高高在上地训话，世上哪有这种道理？！

注一：这句话我一直憋在心里，一年多后，新闻11级学生采访我，专题谈教育。我谈着谈着，冲口就出：“要办好教育，必须除去行政化，所有党团组织和相关课程滚出学校！”

注二：这个“雷区”对教师的凶险性详见后面“信息员”一文。

补记：

正是这一系列“事件”，让我在2012年6月产生了强烈的走人冲动。我自由的意志和叛逆的“反骨”，不适合这块已经高度僵化的土壤。可是，何去何从？可是，对学生们总有割不断的情感。还有，在育才学院冲动走人后的后悔……

To be or not to be……

我为此内心挣扎、焦虑，人陡然变得苍老而憔悴。

我，2012年6月

下面，是我2010年6月在离开育才学院时写下的文字：

“捧着一颗心来”

下课铃声响了，最后一声“Goodbye”敲响了我在“育才学院”永远下课的铃声。多媒体的白色屏幕缓缓向上卷起，我人生又一段旅程的大幕徐徐闭合。

一位女同学走上讲台，双手捧上一个彩色笔记本……

一

“呀，这所学校真漂亮！”我第一眼看见它，便生心爱慕。蓝色、白色、红色的校舍掩映在起伏错落的苍翠中，构成一幅幽雅的风景。清风拂面，山色怡人，在都市烦杂喧扰中布满尘埃的我，顿时生出一股回归山村田园的宁静和清凉。

“不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我扭头对高考失利一脸沮丧的女儿说。

那时，我离开讲台整整13年了，对教育领域天翻地覆的变化已经陌生，对什么是“三本”院校，对这类院校的“内核”如何，一无所知。

但是，我对育才校园的一见钟情，决定了我女儿青春岁月中最华美的一段年华。

二

接下来的几年，作为《中华手工》杂志主编的我在中华广袤的大地上往来奔走，在手工秀美的图文中沉醉忙碌。女儿？放任她在那收费虽昂贵，校园却幽香的地方挥洒她少女美妙的光阴。

转眼三年过去了，女儿即将步入课程几乎不开，学费一分不少的所谓“大四”。也就是说，她在四年本科中的专科学业已经结束了。

我见她双眼无光一脸茫然，一拷问，她既不知道自己真正学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今后何去何从；既说不出哪个恩师传道授业让她心智大开，也说不出哪门课程精彩绝伦使她流连忘返。身外，没有引导和压力，身内，没有紧张和自律，一个女孩19到21岁的芬芳三年就这么抛洒了。

我拿出父亲的脾气对她大加谴责。她自知有过，开始猛然醒悟痛失的青春时光。

责骂之后，我转念一想：育才学院，你美丽的校园为什么没有培育一个女孩青春的美丽？

三

2008年9月1日，我成为女儿这所学校的一名教师，自1992年初离开校园和讲台，已整整16年了。

16年来，我人生的路跌宕起伏、悲欢离合，但“虽九死而尤未悔”，绝没想到还要重返校园，再上讲台。

据说“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吃回头草”了，自然不是好马。

可是，如果里面有一个父亲对女儿深深的爱呢？

我原想教新闻采写，或西方文化，或民俗文化，但领导说，现在最缺的是英语教师。我只好又重新去拥吻我从来就没真正爱过，且离异已16年的ENGLISH。

第一次上课是2008年9月5日，学生是对外汉语07级四班。女儿专门前来观看她老爸的表演。

毕竟离异久了，宝刀已老，弓弦已锈，一节课下来，我讲得热汗淋漓，女儿听得无精打采。下课后，她毫无“孝道”地说：“你课上成这样，如果你教我，我肯定逃课！”

说完，她扬长而去，用她的背影报了我责骂她的一箭之仇。

夜黑里，我独自走在回寝室的路上，品尝着那品尝过多次的失败的苦涩。

四

重返讲台前，便听朋友说，现在的大学生早已不是当年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模样。大学的扩招、金钱的打磨、世风的影响、价值的转变，早已消解了当年的风骨和品味。

于是，我作了相应的心理准备。

不料，几次课下来，我欣喜地感到，四个班的学生十分可爱，他们晶晶莹莹的眼睛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他们笑盈盈的问候里饱含着对教师的尊重。我身兼教师和家长双重身份（或双重责任），怎能不禅精竭虑，善待这份晶莹和可爱？

幸亏我当年的功底还比较扎实，很快找到了讲台上挥洒自如的感觉；好在这些年我人生阅历还算丰富，不久便将讲解深入到书本背后的五彩缤纷。学生很快喜欢上了我的讲授，两个月后，不仅录制了一盒赞美的语言送给我，还邀我到校广播站作了一番演讲。

不过，女儿再没来听我的课，她带着对大学三年得不偿失的悔痛、怀着弥补过失开创新生的急迫，手忙脚乱地投入了考研的背水一战。

只剩下四个月时间了，她搬到我寝室，闭门备战。那些日子，每每我凌晨醒来，发现孤寒灯下，她仍在“头悬梁，锥刺股”。

五

不久，我遇到新的问题。

这些年来，对我说来已是常识性的东西，在不少学生眼里竟有完全相反的认识；我认为是真理性的东西，竟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谬论。

有一次，我提到：八年抗战，主要是国民党在拼死奋战，挽狂澜于既倒……

话音未落，一位同学惊诧地睁大双眼，有些义愤填膺地责问：“老师，你怎么这么

说呢？”

我一愣，也惊诧地睁大双眼，一时不知该怎么说。

转眼，我理解了。

我从小受教育，教科书上、宣传品里，毫不含糊地印着：抗战八年，国民党不发一枪一弹，蒋介石躲在峨眉山上，待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蒋介石才下山来抢夺胜利桃子……

在我小时候最喜欢的一本小说《林海雪源》的后记里，作者开篇便是上述的“抗战论断”。

我对此坚信不疑。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抗战历史的阅读达到了千万字；

几十年过去了，我走访了中原、滇西大小抗战战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了解到国民党两百多位将军血染疆场；

几十年过去了，我主编了抗战陪都专集、采访了102位抗战时期老人、参与了中央电视台《重庆大轰炸》的拍摄；

……

我以为，历史真相早已大白于天下。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新一代当年的我和我们又被成功地“育才”出来。

我们的教育，真的坚韧而伟大！

六

一天，课堂上偶然提到刘文彩，全体学生茫然：“Who is he?”

我于是也茫然，愣了半晌，问道：“你们都知道赵本山吧？”

全体失笑。

在我当学生时，刘文彩的大名在中国正如当下的小品巨星赵本山。不，前者更胜于后者，因为他和他的“作品”还被写进教科书，作为历史实事教育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那时，刘文彩的赫赫大名连同他的精彩“作品”——水牢、地牢、收租院、大斗小斗等——同赵本山的作品“卖拐”、“我想有个家”、“策划”等一样，家喻户晓，老幼兼知。

不料，仅仅30年，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刘文彩便在“新的历史”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来，在讲“6.4”时，我展示赵紫阳在天安门广场的照片，学生们竟然不知道他是何方人士。）

“那么你们知道周剥皮吗？”我问。

“知道。”全体回答。“他剥削长工，半夜鸡叫。”

我愕然。

“黄世仁呢？”

“知道，他抢了喜儿。”

“南霸天呢？”

“知道，红色娘子军。”

这样，在当年当局拼力打造的四大恶霸地主形象中，眼下的学生知道三个。这三个形象分别来自小说、戏剧和电影，而排在榜首、也是唯一真名真姓确有其人的刘文彩，连同他的“作品”统统消失不见了。

当年的我，在校内校外铺天盖地的教育下，毫不怀疑刘文彩的毒辣残暴和水牢的恐怖阴森。不料，1988年，水牢、地牢被证明是“为了教育下一代”的虚构，而那位说了无数谎言、“坐过水牢”的全国劳动模范冷月英，也终于发出了“是他们要我这样说的”的临终真言。

还有，我有幸亲临安仁镇，采访了刘文彩当年的厨师、长工、佃户、乡邻和他的孙子刘小飞，原来，刘文彩是这样的人！

既然确有其人的“刘文彩形象”经不起历史实事的检验，那就让他消失，而不需要历史实事检验的艺术创作人物——周剥皮、黄世仁、南霸天——则保留下来，继续发挥“教育下一代”的教育作用。

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官场上有句名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这是任命权在手者的天马行空。

教育领域呢？仿佛可以套用上述的话说：“说是真就是真不真也真，说不真就不真真也不真。”——这是话语权在手者的我行我素。

实在编不下去了？那就让它消失！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几十年过去了，指导思想和操作手法一点没变。

七

当然，时代毕竟不同了。

虽然我看到我当年熟识的那一幕音韵不绝曲调依旧，但“时代的进步”还是显著的，最大的长进之一是：美丽苍翠的绿茵丛中，弥漫着细细密密无孔不入的“金黄”颜色。

2005年9月，我送女儿到学校报道。XX费、XX费、XX费、XX费、XX费，一路过关斩将，终于领到了宿舍的钥匙，分到了床位。

下午，宿舍突然进来一沧桑老农和一瘦弱女孩。

“劳驾，哪位同学让我孙女在她床位上挤几天？”老农满头大汗地说。

“怎么？她没床位？”

“有，可我钱还没交，我是农行的存折，在这儿钱一时打不过来。”老农手里紧捏着一个银行存折。

“你给他们说明情况，先住下来，反正宿舍有她的床位。”

“我恳求了好久，不交钱不行。”

老农的满头热汗，学生的“无家可归”，丝毫打动不了“金银”的规定。这是我在这所美丽校园里呼吸到的第一缕铜臭。

后来，感触就更多更深了。

我曾经下海当过几年生意人，熟悉商场中的挣钱之道。16年后，我重返校园，惊愕地发现，这真是一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好商场！我在商场中熟悉的一些手法这儿有，我在商场中不熟悉的手法这儿也有。游戏规则由大小“商家”制定，“消费者”——祖国的未来们——则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

“教师的服务精神系教育的命脉。金钱主义，最是破坏教师职业的尊贵。”——“育才”的创始人陶行知先生的这句话在这所“育才学院”成了一个讽刺？

2009年底，我读到美国耶鲁大学前校长施密德特对中国教育的一番评论，其中有这么一句：“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我悚然一惊：远在天边的“美国鬼子”，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八

我教的英语泛读课，每周每个班只有两节课，每节课只有40分钟（比我16年前的课缩水10分钟）。在短短的80分钟要讲完一个大单元并做练习时间很紧张。一学期下来，学生对这门课感兴趣了，纷纷要求增加课时。正好学院也在调整，于是我打了报告，申请增加一节课。

不获批准。

“本科生四年只有2500个学时，其中约500个学时是上面硬性规定了的，如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列文论、中国近代史纲要等等。”有关人士告诉我。

韩俞说，为师者要“传道、授业、解惑。”这500个学时的课程，大概就属于“传道”部分，或者用他们的话说，叫做“竖立正确的政治观点、培养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热爱。”

06级本科生毕业前，我在教务处旁边的墙上看到一张补考科目，那上面列得最多的科目就是这“传道”部分。

看来，学生们对“传道”重视不够。但转念一想，这是“自然之道”呢还是“强权之道”？

一届又一届，每一个青春学子，500个学时。

青春哪，无限美丽而珍贵的青春！

九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四川外语学院和四川大学学习时，每周都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既有中国专家学者，也有外国学者专家，学生们通过这些讲座提升心智扩展眼界。

到育才学院后，我发现，不知是由于学校太偏僻，还是眼下请人来演讲费用太高，这儿的学术讲座很少，大师们的身影更是罕见。（据说，这几年光临我所在的文学与新闻学院的唯一大师就是那位被喻为“文化口红”的余秋雨。）

可是，71年前陶行知先生在草街创办育才学校时交通更不方便，经费真是可怜。但是，大师云集！

不管怎样，时空总得要东西来充填。于是我看到，学院门口，不时有告示张贴，如：“我为党旗添光彩征文”、“毛泽东诗词进校园活动”……设置完备的各级党团组织工作也出色：听党课、爱国主义教育、纪念毛泽东诞辰……

总之，各种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校园内仿佛也不寂寞。

只是，我偶尔有点困惑：这是中共党校育才学院分校吗？

十

重返校园，还看到一个显著的变化——出售答案的作弊广告可以公然张贴。如：《王牌助考》、《启航助考》等等。

广告上有保证——“正确率和及时性双重保证”；有承诺——“考中答案全国第一”；有设备出售——各类隐形耳机、看字橡皮、对讲机、手表等反屏蔽防探测考试专用设备；有联系方式——QQ号和电话号码。

至于价格嘛，广告上不写明，但学生私下都知道，据说也不乱收费，根据提供的服务多少定价。

这样，黄金白银，打败了公平竞争；作弊造假，取代了寒窗苦读。

有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发奋努力，想凭自己的刻苦通过英语四级。不料，考下来差了几分，而她的几位同窗，金币一掷，铁石洞开，一个个欢天喜地获取了国家公认的“四级证书”。

这是我了解的真实故事之一。

05级毕业前，一位学生会的高级兼优秀干部写了一篇优秀论文，于是，参加优秀论文答辩。答辩会上，学识渊博的杨思聪教授火眼金睛，一眼发现该“优秀”是抄袭。

“还是优秀学生会干部？！判零分，不得毕业！”杨教授大怒。

1986年我在重庆大学读书时，一位美国教师发现班上一位同学考试时偷偷抄了自己的笔记本，我们觉得问题不是很严重，但该金发碧眼勃然大怒，立马判该同学零分。

“道德比分数更重要！”她说。

陶行知先生曾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并且，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恶就愈大。”

年逾六旬的杨教授可能还没摆脱陶先生的影响，骨子里还有几分旧知识分子的道德和义愤。而我，对此已不感到愤怒了，因为我已经步入了“现代化”。

就在该学生会“高官”作弊之前，我也大肆作弊——帮学生开“就业证明”。

学校硬性规定，毕业生一定要找到一个“工作单位”，开来一张“就业证明”，这样才能让该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单位”怎么办？不要紧，搞来一张“就业证明”就行。辅导员天天催促，学生们被“逼良为娼”。我抹不过情面，找关系给学生们开来一张又一张“就业证明”。

这样，一个个学生“被就业”；

这样，学校就业率成绩喜人；

这样，有关人士获得奖励……

当造假已成了我们民族和社会的一个“正常生态”时，我还会为一个学生的小小抄袭义愤填膺吗？

当谎言体系堂而皇之地摧残着我们心灵时，其物质体现形式的“三鹿奶粉”们摧残我们的肉体又有什么奇怪？

既然我们可以继续教育学生“国民党不抗战”，或“消极抗战”，为什么又不能容忍“包过四、六级”的广告四下张贴？

此刻，已有相当人生阅历的我，已没有了杨教授般的愤怒。

只是，心底隐隐作痛。

十一

不时有学生问我：“老师，你是党员吗？”

我于是很惭愧。

“那你写过入党申请书吗？”

我于是更加惭愧。

我知道，学生们几乎都是“入党积极分子”，至少，个个都是“发展对象”，或者说至少写过入党申请书。2010年清明节时，有个班的同学要求调课，说是凡是写了申请书的“入党积极分子”第二天都要去烈士陵园扫墓，而他们班几乎全体都是，所以只得调课。

我如此“落后”，真有些孤独。

不过，我“不惭愧”的是，我父母都是中共党员，他们也是在学生时代加入的共产党。我曾问过他们“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这个人有极强的民主、自由、人权观点，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摆在我面前有三条路：一、科学救国；二、追随国民党；三、跟共产党走。我选择了最后一条路，这在当时是最艰辛最危险的一条路。为什么？很简单，为了民主和自由。同那个时代的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我非常爱国，一心渴盼祖国富强。我读到《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读到新华日报的文章，共产党呼喊的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很让我激动，我觉得自己应当为这一个目标奋斗。那时，我认为国民党专制腐败，中国的希望在大力呼喊民主和自由的中国共产党身上。”

母亲回答：“那个时候国民党没有喊民主自由，只有共产党在喊，喊得声声入耳，声声入心。我以为中国只有共产党代表民主自由，只有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所以就跟共产党走了。”

我也问学生“为什么？”

回答是：“今后出去找工作，尤其是考公务员，或当教师，入党是一个有利的甚至必备的条件……”

“哦——”我十分理解地说。眼下大学毕业生求职很难，想增加竞争力很自然。

不过，就我而言，如果有一天我非得举起右手，我一定要像当年我的父母那样。

十二

2009年5月12日，“5.12”大地震一周年，当晚，我上对外汉语07级四班的课。讲完那些枯燥的单词句法之后，我拿出了事先打印好的有关照片——因为文新院的教室里还没有多媒体设备。

我曾两次前往灾区采访，从一个废墟到另一个废墟。我讲起我的亲眼目睹，讲到那吞噬了无数学生生命的“豆腐渣”校舍。当我讲到我在东汽中学倒塌的教学楼前，向那些仍埋在瓦砾中的青春亡灵深深鞠躬时，巨大的悲愤排山倒海涌上心头，我蓦地哽咽失语，泪水涌上双眼。

教室里鸦雀无声，一位坐在前排的女同学默默递来一张餐巾纸……

20年前，1989年6月5日，我第一次在讲台上失声痛哭——为倒卧在血泊中的北京学生。

转眼，6月又到了。

2009年6月3日晚，上完两节课后，我留下学生，又拿出事先打印好的照片，问道：“有1989年出生的同学吗？”

一多半学生举起手。

“请问你们知道在那一年发生的那个大事件吗？”

无一学生举手。

“请问你们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有老师给你们讲过吗？”

“没有。”全体同学异口同声。

我愕然——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又在我们的教育中消失了。

……

第三节课的铃声响了，我最后说：“20年前的此刻，北京枪声四起，血流成河，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儿女，倒卧在他们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20年后的此刻，世界各地都在秉烛焚香，纪念那一个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之夜——除了中国大陆……”

当晚我回到宿舍，心神不定，万分孤寂。

从1989年的涕泪滂沱，到2009年的哽咽失声，一个男人最饱满的20年过去了。

20年过去了，我们走向了何方？

20年过去了，当年校园里还存留的从屈原到谭嗣同的精神品质荡然无存；

20年过去了，当年莘莘学子们还仰望天空的理想主义消失殆尽；

20年过去了，当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风骨无影无踪；

20年过去了，教师们、知识分子们，在又一次刀光血色中退缩了、放弃了、投降了；

20年过去了，退守个人生存空间，投身全民发财队列，成了“士大夫”们的价值取向；

20年过去了，连那个惊天动地的事件本身也被“高压水龙”冲洗得一干二净；

……

可是，我永远绕不开这道良知的坎。

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哪儿有一个烛光广场，让我手捧红烛，长歌当哭，一泄心中万倾狂澜？！

十三

“谭松，你要学会保护自己。”一位熟识的老教师把我叫到一边，很慎重地说。

这是2010年的“六•四”前夕。

“怎么了，你又听到什么？”半年前，这位教师也善意地找过我，告诉我他听到一些反映，说我很“激进”。

“学校有个院系的教师在课堂上赞同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说，被学生举报，学校要处分他，开批判会……你说话要注意，现在的学生很复杂……”

我想起，就在一年多前，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教授因课堂上的“不轨”言论被学生举报，并被立案侦查。

还有，吉林艺术学院的教师卢雪松因课堂言论被学生告发而身陷囹圄。

还有，就在去年“六•四”纪念日，听说一些学校又有教师因言获罪。

还有，有人告诉我，说当局在学生中建立有一种叫做“信息员”的制度，“信息员”属于“地下工作者”，单线与有关人士联系，专门汇报教师的“不和谐”言论。

……

“六•四”21周年马上就到了，讲，还是不讲？

去年“六•四”后，有朋友认为，我最好的结局是被赶下讲台。当时，我作了甚至更坏的准备。可是，我安然无恙地走到又一个6月。

我又去翻看当年的照片。

我目光停留在一张我与两个学生的合影上，当年，我们并肩游行到市政府对面的广场上。

2010年6月，课堂上忍不住又讲起了“6•4”

二十多天后的一个深夜，我正在灯下写第三份“检讨书”，突然传来敲门声。我打开门，昏暗的过道上站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影。

“谭老师，我来向您告别。”男的说。“白天我不敢来，怕影响您，我知道您也被列为了‘重点’。”

“怎么？下个月才毕业呀？”我不解地问。

“我不要那个毕业证了！我看到那些人太丑陋，我对这个国家绝望！”

“你不要冲动，马上就毕业分配了，你暂时认个错，这事今后一定会平反。我也在写检讨……”

“不，我一天都不想再在这个学校呆下去了，我明天一早就走。”

“你要去哪？”

“新疆，走远点。”

“这位女孩？”

“哦，她是我在歌乐山上认识的，她愿意同我一块走。”

我蓦地感到十分悲伤。这是一个品学兼优、长得十分帅气的学生，我教了他两年英语，整个学潮期间，我们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师生兼战友情。那时，考上大学十分不易，毕业又是包分配，工作无忧。他把这一切全部放弃了，可想他的绝望之深。

“再见了，谭老师，您是我在学校唯一来告别的老师。您多保重！”

说完，他同他的女友转身离去。

我望着这对消失在夜黑中的、即将亡命天涯的背影，泪水倏地涌出来。

从此，我再也没见到他，21年来，我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了。

但是，我永远留下了我们在广场上的这张合影。

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位学生

接着，我看到孤身站在坦克前的王维林；看到被坦克碾断双腿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

无数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把生命都献出去了！

我仍然翻不过这道良知的坎。

……

令人欣慰的是，学生们对我的讲述反应十分热烈，事后好些天都追问不已，有的还打电话询问其父母，更多的是去网上收索。（当然一无所获，他们为此很困惑。）

我由此感到，哪怕谎言成为了“正常生态”，但一个人永远是渴望了解真相的，这是人的本性。

问题是，谁敢讲？

十四

2010年4月，青海玉树发生大地震。我所在的文新院大楼里挂起两条长幅：“点亮心烛，鲜花献上无尽思念”、“汇聚温暖，爱心迎来雨后彩虹”。紧接着便是“5.12”大地震两周年。那天，一进大楼，便看见一个纪念墙报。上面文字写着：“汶川灾区，一半是泪水，一半是微笑……”配的图片则没有泪水，全是欢笑——灾区人民在党领导下欢快幸福的笑容。不少学生在上面留言：汶川，加油！灾区，雄起！

看到那幅对联，“学术”上我没有妄加评论，文革中长大、后来又学外文的我，古文、诗赋水平极差。我只觉得这幅对联丝毫没打动我，它没有out of the button of the heart，而只是一个宣传口号。

但是，那个把惨烈的天灾和人祸的“5.12”又化作“微笑”的“喜事”则深深刺激了我。

失去了儿女的母亲们心里是永远的痛，“微笑”在哪儿？

一声声“加油”、“雄起”，是看球赛吗？

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才能培养出学生内心深处真正的悲悯心？我们的教育，什么时候才能唤起学生对人类苦难的伟大同情心？

此时，学校为了通过有关部门的评估，终于破费伟大银子，为学院安装了几间多媒体教室。学生们十分积极，有三个班争取到了多媒体教室的钥匙，于是，我在离开育才学院的最后一个多月里，有幸向学生们展示我的多年积累。

我并不愿把沉重加在活泼欢快的青春心灵上，但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何况，他们今后要面对的，是一个活泼欢快的社会吗？

当音乐、图片和我的讲解结束时，我看到，不少学生眼中出现了一份真正的深沉。

十五

一天，几位男同学送给我几份他们办的小报，希望我提点意见（他们得知我当过编辑记者）。我在上面看到学生写的一篇评论“美国绝不是什么好鸟”。我读后感到，其观点、语气、文风，与我们党报上的这类“大批判”文章如出一辙。还有位同学告诉我，他们有一门“政治类”的课（课名我忘记了），一位30多岁的教师经常在课堂上大批“美国霸权主义”，并告诫说：“美国亡我之心不死”。

这正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这种教育一直延续了下来。

“9•11”事件发生时，中国大陆上一片欢呼声。我女儿的中学（又是“育才中学”）的班主任对学生说：“什么悲惨？！美国太坏，活该！”还有，眼下，在网上，只要涉及到中美的有关“问题”，一定有大批网民对美国铺天盖地的批判和漫骂。

我们的教育，真的很成功，当年它成功地培养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红卫兵”，现在，又成功地培地养了“新时代的爱国主义者”。

有人说，中国和美国的媒体有一个共同点，都喜欢骂美国政府；中国人和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点，都把骂美国政府当作爱国。

不过，有一点绝对是中国特色，也是不同于当年红卫兵的“新爱国主义”特色，那就是，不少人一边用口骂美国，一边用脚往美国奔。

199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到北大讲演，北大学生马楠站起来，当着全世界的目光，痛斥美国的人权状况恶劣，一时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

令人不解的是，两年后，刚一毕业，她马上选择了到“人权状况恶劣”的美国，并且，投入一个“美国鬼子”的怀抱，生了两个美国籍的“中美爱情结晶”。

2009年夏，中国出了一本宣扬民族主义、反对美国霸权的书籍，名曰《中国不高

兴》。此书一问世便大受追捧，成为畅销书。但是，几个月后，因此书而名利双收的作者宋晓军，却办理了美国绿卡。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务院发言人袁木接受了美国人汤姆．布罗考的采访，他对布罗考有关中国在美留学生大多都希望留在美国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说：“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是会回到祖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的……从我自己来说，我衷心地希望他们回来，也相信他们会回来。”几年之后，他的女儿到美国留学，毕业后留在了美国。（后来，见报道说，袁大人本人也“以身作则”，投奔了“美帝”。）

还有，无数官员台上大骂美国，台下赶紧送子（女）赴美。就是贪官外逃，首选也是“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国。

这类例子太多了，也许，学生也看到这个“令人困惑的二律背反”，于是，一次下课时，一位同学突然说：“老师，你给我们讲讲美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这真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大难题。学生们同我当年一样，从幼儿园起就饱受那种教育，我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讲清楚吗？更主要的是，话语权不在我手里，我能一针见血地说：“民主是专制的天敌”吗？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的时代早已随“育才”的创始人陶行知先生作古了。

不过，我是英语教师，总能讲点英语，于是，我给学生选了几篇英语文章。一是帕特里克•亨利的“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二是林肯的“The Gettysburg Address”和爱德华埃弗雷特的“At the Dedication of the National Cemetery at Gettysburg”节选；三是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四是自由女神像英文介绍和爱玛•拉扎罗丝的诗句：“The New Colossus”

亨利说：“Is life so dear, or peace so sweet, as to be purchased at the price of chains and slavery? Forbid it, Almighty God! I know not what could others may take; but as for me,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林肯说：“Four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up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

爱玛•拉扎罗丝说：“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

这些千古传诵的名句和篇章也许能让学生了解一点真实的美国和学会几分独立的思考吧。

十六

2009年12月的一个晚上，我为06级的大四学生指导毕业论文。“学术”谈完之后聊

到找工作的事，几位同学都面呈忧虑，一片茫然。我说，文科生工作不好找，你们最好不要选择重庆城内，住房难，竞争烈，最好还是回到家乡当一名教师。

一位来自丰都县乡镇的学生说：“老师，您不知道，我们那儿找工作首先要有‘关系’，当教师还得花5万元‘门坎费’，有的地方还要高，没钱根本不行。我读育才花了9万多元，家里已经负债累累……”

30年前，我教的第一批学生毕业，有两名学生同时分到一个县。（当时国家包大学生分配，不需自己找工作。）我想当然地认为，县教育局一看档案，一定会择优录用。后来得到的消息刚好相反——优秀者分到了偏远山乡，差生留在了县城重点中学。

原因很简单，后者有“关系”。

30年过去了，“关系”十倍、百倍、千倍地狂热扩展，在“万能金钱”的推波助澜下，纵横驰骋、翻江倒海，淹没了神州大地起码的公平和公正！

我在讲台上曾说：“现在工作不好找，你们不抓紧时间多学点知识和本领，今后走向社会……”

话音未落，一些学生哑然失笑。

后来得知，这些学生根本无此担忧了，他们有权势、有“关系”的父母们早已为他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康庄大道。我甚至听说，有个别学生已经是“编制人员”——在领取工资了！

作为已有相当社会阅历的我，竟然还在用老套的“传统教育法”教育学生，怎不让人哑然失笑？

于是，在面对那些学习十分刻苦，成绩非常优秀，但出身“平民”的学生时，我心中十分难过：他们渴望通过自身奋斗来改变命运的道路不说此路不通至少是越来越窄了。

好多次上课，我在望着这些“毫无竞争力”的优秀学生时、在面对他们单纯的眼眸可爱的脸庞时，心中隐隐作痛。这种痛，既是来自一个无可奈何的教师，仿佛也是来自一个无能为力的家长。

十七

在育才任教的这两年里，身外的社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大事，如：三鹿奶粉、山西疫苗事件、云南大旱、富士康13跳、校园连环屠杀案……

我原本很想与学生讨论一下这些“身外之事”，但要完成教学大纲的“授业”任务让我无法去“解惑”。

不知学生对此有何困惑，有何思考。

6月24日晚，在告别08级1班时，有个同学突然提了个问题：“老师，您一直教育我们要有正义感、要正直、要善良、要有同情心。但是，我们感到，今后走向社会，要想安身立命、要想保护自己、要想得到提升，必需要学会用心计、学会说假话、学会讨好领导、学会投机钻营。您给我们讲到您以前一次次碰壁、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时，也让我们感到这一点。那么，我们究竟该相信什么？究竟该怎么做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问得我在6月的娇阳中满头大汗；

问得我在夏季的“寒冷”中哑口无言。

面对一个“劣币驱逐良币”的生存空间，作为一个教师，或者作为一个父亲，他该怎样教育下一代呢？培养他(她)正直忠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做人品质，还是教他(她)老谋深算、会说假话，懂得讨好领导的“生存本领”？

1989年“6•4”之后，我从“学术”的樊篱中跳出来，拿起笔开始从事文学写作。我首选的是针贬时弊的杂文。

我一篇接一篇地写，文字触及我看到的种种丑陋。

可是，“社会”迈着它坚定的步伐，朝着它既定的方向，风驰电掣，高歌猛进。我那点自以为是的“针贬时弊”，尤如一滴苍白水露，转眼消失在它东风浩荡、红旗漫卷的长天里。

有什么用呢？

2500年前的孔夫子，面对整体的礼崩乐坏，无奈之余，只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那么我呢？

十八

距育才学院十多公里外的草街古圣寺，是“育才”的发源地。71年前（1939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这儿创办了育才学校。

那一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陶先生怀抱大爱，将一些失学的贫困孩子收养，以嘉陵江边一座古寺为校，悉心为国家培育人才。这，便是后来誉满天下的“育才”起源。

一个雨意阴沉的下午，我来到古圣寺。

几株百年大树将寺院正面掩去一半，深绿色的稻田和荷塘映衬着古黄色的院墙，大门两旁的墙上，书写着“忠”、“孝”、“禅”、“林”几个大字。

山风习习，池水涟涟，心，顿时澄静下来。

居然不收门票，这在眼下的中华大地上实在罕见得让人感动。想来，一定是当年陶先生不收学费的古风传承。

寺院有一个看守人——85岁的杨婆婆。她支着一根长长的竹竿，陪着我从一间教室到另一间教室。

“我当年在这儿读过书，”杨婆婆很自豪地说。“我在这儿见过不少大物，如冯玉祥、周恩来等，陶校长嘛当然更见过。那时有300多个学生，房子不止现在你看到的这一点。‘文革’时寺庙的很多房子都被‘破四旧’破了，如果不是当时拆那些花板时摔死了一个人，可能现在这点都留不下来。”

我走进标着“舞蹈组旧址”、“音乐组旧址”、“社会组旧址”的古旧教室，目光在那些布满岁月风尘的木头桌凳上搜寻。

搜寻什么呢？我似乎也说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71年前，一定有我不熟悉的、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东西。

看得见的，是不少大师级的人物在这儿任教，如：大诗人艾青、电影艺术教育家章泯、幼儿教育家孙铭勋、版画家陈烟桥、历史学家翦拍赞、舞蹈家教育家戴爱莲……

读得到的，是创办者陶先生的经典名句，如：“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 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做个真正的人，第一就要有思想。”、“我要有一句话奉劝办学同志，这句话就是‘待学生如亲子弟。’”……

位于古圣寺的育才学校旧址

我从一间教室走到另一间教室，像考古一样探寻“远古的神韵”。

它仿佛离我很远了，虽只几十年，但已沧海桑田。

可是，它又那么近，那么显而易见。

稀疏的雨点若存若亡地洒在古旧的庭院，发出一种叹息般的悠远回音；陈旧的图文无声无息地述说着一段辉灿的历史，传递着一种明白无误的精神气质。古寺虽小，存物不多，但我毫不费力地看到了陶先生和他的“育才”的灵魂——真情和爱心。

育才学院校园里，立有一尊陶先生的半身石像，女儿毕业时，我专门携她在石像前合影。可是，我每次看到那尊石像，都觉得它就是一尊石像，一尊只有躯壳，没有了灵魂的石像。

离开古圣寺时，我掏出一点钱酬谢杨婆婆，不料她坚决不要。她说，能够向我讲述当年的事她就很快乐了。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很“世俗”，在伟大前辈的魂灵前，我这个后来者只有惭愧。

浸泡在金钱和谎言中的“肉身”，怎能触摸到“育才”的灵魂？

十九

2010年6月底，最后一周在育才学院上课。

三个月前，我提出了辞职。为什么呢？原因种种，主观客观的都有。有对眼下身外世道的失望，也有对未来潜心写作的渴望，甚至，仍然有隐隐的浪迹天涯的“浪漫”。

不料，随着离去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越来越强地生出难以割舍的依恋之情。

校园内满目的苍翠，教室里可爱的晶莹。

课堂上的交流互动越来越圆润，与学生们的感情越来越浓郁。有一个班各方面的程度都较差，我最初教得很吃力，心情也不好。后来我发现，我的教学方式和态度上也有

问题，这个班的大多数同学其实都有求知欲，也能学好。到第二学期的后半部，我感到这个班明显的长进，听课越来越专心，纪律也越来越好。

08级1班是晚上上课，他们的教室正好在路边，每次晚上去上课，从外面我远远就能看见他们。

他们坐在教室明灿灿的灯下，睁着晶莹剔透的眼睛，面对讲台黑板，等待着我的到来。

晚风徐徐吹拂，送来夜的温馨，即将到来的上课铃声带给我一种激动、愉悦和渴盼——“Good evening everyone”之后那洋溢着鲜活青春的回应：“Good evening teacher！”

对外汉语08级1班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无论是学习态度还是学习效果都让人十分喜爱。“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一大幸事。”

可是，再不会有“See you next week”了。最后一课，我失去了往日的幽默和潇洒，学生失去了以前的笑意和热切。下课的铃声响了，我一如既往地说：“Goodbye everyone”。

教室里一片沉寂，没有一声回应。

二十

我教的上一届学生照毕业像，他们邀请我来到操场。

雨后的校园清新洁净，白色、蓝色、红色、黄色的校舍掩映在茂盛的绿茵中，呈现出一种幽雅、宁静和美丽。

操场上，笑语盈盈，青春四溢。一张张熟识的面孔唤起往日的师生情谊和那一去不复返的课堂时光。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走上来同我合影，我站在镜头前，享受着“明星”的待遇，脸上，做出微笑状，心里，充满了一种失落和感伤——不得不挥手作别了，十里长亭，“今宵酒醒何处”？

脸上，作出微笑状，心里，充满了一种失落和感伤

也是在这一天，中午12点下课后，七、八个学生不愿离去，在教室外的过道上围着我整整站了近三个小时。

一位学生眼含泪光，几乎恳求地说：“老师，您可不可以不走嘛？继续教我们！”

另外一些同学则抓紧时间一个接一个地提问，其中包括向他们推荐值得读的书目。

“你们不吃饭了吗？都下午两点半了。”我说。

“不，吃饭不重要，您走前再多给我们谈谈，我们该怎样……”

那一刻，我刻骨铭心地感到，三本院校的许多学生，心灵深处同一本、二本院校的学生一样，有强烈的求知欲、上进心。他们的心智只要获得良好的引导开发，一定会散发光彩。大学四年，每一年，每一学期，每一周，他们太需要良师益友型的导师来引领和指导他们了！！

他们不是企业生产线上的物质产品，他们不是按人头收费的进财渠道，而是一个个正在成长、身心需要呵护、心智需要开发、灵魂需要关爱的鲜活生命！

望着他们切切的目光闪闪的泪眼，我心里十分难受。

这些年，我换过不少工作，见惯悲欢离合，但这次为什么这么动情、这么伤感、这么依依难舍？

是人老了？

他们是需要关爱的鲜活生命！

下午，从操场合影回来，我再也把持不住，拿起电话，拨通了文新院的院长。

“唉呀，不行了。”院长说。“你坚持要走，我们另外进了人，英语教师的名额已经满了。”

我放下电话，心中回响起海涅感伤的诗句：

“我想仍停留在你的怀中，

车夫已把马儿牵来。”

二十一

6月25日中午12点，下课的铃声宣告我又一段人生之旅的终结。一些同学走上讲台，与我合影留念。这时，一位同学把一个彩色笔记本递到我手里，我说声“谢谢”，并没有在意。

晚上静下来后，我才想起它。

笔记本封面是一个浅灰色的猫头，上面坐着一个身穿粉红色衣裙的小女孩，里面的彩页是猫、花朵和女孩的衬影。（后来得知，他们听说我最心爱的猫“lili”刚摔死了，便特意选了这个笔记本。）

我翻开笔记本，一页一页读下去：

Dear Mr Tan:

……你在小小的教室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大大的世界，让我们在中西文化的故事中留连，让我们在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忘返。更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善良正直有责任心的人……知道为什么你说“good bye” 时我们全体沉默吗？因为我们不舍，不愿就此拜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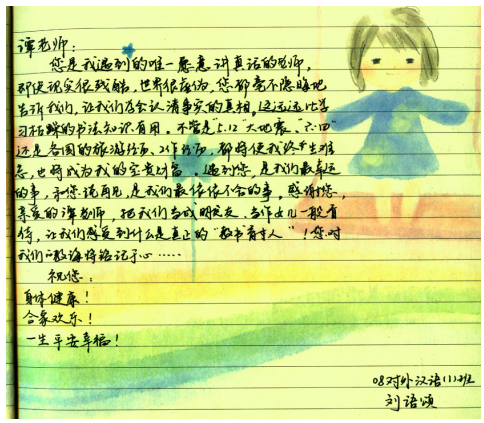
Dear Mr Tan:

你是真正平等地对待学生、爱戴学生、尊重学生的老师，是真正对得起“教师”二字的老师，是真正打开心扉告诉我们真、善、美的老师，我真的很骄傲自己做了你的学生……

尊敬的谭老师：

……一年的时间似乎漫长却又短暂，尤其是短短的上课时间。每次你讲到快下课时，匆匆忙忙地看看手表，又说：“糟了，讲不完了！”后面精彩的内容也总是随着下课铃声消失。我常常在想，什么时候能够不受铃声的限制吸收老师带给我们的广博知识……

谭老师：



您是我遇到的唯一愿意讲真话的老师，即使现实很残酷，很虚伪，您都毫不隐晦地告诉我们，让我们学会认清事实的真相。这远远比学习枯燥的书法知识有用。不管是“5•12”大地震、“六•四”，还是各国的旅游经历，工作经历，都将使我终身难忘。遇到您，是我们最幸运的事，和您说再见，是我们最依依不舍的事。感谢您，亲爱的谭老师，把我们当成朋友，当成女儿一般看待，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教书育人”……

谭老师：

谢谢您把最真实、最实用、最有价值的东西教给我。老师，谢谢您把生活的不同面展示给我，让我用心去体会其中蕴涵的东西。老师，谢谢您就像清晨的第一束阳光照进我的生命里……

若干年后希望我也能成为像您一样的好老师。

用自己的努力去爱学生、爱工作、爱国家…….

几十个学生8000多字的临别留言，点点滴滴，像山间清纯甘甜的山泉，浸润了我心底最嫩绿的芳草地，我立马意识到，这是我在育才学院收获的最有价值、最为珍贵的东西，也是这些年我走南闯北，奔波劳顿后获得的最丰硕、最厚重的礼物。

因为，它们是一颗颗盈满真情的心。

我在这一颗颗纯真的心灵前沉思浩叹，闭目感怀。

金钱的力量威烈浩荡所向无敌吗？仿佛是的——看看身边这个彻底物质功利化了的金黄世界；陶行知先生当年创办育才学校是为了金钱吗？绝对不是——读读陶先生那一篇篇闪耀着伟大爱心的质朴文字！

陶先生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他还说：“教的人尽义务，就能和学的人发生一种很宝贵的友谊。”

要收获真情和爱，只能用真情和爱去耕耘；要“育才”真善美，只能用真善美去培育。

二十二

7月1日，星期四，我回学校交考试成绩表。对外汉语08级1班的同学得知我回来了，决定全班集合，晚上六点在我教他们的教室外合影留念。

那天，天气酷热，汗流不已。全班同学都没去吃饭，准时到来。

先集体合影，然后分寝室，接着是个人。

我脸上挂着强装的笑容，心中充满了离别的感伤。

这些年，我从事过不少职业：编辑记者、商务贸易、广告策划、（不）自由撰稿……。然而此时，我刻骨铭心地感到，作为一个学生喜爱也喜爱学生的教师，是天底下最滋润心灵的职业。它不像我在《中华手工》时奔走在辽阔大地那么风姿多彩；它不像我在国际公司时出入豪宴华府那么光鲜亮丽，但是，它涓涓细细，晶晶莹莹，浸润着我心灵中最柔软的芳草地。

望着学生们真诚可爱的青春容颜.....

在金光辉灿的物质王国上空，高扬的理想主义大旗和久违的精神境界阳光，传递着一种透彻心灵的美感。

当你发现你的言行深深影响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当你感到你的劳作促使了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流淌，那种快乐和成就感岂是金钱和名利所能企及！

挥手告别时，望着学生们真诚可爱的青春容颜，我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把育才学院最珍贵的东西永远留在身后了。

七点半的上课铃声响了，但不再有我笑盈盈的问候和他们笑盈盈的回应。

一种巨大的空虚和失落感，如汹汹逼近的暮色，沉甸甸地笼罩心头。

二十三

告别的时候到了。

最后该说什么呢？

“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

——仿佛没有这么潇洒。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

——仿佛不该这么悲切。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对了，就是它了，伟大的前辈陶行知先生！

2010年7月18日

附一篇学生的留言：

Dear Mr Tan:

时光匆匆流去，一年，转瞬间将成为过去，在这短暂的一年里我们能遇见您，能享受您带给我们的快乐，能得到您父爱般的关怀，作为您的学生，更多的像是朋友和女儿的我，感到万分幸福和数不尽的快乐。

老师，昨天晚上您最后一次在9408教室给我们说再见时，您或许知道为何我们都没有像往常一样快活的给您说“see you”了吧！“see you！”=“再见”，我们曾经可以很轻松很快活的对您说，但昨天晚上我们都默不作声。因为我们不愿，我们不能，我们也知道能“再见”或许已经成为不可能，在下课铃声响起的那刻我的心里万分难受和不忍。我多么希望时间能永远停留在昨晚的7：30到9：00之间，那样我们就可以永远不说再见，永远当您的学生，做您的朋友，做您的女儿。

老师，当您昨天晚上课后在教室留下给同学们解答，与同学们作最后一次交谈时，我在中途悄悄的离开了，没有与您道别，没有和您说最后的再见，我不想陪您聊到最后，看着您在黑夜中渐渐远去，只给我们留下难舍的怀念，只给我们留下您那父亲般伟岸的背影。后来，在我回宿舍的路上，我也总是想起以往您每次离去的背影，我就在心底告诉自己，“老师以后还是会像以前每次离去那样，和我们说下周见吗？不了，老师再也不会和我们有下周的相见了。仅管如此，但老师的笑，老师的乐，老师的每一次上课，老师的每一次教诲，都会永远刻在我的心灵深处和我的大脑里。”那时，不知不觉，两腮已经有了一颗颗晶莹的液体……回到宿舍，听到的仍然是关于您的事。同学们在讨论您的去留，大家都说：“明天过后，谭老师就离开育才了。”我们，那一刻全都忘记了什么叫快乐，不是，每个人都很沮丧，脸上也看不到一丝笑容，我知道她们也和我一样，舍不得不再见您这样的老师，您这样的父亲。

老师，我希望您离开育才后不要忘记我们这些美丽可爱善良的女儿们，我有您的电话号码，我希望以后如果您更换电话能告诉我，因为我不想和您失去联系，我希望您能允许我以后用电话的方式和您一起再分享我们的快乐。老师，我也永远记得昨晚您在黑板上留下的“Forget me not！”以后我走上三尺讲台的时候，我一定会将您告诉给我可爱的学生，我恳请老师“Forget me not！”

老师，千言和万言都道不出我此刻的心情，此刻的不舍。我相信我们有缘作师生，也有缘做一辈子的朋友和父女。老师，您以后一定要继续关心我们。

老师：Forget me not！

老师：祝您健康快乐！

爱您的学生/女儿 XX

08对外汉语1班

2010年6月25日早晨8：00。

育才学生们的涓涓留言，仿佛有一种涵涵的力量，势不可挡地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我放弃了挥手作别，浪迹天涯的决定，匆匆扭头，跳到了另一所三本院校。下面，就是我在这所学校里的“心路历程”

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育才学院的学生

教中外文化交流课的感慨

学院突然安排我上一门新课——《中外文化交流史》。这门课以前学院从未开过，院长找到我，大概是因为我学外语出身，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其实，我从没学过这门课程，对中外文化交流所知甚少。不过，学校并不在乎教师是否是学该专业出身，只要能照本宣科，学生不闹就行了。

我对文化、艺术方面的课一向很感兴趣，便斗胆接了下来。暑假里，我借了十几本相关的书籍进行恶补，又选了一本从简介和目录上看还不错，价格也较便宜的教材。

开学前，我才拿到教材，一看，傻眼了，教材编得像是一本考古书，读起来艰涩枯燥。真不懂我们这些编教材的学者，为什么不用流畅明快的文字来写作，难道非要八股加考古才能显示出高深的“学术性”？

可怜我们那些成天背僵死教材的学生们！

我干脆把教材抛开，决定自己编写“谭氏教案”。

第一部分丝绸之路是一个老生常谈、大家耳熟能详的章节，学生中学时大都学过。我决定跳出“老生常谈”的框架，将历史、地理、文化、风俗和我自己身临其境（我曾两次亲临河西走廊，并走到新疆喀什、和田等地）所拍的照片等融为一体，再加上自己的感受，立体地向学生讲授。结果，收效很好。学生说中学学的都是名词、概念，现在才是饱满的血肉。

接下来讲佛教东传和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大获成功。课后，学生纷纷来拷我的课件——那上面有我的很多“专利”照片，如：河西走廊上的马蹄寺石窟、甘肃西峰北门石窟、山西的云冈石窟、洛阳的龙门石窟等等。我将这门课我做的课件和近千张图片、照片全部拷给学生，我对他们说，今后你们用我的课件和资料，再读读书，就可以给你们的学生讲相关的内容了。

在讲课时，我不时将历史和现实结合，甚至将自己的经历、感受相结合，给学生一种“立体的启发”。比如，在讲了法显和尚、玄奘和尚、鉴真和尚西天取经，东渡传道的事迹后，我专门花了一节课讲上世纪90年代魂断罗布泊的“大侠”余纯顺的故事。最后以我徒步川康——塔公高原的真实经历为结束。这一章节讲下来，不仅让学生了解到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些内容，而且让学生领悟到人的精神、人的意志、人的追求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信仰、人与功名的关系。

1997年我徒步塔公高原路上

也是在这门课上，我获得了一次“殊荣”——学生们为抢前排座位发生冲突。

给09级对外汉语上这门课时是星期三晚上7点。学生们早早地就聚集在教室门口，等待老师开门（多媒体教室必须由任课教师在管理室领钥匙开门）。每次我一开门，学生一涌而入，抢占前排的座位。结果，有外来旁听的学生抢占了最佳位置，这引起了“正宗”学生的不满。“冲突”之后，他们决定，由班干部出面6点半就去领钥匙，以免被旁听生“鸠占鹊巢”。

这使我很感叹——一个老师获得的最大的回报就是他得到了学生的认同。

上这门课还有一个感叹——

每次给新班讲课之前，我都要提一个问题，中外文化交流，你们认为是中方给予外邦多，还是相反，或者说两者相等。除了有少数同学认为两者相等之外，绝大多数都认为中方给予外邦多，几乎没有一个认为外邦给予中方多。

我问为什么，请举例为证。几乎全体学生都举出那如太阳一样古老，如太阳一样光艳，也如太阳一样永恒的中国四大发明。

这也是我从小受的教育，这也是我们永恒的骄傲，这也是我们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给08级对外汉语上课时，他们已经是大四了，大学都要读完了，仍然是这种认识，我不由心生感叹。

但是我没作评判，我把课讲完后让学生自己得出答案。

在物质层面，我分类列出了中国本土的东西，如食物方面的水稻、粟（小米）等，用品方面的丝绸、瓷器等等，相应的我也列出了外来物品，如在讲食物方面时，我专门花四节课讲了南美的三大文明，玛雅、阿兹克特和印加文明，因为在16、17世纪输入中国的玉米、红薯、土豆、花生、番茄等等，对中国影响巨大，直接导致中国人口剧增——从几千万到几亿，而这几种食物都产于南美。

在宗教、文化、艺术方面我着重讲了佛教和它2000年来对中国的影响。

……

在课快结束时，我问了学生几个“现代”问题：

你们现在用的手机、电灯、电脑，乘的轮船、飞机、火车等都是谁发明的？

你们戴过的红领巾，还在过的共青团组织生活，还要加入的党是哪儿传来的？现行政府的机构，如：政治局、组织部、某某委员会等是哪儿传来的？

你们的必修课马克思理论概论等是哪个国家的？

……

从历史到现实，从物质到文化，从社会生活到意识形态，我讲完了，让学生自己去评判。

附录一：《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生留言

这是一门我自制教材的课程。我自身走南闯北的经历、近千张图片和我写下的一些“图配文”与“文配图”，再加上课堂上的多媒体，使我能够立体地给学生展现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共给六个年级三个专业约四百多名学生讲过这门课，学生留下了大量

的感想，下面主要选自09级对外汉语学生的一些留言。

一份感动

这门课没有教科书，于是，对于我这种习惯了课本笔记、考试重点的学生而言，感到兴奋新鲜。我们将只为知识而非为考试而学习。我在轻松的心态下跟随老师开始了一段别有意义的文化旅程，也是一段唯美的心灵历程。

随着老师穿梭在古今中外的文化艺术长廊，多了份感动：感动人类为信仰而付诸的各种艰辛努力；感动于人类为了艺术而创造的新艳灿烂夺目的文化艺术作品；更感动于一位真正把我们当成学生的老师，费心尽力地为我们付出的真心。

……法显和尚，那位65岁还坚持动身前往佛国求取佛法的高僧，是怎样一步步走去印度的？信仰，多么美好的一个名词，它是力量、勇气、坚强的代名词。

巴洛克式的建筑，哥特式的教堂，各种形式的艺术作品，仿佛在这门课中鲜活地走进了我的心灵。罗丹、雕塑，还有那位美丽的才情女子——卡米尔.克洛岱尔，有血有肉地带领我走向艺术之门。……

我感受到我进入了一片广阔无垠的文化艺术领域，这同时也是一片肥沃的精神天地。总觉得这场旅行不应该这么快结束，文学、艺术、宗教、哲学等多位一体的精神世界是对现实生活黑暗面的调和剂，有它的支撑，可以抚慰生命个体的孤独感伤和身心的鳞伤。

心灵，被文明的光辉所照耀

目光还停留在罗丹雕塑上，竟不察觉我们已走到了课程的尾声。

这是一次涤洗心灵的旅程。从龟兹、精绝、贵霜到楼兰，从喀什少女家中的工艺品，到“思想者”深陷泥土之中的脚趾，心灵，被文明的光辉所照耀。

我们总是自满于物质的丰富，却忽略了精神的升华。

课程完结后应有的轻松之感被一丝丝滞留心中的意犹未尽与不舍所代替。回顾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精神的拯救与人生的启迪。它真正讲进了心里，印在了脑海中，没有了课本、教材或随堂笔记也并不重要了。此时，耳畔也似乎还回荡着丝绸之路上驼队清冽的铃声……

传播一种启迪心智的思维方式

每周三的晚上，仿若置身在弥撒日的教堂……

这门课程传播的不仅仅是中外文化交流中的点滴知识，它更多的是传播一种新的、启迪心智的思维方式。与其说这是一门文化课，还不如说这是一次心灵对话和启迪心智的游历。从佛教中的健陀罗艺术到石窟壁画的雕塑美学，从基督教的圣歌到塞那河畔的静谧光彩，从施坦因的敦煌到余纯顺的罗布泊……成百上千张图片和文人骚客独有的解说，带领我们享受了一次在视觉和听觉上无与伦比的饕餮大餐。自由的精神，救赎的灵魂……我恍然明白，有一个上帝的孩子为何在圣歌响起时泪流满面。

我想回到某个辉煌的过去

从绵延苍凉的丝绸之路，到坎坷艰辛的三位高僧的西行或东渡；从敦煌壁画上丝带飘飞的香音之神，到云冈、龙门石窟里巧夺天工的佛像；从西方哥特式教堂的玻璃窗到罗丹的《地狱之门》，璀璨的艺术与文化透出信仰的力量和智慧的光芒……

我想要像《午夜巴黎》中的男主人公一样，在午夜登上一辆马车，穿越时空，离开这个所谓经济文化繁荣的时代，回到某个辉煌的过去。

一点点地改变

每次上您的课，我都觉得是开启一趟旅行，进行一种心灵的修行，是内心最开心、最舒服、最投入、最没有压力的，是最纯粹的学习和对知识的向往。渐渐地，我觉得我发生了一些变化。从以前只知道死读课本，只知道追星和玩耍，到现在关注新闻和重大事件，关心国家和人民的命运，懂得分析，并有自己的想法。我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在一点点地改变。

真正的像一个大学课堂

上了这门课，我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学问。在课堂上，谭老师用幽默的语言为我们讲解了中外文化的差异，并且对中外文化的交流提出了自己独具一格的见解。在课堂上老师并不是用生硬的理论知识照本宣科，而是用生动的例子和诙谐的语言将中国与外国几千年的交流史娓娓道来，听得同学们时而捧腹大笑，时而叹息流泪。他的课才真正的像一个大学课堂，非常受欢迎，以致每次都要提前去，有的同学更是将摄像机带来，录下他的每一节课，回寝室后大家再一起观看。

如果我有幸成为老师

您与我以前认识的任何一个老师都不同，与传统的“教书机器”完全不同，不用教材，淡化考试，带我们到文化与艺术的殿堂畅游。同时，我也在您身上看到一种激愤之情，一种肩负责任和使命之感。如果我有幸成为老师，我将以您为榜样，为身处封闭高墙包围的孩子，开一扇心灵之窗、智慧之门。

课堂是有灵魂的

这一科我最大的感受是：课堂是有灵魂的，学习变得自主，不知不觉就掌握了知识，我没有压力，只有莫名的喜爱，想去知道，吸收所有。

这课安排在周三，也让我觉得周三是一周中最开心的。以前从没觉得上课可以让人开心。只有在谭老师课堂上轻松愉快地学到了很多知识。每次都让我觉得三节课怎么那么快。我不是一个文艺青年，但我却被吸引，进入了您的艺术空间。

这门课唯一的缺点就是旁听同学太多，坐在后面有时听不清。

一不小心就改变了

谭老师一直都说自己喜爱的是艺术，而我则倾向于认为你是思想家。因为你总是能

给人以思想上的启发，带人看到之前没有注意到的风景，说不定一不小心就改变了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思想理念。

拿回去随便写点什么吧

第一节课上，老谭说：“我希望淡化考试；我希望我尽量对你们说真话；我希望你们坐在这里纯粹是为了对知识的渴求……”听到这些话，我轻笑：最终也不过是言过其实罢了！

大半学期的课上下来，老谭从丝绸之路讲到了佛教东传，从耶稣诞生讲到了罗丹艺术……绘画、雕刻、音乐……。课堂上的老谭嬉笑怒骂，滔滔不绝，让没有课本的我们切实的体会了一把什么叫乐在其中。

睡我上铺的那位姑娘，说她时常梦到老谭讲课时的情景，还说梦里有敦煌石壁上的飞天，有西去取经路上的玄奘、法显，还有那些无头的佛陀……

转眼课程已到最后，老谭把卷子发下来，轻描淡写地说：“拿回去随便写点什么吧。”

听到这句话，我感叹道：老谭终究是老谭。

老师这个职业真的很神奇

老师这个职业真的很神奇，老师一句话就有可能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发展。我现在开始思考很多以前没有思考过的问题，也在想自己以后也当老师的话，什么样的老师才算一名成功的老师?这门课带给我太多的思考的同时也教会我去欣赏美，艺术的美，真正的美。和这门课告别了，但是却是我开始走入艺术殿堂的一个序论。

这门课对于我而言

每一次谭老师的课，带给我们的都是一场视觉的盛宴，是一场精神上的洗礼和一次知识上的升华！这门课对于我而言，它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知识教育，更是一种诗意化的艺术教育，一种发人深省的人性教育，一种触及人灵魂的内心教育。

那一幅幅的图片、一字一句、每一个知识点，都是谭老师精心地挑选和准备的，在全校唯一一科没有教材的课的情况下，谭老师却能把它上成最丰富多彩的一门课，也是最有声有色、知识面最广的一门课！

我的改变

我们这一代的学生都是分数的奴隶，老师看的是分数，家长看的还是分数。学校不重视文学素养方面的培养，没有老师会抽出时间，带我们领略一番艺术的芬芳，音乐的美妙。从小到大，我甚至没上过几次音乐课、美术课。老师永远在讲台上照本宣科，我们在下面要么眼神迷茫地看着他，要么低下头抄笔记。我们的生活湮没在浩瀚的教科书和永无止境的试卷中。

上了这门课，我特别震惊，每次课后我都会和同学讨论一番。您总能带给我们思想上的震撼，涤荡我们的整个身心。自从上了您的课，我开始关注政治，关注历史，关注

艺术，并且对这些充满了兴趣。

其实，每次上老师的课都是又高兴，又自卑，高兴地是又能学到许多我不知道的知识，自卑的是我从来不敢自信地说："我知道。"

老师也曾感叹："现在的大学生是党让他知道什么，他就知道什么；党不让他知道什么，他一概不知。"老师的感叹，余华在《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也有同样的感叹。也许，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像您这样的老师，来唤醒我们，来拯救我们糟糕的教育。

从前，没有老师会告诉我们考试不重要，让我们淡化考试；以前，我会因没考好而生气落泪。现在我更加看重的是我学会了什么。

记得有一次有一些同学没来上课，您很生气，说您很用心为我们备课。有同学说其他老师也有很认真的备课啊，但他们怎么没有生气。我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因为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呀。后来我终于想通了：您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我们身上，希望每一个同学都能有所收获，所以不希望有任何人错过。

在享受的状态下学习

学了这门课后我的感觉是：终于有老师不是照本"灌"知识了，终于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去学一门课程了。上这门课完全没有任何压力，都是在很享受的状态下完成，因为一开始老师就没有任何强迫性的目的，所以，我并没有写下一字半字的笔记，但是历史的脉络却记在了脑海里。

用心去感受

这门课让我感受深刻的是老师让我懂得了什么叫用心去感受。慢慢跟着老师的思路走，就有了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特别是后来讲俄罗斯巡回画派时，从老师的讲述和图片中我深深感受它的魅力，欣赏到作品的美妙。最后的一节课，对于一个没有一点艺术细胞的我，居然能如痴如醉。

心灵的触动是大于知识的获得

我记住了老师的两句话：

"文学、音乐、美术是互通的。不懂欣赏音乐、绘画的人，不会成为一个好作家。"

"一个民族不对自己的过去进行反思，灾难必然会重新降临。"

我想，心灵的触动是大于知识的获得吧。

“崇洋媚外”的“愤青”

在教学中，学生对我批评最多的有两点：第一是“激进”（或者说激愤、偏激），第二是“崇洋媚外”。

一，老师，你太激进！

作为一个教师，在某种程度上说，我是不合格的。因为，教师在课堂上应该是理性平和、稳重端庄、娓娓讲述、因循善诱，而不应慷慨激昂、手舞足蹈、喜怒于色、爱恨强烈。

记得当年我刚上讲台不久，就被一个学生班长向校领导汇报，说我课堂上教态不好，太自由太随便，甚至还坐到了课桌上。我因此被校党委书记传唤，一番严词训斥之后，书记说，这是社会主义课堂，要我立即改掉“资产阶级教态”。那时我还很“稚嫩”，底气不足，不敢公然“犯上”，心中虽不服，但敢怒不敢言，只得事后愤愤写下一篇文章“略谈教师教态”，以宣泄心中的不满。（见后）

几年前重返讲台时，我已经年过半百，可惜，我仍然像一个性情中的少年，喜怒哀乐都在脸上，爱恨情仇一览无余，实在缺乏一个老师应有的稳沉、端庄、冷静、矜持。

这个缺点在讲新闻课时尤其突出。

新闻课经常要联系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件，而这几年来，社会上发生的惊天事件实在太多：“我爸是李刚”、“小悦悦事件”、“动车事件”、“钱云会事件”……。在分析讲述这类事件时，我常常缺失冷静，一不小心就咬牙切齿兼张牙舞爪。

不少学生很不适应，甚至反感。

我能理解他们。他们这一代人是在相对安稳舒适的环境里长大的，首先不缺吃穿，第二没遇到大的社会动荡，第三饱受“六•四”之后的爱党爱国教育。他们从学校到学校，远离社会；他们大多是独子独女，饱受溺爱。父母们对他们呵护有加，学校给他们洗脑有术。从幼儿园起，他们就被灌了一脑子“伟大、光荣、正确”的灿烂阳光。突然间，他们一头撞上了一个撕下大片乌云劈头砸来的老师，自然很不适应。另外，他们见惯了稳沉庄重的老师、和风细雨的讲述和中规中矩的教态，一下子遇到我这样有几分野性狂放的人，肯定有看法。第三，也是最重要的，“8964”之后，在当局的精心打造下，中共已经很成功培养出了他们希望的新一代。与上世纪80年代的学生相比，他们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也消失了理想情怀。他们主要关注的是文凭、工作、工资、出国等与自我生存相关的东西，与他们切身利益无关的（如发生在他人身上的苦难），则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和“激愤”。

其实，一些认为和指责我“激愤”的学生，一旦自身遇到了“事件”时，立马就理解了我的“激愤”。

有一个学生，大四时到一个区县的一所中学实习，她工作认真勤奋，书教得很好，受到学生老师的一致好评。她很想能被该校招聘，而该校也正需要一名语文老师。经过一番努力和争取，胜利已经在望。

一天，校长叫她把一些“资料”送去。她于是把发表的一些文章和获奖证书等送去。结果，她落榜了，另一名送了“资料”的竞争者上了榜。事后她才明白，这是个“潜规则”——这个“资料”不是一般的“资料”，而是印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头像的“资料”—— 8—10万人民币。

她失魂落魄回到学校，向同学讲述她的遭遇，“激愤”得声泪俱下。

还有一个学生，毕业后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来，在电话里他十分激愤地说，这个社会太混账，他考第二名不录取，考第十名的录取了，因为对方有“关系”。最后他说：“谭老师，现在我明白为什么你在课堂上那么激愤了”。

在给10级新闻班的最后一堂课上（该班近一半的学生认为和批评我激进或者说激愤），我说：“我的确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因为我太激进。”我为此给学生道歉之后，也为自己辩解说：“我之所以这么激进，是因为我的血还没冷，对社会的不公义愤填膺，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

附：我24岁时写的文章——

略谈教师教态

人们通常认为，教师在课堂上应严肃端庄，沉稳持重，举手投足，需有规矩方圆。否则，就有失师表尊严，缺乏学者风度，甚至有“轻浮”之嫌。

其实，这是一种狭隘的偏见。

固然，讲台上，不同于课外，理应注重教态。但教态本身，首先应当是为教学内容服务的，采取什么样的教态能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就是最“严肃认真。”从这个角度上讲，“严肃端庄”主要应用于辅助教学，而不应当作表现气度尊严的色彩，更不应该把它作为教师讲台上必备的唯一脸谱。

记得一次外教上阅读课，遇到“蹒跚、“跛行”、“跳行”等生词时，她既没叫查字典，也没用一堆术语和例句来解释，只是模拟该词的动作，边跳边读。这不仅使课堂变得活跃，而且使这些词的音和词意很快印在我们记忆之中。

这似乎是教学法问题，但实则更涉及教态。我们一般认为教师在讲台上蹦跳是不成体统、有伤大雅之堂。但事实证明，学生往往很欢迎比较随便活泼的教师，因为他们常能造成一种轻松活泼的课堂气氛，引起学生的兴趣，抓住并保持他们的注意力，对学习大有裨益。回想我们读书期间，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多半是那些活泼幽默，有鲜明个性的教师，他们所教授的知识，也不易忘掉。

我们民族一向比较内向持重，对教师的要求就更是如此。旧时先生是一手执书，一手握鞭，威严十足；现在虽说有了许多根本的变化，但仍然深受传统影响。一堂课下来，多是一种表情、一种声调，在教态上少有变化，使人觉得缺乏外在的感染力。大自

然本身变幻无穷，大千世界一向色彩缤纷，讲授这些丰富多彩的自然、社会知识，为什么不可以辅之丰富多彩的教态?我觉得，课堂上，结合内容讲解，该柔和则阳春三月；该严肃则深沉低回；该激昂则滚滚滔滔，落地有声，该幽默则峰回路转，妙语联珠；潇洒中含严谨，持稳中有机敏；得意之处，何妨眉飞色舞，情感之至，为何不可声泪俱下。总之，教态应是一江流动的水，与河床紧密吻合，从湍激中学生更了解河底陡斜，从回旋里更看清两岸地势。从头到尾一味“严肃端庄”、“稳沉持重”，师表倒是尊严了，也许还不乏学者风度，但总嫌有些枯燥死板，催人入睡。学生们，特别是初中、小学生，有可能就因此丧失了对这门课的兴趣。

当然，强烈生动的外在感染力，首先是来源于丰富的内在情操，独立的个性，特别是广博的知识和对本学科深刻的理解，其次才是外在技巧性的自我训练培养(否则就确有“失尊”、“轻浮”之危)。

现在. 随着经济的发展，交往的扩大，我们的学生应当是灵活机敏型，而不是旧时书生气十足。这在教态上就要求我们教师丰富多变，生动活泼，从而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我想，除了先生的“岸然”之外，我们是否可学一点相声的幽默生动，演员的表情动作，诗人的热情优美呢?

二，老师，你太崇洋媚外！

“崇洋媚外”是学生评价中我仅次于“激进”的第二大缺点。

“崇洋媚外”是中共当局使用多年（尤其是文革中）的一顶帽子和一根棍子。谁被戴上了这顶帽子，便沾上了如“汉奸”、“卖国”之类的臭气，谁被这根棍子敲打，便灰头鼠脑，惴惴不安。

饱受党文化洗脑的新一代，只要听到有人以“国外之好比国内之差”，其头脑中被植入的“爱国主义”软件就会自动弹出“崇洋媚外”这顶帽子和棍子。施予者，仿佛立马站在了一个“爱国”的道义高度，居高临下鄙视“崇洋媚外”的“汉奸”、“卖国贼”。

有一次学生交来作业，一个学生（后来得知他是班长）直截了当地指责我：“老师，你‘崇洋媚外’实在太明显……”最后他还加了一句：“你悔改吧。”

我决定施以“辩论”。

我在黑板上首先写下这句话：

有两个人：

一个大唱爱国主义赞歌，痛斥西方资本主义丑恶，但是，子女亲属们早已移民西方，资产也已转移海外，本人也随时准备（并且很容易）移民西方。

一个痛恨国土上的丑恶，赞扬西方民主自由，但是，本人一直在这块土地上坚守，也未将子女亲属送往海外，一辈子没有捞取一分不义之财，一直默默地在为这块土地奉献其生命时光。

如果你们必须在这两人中选一个进行批判，你们选择谁？

接着我谈到：

我认识一位校长，他在不少场所都大谈爱国主义和美国霸权，让学生们饱受了爱国反美的革命教育。可是，私下里他提到他早已移民美国的女儿，提到她有车有房有工作的幸福生活，情不自禁眉开眼笑，欣慰不已。他还表示，他退休后将去美国和女儿团聚。

曾在重庆大唱红歌，并在学校（重庆大学等）教导学生要爱国、要受革命传统教育、要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薄熙来书记，其爱子薄瓜瓜在英国贵族学校接受资本主义教育之后，又到美国接受“帝国主义”教育。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的人大，政协代表们，我们的各级党官们，甚至我们众多的教育学生的校长们，能否公布他们的亲属、他们的子女是在哪儿接受教育？

我感到悲哀的不是那些官员和教育者们说一套做一套（他们历来如此，本性如此，毫不奇怪），而是这些被洗了脑的大学生们，他们面对显而易见的铁一般的事实，仍然不醒悟，仍然不思考，仍然自觉地充当党文化的传声筒。

我很早就学英语，我的同学同事们有不少已是他国居民，我也不乏这种机会和条件（甚至比很多人更有条件），如果我真是崇洋和媚外，我现在还会站在这个三本院校的讲台上吗？我看到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社会的种种问题，批评它，指责它，但并不放弃它，哪怕面对牢狱铁窗，也仍在这块土地上苦苦坚守，这正是一种爱——一种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深沉的爱。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诗人艾青的名句，我们的学生们什么时候才读得懂？

接下来我问学生：

你们当年戴的红领巾是哪个国家传来的？你们必须过的团组织生活是哪儿引进的？你们必须学的那本教科书是哪国人的理论？不时对你们训话的党团书记们是哪儿引进的物种？……

你们知不知道1949年前中华大地上的“苏维埃国”？知不知道1949年后的全盘苏化——从政体设置到经济建设，从意识形态到文化教育（包括课程，专业设置）……甚至挂在神圣的天安门城楼上的五个大头像中有四个都是外国人（几十年后才在一个外国人——法拉奇——的责问下去掉）。

把一个外国人叫做父亲，并组织全国人民聚会哀悼，这个外国人是谁？在1957年的那场惨烈迫害的运动中，专门列出一条罪名“反苏”，谁要是说了半点苏联的不是，立马打成右派，发配劳改，抓入牢狱。多年来，当局强迫你媚外（媚“苏”），谁敢不媚，整得你

家破人亡，这是历史的实事，不是我的编造。

长期以来，我们都被强行灌输一个“圣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虽然现在没再呼喊也没再写在墙上和报纸上，但实际上，这外来的东西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仍然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信可以看看现实，翻翻我们的党章。

中华五千年来的智慧不要了，指导我们十几亿人思想的，纵横这个泱泱大国的，是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真正“崇洋媚外”的是骂人家“崇洋媚外”的中国共产党呀，真正卖国祸国的是执政当局呀，怎么老把帽子扣在我头上？

注：那位叫我“要悔改”的学生班长，在期末最后一节课时，要求到讲台上来同我辩论，我同意了。于是，全班同学上了他们至今为止最生动最难忘的一节课，不少同学掏出手机来录下了这“精彩的时刻”，有的同学甚至激动得流下了眼泪。

该班学生毕业一年后，我突然收到了那位班长发来的一封长长的邮件，他说他走上社会一年后，领悟到了很多，他为他当年的言行向我道歉。

其实，我一点没生他的气。

广为流传的柴静的一段话“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前30年你们拼命毁文化，后30年你们拼命毁物质。夜以继日地挖取地下资源贱卖掉，强拆地面的民房，污染河流空气，用高税负和低工资榨乾百姓，我们的子孙没有了生存资源。你们的子孙移民走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国家，毁之唯恐不及。”

“成功的教改”

新闻毕业生就业率太低（倒数第一），领导们分析原因，认定是实践不够。于是院领导和新闻室新上任的主任联系校教务处、网管中心，发起了一场挽狂澜于既倒的“教改”（称为“实训活动”）。教改专在新闻大三的学生中展开，具体做法是将学生分成几个组，每周由专人命题，采写报道校内的新闻。每组每周要完成5篇以上的稿件，由领导审定后发表。发表的平台是校园网的FAQ网页。该网页是一个强制搭配的页面，只要你上校园网，它就会在第一时间弹出——就像文革时无论做什么首先要“弹出或背出”毛主席语录一样。好在用户可以立马关掉它，所以，其“生命力”往往长则数秒，短则半秒。不管怎样，它总可以发表新闻稿件。要是稿件好，说不定会增加关注度，延长其“生命存活”的秒数。

2014年春，经过周密设计，精心准备，上下动员，新闻系“教改”正式开始。新闻大三下期的课程很少，学生们正懒散无聊，突然间有了一份“当记者”采访写作的“工作”，一时热情高涨。

我对此热情不高，虽然我清楚新闻实践很重要。每年，都有学生到当地电台、报社去实习。可是，他们能学到什么呢？在党管宣传，媒体是党的“喉舌”的现状下，我们没有独立的媒体和自由的新闻人。社会的弊病不准披露，官场的腐败不敢揭示，民间的疾苦不能报道，灾难报道变成救灾表扬，重大新闻按命令发通稿（通稿：宣传部甚至公安局发的标准稿件）。

学生们一个个热情而去，败兴而归。在一套僵死的采访报道机制下、在一群“打苍蝇”都要选择和犹豫的媒体中、在一个权利争斗加权力寻租不亚于官场的窝子里，学生们能学到什么？

从09级起，我都要采访这些去“锻炼实践”的学生，有学生告诉我，他看到的最大的批评报道是老百姓买到了伪劣产品；有学生告诉我，原来当记者很来钱，出去采访，黄金万两——她本人就被塞过红包；有学生告诉我，原来当记者既轻松又实惠，只要按上级指示办，“吃香喝辣”“宝马香车” ……

这种“实践锻炼”，不去也罢。

那么，我们在校园内关起门来自己干会怎么样呢？在学校这一块没有“红包”的净土里，实践会怎样呢？

结果之一很快出来了。两周之后，学生们发现，批评稿屡遭扼杀，表扬稿常登榜首。如：批评图书馆盗版书多、工作人员态度不好的，枪毙；反映操场周末关闭，学生无法锻炼的，枪毙；批评将校园绿化地租出，建高尔夫场地的，枪毙……。更为神奇的是，化批评为表扬，如反映学生对校园网有意见的稿件被责令改写成一篇赞扬稿——我校对校园网的满意程度居当地众高校第一！

而简单轻松、文字乏善可陈的表扬稿频频登堂入室，受到表扬。

“记者”们热情减退。

另外，一杯杯白开水似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如：我校召开了什么什么会议，举行了什么什么活动，校门口的小食店又涨了价，当地的餐饮有什么特色……

我想，这种实践活动学生也会有收获，那就是在走出校门之前就亲身体会到，在中国，新闻报道是怎么回事。

当然，学生们也有正面的收获，一是做了一些校园内的采访；二是勉强把新闻采写中最基础的消息稿写得比较通顺了。

开会小结时，一些学生说：“很有收获，我们现在的病句和标点符号错误大大减少了。”

于是，在汗流浃背几个月的劳作下（其中包括全部五名新闻教师耳提面命的指导、日以继夜的改稿），新闻大三学生的写作水平，终于从高中一年级提升到了高中二年级。

于是，上上下下皆大欢喜，“教改”初见成效。

“因为爱国，所以反党！”

2013年7月，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我做了一个学术讲座《川东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我以我多年在民间做的社会调查为基础，讲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中共血腥土改的起因、过程、手段、结果等。参加讲座的有一位著名媒体人士——蔡咏梅，她听后非常感兴趣，对我进行了专访，并在香港《开放》杂志上刊登了4000多字的专访——《谭松谈川东血腥土改》。

此文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海外各大网站纷纷转载，并置为“热门要闻”。国内的网民们也狂热地下载、转发，跟帖铺天盖地。

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中共土改运动

虽然我知道土改运动真相是中共捂得最严的禁区，但我没想到会引起这么大的反响，我知道这次祸事惹大了。

当年放了我一马（只关押了我30多天）的专政机关这次可能不会善罢甘休，而此时，又正值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大抓异议人士，剿杀“网络谣言”，全国一派红色恐怖之时。

有朋友劝我逃离学校到外面躲躲。

我不。

当年突然抄家抓人，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现在我已经有准备了，更重要的是，我又长了十年，比以前“强壮”多了。

我等着他们大驾光临。

果然来了。2013年9月18日（中秋节前一天），我上午有四节课。第二节下课时，

院党支部书记来找我，告诉我中午下课后到学校行政楼，校党委书记要找我谈话。

我很了解我党的手法：叫去开会或谈话，便“赵巧儿送灯台——一去不回来”。

我很冷静地上了后两节课，学生听得很专心，我心里有点难过——很可能，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课了。

下课后，我匆匆找到我女儿，把几个U盘、房间钥匙等交给她，对她说：我惹上点事，被叫去谈话，如果我晚饭时还没回来，你就自己回去（当晚开始放中秋假），告诉你妈，我短期内可能回不来了。

12点30分，我走到学校行政楼，四下张望，没有警车。（后来听学生说，当天中午有警车到学校，但没有停在行政楼。）

书记正急不可待。他办公室还坐有另外一个人，没穿制服，我不认识，也没介绍。

书记问起我香港讲学的事，我做了回答。

“如果我给学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我马上辞职。”我对书记说。

“我们没这个意思，学校对高级职称的老师还是很珍惜的。”书记回答。

其实我心里清楚，我的命运不由学校决定，找我谈话也不是书记的主张，这是上面有关部门的安排。（负责“关心”我的重庆市国家安全局直到年底才把我叫去谈话，并规定，今后出境，必须事先向他们汇报。）

半小时后，不时有人叫书记到一楼（保卫处所在地）开会。大约一点二十左右，书记让我走人。

我奇迹般地脱身！

当晚我回到妈妈家，妈妈正焦急万分——她也在网上看到我“惹的祸”。

两个朋友飞速赶来，其中一个是因在网上发文章坐了四年牢，刚出来一年多的重庆异议人士张起。他叫我最好发表个声明，以备不测。于是我录了一段视频，说明我为什么要做土改调查，并且表明，若为此坐牢，我不后悔。

我心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悲愤。一位网民在跟帖中说：“在中国，只要你调查中共历史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另一位网民说：“像谭教授这样调查中共历史真相的人，要嘛在监狱里，要嘛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我决心同他们抗争，整夜都在想审讯时怎么说。第二天我匆匆写了份声明《我只有“亮头”》发往香港，并告诉他们，一旦我被抓，就把声明公布于众。我知道他们在监控我的邮箱，我故意就用这个邮箱发送，让他们截获、查看。

可我有惊无险地渡过了这一险滩。后来，有关人士告诉我，说我幸亏是处在重庆，是“重庆”保护了我。为啥？因为这些年重庆被王立军、薄熙来、雷振富等惊天大案折腾得焦头烂额，对外形象十分糟糕，已经影响到招商引资等。新的市领导不愿再“惹事”，据说指令重庆三年内不要再折腾。

于是，我托“重庆”的福，托“薄王事件”的福，又一次化险为夷。

不过我知道共产党的秉性，秋后算账是其显著特征之一。几个月之后我采访西南政法大学当年的一位右派时，他盯着我刻骨铭心地说：“小谭呀，以我这一辈子的遭遇和

观察，共产党是最记仇的，他不动手是因为条件所限，随着他掌控的逐步加强，他的迫害就升级，从1949年以来无不如此，你得小心，最好离开这个国家。”

在书记找我谈话后两个月，有学生悄悄告诉我，学校保卫处长找我任教班级的班干部谈话，收集我在班上的言论，重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崇洋媚外”。

“他明显是诱引我们往这方面讲。”一位班干部向我“告密”说。

（后来，在毕业离校的前一天，该班干部告诉我了详情，大意是，美国一直想要颠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成天在找我们的过失，谭松在境外给反华势力，尤其是美国，提供了攻击我们国家和政党的炮弹，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也给学校带来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现在公安十分关注这件事，他要求两位班干部配合学校工作，揭发我在课堂上的反党言论等。）

这位保卫处长我经常见到，但我从没找他，原因是我清楚，这不是他要怎样，而是上面（中共当局）给他交代的任务。这也说明上面虽然暂时把这口气吞下去了，但时时在做“秋后算账”的准备。这一点不奇怪，不这样就不是共产党了。

说到这儿我想起几件事。我刚到这个学校时，有位老师问我是不是党员，她是负责登记新来老师“政治面貌”的。我回答：“不是。”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是，我也早就退党了。”我在学校从不隐瞒我的观点，以致名声远扬。有一次同几个学生吃饭时，有学生问：“人们都知道你课堂上有不少反党言论，毫不顾忌，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冲口而出：“因为爱国，所以反党！”

（后来学生告诉我，这句话对他们震动很大。他们从小受教育，当局都把爱党爱国绑在一起，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就是爱党。其实，中共在”六.四”之后大力推行的“爱党爱国”教育中，“爱国”只是一个包装，或者说一个“引导”，其真实的核心是“爱党”。）

多年来，“反党”是一个极其可怕的罪名，正如中国皇权社会时的“谋反”一样，这个杀手锏一旦抛出，轻易就让人粉身碎骨。在毛泽东时代，这两个字让人闻风丧胆，这项罪名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在后集权时代，虽说专政的暴烈减弱了许多，言论的自由扩大了不少，但多年的惯性使然和共党依然独裁的现实，“反党”罪名仍有相当的震慑力和杀伤力。

我在采访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孙敬轩时，他说了一段话：“我曾在政协会上说：为什么不能反党？你说个道理？！共产党本身就是反党分子——当年反执政党国民党。为什么非要强迫一个人相信党、拥护党？你干得好我可以拥护你，干坏事，我可以反对你，就是我的亲爹亲妈办事办得不对，我也可以反对。一个执政党，动辄用‘反党’的罪名置人于死地，太霸道！太专横！多年来我们一听说某人反党，就认定他是罪大恶极，一听说自己反党就惊恐万状。我们怎么不停下来想想：为什么不能反党？”

孙敬轩已经去世十多年了，可在我们的大学校园里，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提到“反党”，仍然是谈虎色变。

有一位老教师，只要一遇到如相关历史真相的话题，马上退缩：“这个问题很敏感，不提了！”他几乎是下意识地回避和明哲保身。对此，我虽能理解，但感到很悲哀。对那些仍站在“专政”高度，试图用这个杀手锏来震慑他人的人，我则毫不客气。有一次有人不怀好意地提到我反党时，我当即回答：“是呀，你没说错，这正是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使命！”

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人了解了中共这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如果他还有点正义感和血性，如果他对这个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还有爱，他会怎样做呢？

在书记找我谈话的第二个月，也是当局清理所谓网络谣言，杀气腾腾“亮剑”，打压言论自由的高潮之际，我在课堂上讲到了罗马帝国慷慨悲歌的英雄气概：

安东尼最后匹马单枪的冲锋；

布鲁图斯失败后的慷慨赴死；

老伽图不愿苟且偷生剖腹掏肝的悲绝壮举；

……

雄浑壮烈的男儿热血、义薄云天的壮士豪迈，激励了西方多少仁人志士。

法国大革命枭雄王君们面对死亡的雄浑浩气，欧洲千百年宁为玉碎的骑士精神，普希金受辱后的奋起决斗，亚力山大二世遇袭时的面不改色，无不展示着这种慷慨悲歌的英雄豪气。

中国古代亦不乏古罗马时代那种壮士豪杰（虽受“愚忠”之责）。有保护赵氏遗孤的公孙杵臼和程婴；有吞炭漆身伏剑而死的豫让；尤其是荆轲，明知一去不复返，仍然面不改色。并且，在他出发前，已有三位壮士田光、樊於期、夏扶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头颅。

可惜，春秋战国之后，侠气渐消，虽仍有如文天祥的慷慨捐躯，杨继盛的浩气丹心，谭嗣同的死得其所，但这个民族整体上一步步走向了宁为瓦全不为玉碎，一点点认同了“好死不如赖活着”。到1949年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到来之后，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浩浩国土，芸芸众生，在一个外来“幽灵”的掌控中，迅速变异。犬儒主义、明哲保身、放弃道义担当、退守个人生存空间，成了中华大地上的“普世价值”，终于消解了最后一点英雄豪气和侠肝义胆。

“连续几代人的杀戮，成功地改变了我们的人性。”流亡作家郑义在散文《金棕榈》中痛心疾首地说。

我唯一还能“发表言论”的地方是课堂。于是，在2013年10月的《西方文化概论》课堂上，在中共当局寒光闪闪的“亮剑”中，我面对对外汉语11级的44个学生，借古谈今，慷慨激昂，把讲台当广场，一泄心中淤积的万倾悲愤。

“暴政之所以威烈浩荡，是因为我们一个个都成了沉默的羔羊。”我在课堂上说。

下面是我在书记约谈之后写下的“表态”：

我只有“亮头”（节选）

——我的表态

眼下，又一波箝制言论、打压异己的“亮剑”行动正在中国大陆风生水起。

许志永、王功权等追求自由平等人士和秦火火、薛蛮子等网络大V纷纷中箭落马。

当局手握强大的国家机器，站在巍然的权力高峰，威风凛凛兼杀气腾腾地“君临”脚下的芸芸众生和几个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

“对……我们要敢于亮剑！”

“对……我们要露头就打！”

他们是何等的自信！

他们是何等的有力！

想来也如此。

面对手无寸铁的民众，面对只有一点思想和语言力量的知识分子，手握庞大军警和司法衙门“家产”的中国共产党，牛刀杀鸡，巍然“亮剑”，毫无顾忌。

只是，如果你亮的是法希斯暴虐之剑、打的是民族良心之头，如果你的全部力量都来自手中那把滴血的剑，如果你治国的良策、维稳的高招就是用“剑”和“打”让人民在恐惧中静如寒蝉，那么，你的自信和力量又有什么值得骄傲？

我在《长寿湖》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共产党这50多年来最‘伟大’的治国韬略之一就是：它成功地把一张铺天盖地的恐怖大网严严实实地笼罩在神州大地上，让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中。”

……

“新中国”64年过去了，我们苦苦等来的仍然是恐怖的“亮剑”和“露头就打”。于是我知道，我们渴盼的东西是等不来了。

可是，我实在不愿再把头像乌龟一样缩进肚子，于是，我只好对“亮剑”说——

——我只有“亮头”了。

2013年9月20日于重庆

我在川东农村做土改调查采访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

此语是讽刺当年国民党的：前方战事紧张，后方大吃大喝。

此语是否属实姑且不论，我只想借用它浇心中块垒。

尽量增招学生、竭力减少教师，是我们这所三本院校的办学宗旨之一。在这种宗旨指导下，老师们被强化为“门门懂，样样瘟”的“天才”，他们可以讲授多达十余门不同的课程，可以从大一教到大四；同时，他们也被强化为每月可上100多节课的“人民公社全劳力”。

校园里，随处可见行色匆匆、奔赴各个教室的“教书机器”；难见步履儒雅，徜徉于大道小径的“国学大师”。

这种“前方吃紧”的战况，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问题在于不时冒出的“后方紧吃”！

在一次年终聚会上，我院的一位女教师突然站起来，当众声泪俱下。

这位老师就住我楼下，每次见她都行色匆匆，满脸疲惫。我知道她课多（每月多达150节），我也知道她身体不好。

我以为她要诉说她的劳累。

结果，是“拦轿喊冤”。

她说，学校不愿请外聘教师，把十几个班的课都压在她身上，但人们却说她太贪财，为了挣课时费，要钱不要命……

女教师声音悲戚，泪流满面，把年终聚会的喜庆一扫而光。

另一位男教师，到校几年已经上过十余门不同的课程（而且居然很受学生欢迎），但是，由于他敢说敢“硬”，便不时遭受“后方紧吃”：有来自相关领导的告诫，也有来自教务处的“训条”。（后来，听说他终于在教室摄像机录音功能启用后“阳痿”了。）

2015年，是我在前方最“吃紧”的时期。教大学20年来，我第一次达到了每月90多节课（五门）的高潮，正当我气沉丹田，手脚并用，以老将黄忠的勇猛一路砍杀而去时，“后方紧吃”又悄悄袭来。

一天上午，当我上完两节“西方”，刚想喘口气开始后两节“中方”时，一位学生匆匆前来。

“老师，我们辅导员要我写篇东西，关于你。”

“关于我什么？”

“他要我写你在课堂上的言行，分教外国文化的言行和教中国文化的言行。”

又来了！

不过想来也正常，这是这些党员们的日常工作。我课上得越多，违反习主席“七不

讲”的地方就越多。

“为什么找你？”

“我是班干部。”

“你为什么告诉我？”

“老师，我们班的同学都非常喜欢你，喜欢你的课。”

“那你准备怎么写？”

“我据实写。”

第二周，该班干部走上讲台，交给我一页纸。“老师，我写的被辅导员退回来了。”

我接过一看，上面全是赞扬我的话。

“他说我写的不符合要求，意思是与他想要的刚好相反。对了，他还露出嘲讽的眼神。”

“你们辅导员是谁？”

“是XX。”

“那好，你去告诉他，叫他把要求你写的内容明白无误地一条条写下来交给你。”

学生面有难色，她不敢得罪辅导员，她把这事告诉我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敬重了。

我清楚辅导员想要什么，我按下了前去找他的冲动，因为我清楚，他只是一个执行者。我不清楚的是，他背后是那位专职书记呢，还是校方？或者，是校外一直关注我的“有关部门”？

我绝不会像那位女教师那样哭诉冤情；也不会像那位男教师那样被迫“阳痿”。接下来的课堂上，我照样嘻笑怒骂，并冲着全班说：“我要让你们看看什么是男子汉！”

我决定以明对暗，直接去找辅导员背后的校领导。

本来应找分管党务工作的校党委书记，此君两年前为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事奉命找过我，后来又“埋伏”在众多学生中听过我的课，他对我还相当友善，彼此也应当是熟人。但我先找了一位副校长，原因是，我听说校领导们曾讨论开除我，结果只有他不同意，使我得以存活到今天。

一个下午，我走进他的办公室。

“……”

“……”

“你应当感谢你的学生，还有你身边的人，对你评价很好。我看了送出去的材料，没有一条负面的评语。”

“那么是校外有关部门索要？”

“是的。”

“那么下面的辅导员为什么非要学生写负面的评语？”

“辅导员是谁？”

“XX。”

副校长一听这名字，露出一种仿佛豁然明白了的神情。“我会给他们说。”

“他们？”

这些年来，我在“党妈妈”的教育下，“悟性”大增，对“阶级斗争新动向”超级敏感。我马上明白了，下面的“他们”并不仅仅是“执行者”，而是想借此良机，背后暗捅一刀。他们没料到的是，一向听话的学生居然既有良心还有胆量，不仅秉笔直书而且还敢犯上。难怪“你应当感谢你的学生。”

我又有些冲动，但朋友劝我：“你若去找‘他们’，会让把情况告诉你的学生更受压力。”

“优秀人才”

在学院的一个宣传栏上，有一些毕业生的照片，上面注明他（她）是哪个专业，哪一届的学生，然后着重标示他（她）现在的“优秀”——当了什么“主任”、“X长”等等。

我所在的新闻专业有一个毕业生也荣登优秀榜：某报社XX部主任、首席记者……

在一次餐桌上，我有幸见到了这位“优秀”。

“优秀”十分得体地应酬，举手投足间透露出社交（甚至官场）的成熟风范，年龄不大，但其老成稳重远在我之上。散席时，他忽然很慎重地叮嘱我们：“刚才我提到周永康的事，你们千万不要出去说，也不要说是我说的，我们哪儿说哪儿丢，到此为止。”

“周永康的事”，早已不算一个“事”，网上和民间沸沸扬扬，传播已久。他提到那一点“内幕”早已不是“内部消息”，不知他为何如此小心谨慎。

其实，我应当知道。

首先，从小学到大学，他从没接受过“铮铮风骨”的教育。“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侠骨，早已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和讲台上消失殆尽。十几年的学生岁月，学生们除了学一些为考试（尤其是为高考）的僵死条文和为就业的“匠人”技能，就是喝了一肚子爱党爱国，反美反霸的“红色浆糊”。

其次，一旦进入这个飞速堕落的社会，这“劣币驱逐良币”的职场、官场，要想往上升，除了“我爸是李刚”外，必由之路往往是圆滑事故、老谋深算、投机取巧、小心谨慎、阿谀奉承……。

我所在的新闻系不要说学生们不知道被当局封杀的“中国良心”刘宾雁、“媒体良心”马云龙等，连眼下的揭黑记者王克勤、刘畅、简光州等都全然不知。这些充满了良知道义，充满了勇气正义，充满了悲悯之心的媒体标杆人物，从新闻学生们的视野里整体消失了。他们背了一大堆僵死的条条框框，学了一整套虚伪的法则法规，然后一头闯进充满潜规则的职场官场（或者一步登上了“虚假才是第一生命”的媒体殿堂），他们从哪儿去寻找道义的力量、人格的伟岸、精神的资源？

于是，我们看到那位如消遣旅游般在地震灾区采访，笑眯眯地问灾民是否开心的年轻记者计鑫；

于是，我们看到数百记者在山西矿难现场排队领钱，然后笑眯眯走人的壮观盛举；

……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雷鸣的瓦釜，成了“优秀”。

一个世故圆滑、患得患失的记者，会有揭露罪恶的勇气、为民呼吁的道义、铁肩辣手的担当吗？

我没有教过这位“优秀”，如果教过，我会说，这也许是他的优秀，但一定不是我的骄傲。

秋日感怀

上了两个多月的新闻课了，学校订的那本“高大上”的“十一五教材”仍然新崭崭地摆在我书桌上。学生们奇怪：这个老师怎么不讲教材?不讲教材为什么要我们订购?不讲教材我们今后考试用什么复习?

我自知理亏，没办法，只得翻开它，打算照着它认真备课。

触目一大堆“八股”语言和僵化篇章，我觉得生命一片黯淡。

秋日的阳光，暖暖洒在清澈的江面；有风，悄然入怀，撩动一颗日渐衰老但敏感依旧的男儿心。

我将味同嚼蜡的“十一五教材”轰然一扔，昂首出门——涪江，阿哥有心来相会！

沿着江岸上下奔走，竟没找到一条通往清波荡漾的路。秋阳，在明净的高空中悄然西沉；尘土，在喧嚣的工地上漫天飞扬。举目不见一处河畔处女地，推土机、挖掘机、运土车吼声震天，一个个如强悍而饥渴的野性汉子，在守身千年的处子之身上往来奔突、恣肆祥狂。

寻梦？向青草更深处漫步？

出城，沿一条宽敞而车少人稀的水泥大道前行。大道在一片茂密的竹林和果林前嘎然而止。我跳下车，几步登上一个小土丘。

哇，“寻芳尽处得红梅，暗香浮动君沉醉。”——眼前的景色让我怦然心跳。

碧绿的涪江静卧在两岸青幽的怀抱中，稀落的农舍点缀在竹林和田园的苍翠里。一大片窄长的平地沿江伸展，在高高的河岸和清清的江水间织成一道“桃花源”的风景。

我沿着卵石杂乱的竹林小道下行，来到“桃花源”河畔。

秋阳悄无声息洒下暖暖的光辉，江风清凉，吹去了英语单词的枯燥和新闻教材的烦乱。大自然的柔美和静谧殷殷地抚慰着浮躁的心灵与受伤的情感，仿佛母亲——

——哦，大地，母亲！

“喜欢这地方？”一位正收割红苕藤的老农见我痴迷，直起身问。

“是呀，很美，又宁静。”

“你们城里来的人都喜欢。有人还劝我搞个农家乐。”

“这是块宝地，你该搞，我就愿来。”

“不行了，沿江这一大片地已经被政府规划了，要开发。”

“规划了？”

“你没见公路都修到上面了？”

“那你们要搬迁？”

“当然。”

“你舍得？”

“我在这儿生活了60多年了，这地方好得很，干旱洪涝都不怕。”

即将被开发的河岸

“你不愿意搬？”

“这由不得我，愿意也罢，不愿也罢，都得搬。我们农民嘛，无权无势……当然，国家要发展，要征地，我们理解。我们不理解的是共产党内那些叛徒……”

“叛徒？”

老农接下来告诉我，这片地刚一规划，就有人来抢着圈地。那些人把最好的地段以每亩1750元的价格租下来，等待即将到来的开发。一旦开发（他们清楚开发的时间表，正如他们清楚规划图。），他们就会获得高额赔偿。多高呢?老农说，据他了解的类似操作，每平方米赔偿200元。

一亩地666平方米，“那些人”将获得133200元。

1750元的投入，133200元的产出，一本万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有一段经典论述：“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挺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

“那些人”不需要挺而走险，只需要一个权力支点，有了这个支点，便可轻盈盈地撬动任何沉甸甸的土地；有了这个支点，便可以践踏世间的一切；有了这个支点，便可以轻取1000%的利润！

“已经规划了，就不能再让私人来圈地。那些人都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们拿共产党的钱，可尽干坑共产党的事，这不是叛徒是啥？”老农愤愤地说。

“那些人”是哪些人呢？老农说，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其中他知道的就有当地派出所的公安。

夕阳西沉，宿鸟疾飞。我拾阶而上，来到老农提到的“养猪场”。

一长排灰白而丑陋的棚屋死气沉沉地立在一片茂盛的果林中。从敞开的大门望进

去，里面空空如也，一片死寂。

小路上，迎面而来一位荷锄归来的沧桑老农。

“大哥，这是哪个的养猪场？”

“哪个？那些有权势的人嘛。”

“怎么没有猪？”

“永远都不会有。你看这是喂猪的地方吗？咋个喂？粪往哪儿排？他们是在等征地时的赔偿。这地方已经规划了，要建商品房……”

空无一猪亦无一人的“养猪场”

商品房？我伫足四顾，发现这儿真是个风水宝地。背后，是通往繁华都市的宽敞大道，前面，是一览无余的大好河山。在繁华都市与秀美自然的交汇点上，高价的“商品房”将拔地而起。

江景如画，秀色可餐；

权钱联姻，山河色变！

1750，点石成金，转眼变作133200；

133200又会如何滚翻，化作更大辉煌？

“叛徒们”日理万机，早已成竹在胸、胜卷在握。

远处，传来推土机隆隆轰鸣，“开发”的铁轮正汹汹逼近。

大地，您不能再以您的甘甜乳汁哺育两岸苍生；母亲，您不能再以您的玉肌胴体抚慰孤寒魂灵。眼见您正被整体玉碎，在GDP节节攀升的官场辉灿中化作RMB暗暗流淌的猪场腐臭！

我在“猪场”外徘徊，尘世中的现实腐臭消解了秋日踏青的浪漫情怀。

心中，有一种焦躁的涌动。

在传媒中奔走多年尚未丧失的那几分记者良知、对大地母亲那份真诚天然的赤子情怀、从祖先传下来尚未死绝的那一点男儿血性，让我渴望从猪场的灰墙旁奋身而起——

老农的访谈、现场的照片、背景的调查、网络的平台……

“你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闻专业呢？”我望着课堂上60多个男女学生，不止一次地心中暗想。

这是一个好专业，大有用武之地？

十年前，我曾造访美丽岛国NEWZEALAND。那是一个太干净的社会，干净得“苍蝇”们无缝可叮，记者们闲得无聊。终于，有一天，一个议员在英国出差时用公款买了一条内裤。如此“叛徒”引得“苍蝇”们蜂拥而至！大报、小报、电台、电视台连篇累版，穷追不舍。据说，新西兰政府的廉政指数因此而下降，那位毛利族议员则身败名裂。

当我在一尘不染的罗托鲁阿镇听说这一消息时，不禁对着南太平洋的天空仰天长叹——我能在NEW CHINA当新闻记者真是幸福啊——遍地都是“有缝的鸡蛋”和“腐臭的鸡蛋”！

收获了整个白天的夕阳满面通红，沉甸甸地滑向沉甸甸的大地。在充盈着天地间的金黄光辉中，我恍然看到权力之花漫山遍野，一朵朵开得红艳如火、金灿灼目。

我在这无边无际的金灿中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在黄昏的夕照中面对即将被开发的河岸

无奈、软弱？

无力、麻木？

恐惧、绝望？

终于，一切归于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看见，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手中火热的笔屡屡挣来手上冰冷的手铐时，当还有良知的记者被开除、被暴打、被抓捕后，社会，便在另一个层面上归于“干净”、“稳定”与“和谐”。

暮色苍茫，晚风带来淡淡的夜的寒凉。我向足下的涪江投去告别的凝望，那千古不绝的声音又回响在心头：大地，母亲；江河，母亲……

我抬起头，迷茫的目光投向苍天——

父亲，您在哪儿呢？

“母亲”快被卖完了！

夕阳下的涪江

新闻课堂上的迷失

我不是学新闻专业的，没有受过一天的相关教育和训练，也没有相应的文凭。按照核心课程必须由相关专业的教师讲授的规定，我是没有资格上这门核心课程《新闻采访与写作》的。（该课程学分为该专业之最，高达8分。）不过，在我了解到学校里有上8到10门不同课程的老师之后，我也就坦然了。毕竟，我还在媒体干过，采访过近500名各类人士，相比那些毫无实践经验，对该专业所知甚少，凭着一本教科书就勇登讲台的老师，我还不算误人子弟的类型。

可是，从勇登讲台到无奈退场，从豪情万丈到黯然神伤，新闻课堂上，留下一段深深的“迷失”。

一，不幸的学生

进校不久，我就发现，子弟被“误”了。

2011年上半年指导毕业生论文时，给我分了10余名新闻系的学生。见面一交谈，我惊讶地发现，他们全无搞新闻的那种活跃、敏锐、敏捷、健谈，一个个都像是听话的好娃娃、乖孩子（同时也两眼无光，表情迟钝）。更让我惊讶的是接下来读他们写的论文。我当编辑那些年，读过无数稿子，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读过这么糟糕的文字。

概念不清、层次混淆、语法错误也就罢了，连标点符号都一塌糊涂，连给他们指出句子错误后，都看不出错在哪儿。

而他们，就是我们培养的即将走上新闻岗位的大学本科生！

有个学生改了5次之后，仍一团乱麻，我已经无法同他在网上交流了，于是找来面谈。我盯着他刻骨铭心地说了几点：第一，你这几年的大学是白读了，青春是浪费了。第二，你父母交的学费可惜了。第三，你应该回到初中把基本的语法和标点符号学好。

后来发现，这不是个别现象；

后来发现，文科学生的写作水平很差是这所文科院系的一大特色。

武汉大学教授赵林在《西方文化概论》的前言中说：“当今社会，由于商业化和流俗化潮流的双重冲击，大学已经变得越来越功利化和实用化，逐渐沦为替商家和市场批量生产专业人才的知识加工厂。”“如果在大学生期间还不注重这种必要的人文教育，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就果真会培养出一些有知识无智慧，有技术没文化的残次品了。”

可悲的是，别说人文教育，我们这所“加工厂”连“有技术”都没做到，生产出的是大量不合格的、残上加残的次品。

2012年在一次会上，院长通报，我们新闻毕业生的就业率在同院系中倒数第一。

可是，这主要应当怪学生吗？

我曾多次在课堂说，造成这种现象第一板子应当打在教育体制上，第二板子打在教

师身上，第三才应打在学生身上。

二，可怜的教师

那祸国殃民，已被万人唾骂的教育体制就不提他了，大量不合格（才德双无）的教师站在讲台上也不提他了，我只说我们新闻系的教师数量。

我2010年7月进入这所院校，我要去的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院长不愿意要我，说是不缺教师了。进入后，第一次开会，30余人聚集一堂，我以为是我们新闻系的教师（因为育才学院新闻系就有近30位老师），后来得知，这是全院教师职工人数！这30余人中还包括10余名辅导员、党团支部书记、办公室秘书等，教师只有20余名，负责教2500余名学生！我所在的新闻系，不包括刚入伙的我，只有两名教师。这两名教师一位是年近60、中文专业、聘用前没有教过书的老人；一位是刚毕业几年的本科生。这也就是说，我们前几届的新闻系学生，除了几个来上了课就走的外聘教师外，四个年级数百名学生，只有两名专职教师，每个年级0.5个！这样，在堂堂大学本科的讲台上，出现了中国贫困山乡小学里才有的现象——教师不仅身兼数职（多门课），而且要从入校新生教到毕业老生。

（四年后，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我们新闻系又进了两名年轻教师，于是新闻四个年级，每个年级终于可以分配1.25个专业老师了。）

教师不足，这是校方有意而为之。对此学校早有应对良策——合班上课。于是，上百学生（甚至一百多学生）济济一堂是这个学校的正常生态。

我观察发现，学校修的教室，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可容纳100多学生的大教室，这说明学校（投资方）早有预见性：减少教师数量以少发工资，增加课堂学生人数（合班上课）以少付课时费，这一增一减，办学利润就出来了。

只是苦了教师，更害了学生。

偌大的教室，黑压压的学生，既不利于提问、答题、沟通、交流，也不利于声音传送。若该教师嗓音偏弱，则后排学生“只见其人，难闻其声”。更紧要的是，那些多媒体设备不管如何浑浊不清，只要不彻底报废，那一定要为教育事业、育人大计贡献最后一分光热，这使得后排学生尽管双目圆睁，屏幕上也是“雾霾”一片。

回到我们新闻教师数量的话题：就这么几名专业教师，质量怎样且不说，仅数量就难以保证生产出合格人才。

三，“优秀的”教材

再说教材。

2010年9月我在上课前几天才拿到“中国新闻采访与写作教程”，这也是前几届学生的用书。我翻开书，扉页上“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论语）“博晓古今，可立一家之说，学贯中西，定成经国之才。”顿时，一股气宇不凡笃学厚重的大家之气扑面而来，让人举目仰慕俯首谦卑。

紧接着是一大段作者介绍……教授、博导、主任、院长、理事、会长、学术评定会主席……从事……研究数十年……获得……优秀奖……

一长串“显赫”，如雷贯耳，让人屏息敛声，肃然起敬。

再接下来是另一位教授专家贺词般的序言。他开篇写道：博士生导师XXX教授的新著，是“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闻采访与写作类教材和著作登上这个高峰，可喜可贺！结尾他又写道：“作为一部国家级教材佳作，必将受到新闻传播学院师生，新闻宣传和媒体从业者及新闻爱好者的欢迎……再次表示衷心的祝贺！”最后是作者本人的“后记”。他说，新闻采访与写作这柄剑他磨了近40年，终于攀到一个高度。该教材被教育部列为“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一行殊荣被显赫地印在封面上。）

我这个非新闻专业出身的门外汉被这一长串惊心动魄的头衔、殊荣、贺词等征服了，我认定这部经典是大熊猫般的国宝，于是急不可待地挑灯夜读。

不料，秀色可餐的包装下面是一大包味同嚼蜡的“过期食物”。僵死的条条框框、枯燥的文字例句……。更让人不适的是，它还散发出一股股党文化的八股味。

我越看越庆幸我是没受过这种正规教育的“野种”；

我越看越后悔我接了这门“八股教材”。（要是早一点看到它，我一定不会上这门课。）

其实，想来也正常，在新闻是党的喉舌的国家里，只有这种僵硬的八股才能攀上“国家级规划教材”的高峰。

据说，在西方国家，有两门学科必须由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来担任，一是金融，二是新闻采访与写作。原因很简单，这两门课程实践性太强。

我们这位教材作者，数十年在校园中书斋里“磨剑”，从资料到资料，从书本到书本，从党的新闻政策到报刊宣传报道……

如果把这种教材拿到课堂上照本宣科，再按照眼下盛行的“勾重点、背条文，考教材”的僵死教学模式，我敢保证，无论学生多么认真、勤奋、无论他拿到多高的考分，他都学不到真正的本领，而且还会让脑子“动脉僵化”。（聪明的学生也会学傻。）

我看到不少学生思维僵硬，反应不灵，创造力底下，这是不是同他们学了、背了大量的这类教科书有关呢？

四，“对口”的生源

再说新闻学生生源。

教、学新闻的人都知道一句话，叫做“新闻无学”，意思是新闻不能算作一门专门的学问。想来也是，同数理化、医、外语等学科相比，它学术性不强。在学校里，没老师教，那些教科书学生自己都能读懂；在社会上，没学过新闻的人，照样可以从事这个职业，并且会干得很出色。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门坎不高”兼“简单易学”的原因，不少文化程度很差的“对口生”就源源不断地塞入了这个专业。

我就遇上了。

2012年九月，我给新闻系的一个新班（大二）上课，第一节课就有7、8个学生趴在

桌子上睡觉，而且睡着了，另有不少人埋头玩手机。这种现象在我十六年的教学中还是第一次遇到。接下来我发现，该班不少学生文化知识水平很差，悟性、灵性极少，不管我怎么慷慨激昂，课堂上都微波不兴，一片沉寂。我同其他老师交流，他们也有这种痛苦。于是我找到分管教学的副院长，问怎么回事。原来，学校在一个专门的地区，招收了一批“对口生”。

“对口生”不参加高考（有的高中都没毕业），只要交纳一笔“赞助费”便可堂皇地登入大学本科殿堂。严格说来，他们不符合大学生的起码标准。但他们往往都是富家子弟或官家子弟，毕业之后也不愁找工作，因此，他们大多不需要（也不想）学知识，只需混一张文凭。

对为了钱不惜“卖身”的校投资方我能够理解，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将这批进门就不合格的学生都投放到新闻专业。

“不放到新闻专业放到哪儿？”副院长回答：“难道让他们去学数学、英语？他们更学不懂。学师范？那可是要误人子弟的。”

由此看来，只有“无学”的新闻专业最适合收留这批学生了。也许，相比之下，也只有新闻专业最容易混个及格，再混个文凭。

就这样，新闻专业成了学校的一个“收容队”和“对口”赚钱的门道。

自此之后，新闻专业学生的学识等水平每况愈下，写作能力更是惨不忍睹，一篇小小的消息报道都乱作一团。我常常困惑，我到底是在教大学还是在教高中甚至初中。更不幸的是，绝大多数学生并不是因为热爱新闻而选择这个专业（如一个班48名学生中只有五名愿意从事新闻），他们只需要一个文凭，学什么专业无所谓。

其实，“无学”的新闻专业是最需要挑选优秀的学生！

我在实践中感到，新闻媒体人士的综合素质非常重要。学校里对新闻系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应重于其他专业。从硬件上说，新闻学生除了扎实的专业技能之外，他还必须拥有很广的知识面。他要同各行业各种人打交道，“无学”的新闻应该是一个杂学的大家，应变能力、语言能力、交际能力、策划能力、观察能力、判断能力、敏感能力、甚至侦查、化装、逃跑能力等等，是从事这个职业的基本功。从软件上来说，他必须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强烈的历史、社会责任感。他应具有对人类苦难充满同情的悲悯之心；对社会不公满怀义愤的正义感；对邪恶势力敢于抗争揭露的浩然之气。良知、道义、勇气是一个真正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就拿身体素质来说，学新闻的就应当强于其他专业。以我在这个领域十余年的实践，深深感到，没有一个强壮的身体要干好这一行是十分吃力的。（当然，那些养尊处优的“党的喉舌们”另当别论。）

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对这个专业、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和喜爱基础之上。

可惜，本应对生源要求很高的新闻专业，成了一个接纳“病弱”的收容队，不少对新闻毫无兴趣只求混一张文凭的学生坐在了新闻的课堂上。虽然也有学习刻苦也热爱新闻的学生，但由于招生录取的标准下降，尤其是当局教育体制造成的恶果愈加深重等原因，一届一届学生的综合能力逐渐减弱。几年教下来，我感觉到，学生一届不如一届，灵敏拔萃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也越来越感到心灰失望。

2013年，我因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引起关注之后，我校一名教授在“一五一0论

坛”（半年后该论坛被封）上留言；“谭松是我校最优秀的教新闻的老师。”该论坛版主跟帖：“但愿谭教授培养出更多的谭氏人才。”

我很愿意这样做，这也是我的使命。

我对学生说，新西兰全国媒体曾蜂拥报道一位毛利族议员用公款买一条内裤。为什么“蜂拥报道”?因为新西兰的社会环境同其自然环境一样，干净透明，新闻媒体“苍蝇难盯无缝的鸡蛋”，成天闲得无聊。

与新西兰的“无缝可盯”、“闲得无聊”相比，中国真是一块媒体大有可为的肥厚沃土！厚厚的历史沉冤，浩浩的现实苦难，浓浓的官场腐气，层层的社会矛盾……旧波未平，新浪又起！面对这个广阔的肥厚沃土，新闻媒体俯首皆是用武之地；面对沉积数十年的“奥吉亚斯牛圈”，太需要众多的“赫拉克利斯”记者。尽管当局动用移山之力封杀打压，也绝非束手无策（我本人就是例子），更何况，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永恒的变化。我们要为未来的时代培养我们自己，培养我们真正合格的新闻人才。

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培养当下学生最欠缺的“软件素质”），在新闻的讲台上，尽自己的职责。我曾对学生说；“我已经老了，再过几年就到六十，希望你们能壮大起来，继续我们的事业。”

可是，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失望。

五，无奈的讲台

最后说课堂。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这就像说“水往低处流”一样，是一个常识性的道理。那么，在新闻课的讲台上，说真话、揭示真相，自然就是这门课的最起码要求。

新闻课堂，大异于英语讲台，是一个横刀跃马的好战场。于是，从民国时报人的“四不主义”到新社会媒体的“党的喉舌”；从反右运动的阴毒“阳谋”到大饥荒的饿殍万里；从雷锋叔叔的虚假日记到刘文彩水牢的凭空捏造；从“文革”的暴烈血腥到“六•四”后的飞速堕落；从国民党抗战的历史真相到眼前社会的现实分析……我在讲台上滚滚滔滔，一泄千里。

从小饱受“我们的祖国是花园，花园的花朵真鲜艳”教育、脑子里灌满了“伟大、光荣、正确”的学子们，突然遭遇这种暴风骤雨般的冲击，心灵受到的震动可想而知。

受到的震动的不只是学生。

不时，我发现有“UFO”悄悄降临，坐在后排看我表演（后来学校在教室里安装了监控摄像后便不用再亲临现场了）；不时，我听说，这门课的学生被有关部门找去“了解情况”。

（来听这门课的从院长到主任，从教务处到教学督导，每期都有，人数为我所教的各科之冠。最少的是英语——六年来无一人前来“督导”。）

“你在课堂上说话要小心。”亲友们反复叮嘱。“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已不是当年。”

其实，我早已目睹了“8964”之后的天翻地覆。

当年“官倒”的点点星火，早已熊熊燎原，烧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当年权贵的巧取豪夺，早已变本加厉，赤裸裸强奸了大好河山的每一寸土地；当年民族尚存的气节良知，已经在刀光和金光的双重绞勒下气若游丝……。

那么校园呢？那么我们这个历史悠久文化丰灿大国的教育呢？

重返校园，我看到这20年来我们民族最重的伤痛。

“你们学新闻的，要多上网关注国内国外新闻事件。”

“老师，我们上网太贵。学校不准我们包月上网，只准我们一次一次地购买流量。因为这样能多赚钱。”

“这本教材里有很多不实之处……”

“老师，这本教材算好的……”

……

金钱的贪腐、谎言的暴烈，双管齐下，齐心协力“培养”着祖国的未来。

我望着班上那一个个青春的面孔，仿佛看见农贸市场上一只只待宰的羔羊。

钱财被掠夺，忍了，算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土地被强占，认了，算是“为了GDP超英赶美”。

可是，教育腐烂了、下一代被摧残了呢？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会有怎样的未来？

我该怎么做呢？面对一个个交纳了高昂学费、耗费了宝贵青春的学子，面对一双双被妖雾迷瘴、渴望真相的眼睛，我如何做到“在课堂上说话要小心”？

我曾在课堂上说：“暴政之所以威烈浩荡，正是因为我们一个个都成了沉默的羔羊。”

但是，他们太强大了，强大到可以轻易让“真实成为新闻的坟墓”。这些年来，有多少说真话的记者被抓；有多少披露真相的媒体被封！

我们见得还少吗？

（写到这儿，刚得知，报道“我爸是李刚”的记者殷玉生因在郑州参与“六•四”公祭，祭奠赵紫阳、胡耀邦及“六•四”死难者被抓捕了，罪名是“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

我很清楚，在一党独裁的中国，说真话和揭示真相，你就“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我很清楚，在“新闻是党的喉舌”的中国，虚假才是新闻的生命。

那么，我在新闻讲台上的“生命”呢？

（2014年上期，我正式向学院领导提出不再教新闻并调离新闻教研室。一个月后，学院答复同意。

2014年6月17日，我最后一次给新闻系的学生上课，从此，我将永远告别新闻的讲台。下课前10分钟，我才对学生说：“你们是我教的最后一届新闻的学生了。”我毫不掩饰地说，我对他们很失望。

课后，有五、六个学生留下来，要求同我合影留念。一个男同学竟当众哭起来。下午，一位学生发来信息：“谭老师，感谢您这一年来对我的关心，您教会了我很多深刻的道理。您身上的理想主义、良知和悲悯之心让人敬佩。您让我看到另一个世界，希望

下学期能来旁听您的课，与您交流。感恩谭老师！”当晚我打开邮箱，看到一位学生发来邮件：“你走了，身后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那一刻，我感到自责，我是不是太情绪化了，太在乎自己的感受了？我只看到学生质量下降，没想到每一届中都有渴望进步、渴望老师启蒙的学生。如果我能对他们的成长起到积极的作用，如果我能对中国新闻媒体培养真正的德艺双全的人才，哪怕数量很少，也是功德无量。）

附录二，新闻系学生留言

这门课我上了四个年级，四个专业，近十个班级，教了700余学生，也是我上得最累也最“激愤”的一门课。在这门课上，我的优点和缺点都极其张扬地一览无余，几年教下来，我对学生的“冲击”（或者说影响）最大的就在这门课上，而学生们对我的批评指责也集中在这门课上。学生们十多万字的留言，读得我心潮起伏……。

下面是从新闻10级和11级的留言中摘录的：

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

谭老师讲到大地主刘文彩的真相，让我十分震撼。因为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说起他，无一例外都是批评和谩骂。所以，在我过去二十年的生活中，我的印象刘文彩就是一个无恶不赦的大坏蛋，我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但在那堂课上，我的内心受到极大的触动。当时，我对谭老师的话还是充满了质疑的。因为刘文彩的坏形象已经根植在我心中几十年了，突然这一巨大转变让我回不过神来。我不能完全相信谭老师的话。回到宿舍，我上网搜了有关水牢的资料，当电脑上显示“水牢是出于政治需要虚构的宣传工具”时，我惊呆了。看完材料后，我又想起了课堂上谭老师给我们讲的刘文彩的一切，包括对刘文彩厨师和长工等人的采访结论，我不得不相信并接受这一现实。后来，我给爸爸打电话，我爸爸很惊讶地说：“这些事都是以前书上写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竟然还有这样的事？”

编造受刘文彩“迫害”、坐了“水牢”的冷月英在党的指导下教育(欺骗)下一代。（1966年）

2009年8月，我第三次前往刘文彩庄园采访，图为采访刘文彩当年长工龙万福

我上您的课是不快乐的

每次上完你的课，内心都有一种触动，对社会，对良知、对道德、对未来、对父母、对自己。都会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斗争。不得不说的是，上您的课我是不快乐的，内心总是很沉重，记得有一次课后，我想了好多好多，最后一个人就那么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天和楼下的荷花池，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对自己过去的反思，对自己现在的纠结，对未来的迷惘……

你与我想象的大相径庭

在大一的时候就久仰其大名，曾无数次幻想过他是一位多么风流倜傥，温文尔雅的人。大二终于有机会见到活人了，但与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他，中等身材，脸上有着岁月的痕迹和风雨的沧桑，一双眼睛写满犀利，仿佛一瞬就可以看透别人所想。笑的时候颇为慈祥，让人以为也是一位“好好”老师。可一旦收起笑容就严肃加严厉，上课讲到愤慨处更是带着几分凶悍的意味。

他，高兴了在讲台上跳来跳去，生气了拍桌子拍书，激动了一屁股坐在课桌上；习惯在过道上玩耍的同学没进入教室前开始讲课，因为他以为已经上课了；讲课以实战案例和亲身体验为主，思维既活跃又混乱……也许这就是他的风格。

（这也许可算得上对我上这门课的外表描述）

新闻课上，11级学生给我拍的系列照之一

党培养的孩子必定是认党这个母亲的

你总说，同学们，赶紧把思想深刻起来啊。对于你的着急，我可以理解为，你想让我们抓紧成长起来，好尽快有深刻的思想来走我们的人生。但是，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孩子不是一夜长大的，更何况是思想呢。

我认为一学期远不足让同学们的思想真正深刻。难道让同学们知道梦想荒谬、现实残酷、党员腐败、百姓艰苦，就可以使同学们高举思想深刻旗帜了吗？那么，这与红卫兵又有什么区别？党培养的孩子必定是认党这个母亲的。

讲这些有什么用？

上了这么多节你的课，完全是半知半解这门课程，懂得更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不知道这与我们上的采访与写作课程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你主观色彩太强了

首先，我认为老师您在上课时将自己的政治倾向表露得过于明显了。当一个人在评判一件事情的时候带有自己的感情色彩，那么一定会有失公允，特别是我们干新闻的，必须努力使自己站在一个客观公平公正的角度去看待问题。也许我们的国家的确存在很

多问题，但这也是正常现象，毕竟建国才63年。我们应当对她抱有希望，而不是绝望。

其次，您总是提出问题而批判之，并没有教给我们解决的办法，我们很想知道我们该怎么办，而不是一味地增加对祖国的厌恶感。（注:经过当局多年的教育，学生们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将“党”与“国”合为一体。）

一把大铁锤

谭老师讲课的内容，偏于批评的多，过于偏激了，世界没有什么绝对的善恶。事件的发生都是必然而非偶然，像历史这类事的发生，那绝非偶然，而成为历史的事，也没有绝对的对错，“存在即合理”这句话用在历史里确实很受用。谭老师的观点在现在的我看来，有点小偏激，若共产党真是那么万恶的话，人民也早反了。

此外还有一些片言只语的批评，如：“希望上课不要发太多牢骚。”“上课应注意语言。”等等。

注：在我重返校园这几年，学生们给我留下了大量的评语，其中有批评指责，也有颂扬赞美，两者的比例是后者大大高于前者，大约占97%以上。

当然，这不是真实的比例。考虑到有不少学生已经被培养得相当“软弱”，对我不敢怒不敢言，考虑到我在课内课外一向“气势如虹”，导致有不少学生敢怒不敢言，因此，批评指责的实际比例会大大增加。

所接受的观念都推翻了

这门课把我之前所接受的知识和观念都推翻了！从抗战、重庆大轰炸、大饥荒到文革，真实的历史就这样赤裸裸的呈现在我面前，了解这些之后我不得不相信了以前有一位老师说过的那句话“历史，是胜利者写给后人看的自传！”无知的自己这时就觉得很惭愧，以前我真相信我生活的世界就是《新闻联播》里说的那样。课下我赶紧去找一些资料和书籍来看，以此挽救一下自己苍白的灵魂。

正是这句话，感动到了我

也是上了谭松老师的课才更深切的明白自己身处在怎样的一个社会，也更加明白身为一名记者（确切的说是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的职责在哪里。

我记得谭松老师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某一天你们变成了那种以金钱为目的的人，不要出去说你是我谭某人的学生，我谭某人受不起。”正是这句话，感动到了我。我也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在哪里，给自己设定的角色定位在哪里。

我感到了“人格魅力”

从“中国的良心”刘宾雁到“媒体界的良心”马云龙，让我看到了敢于说真话人的人格魅力，也看到了作为媒体人的责任良知和明白一个人所应具有的责任感。在我们这个严重缺乏真实性的国度里，还有这么些为了道义良知和社会责任在不断地努力。这也

让我明白自己未来进入这个职业，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

我以后从事新闻要记住的

谭老师组织的两次讲座让我受益匪浅。印象最深刻的是讲座中马云龙先生提到的一群记者排着队领“封口费”。这是多么具有讽刺的一幕！本应铁肩辣手作文章的记者们，竟然为了区区几百块钱，就出卖自己的良心！同时，从马云龙先生身上，我也学到了作为一个职业报人所应该具有的敏感以及对时政的关心。要有自己的判断能力，特别是对事实的判断能力，对价值的判断能力，对风险的判断能力。这些，都是课本上学不到的。

我一直都记得谭老师当时让我们记住的马云龙先生的三句话：“1.绝不说假话。2.绝不创造假话 3.只要有机会，一定要说真话。”

这三点也是我以后从事新闻要记住的。

感触最深刻的

在谭老师的课上，感触最深刻的东西，就是一种精神，以及独立思考的能力。

年轻的心被震撼以后！（学生来信节选）

我不只一次地跟您抱怨说，我们在学校做事，稍稍有些锐意的想法都会被枪毙掉。我曾在校刊《新大学生》做记者，经常开一些所谓的策划会，但每次的内容都中规中矩，起初我很反感，后来我居然被同化了。所以，当开学的时候跟您谈办杂志的事，你建议我们大胆创新进取时，我总是摇头说那样是通不过的——直到上周你给我们讲课。

你说：“我们缺乏自由的新闻环境，但是我们可以努力争取。特别是你们一定要在高压的新闻环境中坚持自己的性格，因为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坚持自己文章的性格，才有自己的风骨，自己的文章才有风骨。一定要坚持，而不要去一味的迎合社会，迎合领导，迎合这个高压环境的规则，如果你一味努力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那么等到真正的自由写作空间到来后，你已经什么都不是了。因此，你们必须坚持自己的思想、坚持自己的风骨、有自己的个性特征、语言张力……”（原信用的红字）

也许你没有发现，在您的课堂上，在一个安安静静的女生的表面沉寂下，掩盖的是一颗怎样被启发和觉悟了的年轻的心。是的，我虽然在课堂上，哪怕在您讲得最激情澎湃的时候，我也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但您不知道我的心是怎样的被震撼了！

我一下惊醒：我在学校做杂志，没有真正学到该怎样做一个优秀的新闻人，反而脑子差点被洗得庸俗不堪！感谢您带我走出险境！我开始慢慢的去寻找那个最初的、还没有被社会的条条框框打磨的自己！

在今天的课堂上，我很高兴地发现那个我只是短时间的被遗忘了，只要有人召唤，她时刻都在待命！当您问道：“强烈的社会反应说明了什么？”我想的就是：“也许这就是官民从无声对立到有声对抗的导火线！”当你问道：“河北大学的学生的反应说明了什么？”我的想法是：“体现了他们对这个社会的一些扭曲的规则的惯性迎合。”当您说出自己的想法以后，我开心的对自己笑了，我很高兴的发现自己还有属于自己的思

考能力。我是真的很激动！

上了您的课以后，我明白了很多，思想清澈多了！我完全不再去想我要是不能做新杂志的主编怎么办？我现在想的是，我到底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来使自己变得强大，使自己的思想变得强大，使自己的能力变得强大，等到毕业以后，等到工作的时候，等到自由的写作氛围出来以后，等到新的新闻环境到来以后，我才可以充分发挥，进退自如，游刃有余！

最后一节课后

上谭师的课，总能感到一幅真实的历史画卷从眼前流过。那一页页血淋淋的历史仿佛一条被披上羊皮的狼，被毫不留情地剥开，露出赤条条的本相……

我们都受着一个模式的教育长大：没有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党也就没有如今美好的生活，社会主义体制是世界上最优越的体制，那万恶的资本主义是所有罪恶的深渊……曾经的我，仇视西方一切，把美国当作第一大敌。

我发现，我错了，我们盲目、狂妄而又自大，我们只是新一代成长起来的红卫兵！

前段时间，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请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作者叫周小平。看了之后，我整整一晚上没睡好觉，除却作者的观点我不能接受以外，更大的原因是那些国民的评论。有一个女网友，对周小平的每一条观点都根据事实提出疑问。回应她的没有一条是据理反驳，全是恶毒语言攻击，如："老妖婆"、"汉奸"、"滚出中国"、"美国的走狗"等。甚至有人还说："我是个大老粗，要来直接动手。"看了之后，我只剩下感叹：这就是我们的祖国，这就是我们的教育，这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培养出来的"接班人"——除了谩骂还是谩骂。最让人难以接受的是有人说："爱党就是爱国"、"我的一切都是国家的"。

前几天上完谭师的最后一节课，我再次在网上搜索"谭松"，除了仍然几乎一无所获之外，偶然看到了一篇文章，一个叫"铁流"的作家写的《扛起历史地狱闸门的右二代谭松》。于是，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谭松"如此"默默无闻"了。他不是学识不到，也不是能力不够，这是"被"默默无闻的啊。

我无法想象，这些年谭师是冒着怎样巨大的危险，才接近那被红色巨幕和谎言掩盖的历史真相。他一次次地被当局传唤，又一次次地去还原真相。他是在抢救历史，拒绝让血腥的历史真实被吞噬和淹没。

在我所有的老师中，只有杨师、谭师等几个老师是在真正地教书做学问，或许他们教的知识无法为我们以后的工作带来好处，也无法为我们带来多么丰厚的金钱，但是这些知识是我们一生最为宝贵的财富。他们让我们知道了历史的真相，让我们学会了真正的用脑思考问题，也让我们看清了真实的社会面貌。我想，像谭师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很少很少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具备的一切，那是一股不畏强权的浩然正气，那是一种殊死拼搏的奋斗精神。他才是真正的爱国，深爱着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我经历的两个小故事

故事一：

一天，我路过一农贸市场，见一个店里正在卖菜油，一台榨油的机器在欢快地转动，一个农民相的老板在热情地叫卖。

想到厨房里菜油不多了，我便驻足打望。

“来来来！上等菜籽油！”老板大步上前，万分殷勤。

“菜籽油？是好菜油？”

“好得很！我们农村自产的，绝对纯正！”老板一脸正气地说。“我们自家就是吃这种油。”他又补充一句。

“我没带油壶。”

“我送你一个！”

油壶很大，能装5升，我图省事，便任凭他灌满一壶。

接下来的日子，锅里飘出的油味总有些不纯正，但我每天主要心思都在挂念“国家大事”，因此，没把这种“生活小事”放在心上。

不久，身上有反应了，腰、腹、大腿部位冒出一些红疙瘩，奇痒无比。吃药后勉强消失，可转眼又卷土重来。我一向玉肌胴体，从无红疙瘩的侵袭，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一直不得其解，直到——

一天，一位朋友来校看我，炒菜时他发现不对，大叫一声：“哇！你吃的地沟油！”

“你怎么知道？”

“你看，大蒜放进去变红了，这是典型的地沟油特征。”

“为什么？”

“因为地沟油里有一种有毒的黄曲霉素，会让大蒜变色。”

“你怎么知道？”

“电视上早就播过，报纸上也登过。你要是没看，闻这个味也不对嘛。”

“我是觉得有股异味，但没往心里去。”

“你是读书读傻了，又不放点心思在生活上。我看你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我顾不得他的挖苦，赶紧把剩下的油倒掉——还剩不到五分之一。

不多久，身上的红疙瘩消失了。

我大步出校门，气汹汹地打上门去。可惜，店门江山虽在，朝代已换。

一肚子地沟油，一肚子窝囊气。

好在还有讲台，于是，我在讲台上发泄了如下一番话：

我给你们讲过雷锋事迹造假、刘文彩庄园编造、人民日报撒谎、新闻联播扯淡、官方官媒吹牛……可是，这种编造、这等撒谎，已经不是官媒官方的专利，它已经侵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了整个民族的共性……据说，历来都是天有道地无道，民有道君无道。道，几千年一直在民间运行。为什么我们说偏远地区民风纯朴，就是有一种天地之道在运行。可是，现在这种民间的道被摧毁了！朝廷里，官员党报撒谎面不改色，毫无心理障碍；民间中，小民百姓撒谎一样面不改色，毫无心理障碍。……1949年之后，真是一个崭新的“新中国”，执政党通过大大小小的群众运动，在短短几十年里，成功地摧毁了中华大地上运行了数千年的民间之道，让官、民同构，将中国变成了一个撒谎的大国……

故事二：

一天，我走进悉尼一家小商店——同行的朋友想买一个皮包，让我帮他询价（他不懂英语）。

选好之后，朋友不放心，万一买到假货呢？于是他叫我向老板落实一下，确信这是真皮。

这种事在国内太正常太普遍了，每每询问之后老板往往都是拍着胸脯发誓：“绝对是真的！”

可是，这位洋老板听了我的“正常”询问之后没有拍胸脯，而是拿一对碧眼瞪我长达十余秒。然后，她宣言似地一字一板地说：“先生，本店从不卖假货！澳大利亚也不卖假货！我们只有质量的高低……你说这话是对本店的侮辱……”

我面红耳赤，逃也似地离开了商店。

澳大利亚是否绝对不卖假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道”。

还有，那个皮包的确是真皮。

一本“好”教材

放弃新闻采访与写作课之后，我又接了两门新课，其中之一是《民间文学》。这又是我从没学过，也几乎一无所知的课程。不过，在这所三本院校，好像只要能看懂汉字，会照本宣科，便可登台传教。前面已经有同我一样不学无术的老师教过这门课了，听学生说，实在惨不忍睹。于是，我有了自信和勇气，因为，凭借我脸皮厚声音大的优势，教下来未必会比她差。

先选教材，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我在网上搜寻。

经过一番“淘宝”，淘出一本《中国民间文学概要》。该书是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

材，北大出版社出版，到2008年6月，第三版已加印至14次了。再看作者（网上有大量介绍）：北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民间文化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甲乙丙丁、子丑寅卯一大堆；成就荣誉更是耀眼：曾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如“优秀图书奖”、“最佳著作奖”、《民间文学论坛》首届“银河奖”、“北大505中国文化奖特别奖”及意大利巴勒莫人类学国际中心的“彼得奖”、1999年英国剑桥国际名人传记中心之“二十世纪杰出人物”金质奖章等。

更为重要的是，有好些网民在评价中说：“这是一本好教材。”

还有什么犹豫的，还有什么挑选的，就是他了！

只有几天就放暑假了，我匆匆填了征订单交到学院。

两天后，我很幸运地从一位老师那儿借到了这本佳作。

我赶紧捧读。

书未读完，我一声惊呼：“糟了！”

我翻身而起直奔办公室。

还好，征订单还未发走，我不顾秘书小姐的惊诧，赶紧把它撤了下来。

这是一本什么“好教材”呢？

如果说我以前嫌那本新闻教材散发着党八股气味，那么，这本教材就是充满着党文化和阶级斗争的腐臭味。

具体有这几方面：

一，大量歌颂共产党、毛主席、“新社会”的描写；

二，大量批判“旧社会”黑暗、地主残暴、国民党反动的语言；

三，大量宣扬阶级斗争的内容。

我原本想把书中大量出现的“马克思”（包括“马克思说”）、“列宁”（包括“列宁说”）、“毛泽东”（包括“毛主席说”）、“共产党”、“社会主义”、“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阶级斗争”等词和句的使用次数统计下来，后来发现这个工作量太大（几乎每节都有），便放弃了。

不过，不妨管中窥豹，看看书中第四章的“民间歌谣”部分内容吧。

在第一节“民间歌谣的形式和体制”中（共10页），教材列举了如下的例子：

一，讲民谣时，作者说：讽刺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民谣非常多，例如：

中央军一到,只有三不要：石磨,石滚,石槽。

作者解释：用传统民谣冷嘲热讽的高度技巧，只用三言两语，就把反动军队到处抢掠祸害人民的丑态作了入木三分的深刻讽刺。

二，讲“山歌”时作者举例：

千年古树披红装，鸡窝飞出金凤凰，革命打开万重锁，解放巧手几亿双。

三，讲到著名河曲民歌《走西口》时，作者描写道：《走西口》描述了解放前晋北人民的痛苦生活……他们饱受财主欺凌、无衣无食遭遇悲惨。它是解放前河曲人民的血泪史，是今天进行忆苦思甜教育的活教材。

四，在讲述“信天游”时，作者说：解放前信天游多唱恋歌、苦歌。抗战期间陕北

成为抗日中心（抗日中心是陕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陕北人民得到了翻身解放，在共产党领导下产生的“新信天游”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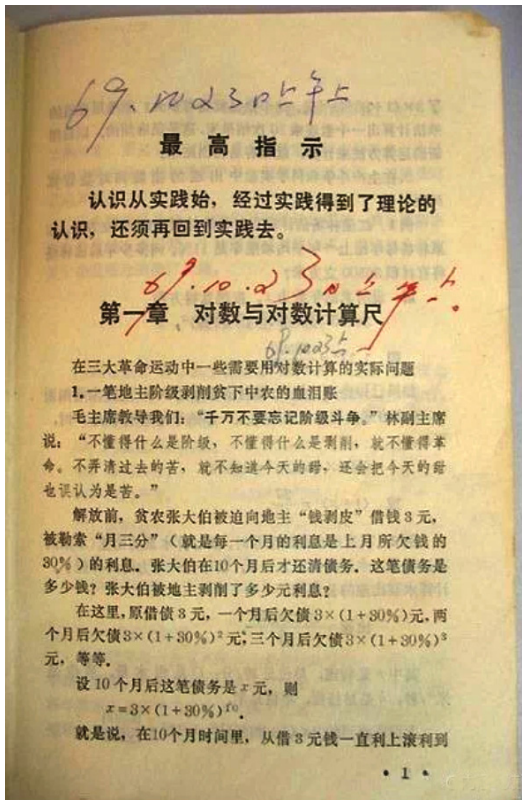
一杆红旗半空中飘，
领兵的元帅是朱毛。
一人一马一杆枪，
咱们红军势力壮。
革命势力大无边，
红旗一展天下都红遍。

五，讲到“花儿”的比兴手法时，作者举例：

武山的大米兰州的瓜，
疼不过老子爱不过妈，
亲不过咱们的共产党，
好不过人民当了家。

六，讲民间小调时作者说：50年代流传的这首优秀的拉夜是有代表性的：

金瓶似的小山呀
山上虽然没有寺，
美丽的景色已够我留恋。
……
北京城里的毛主席，
虽然没有见到你，
你给我的幸福却永在我身边。



最 高 指 示

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

第一章 对数与对数计算尺

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一些需要用对数计算的实际问题

1.一笔地主阶级剥削贫下中农的血泪账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林副主席说：“不懂得什么是阶级，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就不懂得革命。不弄清过去的苦，就不知道今天的甜，还会把今天的甜也误认为是苦。”

解放前，贫农张大伯被迫向地主“钱剥皮”借钱3元，被勒索“月三分”（就是每一个月的利息是上月所欠钱的30%）的利息。张大伯在10个月后才还清债务。这笔债务是多少钱？张大伯被地主剥削了多少元利息？

在这里，原借债3元，一个月后欠债$3\times(1+30\%)$元，两个月后欠债$3\times(1+30\%)^2$元，三个月后欠债$3\times(1+30\%)^3$元，等等。

设10个月后这笔债务是x元，则

$$x=3\times(1+30\%)^{10}.$$

就是说，在10个月时间里，从借3元钱一直利上滚利到

• 1 •

文革时我们的数学教材，几十年过去了，它与这本“好”教材相映成辉。

第二小节“民间歌谣的思想内容”共47页，其中：

“古代歌谣”3页，选材5首，内容全是关于义和团杀洋人和农民造反的；

“现代歌谣”22页，选材64首，其中反映地主、资本家残暴，劳动人民受压迫的23首；挖苦讽刺国民党蒋介石和反帝的8首（前者6首后者2首）；歌颂解放军的2首；歌颂合作化、太平天国、社会主义新貌、忆苦思甜的各一首；其他22首。

“红色歌谣”9页，选材22首，除了几首是挖苦蒋介石的外，全部是歌颂共产党毛主席的。

“新民歌”11页，选材26首，除6首是改革开放后反映老百姓的渴望外，其他是歌颂党、合作化、大跃进、抗美援朝。

第三节“民歌的艺术特点”6页，选材7首，其中2首歌颂共产党毛主席、2首歌颂大跃进、1首歌颂社会主义。

从这一章中的124首所选歌谣中，歌功颂德和阶级斗争等方面的内容有94首，占75.8%；其他30首，占24.2%。从篇幅上看，“古代歌谣”3页，只有“红色歌谣”的三分之一；第三节“民歌的艺术特点”只有6页，占第二节“民间歌谣的思想内容”的八分之

一，占“红色歌谣”的三分之二。

中国几千年的古代歌谣只能写3页、选5首？

民歌的艺术特点真的远不及“思想内容”重要？

在所选歌谣之外，还有大量的“描写性”颂歌，如作者在选用了维吾尔族歌谣“把天下的树都变成笔，把天下的海水都变成墨，即使天下的人都会写字，也写不完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之后描写道：“共产党的恩情是说不完的！ 解放后的幸福生活，人民思想的进步和战斗胜利的欢乐，都是和党分不开的。党是太阳，是一切光明的源泉。”（第153页）

这一章学下来，学生们在学了民歌民谣的思想内容时，也接受了一场爱党爱领袖的红歌洗礼。整本书学完，学生们在背下了“民间曲艺”、“对联特点”、“民间传说”、“谚语谜语”、“民歌赋比”等概念时，也一定接受了“社会主义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英明”、“旧社会黑暗”、“国民党反动”、“地主残暴”等一系列党文化教育。

中国数千年的民间文化，源远流长，俯首兼是珠宝。作者在前言中也说，民间文学宝库简直是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丰富多彩，变化万千。但是，他居然可以把这样的题材编写成一本“阶级斗争红色宣传品”！

我有些困惑，是作者缺乏起码的是非观辨别力呢，还是自身就已经被洗成了脑残？或者，是“新中国”里众多的向权力摇尾献媚的“郭沫若”型?

不过，不困惑的是，他客观上大力帮着当局“润物细无声”地把学生的脑子洗残。

教材把我带回了文革时代，可是，这已经是2009年修改发行的版本（也是作者十分引以为荣的著作）。

以前读北大才子余杰的书，他对北大不少专家教授大加挖苦，我当时有些不以为然，觉得他有欠厚道。读了这本“好”教材后，我觉得能够理解了。

我们哪儿只有几本马列毛邓江的政治教材？我们还有大量如《中国民间文学概要》这类“亚政治”的阶级斗争教材。

可怜的中国学子们，无路可逃。

我唯一能做的，是赶紧撤销这本“好”教材。

与人民币同贬

这些年，人民币急速贬值，1000元甚至不及20多年前的100余元，这一点，人所共知。

那么，我们的大学教育和大学生呢？

大降入学门槛的扩招，增强奴化教育的洗脑，弥漫大学校园的铜臭等等就不去说它

了，我只把前后的课时做一比较。

20多年前，我在重庆一所高等专科学校教书，学生高考入学的平均分数是480分左右（湖北湖南的考生达到500多分），学时三年，每期平均21周，每周上课六天（当时没有双休），每一节课50分钟，每周课时平均40多节，入学后没有半个多月的军训，没有清明中秋放假和国庆七天长假，没有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之类的课程，三年期间只有最后一学期有一个多月的实习，课程要开到第三年毕业前的六月底。

20多年后，我在重庆一所本科院校教书，学生高考入学的平均分数是460分左右（“对口生”不经过高考），学时四年，每期20周，每周五天上课，每一节课40分钟，每周课时平均30节，入学后军训半个多月，有清明、中秋和国庆长假。有四门以上政治类课程，课程在第三年时基本全部结束，第四年大四只有象征性的两、三门考察课，而且只开两个月。

要说明的是，在上述比较中唯一大致相同的是每期20周，其实，这也不同，我校每期开学的第一周是不上课的（见附表图），至于为什么不开课又要算一周学时，原因是既要显得“规范”又要想省钱（课时费、人工费、水电费等）。另外，20周中的最后两周为复习考试周，于是，学生一学期只有上课时间只有17周（有时只有16周），遇到国庆长假则只有16周，五一、清明、端午、中秋、元旦加起来又要去掉一周。按每期16周，每周5天算，一学期学生上课时间只有80天，两学期相加为160天，也就是说，一年365天中只有160天是上课时间，而这160天并不是每天都排有课，如我现在教的大三，他们一周只有两天半有课，而且到第16周（实际上第15周）就停课了。还有，这160天只是大二和大三，大一除开军训等第一学期只有两个多月的上课时间，而大四只是象征性地开两三门考查课。（但学费一万多元一分不少。）

我根据学院大一到大四的课表计算得出如下结果，大一的上课天数为120天左右，大二、大三为160天左右，大四为40天左右，共计为480天左右，也就是说，大学本科四年中学生上课时间为一年零四个月！

20多年前的三年专科，按当时的上课时间（除去复习考试后的18周）算，三年共计约650天，一年零九个月。

从上述计算中可以看出，现在，大学本科的上课时间不到当年专科的两年半。

如果再考虑到远远高于当年的逃课现象；

如果再考虑到大大低于当年的入学门坎；

如果再考虑到远远高于当年的经商活动；

如果再考虑到大大低于当年的读书热情；

如果再考虑到远远浓于当年的校园铜臭；

如果再考虑到大大低于当年的理想主义；

如果再考虑到当年尚无的网络游戏；

如果再考虑到女生酷爱的外来韩剧；

如果再考虑到日益稀缺的教师责任感；

如果再考虑到江河日下的学生进取心；

我可以说，现在的大学和大学生，同眼下大幅贬值的人民币，并驾齐驱。

第一学期

日期/星期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周次	备注
九月	1	2	3	4	5	6	7	一	
	8	9	10	11	12	13	14	二	中秋节 教师节
	15	16	17	18	19	20	21	三	
	22	23	24	25	26	27	28	四	
十月	29	30	1	2	3	4	5	五	国庆节
	6	7	8	9	10	11	12	六	
	13	14	15	16	17	18	19	七	
	20	21	22	23	24	25	26	八	
	27	28	29	30	31	1	2	九	
十一月	3	4	5	6	7	8	9	十	
	10	11	12	13	14	15	16	十一	
	17	18	19	20	21	22	23	十二	
	24	25	26	27	28	29	30	十三	
十二月	1	2	3	4	5	6	7	十四	
	8	9	10	11	12	13	14	十五	
	15	16	17	18	19	20	21	十六	
	22	23	24	25	26	27	28	十七	
一月	29	30	31	1	2	3	4	十八	元旦节
	5	6	7	8	9	10	11	十九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十	
1月17日开始放寒假	寒假期间								

1. 2014年8月30-31日新生报到，9月1日开始军训，9-10日老生报到，9月11日正式上课。
2. 本学期上课和复习考试共20周，12月29日—1月16日为期末复习考试时间。
3. 2015年1月17开始放寒假，2015年2月18日除夕。

第二学期

日期/星期 月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周次	备注
三月	23	24	25	26	27	28	1	一	
	2	3	4	5	6	7	8	二	
	9	10	11	12	13	14	15	三	
	16	17	18	19	20	21	22	四	
	23	24	25	26	27	28	29	五	
四月	30	31	1	2	3	4	5	六	清明节
	6	7	8	9	10	11	12	七	
	13	14	15	16	17	18	19	八	
	20	21	22	23	24	25	26	九	
	27	28	29	30	1	2	3	十	劳动节
五月	4	5	6	7	8	9	10	十一	
	11	12	13	14	15	16	17	十二	
	18	19	20	21	22	23	24	十三	
	25	26	27	28	29	30	31	十四	
六月	1	2	3	4	5	6	7	十五	
	8	9	10	11	12	13	14	十六	
	15	16	17	18	19	20	21	十七	端午节
	22	23	24	25	26	27	28	十八	
七月	29	30	1	2	3	4	5	十九	
	6	7	8	9	10	11	12	二十	
7月11日开始放暑假	暑假期间								

1. 2015年2月28-3月1日学生报到，3月2日正式上课，3月5日元宵。
2. 本学期上课和复习考试共20周，6月22日至7月10日为期末复习考试时间。
3. 2015年7月11日开始放暑假。

这是我校2014至2015年共两学期的课时表

从这张表可看出，第一学期共20周，但要从第二周的星期四（9月11号）才正式上课，总共上课时间只有16周（还包括国庆长假），共计77天。另外，表上列出第20周17号放假，实际上在1月9号学生就考完放假了，因此又偷去一周。

第二学期共20周，但要从第二周（3月2号）才正式上课，6月19号结课，总共上课时间只有16周（还包括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假日），共计77天。

因此，大学（不包括大一）一年全年上课时间为154天（包括没课的“上课时间”），这共计只有三个多月。另外，第二学期要花三周时间来“复习考试”！这种减少上课时间的作法是为了少付教师课时费，但学生全年的学费一分不少。

现代“东亚病夫”？

学校又举行运动会了，按理，这是青春学子们释放青春活力的好时机。想当年，我在大学读书和教书时期，每遇此时，学生们一片亢奋：选择项目、制作标牌、各班组建后勤组、拉拉队。参赛的选手们更是兴奋，早早就“热身”在训练场地，平时龙腾虎跃的操场更加喧嚣火热。

可惜，这是早已成为历史的“当年”。

在运动会后我询问了一些学生，他们大多对运动会缺乏热情。他们说，现在的学生更喜欢“宅”。我第一次听说这种用法，一时没明白。他们解释说，“宅”就是住宅，也就是呆在室内的意思。

“宅”在里面干啥？

打游戏，看韩剧……

是“宅”让我们这些俊男靓女身体素质下降？原因恐怕没这么单一，但是，现象确是一目了然。

一、现在运动会的极限度是3000米长跑，而当年是10000米。那时，许多学生，甚至一些老师（包括我），觉得跑5000米都不过瘾。记得1986年我参加校园万米长跑时，起跑线上黑压压的一大群。

二、清晨，偌大的校园里鲜有生龙活虎的锻炼者（亦无捧书朗读的奋斗者），傍晚，多的是三三两两的漫步者或者浪漫者。

三、课堂上，精力不济双目无神的大有人在；感冒发烧、胃痛腰酸的时有发生。还有个别学生，面色灰白，一上课就体力不支，趴在桌子上无精打采（而这不是三年大饥荒时期），气得我在心底骂一声：是没吸鸦片呢还是鸦片中毒？

2012年冬天，我给新闻班上课，有几个学生老是迟到，我问为什么？他们答：“哎，老师，天太冷，早上起床困难。”

“起床都怕冷，那跳到江里呢？”

“跳到江里？”他们瞪大眼睛，那表情仿佛在说：“要自杀？”

“星期四下午都没课，我带你们做一个公益活动——到江边捡垃圾，然后看我跳江。”

2012年12月25号，该班全体出动，在江边捡完了垃圾，竖了标牌后，观看我横渡涪江。

20分钟后我上岸，在寒风中光着身子一一与学生合影，最后我问：“今后有谁愿同我一起‘跳江’。”

12月26日冬泳后与我教的新闻系学生合影

几年过去了，我教的学生中没有，全校一万多学生中也没有，我于是制作了一个《冬泳纪实》的视频放给我教的学生看。我在结尾时写到：“我愿拥有强壮的思想，我也愿拥有强壮的体魄，我想把强壮的思想，寓于强壮的体魄中。”

“你们今后都要当丈夫、妻子、 父亲、母亲，你们愿意你们的伴侣，你们的子女，病病歪歪吗？那你们为什么不把自己练得强壮？”

可惜，我的言传身教收效甚微。

如今，校运动会竟成了让许多学生和辅导员头痛的事儿。已有各项政治任务、纪律检查、行政管理、工作重任在身的辅导员又多了一项棘手的任务——动员甚至强迫学生

报名参加运动会项目（尤其是高强度的“极限运动”——男子3000米长跑）。

我所在的文新院，男生原本不多，而在这不多的男生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好汉更是稀缺，于是，3000米长跑变成了一个要么利益引诱（报名参与者增加学分），要么行政命令（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的“政治任务”。

本届运动会中，我所在的文新院，从“矮子”中选了一个“高子”来担此重任。可惜，此“高子”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3000米堪比二万五千里长征，弄得不好可是会弄出人命的（注）。此君万般无奈，只得去校外寻了一个高手（就像电影特技中的替身——不知他付钱没有）。

此替身果然身手不凡，一路健步如飞，夺得第二名。这一幕移花接木表演，不少学生心知肚明，但个个守口如瓶——怀着对“阿斗”的深深同情。大幕原本可在一片欢呼声中胜利垂落，不料，一位教师裁判以前碰巧见过这位健将的比赛，于是麒麟皮下马蹄露现，于是成绩取消，于是文新院被罚扣10分。

我没有参加这届运动会，听学生说参赛的选手大多精神不振，整个运动会最热闹的场面就是不参赛只观看的拉拉队。

我所了解的只是这一亩三分地的个别现象？

外面，是中华儿女身强力壮的伟大复兴？

（注：关于学生长跑猝死的消息不时有报道，如中国青年报2013年5月27日报道：5月16日，华南理工大学一名男生在参加1000米测试时休克，不幸离世；5月23日，华东政法大学一名大二女生在晚跑锻炼时突然晕倒，最终也离开了人世。该报道说，去年年底，西安多所高校为规避风险取消了校运动会男子5000米和女子3000米等长跑项目，业内人士披露，取消校运会长跑项目的做法在全国范围内非常普遍。该报道还说，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学生长跑或运动猝死事件多数来自高校。受应试教育影响，中小学生普遍缺乏锻炼，这些学生在升入大学之后，因体质问题带来的运动伤害风险很大，这让很多高校“谈跑色变”。

另据“光明网”报道，21岁的陈杰是广州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2012年11月18日，他在参加广州马拉松10公里赛冲过终点后倒地，19日晨死亡。据该大赛组委会统计，本次大赛有1517人次出现了头晕、不适、抽筋等现象。此次马拉松赛充分暴露了年轻人体质不及老年人的问题，在各个医疗站里，摔伤、扭伤、晕倒的多数为20-35岁的青壮年。广州市急救医疗的医护人员告诉记者：“才跑了10公里，大批的年轻人就被搀扶着下场了。”）

“青楼女子的呼叫”

每到期末考试，各大教学楼前都要悬挂出大幅标语，如“踏踏实实做人，认认真

真赴考。”、“诚信为本，作弊可耻。”等等。对作弊的处罚也不含糊，除当场判零分外，还会记录在案，甚至张榜通报。负责督查的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士更是高视阔步——仿佛，堂堂君子威临考场，一身正气直面考生。

校内校外都不缺这种“贞洁牌坊”

每次看到这种场景，我总有一种见到贪官在台上大讲廉政的感觉。

不幸的是，学生们不仅也有这种感觉，而且早有切身体会。

以指导毕业论文为例。

毕业论文是学生学业中的一项重要“考卷”，学生费时往往长达数月，指导老师从开题到写作到定稿要耗费大量时间。为了保证指导的质量，学校规定每个老师最多只能指导10名学生，而且必须要有讲师以上职称。可是在多招学生挣钱，少聘老师省钱的办学指导宗旨下，学校呈现出严重的粥多僧少局面，以我所在的文新院为例，我们全院20多名教师要面对每年约600多名毕业生（2014年为799名），平均每名老师要指导30名左右的学生。

怎么办？造假。

于是，学院给各位指导教师统一分配一些他们闻所未闻的名字并附上其相应职称（以教授、副教授居多），于是，一个助教甚至一个辅导员指导的学生论文（辅导员作为导师指导学生论文也是我亲眼所见），在指导导师一栏上，打印和签字的将是一个教师和学生都不认识的“外星人”——某某教授或副教授。

于是，50名由同一个教师指导的学生有五花八门的不同职称、不同姓名的“指导教师”。（一名教师可以同时指导50名不同学科、不同题材的论文，也是我亲眼目睹的一大特色。）

这样，又一个特色出来了：学生们一边被迫“参与”君子们的造假，一边年年接受君子们“要诚信，作弊可耻”的教育。

就在校内，学生们目睹和参与的造假层出不穷。比如，为了“生源”和“财源”、为了专业的厚度和学校的亮色，我们把一些他校的名师高职罗列门下，拉大旗做虎皮。学生大学四年绝不可能目睹这些名师高职们的芳容，而名师高职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贵校的“上门女婿”。又如，为了对付上面的各项检查，为了各级评审过关，大量的数据、资料要改写和编写。这累人的活往往交给学生来干，于是，他们又一次体会到“亩产是如何达到万斤、十万斤”的。

现实中最缺的东西在这儿

其中，学生最恨而又最无奈的造假，是学校为了显示本校极高的就业率而强迫每个毕业生开一张“就业证明”。不管用什么手段，学生必须交来一张盖有公章的

所谓“聘用书”。辅导员声色俱厉地威胁，不交者将在其档案上写上“该生不配合学校工作。”我教的一位来自偏远农村的学生，不仅没有找到工作，而且也没有关系去开一张虚假的“就业证明”。在学校和辅导员的威压下，她束手无策，痛苦万分。

在我重返高校的这些年里，我每年都目睹这种造假。这并不是我校独有，而是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我说，当看到某校在招生和自我介绍时赫然表明该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0%以上时，一定要想到“亩产万斤”。

网络图片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造假和谎言就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这国策重点关注和强化关照的中国教育界，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设置，从教科书的公然造假到教育者的习惯说谎，每个角落每个层面都弥漫着“伟大、光荣、正确”的污泥和腐气。在这种环境中，面对考生发出一声“诚信光荣，作弊可耻”的叫喊，我怎么听都觉得是青楼女子在呼叫贞操。

过“英语四级”，校园里的“买官卖官”

这个“英语四级”不是国家级的英语四级，而是学校的“土法炼钢”。前者，由国家出题统一考试，总分700分，过级线为425分，这是大学本科生非过不可的“生死关”（艺术生除外）。后者，由学校自主命题，总分100，专为英语挂科（补考都不及格）和未过“生死关”的大四毕业生设置。这是最后的“挽救”，过关者，才能领到学位证，否则，只有毕业证，这将让青春、金钱和“价值”都折半。由此可见，这种“最后的挽救”何等重要。

英语同马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课程一样，是各个学院、各个专业都必须开的“通识课”，而且又是许多学生既不喜欢又不易学好的课程，因此，这门课挂科的学生很多（我所教的新闻系往往就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挂科）。到了毕业时，全校一汇总，人数蔚然壮观，以我写下此文的2014年5月为例，本月仅参加“土法炼钢”的就有700多人，如果考虑到每年靠作弊过四级和英语考试的人数，不难想象，全校有多少学生英语达不到“国标”和“校标”。

一方面，“最后挽救”极其重要，一方面要想获得“最后挽救”的学生人数众多，按市场经济原则，这就是极大的商机。早已产业化的中国教育界、早已浑身铜臭加腐臭的某些“教育者”，怎能错失这等发财良机。

于是，某校这几年（据说是从2009年起），在大四学生毕业前，极其低调地开设了一个“英语辅导班”。说极其低调是因为它绝不对外招生，也不面对所有学生，它暗箱操作，“单线发展”，要有关系、有渠道的人才能得知此班的招生（连不少辅导员都不知道）。

“辅导班”设在校外，老师都是“外星人”，辅导时间为一周（实际上四天，每天三小时，后两天背资料）。“辅导费”每人550元，收钱后只写下该生姓名和所在专业，没有任何收费凭据（注：2014年5月收费人为三人，一男两女，全是学生不认识的“外星人”）。“辅导”时，严厉禁止将“资料”带出教室，反复强调的是考试时绝不能带“辅导”的内容进考场，许诺的是考试不过全额退款。

写到这儿，我想读者应当明白这种“英语四级考试辅导班”的性质了——仿佛是中共当年地下活动和中共现今商业活动的混血儿。

有一个学生英语惨不忍睹，三次挂科，毕业时面临“大补考”（即校方组织的最后一次补考）都不能通过的险情。他焦急万分，英语坚冰非一日之寒，临时抱佛脚，难以化腐朽为神奇。他的一位同学见他寝食难安，便心生悲悯，悄悄告诉他一个秘密：有一个 “土法炼钢”的英语辅导班，可以包他通过“大补考”。该生绝处逢生，大喜过望，当即按图索骥，找到那个“地下组织”，交上550元会费，然后听“外星人”指点迷津。

“最初只有100多人，后来大约消息传出去了，又来了不少学生，我估计有近200人。”该学生告诉我。

这样，仅仅几天时间，便有约10万元进账。是哪些人分了红利？是该校校方行为还是下面有关部门或者有关个人的私下行为？我不得而知。

我知道的是，这位英语惨不忍睹的学生通过了“土法炼钢”！

他告诉我，550元共买40分的题，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考试时，这40分的题，他题都不用看，按辅导班事前给出的标准答案勾就行了。2014年“土法炼钢”的过关线是50分，也就是说，剩下的60分题，只要不是倒霉透顶，一阵乱勾乱填，瞎猫遇到死老鼠，也可能能撞对10分。（注：据说，2013年的过关线是47分，2014年大约是漏题太多，因此提高了3分。）

眼下中国大地上盛行的买官卖官，在校园里有了对应的形式。

这种买卖，对那些认真复习、拼命备考的学生是一种“谋财害命”；

这种捞钱，对中国的教育、师者的道德和学生的心灵是一种致命伤害。

可笑的是，在5月22号考试那天，为了防止考生作弊，所在的教学楼进行了手机信号屏蔽。“除了性能极好的手机勉强有点信号，一般的完全失灵，我的就不行了。”该学生说。

我知道那栋教学楼，气势恢宏，楼顶上是赫赫大字：“厚德”“笃学”……。

补记：按照求证新闻事实的原则，我本应当深入调查了解，但这本是“扒粪”记者和有关部门的工作，我一名普通教师，更是一位“敏感”人物，我不想专门去做这种“立案追查”的事。该生敢于告诉我这件事，一是彼此关系不错，二是他已拿到证书，马上远走高飞了。我对他的亲身经历和讲述坚信不疑。两年前，另外一位考研学生也亲口告诉我，她参加了一个由招生学校举办的“辅导班”，其宗旨同上述辅导班一样，一手收白花花银子，一手漏一部分考题。

此时，我虽不能像办案人员那样追索其来龙去脉，并从各方面一一举证，但我相信，苍天在上——

如此办学天理难容!

2015年11月16日，重庆南方翻译学院的老师们又“闹事”了！

多家媒体在微博上发布了该院教师维权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老师们周一开始罢课，拉出一条条横幅：“无良企业南方集团不尊师不重教只赚钱，如此办学天理难容！”、“不给活路，欺压老师！”、“南方翻译学院，补齐我们的养老钱！”。重庆本地媒体“大渝网”上有这次教师维权的“爆料帖”，帖子上连续列举了该学院的“11宗罪”。记者采访到该校一名中年教师，他表示，教师待遇差，在学校的地位低下等，已经不是一两年的问题。

报道说，该校一位大二学生小李说，不仅老师，就是学生，也对学校的一些管理极为不满，乱收费严重，书本费一年800元，发了一堆书，实际用到的不到10本，水电费也很贵。

我打电话向我在该校的老师朋友询问，这一下像点燃了他心中积压已久的怨恨，他滔滔不绝， 一泄千里：“……他们收了这么多钱，既舍不得花在学生、老师身上，也舍不得花在教学设备上。比如，美术学院的学生，四年上交六万多学费，可学校连一个100多元的画架都舍不得为他们添置……桌子椅子也是破破烂烂，图书馆更惨不忍睹，我们叫学生做论题，图书馆连起码的资料书籍都没有。一些学生想自学，对不起，图书馆‘穷’得只有点‘残汤剩饭’。更好笑的是，学校的房子不时漏水，一次我在上课时，外面雨淋淋，里面湿淋淋……”（注：投资该校的私人老板是重庆市一个大房地产商。）

该教师说，让他生气的还有，该房地产商还把校园当作了“楼盘促销地”，不时在校园内举办各种促销活动，并把学生弄去唱歌跳舞捧场助兴。此外，紧围学校四周则建起了大量商品楼，招引客户的广告词则有如“紧邻环境优雅的校园”之类的溢美之词。

“总之，我越看越觉得这不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大学，而是一个房地产开发商挣钱捞利的‘楼盘’……。” 该教师还传来两份“爆料图文”，其中一份是该校校长大人亲自出马，对曾罢课教师逐一拍照。“他脸上荡着一种诡异的笑，看上去极其丑陋！他想秋后算账，整罢课的老师。我好希望我会武功，隔山打牛，一掌把他打到粪坑里！”（注：该校长的大名和那阴笑的照片已在网上广为流传。）

我在这儿引用这么长的文字，好像不是我的写作风格，但不如此，怎能留下这个时代的真实和精彩？

这所打着“四川外国语大学南方翻译学院”大旗的“房地产商‘楼盘’”，负面新

闻一直不断，老师、学生“闹事”也不是第一次了。但是，“鼓噪你尽管鼓噪，好官我自为之”。《新闻纵横》的记者在最后写道：“该校曝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也不是没人向有关部门反映过，但是没有效果。”

为什么没有效果？原因是“你懂的！”

当年，在“教育产业化”这个中国特色的号角惊天动地吹响之后，一些胸中毫无公德、眼里满是金钱的商人们慧眼识金，一下子发现这个巨大的商机。他们应声而动，官商合力，办起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各类学校。什么“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什么“国家民族的千秋大业”、什么“成长的心灵，祖国的未来”，都是他们听不懂也不想听的“天书”。他们眼中，看得见的，不是一个个鲜活成长的青春学子，而是一个个排队捐钱的送货香客。借羊头卖狗肉的“XXXX大学XXXX学院”只不过是该商人公司（或私人老板）的一个提款机和摇钱树。

网络图片

《新闻纵横》里的一段文字仿佛为我的“偏激”作注释：“那么是学校没钱吗？不。12000人，每人每年学费12000-14000元，按照学校财务体制，钱收后不是在学校帐户上，而是在（该房地产）集团帐面上，它把学校当摇钱树和提款机……”

在这种“摇钱树”和“提款机”的“教育园地”里，投资办学的商人们会用些什么人来管理和实施教学呢？正直敢言之士想必没有生存空间，媚上欺下之徒（不管他有什么光鲜的头衔）一定大有作为。在该朋友传来的《师生长期受苛待，学生申诉无果，南方翻译学院师生停课维权》一文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我们经历了几届校领导，虽说不上喜欢，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对现任学校领导班子如此愤怒。我们强烈要求XXX、XXX和XXX这种一心一意只玩弄权术，完全不懂教育，不关心老师的所谓领导们滚出南译，还校园一个清静纯粹的环境。”

我细细读了罢课教师们列出的该校11宗罪，心里有些庆幸，相比之下，我所在的这所同类性质的学校还没有那么“痛苦”。比如，还没有发生过临时雇用的保安随意进出教师宿舍和不明身份的保安夜半潜入女教师宿舍（称声去洗澡）的事件。

不过，当我把这条新闻报道传给我的学生后，却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响，比如对那“品种苍白盗版丰富”的图书馆、比如对那每年800的书籍费……

“老师，我不当老师！”

有一名学生，受我影响，决心从事教师职业，我便鼓励她，说眼下我们的学校太需要有爱心有责任心的教师了。于是，大四实习时她便雄心勃勃地找了一个乡镇小学（在贵州）去“初展宏图”。

几个月后，她回校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时，专门来告诉我，她改变主意了，决定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已经报考了）。

为什么？

她说，实习期间她的耳闻目睹与她的想象相差太大。校园内外，吃喝玩乐是一个“正常风气”；教师们才学很低，牌瘾极大。他们为武则天是不是汉朝皇帝争得面红耳赤，为牌桌上的输赢厮杀得昏天黑地。而且，“麻将桌就摆在办公室，一有空就打。”她说。但是，最让她不适应的是“陪酒”。学校三天两头宴请有关人士：有一波又一波来检查验收的，有大官小吏需要伺候奉迎的。每次宴请，校长都要把年轻漂亮的女教师们叫去陪酒。官老爷们饱暖思淫欲，酒桌上，一个个心旌摇荡，色眼迷乱，或持玉手，或搂细腰，或……“我实在不习惯。”她说。“有一个官员，极其猥琐丑陋，他一直缠着我，他说，如果我听话一切都好办，否则……我听说还有陪酒出了事的——”她突然闭口不言。其实，这种事媒体已经有报道，如，也是发生在贵州的著名的“戴套不算强奸”案。（注：2011年5月17日，贵州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英语老师周琴被校长强令陪8位官员喝酒。酒醉后她被阿市乡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竟然说：“戴了避孕套就不算强奸”。）

该学生还告诉我，那些老师们虽然才学很低但脾气很大。“我从没见过可以这样辱骂学生的，那些语言我无法复述，根本不把学生当人，农村的小学生真是可怜。还有，他们中午的饭菜质量实在差，像是猪食，一点清水土豆汤，学生们围着疯抢，这在城市很难想象。还有，学校普遍都存在克扣学生餐费的现象。”她沉默半响低着头说：“老师，我知道你希望我当个老师。可是我觉得我融不进去，我无法改变我所看到的，我又不愿意同流合污，我只有离开，虽然我很喜欢那些孩子——他们真的很可爱。”

“你所看到的是不是个别现象？”我问。

“不是，我有同学就在毗邻的一个县，她也受不了，坚决要离开”。

“那你想法在城市里找个学校，城市里要文明些。”我不死心。

她一下笑起来。“老师，我在城市一所培训学校代过课。城市的孩子我管不了，他们同农村孩子刚好相反，一个个都是小皇帝，厉害得很。他们的家长更加厉害，惹不起。我们班上有个小女孩，动辄发出惊天动地的尖叫。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妈教她，谁要是碰到了你，欺负了你，不管老师还是同学，你就拼命尖叫。更多的家长是这样教孩子：谁打了你，马上就打回去，对老师也是如此。农村学生的家长大多是爷爷奶奶，任凭学校老师打骂他们的孩子，甚至还叫老师用这种方式管教学生。城市里刚好相反，你要是碰了‘小皇帝’，父母们，爷爷奶奶们会立马打上门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同一个

国家，同一个民族，城乡差距这么大。”

“可是当公务员或进一个事业单位就会是一个‘干净’的环境吗？就不会遇到看不惯的事了吗？”

她说她不知道，她只了解她所看到的学校。当我告诉她，那里面也有很多问题时，她惶惑了，不知该怎么办。

“你很喜欢那些学生？”

“很喜欢，他们很单纯，很可爱。”

“那你还是选择当老师吧。”我说。

“老师，我不当老师。”

教师节，一份特殊的“礼物”

2014年9月10日，是中国第30个教师节，新闻12级的一位学生来看我。

“老师，我决定今后不当记者了。”

“怎么了？”我很惊讶。在新闻12级48个学生中，只有不到10个学生热爱并愿意从事新闻媒体。这位学生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一个很坚定的热爱者，她不仅上课端坐前排，全神贯注，而且一再缠着我，要看我写的采访纪实作品《长寿湖》。

“我暑假通过关系，进入我们市（在陕西省）的广播电视台实习，一个多月下来，我发现，这个行业同我的理想和想象相差万里……”

学生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归纳起来有这么几点：

一，在百姓面前该媒体是老爷，冷漠而又专横。

她举了几个例子。当地在7月底8月初出租车经营户举行了15天的罢工，原因是政府将个体经营户花了四、五十万取得和经营权强行“收买”——每户只付10万元再加8年的“使用权”。全市出租车罢工，经营户集体到市政府请愿，他们下跪恳求。同时，他们也恳求电视台报道他们的恳求。电视台面对一张张悲苦的面孔，一双双求助的目光，一句安抚的话都没有，冷若冰霜地将他们拒之门外。还有，她亲眼目睹一位百姓上门求助的遭遇。该男子被车撞伤，肇事车逃逸，他记下了该车车牌号，想请电视帮他公布一下。不料电台的人冲着他一顿臭骂：“找我们干什么？烦！去找交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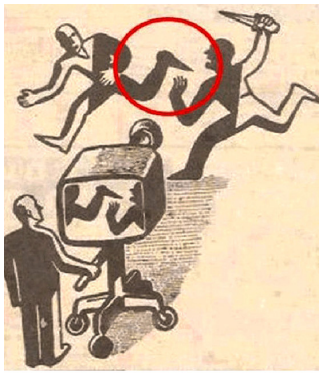
二，在官员面前该媒体是奴才，温顺而又谄媚。

她也举了几个例子。一次报道官员开会——这是媒体雷打不动兼闻风而动的头等大事，记者扛了一台较小的摄像机前往——因为得知会议规模很小，只有一位常委出席。这惹得官员大怒，该官员的秘书冲着记者一顿臭骂，记者诚惶诚恐，赶紧认错，并保证下不为例。还有，电视报道官员，有严格的等级规定，是常委级的，露脸几次，时间多长，先后顺序，不容出丁点差错。有一个从其他部门调来的人，在编辑官员会议时不幸失误，结果被罚一千元并调离岗位。

三，虚假是新闻的生命。

该学生说，在课堂上反复强调的是：“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是，她一个多月

的实习发现，现实中刚好相反。媒体、记者如果敢如实报道（说真话），那就要遭遇打压、处罚。她在短短的时间里，就亲眼目睹了一次又一次的造假，比如后来报道出租车罢工事件。那次罢工以失败告终，经营户拖不下去了，他们要养家活口，只得接受了政府的变相抢劫。“台里的人早就说过，同政府作对是没有胜算的。”她说。最精彩的是事后电视台对“罢工司机”的现场采访。她目睹了“新闻是怎样造出来的”。他们千方百计寻找了几个开出租车的打工仔，让他们代表经营户表示对政府处理此事的感谢。感谢词由电视台提供，现场教一句让对方鹦鹉学舌地重复一句，拍摄完后由电视台剪辑合成，于是，一篇感谢党、感谢政府的现场新闻报道就出笼了。



新闻是怎样造出来的（网络图）

四，外出采访，吃喝为主。

“老师，你在课堂上讲的种种采访经历很是吸引我，我很渴望像你那样爬山涉水，斗智斗勇，写出一篇篇精彩的采访稿。可是，我跟着他们出去采访，‘收获’最大的就是吃喝。”该学生告诉我，一个多月的实习，真真是美食大宴，每到一地，一定被招待一顿吃喝。至于采访，那实在太轻松了！酒足饭饱之后，对方往往直接说，你们回去，我们把稿子传给你们。会议报道就更是这样，直接用由秘书提供的官方稿件，一字不能改。这样，她一番“采访”下来，除了酒肉，什么都没“品尝”到。

五，其他。

“……我去实习，还让我交了200元‘设备使用费’，可一个多月，压根没让我碰一下设备，走时钱也不退。……一位局长的儿子进入电视台，台长亲自带领他走访一个个部门，并马上给他配备了各种‘设备’。……对了，那个台长还很……很……色……。”

“老师，我是带着满腔热情进去的，可我完全没想到，实习的结果是让我决定放弃当记者的梦。”

2014年的教师节，重庆酷热，学生讲得热汗淋淋，我听得阵阵发冷。

我沉默不语，以前有学生实习后决定不当教师，我还一再劝慰，但对她，我说不出话。因为我清楚，“党的喉舌”已经是一块烂透了的臭肉，把一个有良知的优秀学生推入“党的喉舌”，无疑于把一个良家女子推入青楼。

“那你今后打算做什么呢？”

“我打算出国。”顿了顿，她又说：“听说国外是官员怕记者，同我们刚好相反，我想去看看……”

学生走后，我走到阳台上，皓月当空，夜色寂静，我久久地凝望一尘不染的夜空。

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和今天的教师节，数十个学生发来了贺词和赞语，让我愉快地感到了做一个教师的价值、意义和欣慰。可是，晚上这位同学特殊的“教师节的礼物”，

转眼消解了心中的这份愉悦。

我有什么价值？“市场”需要的是奴才和妓女，而你竭力想打造的是“威武不能屈”。后者，注定难以生存，被“市场”淘汰。

清冷的皓月孤零零地高悬苍穹，辽阔的大地臭哄哄地布满污垢。

凝目良久，又想起那位年青诗人的诗句：

“黑暗从地底升起，遮住了明亮的天空。”

卧轨自杀的海子，你为什么这么绝望？

在又一个“8964”纪念日

“8964”的25周年纪念日在全国一片打压和抓捕的恐怖肃杀中走来了。

2014年6月3号，我有新闻的课，课前几天我一直在考虑，讲不讲25年前那场惊天动地。以前，我曾给学生提到，我心中有几个永恒的痛，一：抗战的惨烈悲壮（尤其是“新中国”里国民党抗战老兵们的不幸）；二：5•12地震（尤其是死于豆腐渣校舍的花季学生）；三：1989年的“6•4”屠杀。前两个我已经给学生讲过了，还剩下“8964”——改变了中国命运而我又亲自参与（在重庆）的惊天事件。

可是，今年的打压来得尤其猛烈，在家中聚会谈论“6•4”的著名人士徐友渔、刘荻、胡石根等被抓捕了，记者高渝、律师浦志强被关押了。有人统计，从去年3月到今年3月，全国就有200多名“思想犯”被抓捕。太子党习近平上台后，不到两年，抓捕的思想犯超过了胡温执政的十年总和。在“6•4”这个敏感时期，更是当局狂捕乱抓的高潮。

我已是“登记在册”的人物，一言一行都在他们的“摄像头”下。（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学院有一位专职的党支部书记负责“关心”我。）他们在6月3日的课堂上，想必早有安排。我有揭示真相遥祭亡灵、痛斥暴政唤醒学生的强烈冲动，可是，我有义无反顾自投罗网的浩然勇气吗？

几位了解我的朋友坚决阻止，我心有不甘，特别是，如果课堂上或课间有学生要求我讲呢？（以前就有学生强烈要求，如新闻10级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恳求，作为一个男子汉，作为一个说过“当年无数学生把生命都献出去了”的老师，我会明哲自保地当场退缩吗？

犹豫，挣扎……

最后我决定把相关的图片拷在U盘里，如果学生要求就讲（到时也可说是学生要求讲的），如果不要求就放弃。

6月3号上课了，全班50余名同学没人吭声，我只好讲新闻采写中的“社会新闻”。

第一节课下了，课间十分钟，我期待地望着学生，他们一如既往，有的趴在桌子上打盹，有的兴高采烈聊天。第二节课我只得继续讲专业。在下课前15分钟，我实在忍不住了，突然丢开教材问：“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全班一片哑然，我徒然生出

一股莫明的火气：“当然，25年前你们还没有出生。”我顿了顿，突然在屏幕上打出照片。“你们想看看25年前的谭老师吗？”屏幕上展示出我在一辆作为路障的电车顶上的照片，背后是街头的学生和飘扬的“战旗”。接着我展示出我同我的学生们游行到人民礼堂请愿的照片、北京绝食学生现场、坦克前的王维林……。

25年前的谭老师

1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下课铃响后，学生们收拾起书本匆匆奔向食堂，没有一个人留下来向我了解25年前那惊心的一幕！

我独自关上电脑、收起屏幕，锁上门，默默离开……。

当晚，我走在校园里，诺大的校园一片“歌舞升平”。树荫下相恋的情侣你拥我吻，操场上减肥的男女活蹦乱跳……。

他们不仅不知道今天是个什么日子，甚至不知道这些天各个学校都在加强值班，严防死守。

我真是为当局的“杞人忧天”而“杞人忧天”——有必要吗？

有什么值得“加强”的？！

有什么值得“严防”的？！

现在的大学生（包括许多青年教师），早已被你们25年来的“灌水”和“氧气隔绝”改造成了点不燃的“水积木”。不要说去“严防”，就是把严防的人手用于去“煽动”，校园里的“水积木”也冒不出青烟，燃不出焰火了。

这是远深于对25年前枪声的悲愤！

这是远深于对25年前屠城的绝望！

补记：

庆幸的是，有两个受我影响的学生，当晚邀我相聚，其中一个见我郁闷，暗暗地去买了二十只蜡烛。晚上，我们在寝室里将蜡烛拼成“6 4”，点燃，跪拜，遥祭25年前为民主自由献身的英烈。

刚写完此文，空中响起空袭警报——每年为1941年6月5号重庆大隧道惨案遇难者的纪念。

警报声让我想起我当年采访的102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其中有15位大隧道幸存者）、想起我在黑石子无碑墓地上的感受、想起73年前那惨烈悲壮的一幕、想起我们民族百年的苦难和血泪……

笛声凄厉悲怆，直透心灵，倏地，热泪盈眶。

“没有良心”的多媒体

多媒体在教学上的运用，真是一场“光荣革命”，它集声音、色彩、图片、视频等于一身，立体地向学生们传授知识。教师也从繁琐的抄写黑板中解脱出来，从而充分地利用课堂时间。

可是，任何美好的东西，如果使用者缺乏了良心、爱心、责任心，都会走向反面。

2012年，我给09级对外汉语讲《中外文化交流史》，课排在晚上，7点到9点半。几乎每次上课，我都听见隐隐传来放视频的声音。课间时我发现对面的教室一片黑暗，只有讲台上屏幕的光亮——学生们在“看电影”。我不知道那是一门什么课，我只知道整晚上都在放电影，而且几乎放了一学期！

我几次想看看该教师在放什么，但前后门都关着——同电影院一样。我望着那一片黑暗的“影院”，不知学生们一学期下来是否看累了、看烦了，但我知道该教师一学期下来一定轻松了、愉快了。

眼下，各类视频太多，多媒体播放太方便，一段视频播下来，往往这节课就告终，多么轻松愉快。

于是，不少教师乐此不疲；

于是，整得学生怨声四起。

终于，2012年下半年，学校下发通知，教师播放视频超过5分钟必须申报。

可惜，这就同当局下发文件不准公款大吃大喝一样。

还有，一旦停电，一些教师便借此良机“休假”。有一次上午刚上课不久，就遇到停电。没有了多媒体，我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地给学生讲，三节课下来，我仍然讲了不少东西。可是，我看到，有的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坐在椅子上，低着头自个儿玩手机。

没有了多媒体，便不能讲课了吗？几十上百人的青春，就这么无聊地消耗了。

我想，当一个教师的爱心、责任心丧失之后，先进的教学设备也许便走向它的反面。（这可能正如医院大量的先进检查设备成了不良医风的捞钱机器和不学无术的依靠。）

点名，课堂上的“父母之命”

胡XX（学生） 21:51:55

大学应是自由之地 但是我们并不自由，体制内的老师都像一个模板刻出来的。

漂X（我） 21:53:00

这我知道，不少不合格的老师站在讲台上。但一个有个性的人总能想法最大地去突

破，去争取。

胡XX　21:55:24

我曾经想按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只去上有价值的课，剩余时间就读书和各处跑采访，但是老师的点名让我很恼火，三次不到就挂科，挂科几门就毕不了业……现实总是试图磨平我们的棱角……

以上摘自2013年12月我同一位学生的QQ聊天记录。

这又让我忍不住要说说我的同行们。

有一位教师，才学很浅，脾气很大。几年前她本科毕业就来校教本科，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她自知底气不足。为了弥补不足的底气，她使出“王母娘娘”的脾气。好在我们的学生们，都是“8964”后出生的，从小饱受当局刻意打造，大多在进大学前，都成了驯服的羔羊。该教师使出“用很大的脾气来充填很少的才气”这一绝招，居然颇见成效。从此，她把这个从实践中收获的宝贵经验作为她的教学特色，课内课外推广。久而久之，她整个人似乎都变成“王母娘娘”了。

但是，使用“脾气”这个绝招毕竟是个别特色，绝大多数教师的“杀手锏”是“点名”—— 三次不到就挂科，挂科几门就毕不了业！

学生们无法选择无法逃避了。不管是什么课，不管教师才德如何，“点名”——父母之命媒婆之言——让你只能从命。因此，如果一个外来者看到马列、毛概、“三代表”之类的课堂上也坐满了学生，一定不要认为该教师技艺高超人气火旺，更不要想到学生们对该门课程喜爱有加，而要想到点名——“父母之命”。

记得有一次一位学生很想去听我的《西方文化概论》课（他们班不开这门课），但走到半路上她退缩了：“老师，还是算了，我们‘毛概课’每次都要点名，我已经被点了一次。”

她垂头丧气地走了。

点名，点到了学生的死穴，三次“死穴”被点，挂科！

学子们无路可逃，只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还有，如果班上人多（常常上百人），一次点名就耗时十多分钟。有的学生点名后第二节课就开溜（甚至半途就溜），让好不容易聚集的人气又大受损失。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教师便在下课前再点一次。这样，80分钟的课时20多分钟花在点名上。学生们在一声声机械呆板的“到”的应答中挥洒了亮丽青春和金黄学费。

这是学生的不幸，也是教师的悲哀（靠点名来强迫和威胁学生，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老师已经失败了），更是我们这个教育体制的毛病。

补记：但愿有一天，校园外我们能有选择政党和选择领袖的民主；校园内学生们有选择课程和选择教师的自由。

“这个问题很敏感”

有一位老教师，课堂上每说到官方忌讳之处时，也就是说，要说真话时，他便一脚急刹，嘣出一句：“这个问题很敏感。”立马掉头转向，顾左右而言他，让好奇的学生一阵心痒兼一头水雾。

该教师经历了不少整人的政治运动（也许还对“祸从口出”有切肤之痛），久而久之，身心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自觉地与当局（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上初中时，是文革中的1968年，整个初中时期，我受到了一整套强大的“保持一致”教育。印象最深的是校方和班主任老师反复强调的几句话：“我们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每思考一个问题，都要看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每走一步路，都要看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我当时觉得，这事做起来比较困难，尤其是说话，我们十多岁的少年，说话往往冲口而出，一不留神就会偏离“路线”。但老师说了，这正是对我们的锻炼和考验，而且，这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必由之路。当时只有13岁的我，还想不到“奴隶和奴才是如何炼成的”这种大问题，只是一个劲地想如何才能达到学校和老师的要求，把自己锻炼成“革命接班人”。

庆幸的是，几年后我下乡当知青，在一个地老天荒的地方撒了一把野，再后来又脱离“体制”，孤魂野鬼般游荡了16年。这样，我没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身上倒沾了些口无遮拦独立不羁的狂放野性。

可这位老教师，一辈子在体制内“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党的阳光点点滴滴加轰轰烈烈，润物细无声加宰你没商量，一步步终于将他打造得超级“敏感”。

不幸的是，他又没能彻底奴化，身心还没有完全被阉割成太监，因此，课堂上讲到兴处，他偶尔会本能地“坚硬”一下，说出几句“敏感”的真话或一段“敏感”的真相。

但一个新的问题又出来了，这就是，每当一“坚硬”，他便心跳加速血压上升面色发红。甚至“坚硬”之后也是如此。相反，说假话套话和“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话时，他则面不改色心跳正常，讲台上流畅而自然。

我曾经读到一个笑话。据说，测谎仪进入中国后，操作人员发现，受测者说谎时仪器反应一切正常，而说真话时心跳、脉搏、血压全部异常——符合说谎时的一切数据。

我一直觉得，这不是笑话而是我们眼下的真实生态，如若不信，去测测那些大小官员们在台面上讲真话时的血压心跳和说假话时的心跳血压。

2012年在香港召开的纪念反右运动55周年国际学术会上，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人无信不立，这是我们传承数千年的古老道德，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可是，1957年不同了，诱骗、欺诈、谎言，被当作了‘引蛇出洞’的伟大韬略。当局诱使人们说真话，不说是对党不忠，并且信誓旦旦保证：‘言者无罪’。可是，转眼，当局就据言定罪，整得言者家破人亡。

从此，人们不再敢说真话。谎言，成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

所以我说，1957年，数得出的是55万多知识分子家破人亡，数不出的是整整一个民族开始大步走向谎言。

自1957年起，真话，完全成了危险的同义词；假话，成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从此，我们的心理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说假话时心安理得，说真话时心慌意乱。”

我们为什么有铺天盖地的假冒伪劣产品，因为我们早已有一个健全发达的谎言系统。前者，只是后者的一个物质体现形式。

补记：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讲一位良心还在的老师的“临终真言”。虽然我无法考证其真伪，但就我对党领导下的政治课教科书和其教法的了解，我认为，“临终真言”说的是一个真实的现象，因此，附录于下：

《政治老师退休前的最后一课，惊呆学生！》

同学们，今天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节课，因为明天我就要正式退休，并且离开这所学校了。今天，我想给你们上一堂与以往不同的课，想告诉你们有些事情的真相。

如果一个人一辈子的职业竟然是讲假话，那他的痛苦也是职业性。我们这种政治课老师便是这种“职业骗子”，我们的职业病便是每天骗完了无比崇敬我们的学生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再受良心的谴责，谴责完了第二天又精神焕发地回到课堂上骗你们。

你们会问，全中国人都不敢讲真话是谁造成的？我只能告诉你们，存在着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便是由一个美丽的谎言所造成的，为了维持这种体系只能依靠继续编造谎言，当我们生活在这种体系之中后，我们只能编织谎言或者附和谎言以表明对这种体系的忠诚，避免被这个体系所抛弃。

马克思主义最为经典的论断称，人类社会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其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并且认为这个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切矛盾的根源，这种矛盾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自身无法解决这个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具有比资本主义更大的优越性。今天老师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便是老师前面所说的那个“美丽的谎言”。

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或者叫资本的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结合，是人类进入社会一开始就有的，是一种最基本的生产方式。所以，人类社会数千年的历史证明，生产资料的私有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根本就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最自然不过的一种关系。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这种关系有没有变化呢？没有。只不过生产力的提高使得个人能够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而已，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更高了。

社会化大生产的必要前提是产权的明晰，产权明晰就是要求产权要落实到自然人头上，也就是产权私有制。产权明晰才有利于资本的流动和资本的合作，才有合资公司和股份公司，才能不分种族、肤色、阶层、地域实现资本的联合和流动，从而实现社会化的分工合作，即社会化大生产。

全体人民的利益、全社会的利益不是虚无的和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和具体的，它的基础是每个公民合法的私权。离开了个体的权利谈全社会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是没

有实际意义的，也是虚伪的。事实上，自私是一切动物的本性和生存的本源，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最为原始的动力，消灭人的自私既不可能也是愚蠢的。

从历史的实践来看，包括中国在内，自从二战以后，世界上先后有数十个国家尝试过搞马克思所说的公有制社会主义，结果无一例外，天怒人怨，生产力受到空前的破坏，民不聊生。至今除了北朝鲜一家外，全部改弦更辙，重回私有制体系。

我们知道，为了掩盖一个谎言，最终需要一百个谎言来作伪证的。所以，今天老师要告诉你们的是，三年来老师教给你们的中国近代史，从基本面貌而言是假的历史。这个近代史是官方拼凑起来的，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用来证明那个美丽的谎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惜伪造历史造神，将一位导致中国文明大倒退的罪人包装成了一个始终“伟大、英明、正确”的人民的“大救星”、一位“品格高尚的圣人”、一位容不得任何质疑的“神灵”。

这位“神灵”领导着他的党历经艰辛在上世纪中期夺取了大中华的政权，这当然是一个事实，成王败寇虽然也是中国人历来的历史观，但是，王道并不等于正义和崇高，更不必然代表著文明和进步。因为这位神灵是在实践着一个谎言，它是违背历史规律的伪学说，决定了这位神灵所作所为带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并不是福音而是灾祸，相反，他导致了中华民族生产力的空前破坏、社会道德的大溃败、文明的大倒退。中国人在这位“神灵”的左右下，饱尝了近一个世纪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带来的苦果。可怕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官方仍然用这种反人类文明的邪恶学说作为整个民族的思想，我们报应还没有结束。

在今天短短的两节课时间里，老师没有办法将中国近代史的真相一一告诉大家，老师只能告诉你们上面的结论。老师只能告诉你们一个铁律，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便无真相可言。当一个国家和民族只有一个声音的时候，你们就必须用怀疑和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

同学们，你们即将参加高考，即将离开这个学习和生活了三年的中学，老师最后送给你们一句话，那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抛弃掉那些华而不实的虚假理论，抛弃那些官方人造的偶像，回归人类的本性，尊重普世价值，尊重历史事实，了解真相，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中国，太需要具有独立人格和价值判断的公民了。

如此“科研成果”

大学教师没有中学教师高考升学率的压力，但却有“科研成果”的竞争。

每到年终，老师们都要填报一张表，其中很重要的一栏就是“科研成果”：发表了什么论文、出版了什么大作、从事了什么科研项目等等。

这真是一张让“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年关”表。

从“精神层面”上说，有“科研成果”或“科研成果”显著的老师，扬眉吐气，站在“学术”的高台，受人仰视。从物质层面上说，年终的奖金档次就不一样，而且还可

能有额外的奖励。从职称职务进升上说，那更是“华山一条道”——非“科研”莫行。例如，我校从助教升讲师，一个必不可少的硬件就是必须有在省一级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四篇论文。要上高级职称，更是要捧出显赫的“科研成果”。

“科研成果”既然同老师的个人利益血肉相连，那老师们自然是要“血肉”相拼。

可是，“科研成果”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劳作过程，很难今天播种，明天就结果。不过，在发明过“亩产万斤”的中国、在眼下乱象丛生的市场，没有什么奇迹是不能产生的。众所周知，我们西瓜有膨大剂、猪崽有催肥药、蕃茄有增红素、鱼儿有助长灵……。于是，我们有20多天就宰杀上市的肥鸭、有两个多月就膘肥体胖的大猪……。

既然食物瓜果可以速成，“科研成果”为什么不能？

那么，“科研成果”的膨大剂、催肥药、增红素、助长灵是什么呢？

通常有以下几种：一，赤裸裸的抄袭；二，巧妙地嫁接拼凑；三，以钱开路。

第一种来得最快，属于20天就可宰杀上市的肥鸭。不过，此举风险较大，弄得不好鸡飞蛋打。奇怪的是，铤而走险的专家学者层出不穷，不一会儿就爆出一个——就像膨大剂引爆了江苏丹阳西瓜一样。这不，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的2014年上半年，先是有复旦大学的中科院院士王正敏学术抄袭、科研剽窃——至少57篇论文涉抄袭，还“克隆”国外“人工耳蜗”样机冒充自主研发，接着就是重庆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张世友被举报抄袭论文，“从讲师一路抄袭到教授”。（该教授还是重庆市伦理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高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研究会副秘书长。张现被重师除名。）还有，去年11月被免去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副主任的重庆大学教授刘洪彪，也是论文剽窃。看来，象牙塔内的一些专家学者，同官场上的一些贪官污吏一样，不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而且也如贪官反腐，一边抄袭剽窃，一边大讲思想道德。

第二种要费力一些，不仅要广泛搜寻，更要巧妙嫁接，还得加点自己的润滑粘连剂。这样“研究”出来的成果，虽然论点、观念、见解、立意等全是人家的，但组合文字大体是自己的，正如增红的蕃茄，品种、模样、土壤等都是人家的，但至少增红素是自己的。

第三种对中国人来说很好理解（老外不一定好理解），这就是发表“科研成果”的刊物同创造“科研成果”的作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买卖。我认识一个年轻教师，还有几个月就要评讲师了，可他的论文指标还是一片空白。我关切地问他，他笑嘻嘻地说，不要紧，钱一打去论文就出来了，误不了。果然，没多久，三篇论文就白纸黑字地出炉了。还有一位教学秘书，年终时竟报出发表六篇论文（她也要评职称），我了解她，知道她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但不管怎样，相比一年到头一事无成的我来说，她是大大地露脸了。事后我问起她如何“科研”的，月收入只有三千的她长叹一声：“花了我四千多——”

（注：眼下已经有专为发表论文的中介机构，就像房屋中介公司一样，买卖双方通过中介成交。一般刊物每个页面收费400元以上，核心刊物收费高达万元。另外，也可直接将银子打给刊物的有关人士，对方包写作包发表——就像代授精代孕育一样。此举的风险是“包写”的论文可能惨不忍睹，你若不满意就拉倒，既没有发表，打去的银子自然也变成打狗的肉包子了。）

不久前曾经看到媒体报道，我国的出版物数量已经是全世界第一，也有媒体报道，我国这些年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是，质量呢？全世界第一的出版量中有没有一部世界名著？跃居世界前列的论文数量中有没有一篇入选诺贝尔奖？

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曾说，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场。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罗源认为，“包括许多学报在内，国内学术刊物大量刊发垃圾论文是一个客观事实。”

本末倒置的“科研”

高校教师的职责一是教学，二是科研，这没有错。从理论上说，科研能促进教学，教师通过科研（主要是撰写论文），提高学术水平和教学效果。

问题是，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土地上，好像任何“理论上说”的东西在实际中都大大走样，甚至刚好相反。比如，从理论上说，我们的各级官员，都是人民的公仆。

“教学科研”是高校里听得烂熟的词，想来也是，正如“为人民服务”是政府楼里的中心词一样，“教学科研”就是校园里的中心词。

问题是，放到首位的应当是什么？是教学，还是科研？

科研，自然重要（尤其是对那些担负着引领行业发展、研发尖端科技的项目来说），但是，对绝大多数高校教师而言，所谓的科研更多地是与个人的名利得失相关：评定职称、赢得头衔、出席会议、获取金钱…….

由此可见，虽然教学科研一向并列相提，但现实中前者主要是为公、是奉献，后者主要是为私、是索取。

一个教师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呢？是教学，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教好学生。因为他面对的是成百上千的青春学子，他肩负的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育人重任，站讲台和站柜台的巨大不同正是他面对的是成长的心灵，而这心灵关系着民族和国家的未来。

因此，考评一个教师是否合格、是否优秀、是否尽职，主要应当考查他的教书责任心和育人效果。

可是，在高校里这些年，我发现，在教学与科研上，刚好本末倒置：重个人的科研，轻育人的教学。

举一个例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任教的学校留校了两名学生，在随后的几年中，两人展示了各自的特色：一名教学出色，深受学生欢迎；一名科研出众，省内外发表论文二十余篇。两者的不足也显现：前者科研欠缺（只有一两篇论文），后者学生不满（他连朗读都不流畅）。“奖惩”结果也很快显现，前者默默无闻，年年独守三尺讲台，连评讲师都十分困难；后者名声四扬，期期出席学术会议，破格提为副教授。在随后的岁月里，后者更是“直挂云帆济沧海”，从一般院校跃入一所211重点大学，不久便任该校的一个副院长。

一个教师，是该把主要精力用在教书育人上还是用在个人发表论文的“科研”上？答案显然应当是前者。可是，由于我们的考核考评、奖励提升制度客观上偏重后者，教

师的个人利益也主要来自后者，因此，导致“科研”客观上重于教学，导致许多教师把主要精力用于个人的“科研”。

更为不幸的是，在我们的学校里，还存在大量的“为了科研，损伤教学”的现象。比如我前面提到的那位“破格副教授”，他的主要心思、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科研”上，因此既不认真备课，也不批改作业，他教的学生抱怨声声。

但，抱怨声声并没影响他的步步高升。

我还了解到（媒体不时也有报道），有的硕士、博士导师，成天忙于自己的科研项目，或者说忙于去争取来钱的科研项目，把课交给自己带的研究生去上。这样，学生们名义上是上某某教授的课，实际上是在听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师哥师姐们“指点迷津”。

还有，“目前我国存在的情况是，科研活动和培养人才经常是脱节的，有多少科研成果是为了教学？学生有多少是享受老师科研成果的？”（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语，中国青年报2014年7月28日报道。）

我想，被“科研”误了的教学是教育不幸的扭曲；

被“教学”误了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不幸。

补记：2014年，清华大学解聘了两位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一是外文系讲师方艳华，二是微积分助教闫浩，原因是他们“科研成果不足”，未能达到升任标准。（方艳华老师一心扑在教学上，每个星期花25个小时为学生批改作业，因而发表论文少。）

消息传出，两位老师的学生反应强烈，方艳华的学生，外文系2011届毕业生庞博发起了请愿活动。5天里，来信50多封，4万余字，其中，毕业生王蕾的请愿信《请求清华留任方艳华老师》在网上广泛流传。王蕾说：“方老师让我重新认识英文写作，她叫我们忘记为了高考而背诵的八股文，她鼓励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通过英文写作课，我们学习全新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拷问那些不经审视的观点，重塑自己的价值观。”“像方艳华老师这样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多年的人，才是学校最珍贵的财富。”该文最后呼吁：“清华留住好的老师。把教学上对学生认真负责，对学生终生影响很大的老师留下来，不要让教学很突出、对学生付出很多的老师觉得寒心。”庞博说：“大家记得老师当年的课给我们带来了很深远、终身性的影响，我们认为方老师是清华外文系最称职的老师之一。”

闫浩的学生小胡为此写下了《突然想为闫浩写一篇日志》：“清华学术大牛越来越多，教书教得好的老师却感觉是越来越少，很多老师忙发论文，忙拉课题，忙培养研究生，真正能在培养本科生上花这么多时间而且又如此优秀的老师，很少很少了。”

很多学生认为，仅用职称、论文数量衡量教师能力、决定教师去留的制度太过于死板，“至少应该把学生的意愿加进去。”

可惜，学生们人微言轻，大人们位高权重，两位老师一个转行（方艳华），一个走人（闫浩）。

于是，科研，一如既往地击败了教学。

我是一个罪人？

一个正在为考研做最后冲刺的学生冲我说：“老师，你的课把我害苦了！”

我有些惊诧，追问后得知，原来是我这学期给他们开的《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课扰乱了他们考研的“全神贯注”。

他们是大四的学生，班上有23人考研。

考研，全国考生无论什么专业，都要闯一条生死线——政治。政治这一科若不达标，无论你其他科目何等优秀，都将被一脚踢出。

（我刚得知，去年有一位考研落榜学生就是因为在政治答卷上用了**“共党”**两个字导致该科不达标。注：只能用**“中共”**。）

政治！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呢？自1949年“新中国”横空出世，“新中国”特色的“政治”便劈天而降——

它纵横驰骋威烈浩荡；

它翻云覆雨变化万千；

它泰山压顶无孔不入；

……

当年，在“政治”隆隆滚压过的大地上，草木凋零毒虫横生；如今，在“政治”高视阔步的殿堂里，怪味弥漫怨声四起。

“政治”，一块腐烂的臭肉，强行粘贴在校园的食谱上，搭配在学生的餐盘中，非吃不可！

亿万高考的学生要强吃，千万考研的学生也得强吃。

你想得到研究生这个“香饽饽”吗？对不起，先吃下搭配的这块腐肉。

从“伟大思想”到“特色理论”、从“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谁一旦龙袍加身谁便有权留下一堆“政治”，作为亿万学子的必吃食品。

无数中华学生的宝贵青春和精力，作为牺牲，祭献在一党独裁的祭坛上。

更可悲的是，“腐肉”吃多了，脑子也就变残了，分不清是非，丧失了判断，以至自觉认同那块抹了浓浓香料的“腐肉”是光辉的思想、优越的主义、先进的代表……。

我从小也是吃这块“腐肉”长大的，也曾认为它香艳无比，庆幸的是，我后来发现了他的本质，不再吃了。不幸的是，我当了一名教师，有了一个能发表演说的讲台，并且还生出了揭示其本质的强烈冲动。

在这门我自编教材的课上，我还讲了从沙俄到苏联如何强占中国领土，也讲了“新中国”如何毁灭“旧中国”千年文化，从一个角度揭示了那块肉的腐臭。

正在备考的那23名学生痛苦了，他们正一心一意啃咬这块搭配——为了香饽饽而吃也就认了，再说吃多了吃久了，也就不觉其腐其臭了。

不幸的是，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在课堂上图文并茂地展示其肉之腐，其味之臭，

这让正一心啃咬的考研学子不堪其苦。想不来听课又不舍——毕竟敢说真话的老师不多。

“老师，知道吗？每次听了你的课，再去复习政治，心都很烦乱，读不进去，好容易安静下来，一上你的课，又乱了……。”

我又产生一种负罪感。

几年前，我女儿考研，成绩出来，政治一科最差。“香饽饽”眼看成画饼，她又急又恼，眼泪涌出来：“要是英语、专业没过，我就认了，可是政治——政治——”说着她泪眼朦胧地瞪着我，气恼地说：“就是你！老给我说那些，让我讨厌政治，背不进去……。”

那一刻，我哑口无言，产生一种负罪感。

现在我又在这样“害”我的考研学生？

我是一个罪人？

补记一：

在刚刚结束的2014年研究生政治考试中。有四道题是直接与习近平总书记相关的。

补记二：

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我的一位刚参加了考研的学生来告诉我，她肯定落榜了。原因是，她没料到专业课的考题取消了往年的全部范围，改为考各种各样的“政策法规”。

这位学生非常刻苦，一心要报考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为此，她从大二起就为考研作准备，仅专业书籍就苦读了15本。可是，不知是因为习大大（习近平）近来很关心高校的政治思想工作，还是因为北京这个政治中心里的高校特别要迎合新领袖的“口味”，总之，专业课考试突然改道，打了考生们一个措手不及！

“我明年还要考！”该生说，“但是，我绝不考北京的学校，也绝不再考这个专业了！”

《中国地理区域文化》课

这门课是学校为大四学生开设的，每周四节，只上两个月。大四学生全年只上这两个月的课（而且只有两门课）。我知道这是学校打发（敷衍）学生，在收了全年学费后象征性开设的一门课。因为，中国地理区域文化是何等的博大厚重，怎么能只安排两个月时间并且是在大四，也就是说，在学生人心都已经散了的时候（找工作的、考研的）。

但我不愿敷衍学生，加上我对中国文化有特别的感情，比如以前在《中华手工》杂志工作时，我对中华民间艺术如痴如醉，因此，我在山城七、八月酷暑里，挥汗如雨，全身心投入，用整个暑假的时间来准备这门课。

在备课和讲课中，我都有一种在中华悠远文明和文化中巡游的兴奋，有一种“视野”在祖国辽阔大地上纵横驰骋的快意（除了我增设的“中国失地”部分和讲到文物的毁灭时），时间，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转眼就过去了。

这个班的学生，除了几个去泰国孔子学院教学的外，全部到齐，旁听的也不少，是一次教、学水乳交融的体验。

下面，是学生交来的感想片段：

附录三：《中国地理区域文化》课学生留言

热爱脚下这片土地

这是一场眼与心的万里狂奔，这是一趟灵魂共鸣的难忘旅程，这是一段不愿结束的特别课程。

我去过的地方很少，但这次却在短暂课程里跟随老师的脚步去往了天南地北。

平遥古城，古韵犹存；江南水乡，如诗如画；齐鲁大地，浩然之气；洛阳古都，慷慨悲歌；……

大西北，对于那片辽阔风沙充满着莫名的向往，想伫立于沙包头，让那苍劲的风刮过我的脸颊……。

偏僻村落，皮影绰绰，那不止是一种艺术，更是一份令人肃然的精神。不是为了金钱、名声、利益。盲人艺术家的唢呐，是生命的交响，吹奏出北风的苍凉悲壮，命运的慷慨激昂，厚重的土地情怀……。

荒山野岭，独守道观，是什么让你得以坚持？需要多么虔诚的信仰，才能忍受这份唯有日月星辰相伴的孤独？没有信仰，便没有希望，而我们，用什么去填补内心的日益虚无？

泉州木偶，东阳木雕，剪纸香包，折纸泥塑…… 多么璀璨夺目的艺术。一位位看似平凡质朴手工匠人，不仅拥有高超的技艺，更有着超凡的宁静内心，以及奔腾不息的爱与热忱。

可他们却都“无可避免”地逐渐消弭。先贤们用滚烫热血，用声嘶力竭，甚至用整个生命，为我们谱写出了波澜壮阔的史诗，但我们却不屑，却漠视，甚至撕毁干净。

并非没有可以继承的“魂”，是我们不想，还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教科书上没有呈现的，正是这个民族所需要的。

我写的关于民间工艺的书，该书被译成好几种文字

山河永寂，何以为继？

我热爱脚下这片土地，我热爱每一处山河，在了解到她的文化与伤痕之后，更爱。

也许毕业后，我会踏上征程

地理文化，没有政治那么敏感，没有历史那么沉重，没有数学那么繁琐，没有语文那么优美。但10周的区域地理文化课却让我尝尽了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宏伟与厚重。

当知识没有成为教科书的时候，它才最精彩。

外蒙古，现在，中国的版图里没有它，中国的教科书更不会有，失去它的这段历史被有意掩埋掉。当我们的“老大哥”传来十月革命的第一声炮响时，殊不知这个让我们敬佩又尊重的国家，却是伤害我们最深的地方。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够正视这段历史，正视这位“大哥”？

……最让我动容的是晋商文化，这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历史。商人，在这个时代，似乎更多的是贬义的色彩。而晋商，完全颠覆了我对商人的理解，进取精神、敬业精神、群体精神、珍惜诚信……无一条不是今日商人最最缺失的品质。

中华手工，中国独一无二的传家之宝。当我感慨街头艺人剪的窗花，吹的糖人时，殊不知这些手工竟渐行渐远。物欲横飞的社会，有谁能静下心来听一段昆曲，触一下苏绣，赏一节皮影？

中国，停一下追逐物质的脚步吧！当还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灿烂的晋商徽商文化、客家土楼文化、泉州木偶文化、八百里秦川文化、庆阳文化、周易文化、洛阳文化的时候就停下来读书吧。经济增长的背后，正是文化的流失和精神的荒芜。

也许毕业后，我会踏上征程，带上谭老师诉说的这些正在流失的文化，用心灵去感受它们。不能传承，就让我永远记住他们的模样吧。

被我们所丢掉的不光是文化艺术

初中学政治课本时，一度为书中所提到的“中国特色”所困惑，什么是中国特色？上了这门课程后，我才渐渐有了自己的答案。

老师在课堂上说：“这些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保留着手工艺人们手的余温。”这句话让我特别动容。想象着东阳木雕艺人在煤油灯下细心雕饰；想象着窑洞里年迈的老人魔术般剪出精美的剪纸；想象着董志垣上无边的麦浪随着晚风摇曳时曼妙的舞姿……这该是怎样的宁静与美好。

在这样一个“工业化”、“信息化”、“快餐化”的时代，我们以发展的名义，硬生生地将祖先们、艺人们手中的珍宝蹂躏，撕碎……。

我给学生展示的甘肃环县清代皮影《三顾茅庐》

龙门石窟中被敲掉半张脸的佛像、贵州安顺那张被老鼠咬掉一只耳朵的面具，环县那座满是断壁残垣无人问津的道观……我突然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目光来与之对视。

我们不曾感受那样的宁静，我们没有走进过这样纯粹的艺术殿堂，在一切都求速度求效益求实际的大染缸里，没有能够支撑起我们内心宁静的力量。是的，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体会那样的宁静了。

被我们所丢掉的不光是文化艺术，更重要的气节与良知，这是比任何其他事物都重要千百倍的品质。所以现在我们才会有层出不穷的三鹿奶粉、毒豆芽、地沟油等等“中国特色”。

重新去了解，去认识

什么三晋文化，什么董志塬，什么晋商，什么徽商，我都是从未有过接触，我接触最多的就是马列毛泽东，是韩流，是明星，是美剧，是日本动漫，我身边鲜有人知道中国的这些传统文化。作为四川人的我，也不清楚这片土地上滋润人心的东西是什么。

是她，哺育了我们，而我们却抛弃了她。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从中国源头开始，去重新了解，去认识，去理解哺育了我们的这片温暖的土地。

让我惊讶、敬佩和感动

我家祖籍在洛阳，但我现在才知道它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积淀，深厚到让我甚至觉得不可思议，以至于上课时我一直在想“这是洛阳吗？”

其实不仅仅是洛阳，还有其它地方，吴越文化粗犷中包含着细腻，晋商徽商的智仁礼信义，还有皮影剪纸泥人香包……这些让我惊讶、敬佩和感动。惊讶的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地方居然会有这么厚重的文化；敬佩的是那些一代代坚持将文化传承下来的守护者们；而感动却是因为您，以前从来没有人像您这样给我们如此认真和系统地讲过这些中国文化。

这次结了课，就是告别了。不过，您传给我们的那种求知精神，那一股浩然正气，我都会保留并且继续坚持下去。

民族自豪感的感受

我想，每一个怀着对心爱文化敬仰的人，走到孕育他的土地上的那一刻，也会感动吧。河图洛书，当老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有种叫民族自豪感的感受，真的很神奇，就这样，文化规范典章制度一起出现，我们的根文化原来是这样神奇神秘地产生。

新的感触

这门课让我对中国的手工艺术品有了新的感触。我是河北人，家乡最出名的手工艺术品是剪纸。我家乡的剪纸没有没落，发展得很好，可是出现了老师说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商业化严重，质量档次不高的剪纸大量充斥市场，失去了剪纸艺术本该有的文化古韵气息。

一个开始独立思考的“我”

这门课咋听名字，觉得应该是一门很轻松的课。可是几堂课下来才发现，其中的感受竟是五味杂陈。它远比以前所学的西方文化概论来得深刻，来得猛烈。

听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那份体会是无可比拟的。当老师讲到中国是如何失去大

片土地时，当讲到那些传统文化艺术被破坏殆尽时，我的心情变得那样沉重、屈辱、激愤、痛心。我突然发觉，教科书能教给我们的实在是很有限，历史真相需要我们自己去发现和了解。同时又很惭愧，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历史，竟然有那么多的空白。

我常常设想，三年前，如果没有那个看似不经意的抉择，我会去哪儿呢？会是怎样的生活呢？我不知道，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不会遇到谭老师，“我”一定不会是现在的“我”，一个开始学着去质疑、去反省、去独立思考的“我”。我很感激冥冥之中这样的安排。

这些历史真相以前从没人给我们讲过！

印象最深的一节课，就是中国的失地。高中历史课本上告诉我们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南京条约》，只告诉我们英法等国的残暴，只告诉我们日本如何掠夺，却唯独忽略了以我们友邦而称的“老大哥”俄国。当我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洗礼时，我们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掠夺者就是俄国。

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惨案，外蒙古三次独立的经过……这些历史真相以前从没人给我们讲过！

什么是爱国？爱国是用真相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大脑，而不是成为一味蛮干的“愤青”。爱国是一种钢铁般的硬气，是打不坏摧不倒的骨气，是心怀天下的浩然正气。这就是我学这门课的最大感受。

我们丢掉了最宝贵的东西

从幼儿园到中学，再到大学，鲜有老师内心能够迸发出一种积极的正能量。以前就爱看《洽同学少年》，里面的老师都是满满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而如今太多“单纯”的教书匠，缺少了内心的独白，缺少了最真挚情感的引领。我们正是缺少了一种人文情怀，才让我们的行事做人犹如一介莽夫。

在课堂上，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讲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对现在这个社会，实在是太需要了。可是，这种精神气质早已被腐蚀得留不下一点踪迹，现在的人们沉醉在纸醉金迷里，为了钱权低眉折腰、不择手段，哪儿还看得到一点浩然正气。

唤醒我们被遗忘的记忆

在老师讲到西北庆阳文化区的时候，我被那位叫赵文菁的泥塑艺人深深震撼。一个女子，因为对艺术文化的热爱，一贫如洗，连丈夫最终都离开了她。看起来她一无所有，但她的眼神告诉我，她的灵魂是富余的。

很喜欢这段描绘她的文字：“是艺术给了她充实、勇气和生存的意义，她有一种来自内心的力量，抵挡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她的心绪、她的情感、她的品性、她的作品，和这美丽丰厚的黄土地溶为一体，她仿佛就是黄土地的化身，用双手的捏制向世人诉说着古老的故事，唤醒我们被遗忘的记忆，指向我们人类的童年和来时的地方。”

我深以为然

我以前只知道山西产煤，面食好吃。老师讲到晋商的时候，我被深深的震撼了。为什么那时的商人不像现在的商人这么贪婪，不择手段？

老师展示的图片也很触动我，商人的家里，随处可见诗文，“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但思皓月冰心，穷不悖义达不离道惟盼箕风毕雨”，这是我专门抄在笔记本上的话。

老师也说到甘肃的张掖，我虽然是甘肃人，却所知极少，原来我们居住的地方有这么深厚的文化底蕴！

最后一节课，老师给我们忠告：人生一定要做好两件事，那就是不停地看书学习和坚持锻炼，强壮的思想应建立在强壮的身体上。我深以为然。

“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记得上次课上，老师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我无法与这个强大的价值体系抗衡，只得从无奈走向无奈。”我想象不出，这句简短的话里究竟包含了多少曾经的失望、无助和挫败。但，我知道老师依旧不改初衷。

老师您可能觉得自己很孤独。我暂且引用一句话“你的孤独，虽败犹荣”。

意犹未尽之时，告别的时候到了

课程中，我为燕赵悲歌的侠义精神感动；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齐鲁文化中的浩然正气而感动，我慨叹晋商兴衰的历史苍凉；感叹塞北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居然孕育着如此精美绝伦的手工艺术。剪纸，皮影，泥塑……为这些被工业文明战车碾压而日渐消亡的传统民间艺术惋惜，并为传统手工艺人安于清贫的坚守感动；……

在意犹未尽之时，告别的时候到了。

这一次应该是真正的告别，心里有很多的不舍。再也听不到你激扬澎湃的讲课声；再也无法在您的带领下感受中外文化的博大精深；再也不会有人不厌其烦地讲“要多读书”；再也没有那双包含着深切的热爱又有痛苦的复杂眼神……

美丽丰厚的黄土地，唤醒我们被遗忘的记忆，
指向我们人类的童年和来时的地方。——甘肃艺人赵文菁作品

上天的安排

给对外汉语11级的一门课结束了，一位学生走到讲台前：“老师，我不是您班上的学生，是旁听的，我是艺术系学播音主持的。”

我“哦”了一声，没有在意。

当时，我绝没想到，这位同学竟是我来到这所学校后的一大“收获”——上天派她来帮我完成一项“神圣使命”！

后来，她又来旁听我给新闻11级的新闻采访与写作课，彼此慢慢就熟悉了。再后来，当我得知她会视频制作时，怦然心动：何不借她之手把我多年的采访录像制作成纪录片?还有，她是学播音主持的，普通话一流，正好给纪录片配音。

我试探着向她提出，她满口答应，而且还说，她能够给我找一个男播音，是她的搭档，普通话也是一流。我大喜，立马动手写剧本。

整个寒假，我头悬梁、锥刺股，一口气写完了剧本。

开学后我把剧本给她，她看完后面呈难色：“谭老师，这种内容我无法找我的搭档来配音，他肯定不敢。”

“那你敢吗?”

“我?——可以。”

这位“播音”已经听了我两年多的课，而且还读过我的“禁书”，已经被我成功“洗脑”。

“那不要男声配音行吗?”

“不好，你这是厚重的历史题材，我的声音力度不够，一定要浑厚的男声。”

“那这样，我来当男配音。”

“你?”她扑哧一声笑起来。她在课堂上早已领教了我常常引起学生们窃笑甚至哄笑的“四川普通话”。

“没关系，”我厚着脸皮说，“我有两个优势：一是我内在情感丰富，二是我胸腔气足，声音浑厚。至于发音不准，你是高手，给我纠正就行了。”

于是我们开始制作、配音。半年之后，反映1957年反右运动的六集纪录片《长寿湖》大功告成。给几个好朋友私下传看，获得一致好评。不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此片要公开传播，必须把那个男配音换掉。

可是，找谁来替换呢?

接下来第二部纪录片的内容更是触目惊心，没有人愿意或者敢于涉足这个“高危行业”。我只得又面对录音话筒，汗流浃背，竭力用我的气势，掩盖发音的缺陷。

近一年后，九集纪录片《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调查》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勉强完成。“女播音”为制作这部纪录片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工作（紧迫）的压力、苦难（血腥）的压力、安全（恐惧）的压力等等。

这两部纪录片的制作，让她凤凰涅槃，从此，她脱胎换骨，眼眸中，隐含了一种深沉和凝重。

但愿有一天人们在看到这两部纪录片时，能想象到我们在制作时东躲西藏的恐惧和艰辛。

从而，也请谅解我那让人窃笑和哄笑的“四川普通话”。

毕业的关爱：祝“要发”

2014年6月18日，学校给10级毕业生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我所在的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共有799名毕业生，而教、辅人员只有30余人，除去有课的老师，人手更少，于是，像我这种“老教师”也被抽去干这种杂活。（学校的年轻老师每期还要被叫去干收水电费之类的杂活。）

当天，我干了大半天，来领证的有我教过的近300名学生（其中新闻98名、对外汉语100名、文秘和文化传播80多名）。我抽空同他们交谈，并一一问起他们离校的感受。

他们的回答让我沉思。

下午四点，我干完活走到大校门，正遇几名学生在穿学士服照相，她们见我，便拉着我一起合影。我问起她们离校的感受，一谈到对学校的印象，她们原本开朗的面容立马变成了厌恶的神情。

“我们今天刚领证，明天就要赶我们走，多住一天都不准。”

“不少同学匆匆从外地赶回来，领了证，大家想最后再聚聚，呆一两天。不行！他们态度强硬，像是撵难民，哪儿像是相处了四年的母校！”

“我上午去办手续，少了一把小钥匙，强令我赔30元，态度凶得很！”

“谭老师，你还记得我写过一篇批评食堂办饭卡那位工作人员吧？这个学校上上下下各个部门对我们学生很少有个笑脸，一切都是以他们的便利为重，态度又恶劣。”

“一切都是为了钱，动辄就是钱！”

……

一天下来，同几十个同学交谈，他们对这段青春岁月有留念、有感怀，但是，他们对母校却没有一点好评和感恩，相反，一个个抱怨不已。

我望着正对大校门的那几个显赫大字，长叹一声：当一所学校的学生以这种情绪和评语毕业时，不管该校有多少光鲜的口号、堂皇的门面、精美的展图、动人的宣传，它的教育已经彻底失败了。

一个没有爱心的学校，怎么去培养有爱心的学生？

一个只知捞钱的产业，怎么去培养高尚的情操？

不过，学校在最后一刻给了学子们一个大大的关怀：它选择“6.18”这个日子发毕业证，其“爱心”显而易见——祝愿毕业生们今后“要发（财）”。

写在“党庆国殇”之日

10月1号，放假了，几个朋友相聚，其中一人说，我认识你们学校的一个投资老板（股东之一），他以前穷愁潦倒，家人们全都瞧他不起，后来他入股办学，发了大财，现在，家人们一个个都围着他转……。

刚刚过去的九月，是我们这所三本院校“分田分地真忙”的月份，16000名学子，排着长龙，把白花花的银两奉献到“教育产业”的血盆大口里。每人平均约一万五，一万六千学生，两亿四千万！

九月，真是一个丰收的季节！

有一位校领导，曾亲口对我说，每年九月，股东们吵得不可开交，为啥？为分钱。

压低经营成本，获取最大利润，是商人们的处事原则和生存之道。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不仅处处体现了这种原则和道，而且还具有欺行霸市，宰你没商量的如菜霸，路霸，肉霸的黑社会霸气。

短斤少两是不法商贩的惯用手法，“产业化”的校方自然熟谙此道。比如，每学期教学年度表上赫然注明：本期上课和复习考试共20周。但是，第一周都不上课，老师学生依然放假，甚至有近两周都不上课的，比如2014年9月，开课时间是9月11号，第二周只有两天了。斤两这么一短少，利润便出来了。首先，老师的课时费不用付了，而且，如果每月课时不达标，还要倒扣老师的基本工资。其次，学生的水电费等省下来了（但学生所交的相关费用一分不少）。第三，教学楼的电费、水费、管理费等都省下来了。据说，全校少上一周课，“资本家”可以增收一百多万元。

当然，“产业化”的不法与商贩的不法还是有区别，区别在于：商贩的短斤少两是偷偷摸摸，“产业化”的少两短斤是明目张胆。

也是在这个九月，我走进语音室，惊诧地发现，所有的耳机消失了。原来，校方从这学期起，语音室不再配备耳机，耳机由学校统一出售，一人几十元购买一副，如果丢失或损坏，由学生再掏钱购买。语音室的耳机原本可供多个班级的学生使用，而个人购买，一周只用一次，无数个学生要买多少一周只用一次的耳机！而且，一旦课堂上发现耳机有问题，教室里便没有其他耳机可选用。校方为了利润，不惜影响教学和浪费资源（当然不是他们的资源），并增加学生的负担。我教英语听力课前后已有十多年，第一次经历这种买卖。生意做到如此份上，只能让人对这种“强买强卖”的“校霸”肃然起敬。

也是在这一个九月，我又听到学生的抱怨，交了大笔的教材费，只发了很少一点书。例如，我教的对外汉语大四学生，全学期只有两门课，一门是宗教学概论，另一门是我教的“中国地理与区域文化”，这两门课只有前一门有教材，共计27元。课是在上学期就安排好了，教材也订了，校方很清楚学生应交多少教材费，但本学期一开学，每人交教材费300元！

学生说，也许毕业时学校会把多收的钱（包括以往每期多收的）退回来，不要给他们留下一个拦路抢劫的印象。

也是在这个九月，我们学院新闻系创下了3个专职教师带四个年级十几门课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也是在这个九月，学校继续发扬“减少教师数量，扩大班级容量，力创最大利润”的优良传统，把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强塞一室，闹哄哄地在“厚德、笃学”的校标下锻炼成长。

……

我希望这只是我们这所唯利是图的三本独立院校独立的奇观，而那些一本、二本、重本、“985”、“211”等都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谦谦君子，他们厚德笃学传道授业，一个个超然于金黄，立意于高远。

不料也是在这个九月，有不少考研的学生抱怨，他们一个个被他们心仪的神圣殿堂（一本、二本、重本）狠狠地宰了一刀：一份薄薄的打印资料索价200多元……。

也是在这个九月，重庆一所重点大学的几十名新闻研究生集体抱怨，他们几年下来几乎什么都没学到，有的都快毕业了总共才与所谓的导师（某电台台长）见了一面。

于是我想，中国坑人宰客的只有民营企业吗？国有的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电信就同我们的一本、二本、重本一样“超然于黄金 立意于高远”？

在这个被叫做“国庆节”的日子里，我读到一篇文章：《二中跳楼学生写给全教师的一封信》。主要内容如下：

我父母都是打工的，爸爸和妈妈一个月工资加起来3000元左右，给我付补课费就要：英语200，数学200，语文200，物理400，共1000元。……老师在自己家里补课讲得确实很卖力，在课堂上讲得确实没有在家里讲得用心，老师，我即使考上大学，我也恨你们，是你们给我的家庭带来那么大的压力。假如你们上课毫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我，我的父母就不用拿出那么多的钱给我补课，假如你们不那么势利眼，瞧不起不去你们家里补课的学生，我大不了自己多用功些，自学成才。老师你们不知道我看着爸妈喝汤吃土豆只让我一人吃肉时我的心情，你们是感受不到的，你们只是会告诉我，下堂课该交学费了！！我父母每次都毫无怨言地把学费放到我的手里，只说一句话：放好了，到老师家赶紧交给老师，别弄丢了。为了爸妈的辛苦，我只有努力学习，但是说实在的我要崩溃了，每天背着沉重的书包，我的心情和书包一样沉重，我活得真的很不高兴！！ 老师我恨你们！！！ 教育局到班级调查，我真的有冲动想站起来指认你们，可是为了我的父母，我只有沉默，我不想给他们带来任何麻烦。但是，老师，我恨你们！！教育局，我更恨你们，你们每天冠冕堂皇，抓教育你们做到了吗?看着假期里背着书包去补课，你知道家长付出了多少本不应该支出的血汗钱!

该文章还配了一张血淋淋躺在地上的学生的图。

从图片上看，那是一个交通事故，而不是跳楼自杀，从文章上看，缺少新闻的具体出处，由此基本可以判定这是一个虚构。但是，此文在网上疯传，引起强烈共鸣！因

为，该文所指控的现象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普遍的真实写照，广大学生和家长感同身受。

正因为如此，我读着这些文字，心中不是充满了悲，而是充满了恨。

也是这个“国庆节”，我读到了西安大雁塔照相，拍照人设陷阱强索游客1380元，拿不出钱就扣人；读到了无锡灵山大佛景区（里面主要景点仅一尊1997年造的佛像），门票高达210元；读到了山西五台山台蘑炖山鸡一份收价400元；读到了导游将游客带到某些消费场所后，场所立刻紧闭大门，游客不买东西不准走；……

各行、各业、各地区、各阶层，两眼放金光，双手举宰刀，或巧取，或豪夺，或借你所需，或趁人之危，火爆爆一起上阵，乱哄哄金蛇狂舞！追金逐银的狂涛怪浪，冲毁了最后一线良知道德，在五千年文明的神州大地上呼啸翻滚，一路跳着末日狂欢的病态舞蹈！

十月的阳光，暖暖地洒在身上，可手足依然是阵阵的寒凉；秋日的微风，柔柔地拂过面颊，但心中仍旧是堵塞的块垒。

65年了，“国庆”庆什么？举目满眼的物欲横流人心迷乱，我情不自禁地涌出两个字——“国殇”！

一本“点亮心中蜡光”的教材

学院突然又安排我上一门新课《西方文化概论》。

同《中外文化交流史》一样，这又是我从未学过的一门课程。我愉快地接受下来，原因很简单，仍然是出于对文化、历史、艺术方面的兴趣。

教材是武汉大学教授赵林编写的，以前我就读过，还读过他的其他作品，感觉很好。我拿到2007年的修订版时，更是眼前一亮，我终于看到一本内容丰厚，思想深邃，文字优美，图片生动的好教材了！在那一大堆机械死板，枯燥乏味，尤其是充满了党八股和谎言的教科书中，赵林教授的教材别树一帜，让人顿感清风拂面，满室异香。

修订版前言便是精彩绝妙的好文。赵林手中的笔如手术刀一般，一针见血地剖开了眼下我国教育的一个大病灶——造就统一规格的人才螺丝钉，而不是培养具有人文精神和自由性灵的人。

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完全是按照市场需要来设置课程和讲授教材。市场需要计算机人才，学校就开相关的技术课程，市场需要平面设计，我们就教相关的软件操作，至于人文精神的培养，创造灵性的开发，根本不在学校考虑之内。

后来，我在任教的《西方文化概论》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之后，曾向院领导提出，给众多师范专业的学生开课。我下“军令状”说，我保证能让他们喜欢并打开他们的思维，开发他们的灵性。院方一口回绝：他们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里，没有这两门课。

什么是“人才培养”，在当下的教育理念中，就是培养一个匠人——会一门手艺的

匠人，与这门手艺无关的课（马列课、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洗脑课除外），都不是“人才培养”。

在这种教育指导思想和具体实践下，大学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我在任《中华手工》杂志主编时，曾招聘了一个学平面设计的本科生，她仅能较熟练地运用软件编排，但整个设计死板僵硬，遇到需要灵活创作时，她一筹未展。解聘她时，她痛心疾首地说，在大学四年老师只教了他们一点技术，没有开发他们的灵性。

我重返学校后，曾对学生说，我们有两种培养方式：一种是培养理发匠，一种是培养理发师，前者是教他如何用推剪，如何用剃刀，如何用梳子；后者除了教前者的基本技能外，更着重培养他的审美意趣、艺术修养、创造（造型）能力，你们说哪一种更难培养？

我进一步说，毕业之后，一个理发匠要达到理发师的层次很费劲，而一个理发师要干理发匠的活很容易。他就是转行干其他工作也相对容易，因为，人，被开发出来了。

可惜，我们所谓的综合性大学早已成了为各个行业量体裁衣的“技术员加工厂”，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生产什么。我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我校刚同一个大酒店签订了协议，我们将按酒店的需要培养“合格人才”。

不用走出社会，还在校内，我就看到这种按统一模式培养匠人的恶果了。

一次，我监考一门基础写作课，其中有一题：写一篇“回家”的文章。学生卷子交上来，我捧读，几十个考生文章写成一个模式：如何期待放假，回家路上的心情，到家后父母的迎候，家乡的饭菜……啊，回家的感觉真好！

几十篇文章，我没看到一篇独特的构思、另类的描写。全班统一规格，而这不是抄袭，是他们已经被培养成“统一思想兼统一模式”的“人才”了。

还有一次，我出了一道考题：以本学期教师的讲授，结合本期社会上发生的新闻事件，谈谈你对当一个记者的认识。全班答下来又是统一模式：记者应该有勇气、有知识、有健壮的身体……

（当然，这个板子不能只打在大学教育上，我们从小学就开始了这种“统一的机械化模式”培养，比如写作文便要求按照一个统一规格的“模板”行文。）

在我们这样的学院，连匠人都没培养好，何况艺人了。至于赵林在前言中提到的人文精神，理性精神，道德情怀，智慧性灵等等更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在我们的大学教育中，更是一个陌生词汇了。

“教育不是装满一壶水，而是点亮每个孩子心中的蜡烛，让他发光、发亮。”我多次在不同场合引用台湾教育家严长寿先生的这句话。但，正如我预知的，校方没有半点回应。我能做的就是在《西方文化概论》课上，强令学生读赵林的前言，并写出不低于500字的感想认识。我对他们说：“你们可以卖掉、扔掉所有的大学教科书，但请你们一定保留赵林教授的《西方文化概论》。”

灭绝民族灵性的教育体制

——读赵林教授《西方文化概论》前言

赵林教授在前言中谈到了当下教育的一些问题及他的观点，主要有：

◆ 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的中小学教育已经使每一位受教育者（甚或他们的家长）把获取数理化知识当作了受教育的全部目的，这缘于当前实行的高考制度只注重单纯的考试分数，不考虑应试者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如果在大学期间还不注重人文教育，我们的整个教育体制就果真会培养出一些有知识无智慧、有技术无文化的残次品了。

◆ 在当今中国，由于商业化和流俗化潮流的冲击，大学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功利化和实用化的影响，日益沉沦为替商家和市场量体裁衣批量生产专业人才的知识加工厂。

◆ 大学已经成了亦步亦趋地跟在社会需求后面提供各种服务的谦恭仆从，而不再是指引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神灯塔和激发人类神性之光的灵魂火炬。

◆ 现在，一切求知活动都是出于功利目的，完全无关乎一个人的内在精神修养和德性陶冶。现在的大学生们，完全缺乏亚里士多德时代那种为知识或者学以致知的超越精神，在学习任何知识之前都要追问一下：“学习它有什么用？”

◆ 大学不仅要培养专业人才，更应该培养人。而人之为“人”，正在于他是超功利目的的本身。

◆ 大学教育除了要传授那些实用性的知识之外，更应该传授一些“无用的”知识。所谓“无用的”知识就是指那些不直接与学生的就业、求职等专业需要相关，但是却能够丰富人的精神内涵、激荡人的道德情怀的知识。这些知识从那些时髦而浅薄的专业课程中是很难获得的，它们主要来自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它们的目的不是造就统一规格的人才螺丝钉，而是培养具有批判精神和自由性灵的人。

◆ 在任何时候，对于大学来说，塑造灵魂和培育人格都是比造就专家更为重要的事情。大学的首要之义就是要发掘和弘扬人性中的那些神圣而潜在的基质，而不是批量生产模式化的专业人才。

◆ 大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保证科学研究不是出于政治和商业的特殊利益，而是出于独立的学术关怀，要努力保持精神上的独立性和批判性，把追求真理和陶冶性灵当做最基本的目标。大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相关的专业知识，更要培育学生的人文精神。

◆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更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更应该塑造出睿智的灵魂，培育出具有深厚人文素养和崇高的道德情怀的健全人格。

学生们对我布置的这次作业反应热烈，从三个年级两个专业四个班两百多学生所交的作业来看，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同赵林的观点，并痛恨这个教育体制对自己人性和灵性的压制。他们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感受，写下了大量的文字（共有八万多字），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来细细阅读和整理这些文字，下面选摘其中的约十分之一（大多学生的作业都有标题，但此处的标题大多是我加的）：

不关注“性灵”的教育

从小，我们就在父母“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教导下去参加各种所谓的兴趣班，可那是我们真正的“兴趣”吗？我们不得不被硬生生地培养。可能从那时起，我们便不敢有兴趣不能找兴趣，只能听别人的安排，顺从再顺从。

上学后，小学要考个好中学，中学要考个好高中，高中要考个好大学，大学之后要找一个好工作——这就是我们读书学习的目标和动力。到大学，目的就为了一张文凭，大学丧失了人文培养的能力，成为国家机器下的附属品。他们需要毕业就能工作的专业岗位人才，而并不关注这些人是否有“性灵”的光芒。

“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网络图）

我开始反思和怀疑

赵林先生的这篇前言，让我想起了自己所接受的初高中的教育，发现在自己接受的教育中（甚至是在这门课程以前）从没有接触到培养自身的“人文素养”与“道德情怀”的健全人格这一说。以前接受的教育（给我们灌输的）是“好好学习，只有考个好大学才能找个好工作。”于是，我们只知道分数高名次超前就是好学生。好学生会受到父母的喜爱、老师的欣赏、同学的羡慕。于是，我们学习，带有太多的功利性，为了考四六级去苦学英语，为了考研去熬夜通宵，永远都是处在被压迫的学习中，而不是主动地去学习，更不会意识到还有人文素养，道德情怀，塑造睿智灵魂这种高层次的境界存在。这样，我们就像生产线上一个个待定的商品，苍白木纳，没有灵魂，被别人加工修饰后成了一模一样的商品呆在货架上任他人挑选。

这是我们的错？

我想像中的大学是个自由的天地，但现实往往给你一个响亮的耳光。

举个最近的例子。谭老师曾说，大学生重要的是要做好两件事：一是认真读书，二是锻炼身体。我深以为然，便写了一篇文章，希望学校周末开放体育场供学生锻炼。可是，文章被一棍子打回。我于是明白了，在这里，读书锻炼不是最重要的，按学校的规章制度做听话的学生才是生存之道。

赵林教授说，大学已经日益沉沦为替商家和市场量体裁衣地批量生产专业人才的知识加工厂。我们在“工厂”里挥霍着我们仅存的一点思想之光，做一个听话的人才能成

为“三好学生”。

大学，这个词汇早已没有当年的盛名，批量订制的大学生也早已不具曾经的风采。这是我们的错？

这是一台机器？

整个中国都成了物质的世界，连人才也是通过大学这个“加工厂”按《人才培养计划》这一“工业标准”批量生产的。小学中学时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考试而读书，家长们不会在意孩子学到了多少知识，只在乎为什么他没能夺得满分。另外，除了考试，孩子什么都不必了解，甚至生存的常识也无需知道。

上了大学，学生又陷入了考证的泥坑：英语四级六级八级、计算机一级二级三级、教师资格证、心理咨询师、导游证、会计证……。没有“证”即意味着你“不学无术”，换言之你将不能得到“好”工作，接着不能买到大房子、靓车子，这样也就没法娶到（嫁给）优秀的妻子（丈夫），再下去就不能生出聪敏的宝宝，再然后你的下一代就输在了起跑线上，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恶性循环就砰然一声砸到跟前。

中国教育

于是，中小学就老老实实地考试吧，大学就老老实实地考证找工作吧，我们全体老老实实埋头盯着脚下走完人生。

这是一台机器？一根螺丝？还是一个奴才？

“和别人一样”

从小我们就被教育“和别人一样”。“你看人家成绩多好，你也要一样。”“你看人家字写得多好，你也要一样。”“你看人家多才多艺，你也要一样。”……如果不一样，你就是异类，那就是错，那就要改。

到了大学，仍然一样。我觉得现在的自己，更像是一台机器，看书，考试，看书，考试，看书，考试……循环往复，按下按钮就会顺从，重复和千千万万人一样的程序，过着和他们一样的生活。

于是，我们变成了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傀儡娃娃，除了名字和模样，什么都一样。环顾你的四周，是不是充斥着一张张神情麻木的脸？而他们的心，或许也一样麻木。

僵硬的工具

我看到现在的小孩比我们小时还要悲惨，还没来得及体会上学的乐趣，就硬生生地被逼着学英文单词，小孩的词汇量也就成为家长们互相攀比的筹码。（来来来，跟阿姨说说香蕉用英文怎么说呀……）

教室，食堂，宿舍……

90年代出生的我从幼儿园起都在被人安排着，我那些特立独行早在入大学前就被老

师和家长们集体扼杀。面对残酷的升学压力，我哪敢标新立异，与强大的教育制度相抗衡？高中的语文课，我不能写我想写的文章，因为老师说我必须按照格式来写；阅读理解里，我必须按照参考答案的标准去理解。就这样，我被高考的传送带带向了大学。

那么大学呢？

转眼自己已是大三，如果问我过去的两年我学到了什么，我说，唯一的就是俗不可耐的成绩单和一张张我也不知考来有何用处的证书，在大学这两年，我还是教育制度下的玩偶，浑浑噩噩地游走在教室，食堂，宿舍……。

大学教育，等于如何找到个好工作

现在学校的教育，给学生灌输最多的就是如何找到一个好工作，大学教育已经成为找工作好就业的工具。

老师所传授的全是直接与学生就业，求职等专业相关的知识。在这种教育体制下，我们都把学习专业知识当作了获得某种功利性东西的途径。在这种环境下，若学习其他知识，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学习它对以后就业有没有好处？”

当学习知识等价于盈利手段的时候，大学的传统也已经悄然流逝，大学就再也不能叫做大学了，而叫XX工厂了。

你将来怎么办？

前天晚上给老爸打了一个电话，本来谈得很轻松，但最后一刻，他火了。原因是他问起我在学校考证的情况。我说，除了全国计算机一级证书拿到了，其余的都没有过。他冒火说：“别人都能过的东西，你为什么过不了？你都大三了，马上就要找工作了，你将来怎么办？现在这个社会每个月2000块都不见得能养活自己……。”

从小都在学习，也从未学习

小学，书就是语数外，中学，书就是语数外政史地物理化，大学，书就是各种专业书和各种考级资料。这些书就像牢笼一样把我们困在里面。

从一开始，我们都被定了一个目标，一个共同的目标——考上大学，考上名牌大学。老师们这样教育我们，父母们也这样教育我们，我们就这样进入了机器式的读书学习。除了考试要考的，一切都不用学。没有孩子会想，我要去读点别的，而只做一件事，好好做题好好考试。

读书，它不是自己兴趣、爱好和向往，而是我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小学和中学，我们每天挑灯夜读的并不是自己喜爱的书籍，而是英语单词、课文和数理化难题。到了大学，我们又开始奋战于各种资格证和各种考级……。

中学教室黑板上为高考的“励志“标语

读书的全部意义就是如此吗？

我们这一群学生，

从小都在学习，也从未学习。

让灵魂赶上来

大学里，我也加入了各种资格证考试的大军且收获不小，可是心里却总有一种空空的感觉，一种把什么东西给弄丢的感觉。我曾尝试着填补，我扩大交际圈，参加各种活动，可是，那种充实感只能够维持短短的时间，过后却是更多的空虚。这大概就是灵魂缺失的表现吧。

是的，灵魂，我的内在。我只是用各种各样的“证”武装了我的外表，我拼命的向前赶却把灵魂远远抛在了后面。突然想起小学课文《古井》，想起了那温润的井壁，甘冽的井水，就那样静静的立着，慢慢的沉淀着，一点一点的滋润着，让实体和灵魂融为一体，滋味悠长。

感谢这篇文章，因为从来没有人这样清楚明白地告诉我这些，它帮我找到了寂寞的源泉，不知不觉我已经错过了这么多。虽然我现在不能一下子解决我的问题，但我至少有了一个方向。我想为自己争取点时间，让灵魂赶上来，然后一起上路。

是什么腐蚀了我们的智慧和性灵？

很多人把青春奉献给了被窝、网吧、考级以及数不胜数的各类证书，当我们毕业的那一刻，究竟还能剩下什么！

我时常会问：是什么腐蚀了我们的智慧和性灵？

从初中开始，我就失去了为了快乐而学习的状态。我每天按照父母的期望、老师的规定坐在压抑的教室里，学习着条条框框的知识和条条款款的增分模板。我担心每个阶段的终极考试，担心父母、老师骂我，担心未来，却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偶尔写完作业时，仰望天空，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找到那种蓝色的明亮，剩下的只是浅浅的忧郁。

赵林先生认为，“在任何时候，对于大学生来说，塑造灵魂和培育人格都是比造就专家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一点让我非常赞同！

中学教室上方为高考的“励志“标语

我们需要的是具有批判精神、自由性灵和有自己的思想的人，不是用填鸭式的教育培养出的一个又一个的书呆子。

可是，眼下，一批批的中国大学生，就像是工厂生产的产品一样，有特性的少之又少。为什么欧美国家老说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缺乏想象力，只懂得复制别人的东西，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只会copy的“人才”

他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些“人才”只会copy别人的东西，而不会自己创造。就拿当下特别火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中国好声音》来说，都是别人的创造。好不容易有一档是我们自己开发的节目——《非诚勿扰》，其他的电视台却又疯狂模仿……。

是谁造成了这种局面呢？是中国的教育制度。

在中国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才”，没有创造力，不会主动思考，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全是一批复制的“人才”，没有思想，没有灵魂。

我不是螺丝钉，也不是板砖

在谭老师之前，没有老师用直白到粗俗的语言来告诉我学习以外的事。他一度让我觉得他是一个愤青，一个极度讨厌中国教育制度的大学教育者。我以前极其不理解他，既然他讨厌中国的教育制度，那他为什么还要站在讲台上？现在，我可以回答自己了。他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至少要改变他教过的学生。

以前，我“一心只读圣贤书”（高考必考科目的相关书籍），从没想过这有什么不对。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们国家教育机制是错的；没想过我们的教育应该塑造我们的灵魂和培育我们具有深厚人文素养和健全人格……。

中国家长们的教育方法基本都是强压、强迫、打压，迫使小孩整天做题，不听话就打。而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灌输的思想就是读名校挣大钱，买房子，买车子。学校则跟在社会的需求后面提供服务，怎么赚钱怎么来。国家教育制度为了迎合政治的需求，才不管什么是人才，只要你为我所用，只要你听话就行。因此，学校制造出来的都是规模化、规格化的螺丝钉。

为能挣大钱过好生活而苦读（网络图片）

我曾经在空间里写道：“我不愿是国家教育机制下的螺丝钉和板砖，我要成就不一样的自己。”

我相信，今后我的选择会和以往不同。

缺失了应有的智慧和性灵

我读完前言之后深受启发，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希望本书给予读者的不仅有知识和素材，而且更有智慧和性灵。”这句话恰好反映了如今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即，如今的大学生等只注重掌握知识、积累素材，却忽略了应有的智慧和性灵。

当老师提问时，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从书本上找答案，当老师问同学们有什么看法时，回应的往往是一片寂静。想法呢？思想呢？早就被教育制度与书本奴化了。

大学延续了小学、中学的学习模式——考试不考的便不再深究，不想去思考。不去思考便永远无法感受到智慧与性灵。

老师的照本宣科也导致学生们缺失了应有的智慧和性灵。老师只按照教材、按考试大纲讲，教材之外的知识一概不提。这样，学生们所获取的知识少之又少，知识面也变

得十分狭窄。

摧毁了多少青春时光！

在这十几年的学习中，我们真正学到的知识很少，更多的就是为了考试而学。在中小学，老师将语数外当做重中之重，因为高考中它们占的比例最重。老师所讲授的每个知识点都是高考的范围，就这样培养出的所谓的“人才”——只会做题背书的“人才”。

这一场所谓的人才选拔考试摧残了多少人，摧毁了多少少年的青春时光。

当下的大学呢？有多少老师是在培育学生们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人文精神和道德素养，能助你一臂之力找到好工作吗？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里有此项要求吗？

中国的教育真的太失败了

看完这本书之后，脑子里闪现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教育真的太失败了！”

我们现在上的这所大学就像是整个中国的教育影射，它所呈现给我们的全部，就像是中国教育的缩影——功利化和实用化！

它让我们忘记了为什么要上学，为什么而奋斗，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盲目！

人文精神培养的缺失

现在大学校园商业性质很重，领导忙着应酬，老师忙着奔波于各个学校上课赚课时费，这样的学校早已丧失了大学培育人才的功能，学生只是学校赚钱的工具。我深深感到，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模式像工厂生产零件一样，一批一批的被生产出来，不在乎是否合格。

教我们何去讨好自己的老板

我曾经连续几个月在电视台、报社“学习”，可是，呆得越久，我就越失望，原来新闻只是贯彻政策、聊家常的工具而已。后来，我放弃所有的“实践”回到了学校，可学校也是一片浮华…… 大学几年，我看到太多拿着书或者PPT照念的老师。有的老师还教我们今后如何去讨好自己的老板，送什么礼是最好的……

是学生素质还是体制弊端

我怀着最最赤诚的心来到这所学校的，我对大学充满了无限美好的遐想。然而大学三年……

早晨，上课铃响了之后，有很多人穿着拖鞋吃着早点慢悠悠地晃进教室，吃完早点后看看上面的老师，讲得没意思，于是爬着再补一觉。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流传的：“一觉醒来一看表十点了，继续睡到十一点半，起来连早点、中饭一起吃了。”晚上十一点后，男生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打游戏、玩麻将或者是看武侠小说，很多大学生的日常交流沟通内容就是游戏，鲜见一起读书、共同讨论的场景。女生呢？看韩剧，连续剧，感情剧，一部接着一部。不然就是淘宝，一天几份快递。

当然，也有刻苦奋斗的，但他们并不是为了提升充实自己，而是为工作、为考研。他们不断地参加着各种培训各种考证考试，根本不知什么叫做真正的大学生活。

赵林老师说，大学本应当塑造学生睿智灵魂和健全人格，丰富学生精神内涵和道德情怀。可是，现在的大学是这样吗？老师本应是带领学生走向思想高度的领路人，但是，现在缺乏激情，照本宣科的老师太多，一节课下来，学生不知道究竟学到了什么。

这究竟是学生素质的下降还是教育体制的弊端？

究竟是谁铸成的？

我曾在网上有看到一首描述中国大学生现状的打油诗：“学费全国最高，上课一排全睡；考试基本不会，成绩分数个位；逃课成群结队，上街花钱干脆；打饭从不排队，白酒两瓶不醉；杀人放在衣柜，中国大学万岁！”

当代的大学生已经在“雾霾”中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己！随着商业化和世俗化的冲击，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百姓的顺从，以及知识界的胆怯，使中国社会群体进入“奴隶时代”。

这究竟是谁铸成的？是该归因于国家的教育体制还是我们学生自己？

做一个自由性灵的人

老师有一次在生气时对我们班没有完成作业的男生说：“我不要求你们学习有多好，但是你们必须学会做人。”

还有，谭老师经常说，他要培养的是具有批判精神和自由性灵的人，是一个懂得仰望星空而不是只关注脚下的路的人。

我很庆幸自己有一个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无用知识”的谭老师，这些“无用的知识”与就业求职无关，也不属于我们的专业知识，但是却能够丰富人的精神内涵、激荡人的道德情怀。用赵林老师的话说就是一些关涉到“统领一切的普遍价值”的抽象知识。这些知识从那些时髦而浅薄的专业课程中很难获得，更不会从那些每天讲毛泽东思想概论党史的老师们口中听到。但正是因为这些知识，让我们的视野变得开阔，思想得到提升，让我们不再是只会死读书的高考制度的产物，我们因而学会思考，有了自己的思想和批判意识！说实在的，在这之前，批判意识在我们的脑子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是一个应试制度培养出来的机器，脑子中只有老师灌给我们的“死知识”。

要有一颗怜悯之心

高中时，一位语文老师初次与我们见面时讲道：“我们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班上同学不以为然，觉得这太矫揉造作。上了大学，谭老师在课上讲道，“一个人重要的就是要有一颗怜悯之心。”听到谭老师这句话，突然和高中老师的话联系在了一起。对呀，一个人心中没有对他人、对社会的怜悯之心，这样的人只能是冷漠和麻木不仁。

我想到一件让我特别后悔的事。

前几天，我与好友在外面等车，看到一位衣衫褴褛，身上脏兮兮的中年男子站在垃圾箱前。我们赶紧移开离他远点。一会，好友吃完了手中的豆腐脑，让我帮忙把纸碗

扔到垃圾箱。我一转身，看见那个中年男子弯着腰，正在啃一根从垃圾箱里找来的鸡骨头。我一阵心酸，刚才还那样不懂事地议论他。我想给他买点吃的。可这时车来了。我们上了车，车窗外，看见他捧着那点剩下的豆腐脑吃得很香……。

那天晚上，我有些失眠——很后悔没有留下来买一碗热腾腾的食物给他。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后悔自己的言行。

我想，大学应该是培育我们人文情怀的地方，我们不仅仅要明白这个道理，更应该从一言一行去做。

衡量孩子的标准

去年在网络上有一篇题为“爸爸，对不起，我北大毕业，但我没能挣大钱、当大官”的帖子引发热议。发帖者称自己北大硕士毕业，找了份一个月8000多元的工作，却受到父亲冷嘲热讽，认为一个北大硕士生不能每年赚上百万元，不能当大官，十分丢脸。由此可见，不仅是学校，连我们的部分家长也不自觉地将能不能赚大钱、当大官作为衡量自己孩子是否有出息的标准。

觉得把“我”给丢了

我们在现在教育体制下走来，发现自己越来越迷茫，觉得把“我”给丢了。于是，我们急躁，我们不安，想着再回去捡吧。但是，有那么些人告诉我们：“傻孩子，把‘我’丢了有什么关系，只要有个好的文凭找到好的工作，能有钱有权，有了这些，还愁什么呀。”

于是，我们仕途进取的人生图式渐渐定型——挣钱过好生活，而关于追求人文道德的“我”早就搁在一旁落了灰。

当我放下《西方文化概论》，内心依旧风起云涌，有激动，又有些许辛酸，脑子里一直徘徊着前言中的一句话，它说：“当一位讲授通识课程的讲师站在讲台上时，他所面对的不是一些未来的工程师、会计师、律师或是计算机专家，而是一群有着理性精神和道德情怀的学生。”

如果有那么些老师在上课时，给学生传输道德人文情怀该有多好呀。他们讲述着扑朔迷离的宗教文化，讲述着激情澎湃的英雄史诗，讲述着荡漾人心的音乐美术，讲述着善与恶、对与错，成与败的定义。让我们知道祖国母亲的丰功与苦难、荣誉与辛酸，失望与期待，让我们知道地球的各个角落都有着千古流传的文化……。

今日之中国，学校是工厂，院系是库房，班级是车间，学生则是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齿轮和螺丝钉，只不过有的镀金，有的镀铜，有的压塑料膜，但指导思想和生产模式则是一样的，目标是"望子成龙"，标准是"成王败寇"，方法是"死记硬背"，手段是"不断施压"，还美其名曰："压力即动力"！

——易中天（教授，历史学家）

教《西方文化概论》

这是一门我十分感兴趣、也倾注了大量时间和心血的课程。讲这门课，既艰辛，又享受。艰辛，是因为面对博大精深浩瀚美妙的西方文化，我功底不够（尤其是哲学部分）。我曾对学生说，一个人可以装得很有道德，但很难装得很有文化。享受，是因为其内容的博大精深浩瀚美妙，巡游其间，时而赞美、时而感叹，时而沉思，时而遐想。此外，拥有的又是一本难得的、与我“水乳交融”的好教材。

在教学中，我还不时作一些引申和对比，比如，我提问并分析“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为什么只有古希腊发展出了‘三权分立’的城邦民主制?”“公元前五百年时，中国与古希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为什么结出的果实和后来发展完全不同?”“眼下中国社会四下弥漫的‘犬儒主义’与第欧根尼Diogenēs的‘犬儒主义’哲学有什么不同?”……。

几年教下来，虽然我功底不够，但倾注的心血获得了回报，学生们交来的文字中，全部都是正面的评价（不像另一门也倾注了大量心血的新闻采访课）。下面这一点文字，选自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

附录四：《西方文化概论》课学生留言

没有信仰是可怕的事

上这门课，最大的收获就是深刻地理解到，作为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最可怕的就是既不了解自己的国家，也不了解其他国家！很幸运地，这学期算是对西方文明有了新的一个初步认识吧。古希腊的哲学艺术让人惊叹人的智慧和美好；古罗马的军事和历史也让人感到惊心动魄；还有基督教文化对我的冲击，我觉得我的内心已经要跟随上帝了。真的，没有信仰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有时候真的很迷惘很迷惘，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没有精神支柱的躯壳犹如行尸走肉……

没有信仰真的很空虚

虽然我们一直在学习英语，但对西方文化却一无所知，通过这个课程填补了我们思想上的空白，我们再也不能认为西方就是曾经侵略过我们的“坏人”。

我们没有信仰真的很空虚，社会越来越乱，各种恶毒的事情都在发生，这是不是和没有信仰有一定关系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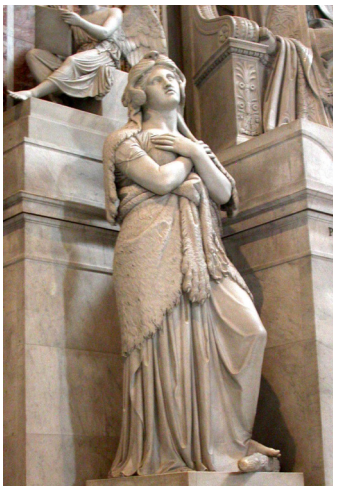
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

我还想再谈的是西方人的信仰。这一点也是我在学习这门课时心中一次又一次荡起涟漪的地方。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怕的。”可是在我们中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信仰上帝的人，做了错事之后即使没有人谴责他，他也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因为上帝每时每刻都在看着他。可是无神论者却不同，认为做错了事只要

没有人知道就可以逃过一切。因为他不相信自己死后会下地狱。

缺乏了信仰，就缺少了灵魂

基督教文化中灵魂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这种神秘幽邃的唯灵主义，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我觉得，一个人，有信仰总比没有信仰好，因为一个人如果缺乏了信仰，就缺少了灵魂，而缺少了灵魂的人，心就是浮躁的。


我摄于罗马圣彼得大教堂

西方的教堂是一个庄严而神圣的宝地，我曾经无数次想象自己也像西方的虔诚者们一样跪拜在教堂里。不知道若终有一日梦想成真，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不知道自己是否也能像他们一样拥有一颗宁静的心。

我们到底怎么了

还记得老师最后给我们看的那项调查报告，有信仰的人与没有信仰的人的区别。

这让我想到我们眼下的社会。如果整个社会变得麻木，国家就算整体发展了又有什么用。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广西一女子在大桥栏杆外站了数十分钟后才跳入江中，在这时间内，桥边不缺拍照的人，可没一人上前劝解。更精彩的是，消息评论栏里被赞的最高的一条竟然是：“对想死的人为什么要救？”

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到底怎么了？

是因为没有灵魂吗？

有信仰才会……

还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要了解西方国家，必须先了解他们的宗教。”这也是谭老师您说的。以前我对宗教文化问题了解得少之又少，甚至不怎么认同宗教信仰。通过学习我才知道，宗教的形成，使民族文化具备了精神内核，使民族文化特性得以确立。有信仰才会有企盼，才会产生爱；有信仰才会对自我产生一种自制与约束，不去违背原则与道德的底线；有信仰才会知道感恩、知道奉献与回报……。

这门课让我们班的转变

记得老师说过，现在的学生不读书是个大问题，上课的时候，老师问的问题、提及的文明，彻彻底底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无知与知识的欠缺。我们都像一群干渴已久的旅人一样，急需补充水分与能量，于是，图书馆成了我们的首选。这学期班上同学去图书馆借书就像一种时尚一样，我也不例外，浏览《圣经的故事》，重温《古希腊罗马神话》，就连看的电影也从《泰囧》换成《特洛伊战争》和《斯巴达克斯》。

领略了另一种文明

这门课就像是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户，带我们走入了另一个奇妙的世界，去体验我们不曾接触过的人类文明，置身于奇妙的旅行中：飞过古希腊众神居住的奥林匹斯山；见证古罗马的英雄主义；途经中世纪的修道院；来到哥特式大教堂前……目睹十字军的东征、文艺复兴的繁荣、宗教改革的伟大；我们看见了耶稣的从容，路德的坚定，胡斯的无畏；我们赞赏伊丽莎白的智慧，感叹维多利亚的繁荣……。

这一段旅程，我们经过许多的风景，领略了另一种文明，也学会用更开阔更理智的眼光看待不一样的世界，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以后，当再看到网上的无聊谩骂和无知宣言时，我即使无法改变别人，但可以让自己不陷入无知的深渊。

多年来都上当受骗了

在这么一个极短的时间内，颠覆了我以前的所学所知！

以前我真的以为唯物主义才是真理，社会主义才是正确的道路，共产党才是最好最先进的党派。可这学期接触了这门课后，突然发现自己那么多年来都上当受骗了，以前的自己是那么的无知和愚蠢。

曾经的自己用诧异的眼光去看待信教的人，曾经的自己以为全世界那么多信教的人都是愚昧的……而如今一下子豁然开朗，真正愚昧无知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一把通往西方国度的钥匙

一直以来，大家对于上历史课程的共同认识就是枯燥、乏味、无聊、昏昏欲睡。但在这一门课程中，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丰富、博大、精深、惊心动魄。历史的长河在我们的心中静静地流淌，历史的画卷在我们的眼前静静地展开，历史的足迹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在这门课程中，我们看到了悠远的迈锡尼文明；看到了古希腊城邦民主制；看到了罗马帝国的崛起与衰亡；看到了虔诚的基督徒跪倒在十字架前静静地祈祷；看到了文艺复兴之火在意大利燃起，宗教改革在德国、英国等国兴起……。

这是一门充满知识、理性、人文、自由、民主与美学的课程。我们拿到了一把通往西方国度的钥匙，走进了历史渊博的西方世界。

我们在正浮躁的时候遇到一位懂得引导我们的导师，我们是幸运的。

我再也不会想当然地“以为”了

宗教改革影响了整个欧洲，特别是加尔文宗教改革，对资本主义形成影响巨大。他们认为光有信仰不够，还得有善功。他们将世俗劳动赋予了一种神圣意义，从而创造出灿烂的世界。电视、电话、飞机、舰艇、宇宙飞船等等无一不是西方的发明。总之，宗教改革在思想上开创了自由精神，在经济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宗教改革所导致的宗教分裂的现实格局，在客观上为宽容精神的出现和壮大创造了条件，而宽容精神则成为培育西方现代科学与民主的温床。

现在，我再也不会想当然地“以为”了。西方再也不会是我以为的西方，基督教再也不是我以为的基督教……。

已经知道今后努力的方向

今天第一次知道了一个词“犬儒”。自从当谭老师的学生以来，都记得不清楚这是第几个第一次了。听课后，我觉得最可怕是你本身就是“犬儒”而不自知。

人文精神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我不能承诺现在就可以变得崇高，不再“犬儒”，可以为理想头破血流，但是我已经知道今后努力的方向。

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赵林先生的前言里有这样一句话：本书承担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通过展现西方文化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脉络来培养大学生的宏观视野和博大胸怀。学了这门课，我深深感到了这一点。

感觉一切都不一样了！

您给我们上英语听力课时，我真的是不怎么喜欢您，因为您好像一直都在训我们，“嫌弃”我们！所以，当我看到这学期的课表，发现您要给我们上两门课时，感觉整个人都抓狂了，顿时觉得没有想学的心了！

可是，现在，感觉一切都不一样了！……一学期下来，唯一的感叹就是您的课还没有上够！

也许是我们这一批学生的通病，我也不爱看书，从不！因此，刚开始上这门课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对西方文化连一丁点的了解都没有！然后，意料之中的，在上古希腊罗马神话的时候，您又因此批了我们一顿。再然后，下了课我就头也不回地扎进图书馆，借了《圣经故事》，《罗马风云》《希腊神话》等等一系列跟这门课有关的书。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原来我从来没有想要好好的看完一本书……。

就这样，我这学期看的书比我大学前两年看得要多出好几倍！如果说以前我是一个听话的“学生”，那么我现在就该是一个想要学的恶补知识的“求知者”。

一颗带着觉悟的心

如果没有接触这门课，如果没有接触到老师您，我想，我也会像那位辱骂美国霸权主义的学生一样吧。我不能说我完全的能够理解您的思想，也不能说我有那种觉悟，但是，我至少有一颗带着觉悟的心！如果我没有彻彻底底的变成中国式教育的俘虏，那么一定是您的功劳！这些话不是奉承，这些都是我在这门课上的所得，尤其是看了您推荐的杨继绳的《墓碑》之后（虽然没看完）！

仰望星空

在讲到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和科学家、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时，我讲了他在一个秋日的夜晚仰望星空的故事。讲完后我说，两千年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听到这个故事时

说了一句话：“一个民族只有那些关注天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如果一个民族只是关心眼下脚下的事情，这个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我还引用了英国王尔德的一句话：“我们都生活在阴沟里，但仍有一些人还在仰望星空。”

没想到“仰望星空”颇为触动学生，不少学生在几次的作业中都写到这一点。我摘抄几段如下：

仰望星空，让自己的心灵沉静

从小家人就叮嘱我们，“走路要看脚下。”或者“学习要脚踏实地，认真钻研课本知识。”于是，我们一辈子就低着头走过来了。

谭老师课上一再提及浩然正气。我以前以为那只是历史书上的词汇，只属于名垂千古之人，从没想过我们的灵魂也需要浩然正气。

我曾认为浩然正气就是有骨气，昂首挺胸，不折不挠，宁死不屈。现在，我理解是：它更可以指勇敢地批判和质疑、追求真理、丰富自己的灵魂。灵魂不仅仅是一种超脱自然的存在，其实应该也是思想的结晶。它就像一片夜空，浩淼无尽，深邃神秘。而正气，就是天上的星，点点繁星也能照亮整片天空。

找回“正气”，不仅要懂得质疑和批判，更要从中学到升华灵魂和积累智慧的精髓。仰望星空，让自己的心灵沉静，让自己拥有“浩然正气”。

我们从来没有抬头仰望

大学是应该出现“仰望星空”的人的地方。可是，现在“只关注脚下”的人太多了，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成长为一个“关注脚下”的人：关注考试、关注分数、关注就业；关注住房，关注加薪；关注子女……从来没有抬头仰望一次星空。

我愿在夜阑人静时……

仰望星空，一个多么“矫情”的动作。我们的民族素来喜欢脚踏实地地生活，但在遥远的另一边，不少人却喜欢仰望星空。这是多么的荒诞，星空有什么好看的，星空能给你金钱还是美女，能给你权利还是名望。还是脚踏实地的生活吧。

……

我只愿多一点人文主义的光辉照耀这片土地，我只愿多一点浪漫的情怀，让我们的青春不在制度的禁锢里荡然无存。我只愿多一点自由，让我们敢想敢说，不让思想的流动戛然而止。我只愿多一点指引，不让迷惘的我们无处寻根。

今后，我也愿在夜阑人静时，独自仰望星空！

感谢命运的安排

奥登说：“我应该学会仰望空荡的天空，同时感受天空一片漆黑的崇高。”

我们一出生，父母就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光明的前途，而我们则像布娃娃一样努力着、奋斗着、拼搏着，按着父母指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踏实地走着。

可是我们却是没有灵魂的躯壳。

我们已经被模式化，都是统一规格出来的螺丝钉，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我们更多的是学会了如同机器般的冷漠与规格化，没有了普遍价值观指引我们的航行。教育把“学以致用”发挥得淋漓尽致，把一切不能用作实际的东西扔掉，看不见灵动的智慧和性灵。我们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生活，为了更多的物欲，但却忘记了我们为何上路，人生又为何。

随着课程的进入，忽然有一种前面十几年白过了的感觉。我感到一种灵魂的洗涤，是人格的重塑，是一次发自内心的真正的“仰望星空”。

感谢命运的安排，遇到这样一位启发人灵魂的老师、遇到一本让灵魂茁壮成长的书。同时也感谢这样一种启迪，能让我们偶尔仰望天空……。

我们需要仰望星空

从小学到高中，一切课程都是服务于考试。我最爱的音乐课和美术课，很早就被学校取缔了，因为它和升学考试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中考、高考像两块巨石，不管你喜不喜欢，它就横在那儿，让你丝毫不敢懈怠。每天做那些密密麻麻的习题，我心里就赌气道：“为什么我要逼着自己做不喜欢的事，不如破罐子破摔算了！”于是立刻就翻出桌子里的《读者》《意林》来看。不过读了一两篇文章，偷偷看到旁边的同学都在埋头苦战，心里又开始不安起来。一种觉得辜负父母的犯罪感将我吞没，最终只得加入他们的行列。

考大学，专注的是哪一个专业对找工作更有利。在大学里，知识便用“有用性”与“无用性”来区分，于是，常常在自习室和图书馆看到各种用功学习的学生，但走近一看，他们手中的书不是英语就是职业考试书籍。

人之为人，正在于他超越功利目的。在物欲横流的当下，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我深信，想要获得内心的一份宁静与祥和，靠的不会是经世致用的科学技术，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一种纯净美好的信仰。

文中多次提到“性灵”一词，足以看出这对人自身发展是弥足重要的。“性灵”是人立于世的根本，它支撑着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切活动。

为此，我们需要仰望星空。

我在学生的作业后写下了下面这几句话：

我们不仰望星空，因为那里没有金钱、美女、房子、车子、位子（权力）……。

于是我们一心盯着地上，于是我们这个民族近千年来对人类文明毫无贡献。

可我们现在享用的一切物质文明，都是那些仰望星空的民族发明和提供的。比如现在我正在使用的电脑。

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光明教育”

一天傍晚，校园里遇到几个学生，他们问我：“老师，我们听说你是搞土改调查的，是吗?”

“是呀，我作了好些年的土改民间调查。”

“你调查到了些什么?”

“那就太多了，一言难尽。”

“你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那就有点多了，有好些方面。”

“比如呢?”

“比如为了逼要地主的钱财用了很残酷的刑罚。”

“有多残酷?”

我于是简单地说了几种，比如“点天灯”、烧烤活人等。

出乎我意料，他们不是感到震惊，而是笑起来了：“老师，不可能吧? ‘烧烤活人’?怎么可能?”

望着他们靓丽的面容、单纯的表情，我觉得不必多说了。他们从小到现在，都生活在“祖国处处是花园，花园的花儿真鲜艳”的教育里，党的慈爱光辉、社会主义的美好，已经是根植在他们心中的光明。六十多年前的那场血腥，以及校园外发生的种种残酷，离他们太遥远了。

我们的教育，让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制度优越，阳光四溢的国家里，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里，怎么会有那种血腥和残酷。

“也许，有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的书和相关的纪录片。”说完，我转身离去，消失在夜色中。

补记：几年后，2018年6月，几千家中国p2p网络借贷平台“爆雷”，成千上万投资者血本无归。其中一个叫王倩的年轻女子去向政府请愿，结果政府不仅不理，反而出动警察对请愿者一顿暴打，怀抱两岁儿子的王倩也未能幸免。

这是我们爱人民的政党和政府吗?这是我们保护百姓的警察叔叔吗?这与王倩从小接受的“光明教育”多么不一样!

王倩崩溃了。她无法承受这种崩溃，于是选择了上吊。她在遗书中写道：“这个国家太令人失望……心态完全崩了，因为我从小接受到的教育是爱党爱国，有极高的集体荣誉感，一下三观全毁了。”

王倩不是死于她的钱财被骗（她还年轻，钱财还可以挣），而是死于导致她崩溃的第二种欺骗——“爱党爱国教育”的欺骗。

她绝望地走了，走前，她在遗书的最后留下了她的希望：“西西，妈妈走了，希望你好好读书，长大出国留学移民。”

训练有素的“统一”

学校的一位外教（美国人）来校任教前曾在美国从事传媒工作，于是新闻系一位老师把她请到大一新生中作一次专题演讲。

该老美教师娓娓论述，一一举例：……在美国，媒体有各种不同的声音，有支持奥巴马（政策）的，也有反对的；有喜欢他的，也有不喜欢他的……。”

讲完后，该洋人随口问了一声：“你们喜欢习近平吗？”

全班几十个学生齐声回答：“喜——欢！”

那爽朗的声音像操练的士兵，整齐而高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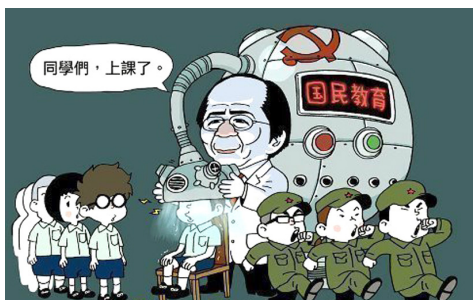
我大天朝训练有素的“统一”，打得一盘散沙的美利坚哑口无言。

与此同时，我又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例行公事——指导毕业生论文。一看那报来的题目，我就像又重逢了已经吻别多次的老女人：不是“论雨果《悲惨世界》中的人道主义”，就是“浅析《呼啸山庄》中的爱情悲剧”；或者，不是“论新闻记者的学识修养”，就是“浅析采访中的提问技能”……

把女人比作花朵固然是千古经典，但让一届届学生老是拥吻此经典则令人“性趣”疲劳。

我们为什么不培养学生自选论题？

我告诉他们，天涯何处无芳草，甚至，“十步之外，必有芳草”。可惜，已经被教科书定点定时定量灌食多年、被“教导员”定标定准定规捆绑一生的学生们，走出十步之外，便觉天苍野茫，孤寒迷惘。我叫一些学生另选论题，半月过去了，他们仍茫然加惶然，不知何处下手。



“党的教育事业”（网络图片）

大学寒窗四年，离开那些“八股”命题，他们竟找不到一个非“山寨”的“自主研发项目”。

可这能怪他们？从初入校门到挥手作别，“统一思想”的大旗呼啦啦四季高扬；“保持一致”的军号热辣辣昼夜嘹亮。莘莘学子们，一步步踏着僵死的“人才培养计划”，在那僵而不死腐而不倒的血红王朝之血红之光照射下，不是写出千年不变的“姑娘像花朵”，就是发出万众一声的“喜——欢”！

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

2014年10月，开学一个月后，我给大二学生布置的作业陆续交上来了，几十篇作

业，从立意到行文，大同小异，就像收集了一堆南瓜，虽然大小长短不一，但都是南瓜。

重返讲台几年教下来，越教我越困惑，我是在教大学吗？怎么越来越有面对初中生甚至小学生的感觉？

半个月前，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文章说：“中国教育也许是中国最恶劣的假冒伪劣产品，中国教育之毒已经远远胜过毒牛奶，地沟油，毒大米，甚至有毒的空气。中国教育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大批量制造出没有任何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书呆子记忆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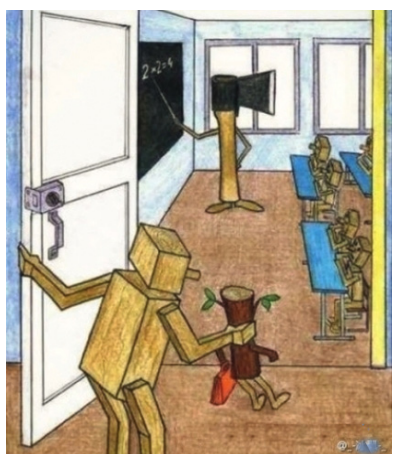
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雪化了是什么？”老师在课堂就此提问，孩子们齐声回答“是水。”不料有一位学生回答：“是春。”老师对这违反“标准答案”的回答十分不满，答“错”了的男孩被叫站起来，受到老师的斥责，同学的嘲笑。

我写道：“雪化了是水?”固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但那“春”的回答是不是内涵更丰富、更生动？在回答这个问题时，那男孩脑海里也许浮现出了“雪融冰消，山花怒放”的满目春色。其景象之生动明丽，远非干巴巴的“水”所能比拟。然而，老师“大棒”一挥，男孩站起一“示众”，从此他那想象无限丰富的大脑中也只剩下“水”了。或者说，从此他纵然还有“春”的感觉，“春”的向往，但现实中还是觉得与“水”保持一致最正确，也最安全。这种“只能是水，不能是春”的僵死模式，不知扼杀了多少人的想象力、创造力。

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中，那些在艺术、哲学、科技、文学等领域里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往往都具有独特的思维、丰富的想象。倘若他们从小便受到“只能是水，不能是春”的棒杀，世界也许不会有伽利略、牛顿，不会有雨果、贝多芬、罗丹。

再引申看，历史上与传统观念相违的“不和谐音”，往往预示着理性和科学在蒙昧中的突破。例如，当《地心说》的谬误笼罩欧洲大地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是真理的初探；当人们普遍认为“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则是理性与科学的体现。



砍成一个样的教育刀斧（网络图片）

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统一规格的学习模式和“保持一致”的“标准答案”培养下步调一致地成长起来，他们自然又要不自主地一代又一代地将此传统延续下去。到最后，整个民族缺乏灵气，看不到独立思考，只有“水”千古流淌，没有“春”姹紫嫣红。

这种僵死的“标准化”教育，是来源于专制的“一元化”政治。几十年来，“统一思想”、“党叫干啥就干啥”是执政党统治国家的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国策。在这个国策指导下，思想和教育领域，长期强行按照奴隶和奴才的标准来规范。如此，怎么可能培养出有创新能力、有独立特性、有鲜活灵气的学生和人才？

（民国时期，大师辈出；“新中国”65年，一片空白！）

眼下，站在讲台上的许多老师，也都是这个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车轻路熟地与当局的要求保持一致，继续“批量制造出没有任何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书呆子记忆棒”。即使明日突然变天，他们也很可能继续沿着这个“道”行走。

该文章说：“跟一些中国大学生甚至毕业了多年的大学生谈话，你会发现他们的思维跟小学生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思维方式，以及对世界认识的角度是一样的，这是极其可悲的。”

该文也提出“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中国的教育摧残孩子的秘诀是：要求学生大量记忆碎片化的‘知识’。现代教育研究证明，任何‘碎片化的知识’必须被理性梳理并建构起系统化的秩序，才能显示出知识的力量。否则不但不能够给人带来任何的帮助，还会成为大脑沉重的负担，使人成为‘书呆子记忆棒’。任何人要成为自己大脑的主人，都必须建构属于自己的逻辑思维体系，在这个可操作的体系里，他所有的观点和知识都是不矛盾的，是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完成了这一步，就相当于在我们的大脑中建立了一个知识操作系统。我们就具有了运用知识的能力，成为有创造力的学者而不是‘书呆子记忆棒’。”

“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不提供建构逻辑一致性科学体系的思维工具（哲学，逻辑学，批判性思维，还有宗教的知识）。中国教育甚至不告诉学生有这些工具存在，而是哄骗学生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时间去无限的获得‘标准知识答案’，这是极其野蛮和邪恶的。”

当然，中国教育窒息民族创造力和思考能力的原因还有种种，这有待后人来一一分析梳理，或者说批判清算。

该文最后的结论是：“所以中国的教育对培养学生的创造力，人类的情感（人性）没有任何的意义，它对一个人思维和人性的残害可能会遗祸终生。”

我在教学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正是这样！

补记：写完这段文字后一个多月，我在网上（人民网-2014-12-11）看到一篇章文章《580篇中学作文掺假》。

作者说，他作为评委参加了某部委主办的以阅读为主题的全国中小学征文的评选，在连续几天看了580篇中学作文后发现几个问题：

一是虚假。这批作文有个普遍的问题：假——写的是假事、抒的是假情、发的是假议论。比如，有一篇作文写道，读了某本书的感觉“如同吃了一枚无花果，既甜蜜又苦涩。”无花果能吃出苦涩？显然作者没吃过无花果，想当然地以为就应该是那个味儿。类似的向壁虚构的内容，在这批中学生作文里大量存在。

二是模式化。这580篇作文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本来各地风土人情、方言土语各有特色，每个人也各有其性格和经历，但看上去这些文章却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开头必是一段华美的抒情，中间写一段自己读了某本书的感受，其间引用几句名人名言，结尾点题。连续看了500多篇千篇一律的文章的确令人厌倦。

作者还指出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

一是语文教育问题。语文教育在塑造人格、培养志趣方面明显不够，很多孩子不具备独立观察、独立思考、独立表达的能力和习惯。学生作文之所以出现模式化的假的问题，和语文教学的这一特点有直接关系。

二是语文教材本身就充斥着虚假空洞的文章。作者举例说，小学语文教材内容失实，《地震中的父与子》讲述1989年洛杉矶大地震里的一个温情故事，事实上1989年洛杉矶并没发生地震；《爱迪生救妈妈》说的是少年爱迪生用烛光为妈妈做了一场阑尾炎手术，但据史料记载，世界第一场阑尾炎手术出现时，爱迪生已经40岁了……学习这样的文章，孩子们学到的是什么？如果语文教材本身就充斥着虚假空洞的文章，我们又怎能指责孩子们在作文里说假话呢？

当然 ，还有其他问题，这从作者举的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出：

去年上海中考作文题目是《今天，我想说说心里话》，一名女生走出考场接受采访时说：“因为是中考，如果真说心里话，一定考不好。”一语道破真相：考试不欢迎真话。不是学生们没有真情实感，而是在高考、中考这样的重大人生关口，稳妥起见，还是照老师教的套路为好。如此心态写出的作文，岂能不假。

（不是考试不欢迎真话，而是这个制度不欢迎真话。）

因此，作者感叹地说：“沮丧的是孩子们很少在文章中袒露心声，很难透过文章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雄猛的普京大帝

2014年2月，乌克兰事件引发俄罗斯在公投的名义下强占克里米亚。网上，中国民众一片欢呼。“普京，伟男子！”、“俄罗斯，给西方（美国）点颜色看看！”之类的留言铺天盖地。其中，对普京这个硬汉强人的称赞尤其热烈，在一条“普京，真正的男子汉！”的留言下，点赞同的就达15000多人。

现在的普京大帝也许没料到，他有这么多中国粉丝。曾经的俄罗斯帝国也没有想到，它有这么多炎黄支持者。难怪，正因入侵而遭遇谴责和孤独的普京喜不自禁，专门对中国民众的支持表示感谢。（而中国各大网站则如受宠若惊的妃子，把普京大帝的感谢登了又登。）

紧接着又传出美国阿拉斯加有3万人要求公投的消息，中国民众又是一片欢呼和支持，同时，幸灾乐祸地挖苦美国，还呼吁普京这个当今世界的第一阳刚，要坚硬雄猛，教训教训“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帝国主义。

是我们的男人们阳痿已久，以致对勃起的坚硬崇拜不已？

是我们的女人们压抑已久，以致对乍现的雄猛惊赞不已？

至于这坚硬强壮现在是否涉及强奸、过去是否强奸过自己的祖先（和领土），今后是否还会强奸自己的子女，被灌了一脑子“红色浆糊”的“中国粉丝们”都不清楚也不会去思考。

我又想起9•11事件发生后中国民众的举国欢腾……

从对恐怖拉登9•11事件的欢呼到对强占克里米亚的普京大帝的顶赞，中共当局可以很欣慰地看到，他们的愚民教育和洗脑教育已经大获成功。

补记：去年我在讲授西方文化概论课时，很想专门讲一下俄罗斯帝国和苏联帝国，但因为课时紧张，不得不放弃了。克里米亚事件和中国民众的欢呼出现后，我更想讲一下对我们影响巨大的这个近邻。我为此作了一个多月的准备。不料，五一和端午节放假刚好放掉了这门课的好几个学时，更没料到学校又宣布提前结课（6月初就结课），我又只得放弃了。

一个怪胎

一位学生，为“钓鱼岛”慷慨激昂义愤填膺：那是祖国的领土，也是国家的尊严！

可我知道，也是她，在办公室受到粗暴对待和无理训斥时低眉顺眼，一声不吭。

我们有一些脾气很大的教职人员，也有一些态度恶劣的管理人员，我不时看到他们在学生面前言词粗暴，霸气十足，甚至一个食堂卖饭卡的职工，一不顺心，都可冲着学生高声吼叫。而不少学生（包括这位“她”），逆来顺受已经习惯，仿佛并没有感到个人尊严和人格受到侵犯的愤怒，更没有要为这种侵犯而奋起“维权”（抗争）。

但是，他们却可以为“祖国的尊严”拍案而起慷慨激昂。

有外人“侵犯”了那遥远的南海岛屿，四下一片怒吼：“犯我中华，虽远必诛！”

有日本人登上了我们的钓鱼岛，全国涌现亿万“义勇军”：“宁可华夏不长草，也要收回钓鱼岛！”

我们从来不缺这种“捍卫国家利益和祖国尊严”的“英勇斗士”。

个人的尊严和人格可以被踩在脚下，可以被粗暴践踏，身边的同胞可以被欺凌被侮辱，但所谓“国家的尊严”神圣不可侵犯。这是一种“自己受辱受压毫不在意，祖国受屈受欺不能容忍”的中国式崇高和伟大吗?

阿Q的脸被赵太爷打得火辣红肿无所谓，可路人要是对赵家评头论足便会激发阿Q强烈的义愤和英勇。我们是怎样培养出这么多“毫不利己，专门爱国”的“忠义之士”的呢?

一百年前，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一百年过去了，这个民族似乎没有丝毫的长进。

一个对自己的尊严都不敢维护、对身边的罪恶都不敢言说、对同胞的苦难都无动于衷的人，却时时要英勇地去捍卫祖国的尊严，维护国家的利益，我无论怎样强迫自己去想象他的无私与崇高，都觉得是个怪胎。

补记：几年后，2019年4月，巴黎圣母院发生一场大火，无数年轻学子一片叫好，

并且由此引出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一个个痛斥当年法军火烧圆明园。我忍不住写了如下文字。

由巴黎圣母院大火所想到的

巴黎圣母院一场大火，又听到无数国人的叫好声，认为这是报了当年法军火烧圆明园的一箭之仇，大快人心。

类似的这种叫好声我们已经听到过多次，比如对美国“9.11”遇袭；比如对日本大海啸灾难……

至于巴黎圣母院的大火，与一百多年前火烧圆明园有什么不同，已经有不少学者和自媒体作了透彻分析，我就不再说。我想说的是，中华数千年的文化遗存（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毁于什么时候，毁于谁之手。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长于十年文革，从小受教育，1949年之前是“黑暗的、万恶的旧社会”，旧社会留下来的东西，大都浸透了封建毒素，属于打倒、清除之列。而1949年后建立的“新中国”，是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马列主义为指导、以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政党为领导的国家。“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口号响遍中华大地，书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城镇和山乡。

这个由外来的“洋教”所培育、所指导的政党，这个以“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为宗旨的“新社会”，天然地要与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势不两立，必然地要用暴力手段清除“旧中国”的所谓“封建毒素”。

这一场“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焚火其实从1949年“新中国”一开始就在中华大地上熊熊燃烧。它一烧几十年，遍及神州每一个城镇山乡！其惊心动魄、其焚毁之绝，其惨不忍睹，实在让圆明园的火光黯然失色。

因为，它把中华数千年文明的根烧断了。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当局就开始了有目的、有计划地毁灭中华传统文化，打出的旗号是“清除封建毒素”。

比如，在川东著名的鬼城丰都，曾有大大小小88座寺庙，是当地民俗、文化、建筑、艺术、地理的实物记载和生动反映。可是，1950年，丰都县委书记亲自带队，把88座大小寺庙一一砸毁（幸亏还没砸那个现在的著名景点）。当年目睹这一“壮举”的丰都民间艺人雷雨风在几十年后说起这事还悲痛不已。

又如，在四川天全县始阳镇曾有两大庙子，一是清朝雍正改土归流后建的城隍庙，二是建于南宋的大碑石，这两座珍贵文物1951年被农会主任带人砸了。

在忠县石黄乡，曾有一座寺庙，不亚于现在梁平县著名的双桂堂，五十年代被拆毁。

至于烧书、烧字画，更是火光冲天兼绵延不绝。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遍及全国的土改运动中，有一个任务就是焚烧乡绅家的诗书字画。比如在川东奉节县洋沱坝，有一个著名学者叫李孟洋，他收藏有整整一幢楼（三层）的书籍，仅裱过的字画就有上万幅，其中有不少珍品。中共土改工作组的人把李孟洋整死后说，要彻底粉碎封建毒素，还要烧光他收藏的反动书画。于是，工作组派人天天去背书焚烧。这一把火整整烧了五个多月，仅焚烧后纸灰都挑有几百挑（挑去肥田了）。又如，忠县花桥乡沈举人家几代人的藏书全部被焚……

当年烧书的沈家大院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打砸焚烧，到文化大革命燃起的“破四旧”燎原烈火，中华大地上，有多少珍贵文物被毁？

原川东彭水县的千年古镇郁山，曾有九宫十八庙等五十多个大小寺庙和著名古迹，1949年后被毁得一个不剩！其中包括那著名的唐代天元寺。（这座挺立了一千多年的寺院是三十多年前才被毁。）

我的出身地重庆市南岸区有一座沿山而建的著名寺院老君洞，它始建于三国时期，正式创建于隋末唐初，历时1300多年，是重庆主城区最大最主要的宫观。寺内有许多珍贵而精美的雕像和雕刻，但是，文革的焚火毁灭了这座著名寺院。老君洞的所有神像及沿山壁而上的摩岩浮雕人物全部被毁，1000余册经书与字画、衣冠等文物被焚烧，70000余平方建筑被拆毁，四尊极其珍贵的唐代铸紫金铜钟神像被当作废品处理了。（这四尊唐代珍品是抗战时期为防日机轰炸转移到南岸的，它们没毁于日机轰炸，毁于文革焚火。）

在甘肃环县的兴隆山，沿山而上（直抵1774米的主峰）曾有建于明清两朝的72座寺庙。在地理如此偏荒的地方，1967年秋，一群毛主席的红卫兵，不畏路途艰辛（那时还没有公路），爬山涉水来到这儿，以砸烂“旧世界”的革命激情，将72座寺庙彻底摧毁！我曾站立在兴隆山最高处那残存的“天门”寺庙外，眺望四方沓无人踪的寂静沟壑，心想，历朝历代的战火，都很难烧到这地老天荒的地方，但一场“砸烂旧世界，清除‘旧文化’”的革命烈火，烧遍了神州大地的每一个偏远山乡，也焚毁了这72座从明清传下的文化遗产。

我在被毁的兴隆山寺庙前

贵州安顺在文革时将中国古老的地戏面具强行收缴，在“清除封建文化”的口号下，两万多个面具（其中有不少传了几百年的珍品）被集中焚烧。那三天三夜，烈焰熊熊，浓烟滚滚，焚烧的灰烬遮天蔽日。

1966年8月27日上午，洛阳市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响应党中央“清除封建余毒”的

“战斗号令”，着手准备彻底砸毁著名的龙门石窟。如果洛阳农机学院的师生晚一步赶到，中国将从那一天起不再拥有这个有一千五百年历史的世界文化遗产。

洛阳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公元68年）。白马寺创造了中国佛教史上多项“之最”。如：最早传入中国的梵文佛经《贝叶经》收藏于白马寺；中国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在白马寺译出；白马寺的齐云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舍利塔……白马寺内曾存有大量千年稀世珍宝，到民国时期，这些珍品依旧保存完好，如辽代泥塑、元代夹纻干漆造像，三世佛、二天将、十八罗汉等。

公元1949年到来了，一切宗教活动均停止，白马寺香火沉寂。

公元1966年到来了，挺立了两千年的中华第一古刹遇到了它的灭顶之灾！

那一年的8月27日早上，白马寺大队党支部书记带着数百人，操着锄头、铁锹等闯入寺庙，声称遵照上级指示 “破四旧”。霎那间，包括有千年历史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稀世珍宝玉马在内的所有佛像、经卷、文物都被毁灭。二千年前印度高僧带来的镇寺之宝——《贝叶经》同样被付之一炬。被焚毁的经书残灰、残卷有一米多高，直径五、六米……据《洛阳市志·文物志》、《洛阳市志·白马寺志》中记载，共计焚毁白马寺藏经55884卷，砸毁元、明、清历代佛像91尊，包括来自印度的一尊白玉佛，缅甸赠送的珍贵贝叶经也被投入大火，化成灰烬。

山西祁县渠家的长裕川茶庄曾是晋商中最大的茶庄之一，始建于清乾隆、嘉庆年间，茶庄大院里有一幅巨大的青石浮雕，它既有中华传统的文化气息（如大禹神兽、罗汉菩萨、琴棋书画、鹿鹤松柏、施衣舍饭等石雕和图案），又体现了西方文化艺术特色（如四方门柱、高高在上的雄狮、院内支撑窗台的石雕吉祥鸟等）。当年，大院曾被日寇占据，但他们未毁坏石雕和房屋。几十年后，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破除旧文化”号召的红卫兵们手举铁锤杀来了。他们首先冲那典雅的大青石浮雕门下手。

叮叮当当，碎石乱飞。终于，这一精美的艺术品被毁坏了。

（我曾站在那残破的雕像前心生困惑：这些祖先留下的文化和艺术之美，当初怎么就没有令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生出一丝不忍与爱惜呢？一个政党、一种学说，要把一个人的大脑洗成什么模样、把心灵毒害到何种程度，才能让他如此疯狂——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炸毁千年艺术瑰宝巴米扬大佛。）

被砸烂的青石浮雕

另外，1949年之前，中国乡村可以见到不少精美的庄园。这些庄园，集建筑艺术、手工雕刻、儒家文化、传统民俗等于一身，再与四周的自然环境巧妙融合，构成“天人合一”的宁静与优雅。置身其中，可以感受到千百年来那一脉相承的文化内涵。1949年，一只巨掌劈天而降，打断了千百年来的那种和谐，那种“一脉相承”。房子分了、

家俱搬了、艺术毁了、书籍烧了……土改未毁的，大炼钢铁毁了；大炼钢铁未毁的，“文革”毁了；“文革”未毁的，“经济开发”毁了。这些精美的庄园，终于玉殒香消灰飞烟灭。例如，始建于明洪武四年、占地200多亩的四川隆昌县云顶寨古城堡（寨内原有54座庄园）被毁得面目全非；涪陵青羊镇陈氏十大庄园只剩下最后半个（即现在想开发旅游的陈万宝庄园）；云阳县凤鸣镇彭氏家族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建造的彭家座堂（住宅大院），占地 2000 多平方米、拥有 15 个天井、三道豪门、无数艺术雕刻，土改之后座堂被毁（现在想开发旅游，但已经无法修复），如今，仅有一道侧门还比较完整地立在天地间。

仅存一道侧门

……

说到这儿，大家明白，这种从1949年就开始的全国范围“清除旧社会封建毒素”就是毁灭中国文化！

（我以上举的这些例子，全部来自于我的实地走访了解，而这还是很少的一部分。）

还有，有人曾将文革时中国被毁的著名文物、古迹和被焚烧的珍贵字画列了两张长长的表，把这两张表细细读下来，你便会发现，圆明园的焚火，实在只是微弱的星星火光。

为什么极少见到有人对真正彻底毁灭中国文化的事件和元凶进行揭露和批判？我们那些动辄义愤填膺怒斥美帝、抵制日本的爱国斗士们为何在这方面总是缺席？

我想，一是他们不知道。比如，我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们的认知几乎全部来自中共精心打造的教科书，虽然现在资讯相对发达，信息多元，但他们被死死锁在分数和考试的铁链上。于是，普遍出现了“党要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就知道什么，党不要他们知道什么他们就不知道什么”的现象。同样，多年的洗脑教育，当局也成功达到了“党要他们仇恨什么他们就仇恨什么”的目的。（为什么有源源不断的“小粉红”，因为我们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培养机制。）

二是他们不敢。就算有人了解了“毁中华文化者，中共也”的事实，他们也不敢说，而痛骂英法联军烧圆明园不仅没有任何风险，而且还可以站在爱国的道义高峰，展示自己的凛然正气。

那些为火烧巴黎圣母院欢呼的人是因为心痛自家圆明园的文化艺术被毁灭吗？那么，他们心痛过被中共、被红卫兵所毁灭的文化和艺术吗？从他们看到巴黎圣母院这人类文明的瑰宝被损毁没有一点心痛，只有一种复仇的快感，我感到，这些拍手称快的“爱国者”们，心中装的是仇恨而不是文明，是愚昧而不是理性和爱。

如此，某天又一位“英明领袖”和“伟大政党”让“1966年”死灰复燃，又用一腔神圣的高调发出一阵邪恶的咒语，他们是不是又要像当年的红卫兵一样应声而起，疯狂扑向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

消解善恶是非的“一分为二”

一位学生交来作业，认为我看问题很片面和极端，他说，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

提出这一点的还不是个别的学生，我纳闷，现在读书很少的大学生哪儿来的这种“富有哲学思辩”的观点呢？

我很快想起，这个“一分为二”也是我以前在课堂上接受的教育——共产党给我的教育。当时我觉得很有道理（那时我也很年轻，除了党规定的教科书之外很少能读到其他书籍）。记得当年教师在课堂上循循善诱，举例分析，更有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让毫无“哲学思辩”的我接受了这种“方法论”，也觉得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和分析问题才能公正客观。

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我没学过哲学，有关的知识一穷二白，但接触和了解到很多事，用自己大脑分析判断，觉得实在无法“一分为二”。

例如：

三年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这肯定是一个大灾难，请问如何“一分为二”，从中分析出“好”的一面？（除非你非要说它“减少了人口负担”。）

法西斯奥斯维辛集中营屠杀一百多万犹太人，残暴血腥，请问如何 “一分为二”，从中找出值得肯定的“正能量”？

特利萨修女一辈子行善，救人、助人无数，请问如何“一分为二”，分析出修女身上的“恶”？

李冰父子修都江堰防洪抗旱造福千万百姓，请问如何“一分为二”，分析出其中的“弊”？

……

世界上很多事，善就是善，恶就是恶，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无法“一分为二”的！“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的哲学思绪和方法论本身就是错误和荒谬的，因为在貌似“客观公正”的外表下它消解了是非，混淆了善恶。

现代的学生，仍然用这种错误和荒谬来指责我，让我感到很悲哀。几十年过去了，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我们的教育一成不变，一代又一代当年的我又被培养出来。

父母们

一

一位土豪子弟，一进校门就豪气万丈——他要住单间。人们告诉他，学校都是集体宿舍，没有单间。该小土豪大概从小见惯了一掷千金气吞万里的豪气，竟大张“金口”，狂吐“豪言”：“信不信我能把这栋宿舍楼买下！”

另一位“大侠”是我曾教过的学生。此君一身“傲骨”，进门出门，高视阔步，举手投足，神情昂然，颇有几分登泰山而览众山小的气势。

有人告诉我：“他爸是镇长！”

镇长，威镇一方，权重势大。

我从没有去采访过这种“土豪”和“大侠”学生，对眼下金钱和权势打造的“中国特色”，我早已烂熟于胸。

2000年，我曾“混迹”于一个政府加商人考察（旅游）团，周游了几个国家。在这个由区委书记带队的8人团里，除我（给他们当翻译）之外，一个个要嘛有权，要嘛有钱，要嘛既有权又有钱。

那是一次我中途就想落荒而逃的痛苦之旅；

那是一次我被霸气和铜臭双面夹击的刻骨体验。

“草坪不能踩？踩几下又怎样！”一位局长瞪我一眼，高视阔步，昂然而行。

“这地方不错？嗯？信不信我把它买下来！”一位土豪白我一眼，口吐豪言，气吞万里。

据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想来也是，在除了权柄和金银之外什么都认不得的家庭里，怎么能生养出谦卑的“传道士”、节俭的“清教徒”？

更何况，在眼下浩浩国土芸芸众生中，权力和金钱这两件奇珍异宝，已经成了我们的定海神针和心中圣灵。

我能螳臂挡车？

二

“你们这个老师怎么回事？老教些无用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你英语四级还没过，好些个证书还没拿到！专业学不好，没有竞争力，今后找不到好工作……。”

这是比较有代表性，也是比较有普遍性的学生家长的语言。

这些家长们大多与我是同一时代的人：生在“新中国”，长在“文革”中，红色恐怖下遭过洗脑，广阔天地里练过“红心”……唯独缺失了传统文化的浸润，现代文明的洗礼。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甚至没受过完整的初中教育（更遑论高中和大学），这整整一代被文明教育抛弃的父母们，如何去文明教育他们的子女？

然而我们又是一个极其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

自己不懂而又万分重视，于是问题出来了；

社会功利而又竞争激烈，于是问题又出来了；

独生金贵而又望子成龙，于是问题更出来了。

“怎么这次只考了98？要给我拿100分！”

“隔壁王二娃过了四级（钢琴），你三级还没过！”

“什么兴趣爱好？学这个专业才好就业，才有前途！”

“读这些书对高考没用，不要浪费时间！”

……

北大著名教授钱理群，满怀理想，到中学去启蒙教育，几个月下来，大败而归。其中，就有家长们的集体反对：钱教授教些与高考无关的无用知识，浪费时间与精力。

“谭老师，你总是指责我们知识面狭窄，可是，我从小只要一看课外书，也就是说，只要看与考试无关的书，就要遭到包括来自父母的指责，弄得我一看其他书就有一种罪过感。这样，到了大学，习惯已成自然，除了要考的教科书，其他书就自觉地不读了。”这是一位学生在毕业前，来向我告辞时说的话。

我曾多次咬牙切齿咒骂这吃人的教育体制，可我能这样对待与我同时代的中国父母们吗？与他们相比，我是幸运的。文革中，我班上50多名学生里，只有3人升了高中（包括我），最后只我一人读了大学。初中班上那50多位同学，同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包括我天资很聪明的姐姐），都被那个时代抛弃了、摧折了。

这是那个时代的罪过！（虽然，现在他们在爱的名义下，也在现实生存的压力下，几乎天衣无缝地配合这吃人的教育体制，与之双管齐下地摧折着他们的下一代。）

面对来自父母们“爱的规劝”和面对来自老师我的“教的威严”，学生们该听谁的呢？

到处都是无可奈何。我只得要么自恋地说：“你们在今后的人生中，就能理解我谭某人的教导了。”要么强势地说：“你上大学几年，在思想认识方面应当远远超过你的父母，应当是你能去教育他们！否则，你这个大学是白读了！”

我试图螳臂挡车？

“社会主义新人”

冷漠、麻木，是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独裁统治越威烈，专制时间越长久，这个特征便越突出。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生存“哲理”发展到当下，便是如外媒惊呼的“这还是人类吗”的“小悦悦事件”。（小悦悦受伤倒地后不仅肇事车不停，而且18个路人视而不见，绕行而去。）

这些年，这类已走到极致的冷漠事件层出不穷，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媒体和网络也

不时在披露。对此，无需我赘言，我想说的是我在课堂上的感受。

这几年，我对每一届学生都要讲起几个“历史题材”：一、5•12地震；　二、重庆大轰炸；三、滇西抗战；四、三年大饥荒和“文革”。这几个题材都是我亲历或亲临现场采访过的。至于八九学运，我则选择性地对部分学生或部分班级讲述了真相。

我痛心地也绝望地感到，听众冷漠麻木的程度和比例在逐届增大。记得在给09级讲滇西抗战时，全班全神贯注，面色凝重悲伤。事后，有学生写来一篇长文，其中一句话让我感动至今：“我生长在遥远的西北，但我今生一定要走到那遥远的边陲，在国殇墓园的石碑前跪下，亲吻那片浸润着无数先辈鲜血的土地……。”

记得在给10级讲5•12地震时，后排的一些学生已神情淡定，似听非听，但班上仍可见到闪烁的泪光。

记得在给11级讲同样的内容时，已经没有泪光更没有读后感的文字了。

记得在给12级讲大饥荒时，班上还有同学发出了笑声。

更记得2013年5月，汶川大地震5周年时，我给一个班讲豆腐渣校舍和死亡学生时的经历。

那天，班上几个学生丝毫不为屏幕上的悲壮惨烈所动，自个儿说话，玩手机。（他们也许觉得我讲这些同他们的专业、同他们的考试毫不相关，而且5•12也过去几年了，还讲它有什么意思？）我为了不中断讲述，隐忍了。

我在北川中学废墟前

下课铃响后我仍然在讲，那几个学生更坐不住了，显得不耐烦，我忍不住制止：“不要说话！”其中一个学生反驳说：“已经下课了。”这一下点燃了我积压的怒气，我双目圆瞪，徒然爆发一声大叫：“那你就给我出去！”

我任教前后近20年，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学生，从来没有这样在课堂上发出惊天动地的大叫。

教室一片沉寂。

半晌，我一字一顿地说：“难道几千个花季生命的消亡都唤不起我们的一点悲情？！难道无数豆腐渣校舍的倒塌都引不起我们的一点愤怒？！如果他们不冤死，他们现在也像你们一样坐在大学的教室里！”

我顿了顿，加重语气说：“我可以容忍一个学生没有知识文化，但不能容忍一个学生冷漠麻木！”

接着，我把以前给新闻09级告别时写的三句话“声嘶力竭”地读出来：

一，记者应当有对人类的不幸与苦难抱怀深切的同情与悲悯之心。
二，记者应当有采写社会真实与记录历史真相的强烈责任感。
三，记者应当有高翔于专业技能之上的浩荡勇气与人性良知。

可是，我的“声嘶力竭”有什么用？在这个飞速堕落的社会中，我只是一个可笑的唐吉坷德，骑一匹歪歪倒倒的瘦马，挺一杆锈迹斑斑的中世纪长矛……

一届又一届，我越来越难见到满面的悲戚、闪烁的泪光。
一届又一届，我渐渐看到越来越多的“淡定从容”、麻木冷漠。
大学和大学生们，与这个飞速变化的社会“并驾齐驱”……

补记：不仅当局施用移山之力打造国人的冷漠麻木，而且学生的父母们也施用关爱之心打造他们的明哲保身。有学生听我讲了“六•四”学运之后向父母讲起这事，其父母如临大敌，严令她只专注自己的功课，其他事少管，尤其不要惹政治上的麻烦。
我在学校这些年，发现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父母们的普遍行为。
于是——
当局的专制暴虐与父母们的爱子之心双管齐下，成功地培育了中共当局需要的“社会主义新人”。

“更坚定我入党的决心！”

2014年9月，我给对外汉语开的《中国地理区域文化》一课吸引了不少外系的旁听生。我自觉课件（我自制的）丰满，讲解独到，正暗暗有些得意。

一天，一位相熟的旁听生告诉我，他拉了一位同学（校学生会书记）也来旁听我的课，听完后，该书记（学生会还有书记？以前我以为只有主席）对他说：“听了谭老师的课，更坚定了我入党的决心！”

为什么？

为了更好地同我的叛经离道战斗呀。

这几年来，我有些高估我的一腔澎湃激情和三寸不烂之舌，以为自己是一根尖锐的绣花针，不屑对方一个个庞大的气球。

其实，我这个叛逆魔高一尺，共党洗脑道高一丈。

“老师，你幸亏没有去教师范专业，那个专业的学生‘左’的很多，教现当代文学的一位老师在课堂上说到党的一些不是，几个学生当众站起来指责她。”

这件事我已经听说过，至于学生私下去向有关部门汇报教师的“违法”言行，那更是当局的鼓励（甚至规定）和经常发生的事。

这还不够，学校从2013年起，便在每一间教室安装了两个摄像机，说是为了监控

学生考试。可考试一学期才一次，所以，它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监控老师。2013年12月期末时，教务处就根据摄像记录点名批评老师（如某次早退三分钟、某次课堂纪律不好等等）。每次上课，我看见它红灯闪亮心里就有气，曾好几次当众冲着它作了几个怪相，说了几句怪话。

我在两个监控摄像镜头下（红圈内）教书育人

最初使用时，两台高科技只是摄像，没有录音，老师们虽然不舒服但还可以自由发声。不久，录音功能启用了，老师们的一言一行都历历记录在案！而且，现在有关人士已经不需要亲临课堂，只要坐在监控室，要听哪位老师的课，如“303教室”，点一下相关按键就行了——这就像交通警察监控全市的交通一样，要查看哪个路口，易如反掌。

“谭老师，你知道XXX老师吧？”一位学生对我说。“他上课很幽默，也一向喜欢嘲讽挖苦，我们很喜欢他的课，但现在他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了。”

教室里的摄像录音，加高校里的“学生信息员”制度（见后一篇），让中国的校园里只剩下一个声音——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声音。

以此，培养出大量的“更坚定了我入党决心”的学生。

以此，保证共产党“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补记一：

在我校已经安装监控摄像近两年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如下：

高校课堂建视频监控系统 律师吁提供法律依据

【大纪元2014年12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骆亚报导）近日贵州教育厅要求各高校建立全覆盖的课堂教学监控系统、对教师授课全程跟踪系统，为此，大陆杨名跨、李贵生、王宗跃、赵庆等四律师，向贵州教育厅要求提供这样做的法律依据、权力来源、制定过程、程序、资金来源、预算进行政府信息公开。

贵州教育厅要求高校课堂建视频监控系统还遭致社会各界的质疑。浙江一家企业的董事长在社交网上公开表示，照此下去厕所、家庭都会享受免费安装监控了，嘴上喊改革，实际上是到退。也有人称其为新时代的思想禁锢运动。

北大学者贺卫方教授以“大学已然若寒蝉”为题说：“讲课如履薄冰，因为探头在上。研究小心翼翼，例如不可写有关宪政的论文，写出来也发表不了。国际研讨会须提前一年向有司申报，稍涉敏感就无法举办（何谓敏感无公开标准）。许多大学学术讲座必须党委宣传部批准，谁在黑名单上，神秘莫测。口口声声办世界一流，可乎？”

对此大律师陈有西也表示深有同感，他说：“有些势力是在犯罪，在扼杀国家的创新动力和文明进步，试图陷全民于愚昧和衰朽。”

也有大陆律师不满质问：“这是教育部把大学教育往死里毁啊，咋不在教室派一持枪的思想警察？”

补记二：

2017年3月26日（星期天），为禁止到香港参加纪念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会议之事，我被叫到校党委书记办公室。书记、校保卫处长、校保卫干事、国保（国内安全保卫局）的两个警官共五人围着我谈了近三个小时。在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包括两警官）对我讲课的情况非常了解！保卫处长直接说：“我听过你的课。”

这就像公安监控社会一样

——摄于我校教学楼里的监控室

五十余岁的保卫处长我是很熟悉的，他只要出现在教室我马上就会知道，还有两名“UFO”——X警官和X警官，陌生的面孔一定会引起我的注意，他们从哪儿听的课呢？

从监控室里的监控录像！

用高科技监控教师，得心应手，真是时代的进步！

“信息员”

看到这几个字，人们也许会想到这是提供信息服务的人员，英语可以译成“information officer”或者“information teller”。

可是，在大学里，这个“信息员”却让人“望而生畏”！

让人“生畏”的重要一点就是这个“信息员”埋伏在众多学生之中，“望”而不见。

我曾经同一位高校的原系支部书记交谈，他告诉我，有关部门（公安或国安）专门到学校来，从学生中挑选“信息员”，标准当然首先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的“积极上进”的学生。他说，他们把选定的学生“信息员”单独带到校外面谈，谈话内容他也不知道。“信息员”一旦确定之后，就与有关人士单线联系，别说同学们不知他的身份，连辅导员都不清楚。这位“信息员”的任务，就像是埋伏在敌区的“地下工作者”，专门收集老师（甚至还有同学）课内课外的言行，然后向单线联系的“上级”汇报。

话说到这儿，我们便清楚了，这种“信息员”是什么角色。

这种“望而不见”的“信息员”的第二个让人“生畏”之处，是他的汇报可以像一颗埋藏的地雷，“轰”地一声把教师从讲台上炸得人仰马翻。“轻伤”是被有关领导找去诫勉谈话，或者行政处分；“重伤”是调离教师岗位或者开除出校。甚至，公安机关大驾光临，把你带去另一个地方。几年前，一位在一所学校当二级学院副院长的朋友告

诉我，他们学院一位教师因在课堂上讲“8964”学生运动被“地下工作者”汇报，该教师先是被派出所带走，然后被学校开除。

随着“时代的倒退”，眼下，“信息员”也不全都是“地下工作者”了。

告密制度，是与专制制度紧密相连的，其程度也与之成正比，独裁专制越是威烈的国家，告密制度越是盛行。2012年习近平“龙袍加身“后，思想言论控制日新月异，直攀毛泽东专制独裁高峰。在这种情形下，高校的“信息员”制度发展也日新月异。现在，“信息员”换了一个马甲，打着“完善对教学质量的监控”、“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等“教学”招牌，作为一种“制度”正式堂皇登台。我在网上看到的就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2015年发布）；重庆人文科技学院的《学生教学信息员实施办法》（2014年发布）；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关于聘任2018级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通知》（2018发布）等等。

这些年，我在对中共发动的一些运动作了调查采访之后发现，中共的任何邪恶行径都会竖起一杆光面堂皇的大旗，如土改运动杀地主抢财产是为了“消灭剥削压迫”；反右运动整知识分子是为了“铲除毒草”，以便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搞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是为了“反修防修，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

眼下，为严密监控教师，控制言论，又打出“为了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的监控和保障体系，加强对教学工作的反馈、交流和处理” 、“为加强对本科课堂教学过程的管理和监控，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等“保障教学”的招牌。就连告密，也可以“正确”得无懈可击，因为那是“反映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学生教学信息员的主要职责》第三条）

于是，在潜伏的“地下工作者”之外，学校又涌现了公开的“学生信息员”，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和汇报。

中国高校的教师无路可逃了，头顶上，是监控录像辛勤的记录，讲台下，是“地下工作者”和“学生信息员”雪亮的眼睛。

很快，效果出来了：中国高校教师接二连三被炸得人仰马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也就是积极实施《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的那所大学）的副教授翟橘红，在讲授“政府结构与功能”时，被学生信息员告密，翟橘红被校方“记过处分、开除党籍、调离教学岗位，并建议取消其教师资格。”罪名是“偏离教材、教学大纲”和“妄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北京建筑大学副教授许传青在上课时，看到学生在玩手机，于是她说：“如果你们不努力，日本就会成为优等民族，而我们就会成为劣等民族。”她的话被学生告密（而且断章取义），于是许传青被行政处分。

厦门大学陈嘉庚学院教授尤盛东被学生举报有“偏激言论”，遭校方解聘。

……

我有时望着课堂上我的学生，目光扫过一个个青春的面孔，心想，他们中有没有中共发展的“地下工作者”呢?如果有，是谁呢?

倘若能在摄像机和“信息员”（监控与告密）两者中选择，我情愿选前者，因为一是摄像机还“客观公正”，不会像汇报许传青教授的“信息员”那样“断章取义”或者“添油加醋”；二是摄像机不存在有“败坏一个人的灵魂”的问题。

网络图片

说到这儿，心中波涛起伏：全国两千多所高校，会有多少学生被培养成告密者?全国几千万的大学生，当课堂上最后一点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意志被剿杀后，会被培养成什么“人才”？

当课堂上只剩下一个声音——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声音后，我们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梦”？

习近平为实现他一人独裁终生执政的“皇帝梦”而倒行逆施，且不谈这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民主自由的毁坏，仅在校园里，就不知又要误多少青春的学子祖国的未来！

想到这一点，恨得咬牙而又无可奈何！

我真的如此失败?

2014年9月下旬，香港人为争取真正的普选，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和平抗议。在这场“占领中环”的街头抗议中，香港的学生们走在前头。其场面，使人想起25年前的北京天安门。

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热烈场面，久违了！

全世界都密切关注，中国大陆自然更应如此。

大陆校园里的学生们会关注吗？我希望课内课外有热烈的讨论。

没有。只有一份来自学院的“紧急通知”：

“各位老师，接学校通知，请不要在课堂上发表关于香港问题的任何观点。请大家相互转告。”

当局恐慌和紧张，一点不奇怪，正如他们每年在“六•四”期间的心态。

其实，他们也许过虑了。

本期我没上新闻课了，教了其他专业的四个班，我没主动讲，四个班的学生也无一人问及，仿佛香港离得太远，争什么“真普选”？太虚幻，远没有“英语四级”、毕业证书和考研来得实际和值得关注。

眼下，对中国大陆大学生的这种冷漠和麻木我已经深有体会，对当局在“8964”之后对新一代的这种刻意培养，我也早有感受。那些天，我什么都没说，成天完成那僵死的“教学大纲”。

不料，10月6日，我突然在我的QQ空间看到一篇毫不“麻木”的评论，该评论全文

如下：

“占中”已经持续第九天了，这些“脑败”的肯定又是被西方帝国主义的指使和后台操作从中作祟，美、英、法、德、日等国，历来就是地球上的混账东西和地狱魔鬼，哪个地方混乱出事也离不开这几个败类国家的后台主宰，虽然你们对人类社会有很大贡献，但是你们从古至今却残杀了无数条生存在地球上的生命。香港是中国的香港，任何人都甭想把香港从中国人手里夺走。治港者必须爱国爱港，这是底线，不容挑战，不容动摇。无论什么样的街头政治，无论耍什么样的花招，都不可能得逞，也注定是要失败的。中国香港顶住，毛（泽东）爷爷、习总（书记）不会让你（发烧）的，很快就会过去的……”

评论下面还配了一张毛爷爷的巨像和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

这是一位刚毕业的学生，我教了她近三年（其中有两门课是专门讲西方文明和文化的）。她的这段文字，我读了好几遍，整整一晚，我从惊愕到愤怒到绝望。

如果她是社会上那些无知无识的“爱国贼”和当局豢养的“五毛党”，我也罢了，但，她是我的学生！

我感到沉甸甸的失败，呕心沥血讲了这么久，教出来的学生（哪怕可能是个别），仍然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我把这段评论，发给其他一些学生，其中一位已经在读研的学生回复：“前几天我们有节英语课，也讨论了这个事情。几乎所有同学，包括老师，都持以上观点。有一位同学是广东人，他很明显地表达了对香港学生行为的不满，说那就是被人操纵的傀儡。”

我们能读懂香港学生举起的这句话吗?

我再从网络上了解到，内地不少人都对香港学生和市民的行动持否定态度，有谴责、有批评、有嘲讽、有挖苦、甚至有谩骂。

十多天前，我看到海外一篇文章，大意是，香港争民主自由的壮烈，将引发大陆民众的支持，唤起大陆民众的抗争，从而推动中国终结一党专政……。

写文章的人身居海外，可能离这块大陆久了、远了，沾染了“西方人的天真”或“纯静天空下的单纯”（正如让“中共经济发展了就会实行民主”一样），太高估了内地民众的觉悟，低估了共党洗脑的功效，尤其是暴力打压不同声音的霹雳手段。

在几十年“谎言加暴力加利益诱惑”三者交替打磨下，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整个民族拖向了“动物化”。“动物化”后的众生，对超越吃喝玩乐外的另一种追求、对除却“强拆”、“涨工资”之外的抗争，似乎天然地难以理解。我永远记得25年前的一幕：重庆市沙坪坝，争民主的学生筑起了路障，影响了一群工人上班。我听见他们骂咧咧地说：“这些学生吃饱了饭，不好好读书，成天折腾什么？！”

那时，中国还没有几个下岗工人，他们还捧着一个个“铁饭碗”，饭，吃得香。

在屠城后“稳定”起来的当局，把“动物化”作为“稳定”的基本国策。大学生们

首当其冲，被重点“物化”。一年年打磨下来，争民主争自由的人的理想，消解于争文凭争工作的物的渴求。25年过去了，当年学子们的身影早已消失，小小的校园，与大大的社会基本同构，气味相同。

另一方面，强化洗脑。在“六•四”血腥屠城、共党意识形态破产的情况下，当局华丽转身，成功地把那块专制独裁的臭肉，包裹在“爱国主义”的华美旗袍和“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民族大义”下，让“六•四”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在“爱国主义”的麻醉和刺激中，不知不觉地认同了那块臭肉并自觉自愿地抵制西方普世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党妈妈”把“爱国”同“爱党”搅成一锅“红色浆糊”，细雨润物加强制搭配地灌给千千万万中国学生。）

我曾经在香港中文大学作过访问学者，也走访过香港的一些大学，目睹过那里的大学生是如何在学习和思考，也看到他们在学习外的关注（如中大学生参加各种讲座，香港城市大学的“六•四”纪念馆等）。当然我更了解中国现在的这些大学生，知道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他们的认知水平。

我不敢去想香港学生和民众看到大量如我学生这样的谩骂后的心情，他们会有怎样的绝望！这些年来，内地种种争民主、抗暴政的斗争，都得到香港市民的声援，从惊天动地的“六•四”运动到无声无息的个体民运人士，香港从道义声援到实际救助，从来都没有缺席。现在，香港需要大陆民众的支持和声援了，可我们竟然是如此这般的回报！

整个晚上，我陷入一种不可救药的绝望中，心中又是海子那悲绝的诗句：“黑暗，从地底升起，遮住了明亮的天空。”

补记一：

“紧急通知”不准教师发表任何观点，但当局可以铺天盖地发表观点，老师学生只能重复当局的观点。

这个观点是一个公式：街头抗议非法——影响市民生活——造成经济损失（也许还有人员伤亡）——幕后黑手（西方势力）操纵——学生受人利用——企图颠覆现政权——分裂祖国可耻——阴谋绝不会得逞。

这个“公式”漏洞百出，不经一驳。可是，在只准州官放火的中国，这个“公式”威烈浩荡，把人们一个个洗成脑残。

学生们也许不知道，在中国，造成最大经济损失的，不是反独裁争民主的抗争，而是反民主搞独裁的一党专政（如大跃进、文革）；

学生们也许不知道，造成中国（大陆）人死亡人数之最的，不是军阀、民国、抗战时期，而是1949年之后的“和平统一”时期；

学生们也许不知道，学生受人利用最惨烈的，就是当年几千万“毛主席的红卫兵”和眼下与中共遥相呼应的“爱国者”；

学生们也许不知道，对中华民族造成最大伤害（包括抢去土地）的“幕后黑手”，就是当年支持中共分裂国家和推翻民国的前苏联；

……

可是，我教过三年的学生总该知道一点吧？难道，州官真的这么利害，我真的如此

失败。

气恼中，我翻身而起，在深秋夜半的寒凉里，给这位学生传去这么几句话：“你能有一点自己的独立思考吗？这个大学你是白读了！ 一个人可怕的不是脑残，而是她把脑残当作‘脑白金’。”

补记二：

在写下这篇文字后不久，我教的另一位学生（他即将赴泰国“孔子学院”任教）在交作业时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香港目前占中活动，已经渐渐变味，我通过互联网，了解到香港那边的情况，和历史同样惊人的相似，同样作为学生，其实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就不能明白，再烂的统一也比最好的分裂强呢？英国人是他父亲吗？是他的祖国吗？他有一张白种人的皮吗？为什么宁愿做西方人的黄种猪,也不愿意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明明知道占领街道，扰乱公共秩序已经是违法，但却口口声声说抱歉，我们是代表香港人民。香港人民就能被他们“代表”了吗？这就是西方的民主精神吗？他们就能够袭击警察焚烧国旗了吗？……

明显的这件事情背后，有国外势力的参与，一个统一处于和平稳定的中国不是他们希望看到的，他们希望中国实行生搬硬套的民主，发生内乱，哪次中国发生民族灾难是统一稳定的时候呢？

这段文字我也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我都赞叹中共洗脑教育的坚韧、顽强与伟大，在“文革”过去了几十年之后，在国门已大开、资讯已多元、世道已巨变的情况下，这种教育仍然能培养出新一代“毛主席的红卫兵”。

补记三：

本期我在讲《中国区域文化》课时，专门用了五节课的时间讲了沙俄和前苏联从中国强占去的土地。我从1689年的《尼布初条约》一直讲到1945年的《雅尔塔协议》，同时我还专门讲了中共和江泽民的卖国。讲完后我用大黑字体在屏幕上打出：

“真正的爱国需要勇气，要将国家的真实历史和现状说出来。

虚假的爱国则不需要勇气，只需要廉价又无风险的表演就行了。”

怎样为你祈祷?

“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

“鲜活的生命无声消失在历史的记忆里，好像指纹被罪犯巧妙地抹去。”

——刘瑜，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作家

一位学生发来一条短信：“今天有位给我们上课的老师说，刘晓波、李洪志、热比娅都不是好人。他说，刘晓波颠覆国家政权，干预‘六•四’，不该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还说，一些不好的历史就应该忘记，记住有什么用？我听后很生气，决定不再上他的课了。谭老师，现在能听的课就只有你和杨济余老师的，其他的都是病毒。”

这条信息让我想到如今站在讲台上的“主力军”——人数众多的年轻教师。

这一群体大多是“8964”后成长起来的，他们一方面饱受“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美国霸权”、“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洗脑教育，一方面遭遇高考应试的严酷“缠足”。从小学、中学、大学、研究生，他们的全部精力都被逼到考试、考级、考研这条独木桥上，没有人文教育的培育滋润，到处是“爱党”、“反美”之类的“狼奶”灌养。学子们一方面被应试“缠足”整成“小脚”，一方面被共党“狼奶”洗成脑残。当大量的这般“小脚”加“脑残”走上讲台时，他们除了那一点专业知识外还能传播什么？

我常常看到一些年轻老师，在讲台上机械死板地照本宣科；学生们在下面不是昏昏欲睡就是把玩手机。

这种老师仅照本宣科也就罢了，怕的是他（她）还要发表“政治见解”。已经被教科书的谎言、入团入党的培训等洗成脑残的老师们，能有什么独立的思考？（比如我校的一位年轻老师仍在课堂上大讲“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鬼子和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

当然，讲台上也有一些冲破藩篱、见解深刻的年轻老师——出类拔萃者如袁腾飞，默默无闻者如张XX（我校的一位年轻教师）。可是，这类“叛经离道”的觉悟者，不是被打压赶下讲台，就是被训诫销声屏息。

此外，放眼看去，在红二代习近平“世袭”后的这几年，针对高校自由思想的打压一波接一波，从教育部长袁贵仁的一个个“不准”，到各高校领导们的一个个“支持”，大学校园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时代已经来临。

若无石破天惊的沧海巨变，若无挽狂澜于既倒的伟岸手笔，待把如贺卫方、陈丹青这样的“散兵游勇”消灭后；待把如袁腾飞、张XX这样的青年才俊“割喉”后，待像杨教授和我这样的老教师或因打压，或因年龄而离职后，中国千千万万的讲台上会不会只见“脑残”林立，“病毒”泛滥……

中国的学生，中国的未来，怎样为你祈祷？

补记：

2019年3月，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副教授在课堂上表示了对“伟大领袖”习近平个别句子的批评，被学生告密，唐云因此落马，被赶下他站了33年的讲台。杨济余教授路见不平，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一篇宣言：《我言说，故我在——教师独立宣言》。

杨教授在宣言中说：每当我想起80岁的托尔斯泰伯爵那振聋发聩的檄文《我不能沉默》的名言：“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不能……不能这样生活。至少是我个人不能这样生活。”我就只能冒着自砸饭碗的风险发声。难道权势者只想要知识分子因害怕枪声而集体失声？

唐云副教授，胆敢在课堂上评说习近平总书记的名言”撸起袖子加油干“，被赶下讲台，工资减半。

杨教授很清楚，在来势汹汹的对知识分子打压中，他公开发表这种独立宣言会有什么结果。他还清楚，他非常需要这份工作和这份工资（他妻子没工作，女儿还需要他抚养）。

但是，杨教授说，面对来自对思想的逼迫，他不能沉默。

宣言公布后，杨教授先是被学校和“有关部门”警告威胁，接着被赶出了学校——一个评师网上和评教榜上排名第一的最优秀的教授终于被清除了！

杨教授为他的良知付出了代价。

这还没完，被赶出学校的杨教授从此被中共当局彻底封杀，不准任何学校再聘用他！

这时，我早已被逐出，流亡他乡。

中共终于放心了，学校再也没有像我和杨教授那样的叛离分子，学生们可以不受干扰地接受党的洗脑了。

杨济余教授（右一），胆敢为唐云教授鸣不平，被逐出学校。
（2015年我与杨教授和他的学生合影与校园）

对牛弹琴

我的一位好朋友，是邻校一个理工科的系主任。一天，他对我说，他们系又来了一位研究生，感到缺乏灵气，知识面狭窄，上课效果也不好。他说，我是学文的，能言善辩，又教书多年，实践经验丰富，他请吃饭，饭桌上让我“引导引导”她。

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喜欢听恭维话，加上我也有“好为人师”的毛病，因此便一口答应下来。

一个周五傍晚，我们三人在一家“万州烤鱼”的雅间坐定。朋友热辣辣地把我作了一番介绍，以期引起“研究生”的兴趣和注意。“研究生”木然地看了我几眼，算是打了招呼。这些年，我采访了不少人，又教了许多学生，自觉拥有了几分“看相”的本领，“研究生”的木然目光和一脸的苍白是我已经熟悉的类型。

但是，在朋友的热情下，我还是侃侃而谈，什么“教书是一门综合艺术，在专业知识之外还要补充大量的其他知识呀”，什么“学校的读书生涯只是一个初级阶段，真正的学习和人生是毕业后走上社会呀”等等。

“研究生”神色要死不活，目光游移不定，从头到尾没有一次提问。待那条又肥又大香气扑鼻的“万州烤鱼”隆重上桌后，她的目光基本上就锁定在美味佳肴上了。

看着“研究生”更关注那条死鱼，我还奢谈什么“灵性”？既然她受的教育让她认定除了她的专业外其它知识都可有可无，那她何必还要花时间费功夫去听“废话”？

夜幕中，“研究生”酒足饭饱地走了。

我转身对显然很失望的朋友说：“她的悲剧不是她知识狭窄、没有灵气、上课效果不好，而是她的‘求新’意识和‘吸收’功能都丧失了。”

我们的教育，能培养出这样的研究生，真是绝活！

在中国的所有问题中，教育问题最为严峻。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像力的极端功利主义，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

“缺乏认同”

——读“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

正在郁闷本期教室里摄像机开通了录音功能，导致教师不敢“言论自由”之时，又读到了辽宁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

该文说，辽报记者深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沈阳5座城市的20多所高校，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整理近13万字的听课笔记，概括出大学课堂上的三类问题：

第一是缺乏理论认同。有的老师用戏谑的方式讲思想理论课，揭秘所谓马克思恩格斯的“隐私”；将毛泽东与古代帝王进行不恰当比较，解构历史，肆意评价；对党的创新理论不屑一顾，动辄把实践中的具体问题归结为理论的失败。

第二是缺乏政治认同。有的老师传递肤浅的“留学感”，追捧西方“三权分立”，认为中国应该走西方道路；公开质疑中央出台的重大政策，甚至唱反调；片面夸大贪污

腐败、社会公平、社会管理等问题，把发展中的问题视为政治基因缺陷。

第三是缺乏情感认同。有的老师把自己生活中的不如意变成课堂上的牢骚，让学生做无聊的“仲裁”；把“我就是不入党”视为个性，显示自己“有骨气”；把社会上的顺口溜和网络上的灰色段子当做论据，吓唬学生“社会险恶”，劝导学生“厚黑保身”。

该文说：“大学课堂上的中国随意被抹黑，一些老师在讲台上牢骚失控，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该文还对老师在大学课堂上如何讲中国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是在编写案例时，别把中国当做靶子，随便拍打，随意责骂。二是在发表看法的时候，请注意语气和分寸。三是在比较中外的时候，别借别人的尺子来规划、用西方的刻度来丈量，那是行不通的。

该文最后呼吁：“（老师们）能够对学生负责，能够对事业负责，能够对国家负责。那么从今天起，在课堂上讲好我们的中国吧！”

我以很大的耐心把此文读了几遍。（说“耐心”是我不得不克服心理和生理的强烈反应。）

又一场整肃中国知识分子运动要拉开序幕了？！

从两年前规范高校教师的“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不讲新闻自由、不讲公民社会、不讲公民权利、不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讲司法独立。）到眼下辽宁日报的奇文，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汹汹杀气——剿杀中国高校里最后一点言论自由！

只准你们疯唱红歌，不准我们言说真相；
只准你们编造“光明”，不准我们揭露黑暗；
只准你们篡改历史，不准我们还原事实；
只准你们奴化洗脑，不准我们正本清源；
只准你们引进马列祸害中华，不准我们讲普世价值启蒙学生；
……

我一时冲动，想拿起笔作刀枪，写一篇“革命大批判”的大字报，批驳辽宁日报那一群党的工具。

如：缺乏理论认同、缺乏政治认同、缺乏情感认同不是缺乏对中国的认同；缺乏对共党和毛的认同更不是缺乏对中国的认同。也许，正是出于对中国的认同，我们才不认同马列的理论、共党的政治、暴君的独裁。这种把共党和中国强行捆为一体的卑鄙手法还要运行多久？

“别借别人的尺子来规划、用西方的刻度来丈量，那是行不通的。”辽宁日报就这句话说得正确。只是，那就要先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驱逐出中华大地，那就要先把强行背读的高校马列课程这类“别人的尺子”和“西方的刻度”驱逐出高校校园；那就先要把“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我们的选择”的话语从党的课本上删除，把“走这个路”所带来的种种恶果清除。

又如，该文说：“教育是民族最伟大的生活原则，是一切社会里把恶的数量减少，

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一个社会是恶多善少还是善多恶少，“唯一”取决于教育？我没懂党报的这种说法。如果按此说法，现在社会上大量的贪污腐败、司法不公、暴力执法等等恶行都是因为中国教育出了问题？如果按此说法，政治改革、司法独立等等都不必要了，只要教育这个“唯一手段”？

文章说：“站在讲台上是一个心态光明的老师，教出的就是一群积极光明的学生。社会上都是光明的建设者，这个国家必定有光明的未来。”按这个逻辑，中国是否有光明的未来，取决于讲台上教师是否有光明的心态？

我从小就是饱受“光明”教育长大的。“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最幸福。”“劳动人民从此翻身得解放，成为了国家的主人。”……于是，我们国家有了光明的未来？

……

我很想说：中国高校经过你们几十年的残酷打压和奴化改造，已经是一付惨不忍睹的太监相，你们还要把最后一点“我就是不入党”的“阳根”割掉？

可惜，我这些年已经被他们打压得成太监样了，我没有写“革命大批判”，而是躲在一角，在心底悄悄大喊一声：“驱逐马列，恢复中华！”阿Q般地出一口闷气。

补记：

文章用“亲爱的老师们，我们是满怀敬畏地在写这封信。”作为开头，又用“为了社会健康地前行，为了中国光彩的明天，拜托老师们，谢谢老师们！”作为结尾。

我读到党报的这种“拜托”，比我读到黑社会的杀气更为不适。

为何？

该文曾说，今年10月，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提高高校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素质。这样，我们便明白辽宁日报为何要在10月21日闻风而动，为何要派出记者当间谍，卧底校园，潜入教室，收集13万字“罪证”，写出这么一篇呼应“七不讲”的红卫兵奇文。

在这种背景下，读到“满怀”、“拜托”、“谢谢”，无论怎么看，都觉得如同目睹一群为虎作伥的黄鼠狼，冲着鸡舍“满怀”地笑……。

纯属想象，对否不知

大学的扩招，社会的功利，物质的渴望，就业的压力……这仿佛是挤掉人文教育、摒弃灵魂关怀的“正当”理由。当工作都难找（或找个好工作过好日子成了第一或唯一的追求时），还去求什么“虚幻的”人文情怀、精神升华？

如此，家长、学生、老师、学校、社会，上上下下，怎么不功利？

可是，这种“动物化的功利教育”（还没算上从幼儿园就开始的洗脑谎言）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也早已彰显，如：被分数作业和考试竞争夺去了欢笑的童年少年；被高考撕杀和考证拼搏摧残了灵性的青春生命；被“一心盯着地上”和“人才加工厂”窒息了的

创造灵性等等。

这种恶果早已彰显（“中国社会的‘恶之花’”）并被责骂已久的教育体制为什么不仅得不到丝毫改正反而越演越烈？

我想，是不是有一种“功利”之外的深层原因。

我不妨把自己想象成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执政党，我不妨把自己看作一心要保“红色江山万年长”的领导核心，我不妨把自己摆在这个集人类独裁专制之大成的中共的位置上——

如果我是他，我最希望什么？

我希望学生们一个个只埋头啃我提供的那几本教科书，此外什么都不要去想；
我希望学生们一个个只盯着我划定的那几张考试卷子，此外什么都不要去学；
我希望学生们一个个只关注自己的分数工作房子票子，此外什么都不要去争；
我希望教师们一个个都捧着我的洗脑教材照本宣科，此外什么都不要去讲；
我希望教师们一个个都为生存为安危自觉规范言行，此外什么都不要去说；
我希望教师们一个个都是应用机器也为我培养机器，此外什么都不要去教；
我希望家长们一个个都在爱的情怀下帮我规范子女，此外什么都不要去管；
我希望家长们一个个都相互竞争也逼后代相互竞争，此外什么都不要去干；
我希望家长们一个个都全力配合我的设计造就奴才，此外什么都不要去做；
……

对了，还有！

我希望高校们全部都行政化官场化，成为我的一个职能部门、洗脑机器和为我培养“人才工具”的加工厂，此外什么都不是。

照这样培养下来，学生们除了与生存“性命攸关”的“专业知识”，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我的历史罪恶；不知道我的现实黑暗；不知道普世价值，不知道人性良知。他们没有人文精神、没有人权意识、没有独立思考、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宗教信仰……。他们不会去追求，不会去分辨，甚至丧失了这种追求的兴致和分辨的能力。如此，便不会有什么民主宪政诉求、不会去为民主自由的选举而“占中”、不会去争什么“真普选”。 相反，长期的封闭洗脑教育，他们一个个都被培养成了我的“同盟军”，我振臂一呼，他们应声雷动：抗议“占中”分裂祖国、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灭了小日本……。

哇，现行的教育体制，你真是我安邦治国的重要韬略，是保我一党独裁的锦囊良策！

虽然，代价是牺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子的青春和人生、窒息了弥足珍贵的人性灵动、扼杀了整个民族的创造能力，但是，只要能保我“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我的想象到此为止。

纯属想象，对否不知。

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聪明”的学生

一

一位大四的学生挂科了，心急火燎打来电话，急切地解释她缺课的原因：在一个公司做了一份兼职，而她今后很可能会进入这家公司工作，现在工作不好找，希望我能理解，网开一面。同时，她还十分热切地表示，她其实非常喜欢我的课，对我也非常敬仰，等等。

对学生我一向是刀子嘴，豆腐心，从没有意刁难。于是我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应当如何去复习。她马上请求加我的微信，要同我保持联系。

从此，她几乎天天在微信上向我打招呼，热乎乎的语言暖人心肺，还一再表示，回校参加补考时一定要来拜望我，请我吃饭。

补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一天，我得知，这次毕业生的大补考不由我出题和改题。很快，她也听说了，马上问我。我做了肯定的回答，她“哦”了一声。

这一声“哦”，就是她留在我微信上的最后信息。

当然，那顿她一再表示要请我吃的饭也随之消失了。

我也很快把她忘了，既忘记了她的名字，更记不得她的相貌。

只是，这件事我没忘。

二

学校一直没让我给众多的师范生上课，但却因教师不足而让我指导他们的毕业论文。

我不怕上新课，但怕给学生指导论文。因为，被现行教育体制打磨得缺乏灵气的学生很难写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章。不少学生连语法和标点符号都错误连篇，有的人甚至在我指出其语法错误后还改不过来，因为他们看不出错在哪儿。

我指导的这一届师范生问题还不仅是“技术”层面。

我从没教过师范生，指导论文时才第一次与他们打交道。除了句子不通顺、标点符号错误、层次混乱等等老毛病外，他们还给我留下了两个深刻印象。

一天，我同他们约好，下午四点在第三教学楼见面。我准时前往。但是，等了近二十分钟，没有一个学生前来，我大怒离去。晚上得知，他们下午去打印论文，因打印店人多，他们没打印完，因此就没来。我很生气，不来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而且打印店离第三教学楼只需走几分钟，为什么不来说一声?

因为他们觉得失约失信无所谓！因为他们觉得先把他们的事办完更重要！

我在电话上冲着他们一阵臭骂。他们很惊奇，这个老师怎么为这点小事发这么大的

火?

我没有教过他们，他们不知道我的脾气尤其是做人原则。不过，有一点他们清楚：惹老师生气了对他们不利——当时正处在给他们论文评分的关键时刻。

接下来的两天，他们一个个打来电话，情热热意切切地表示歉意，这反而弄得我不好意思了，觉得自己是个缺乏包容、心胸狭隘之人。

两天后，成绩评定，上交学院。

木已成舟，学生们安静了。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恼怒。

学生们交来最后打印装订好的论文，由我统一上交学院。这时，教师一般都不会再细细检查了，可我偏偏又逐一翻看。这一看，发现一位学生把我评语中的“不足之处”全部删了，只剩下优点。

这段时间，那些论文和写论文的学生已经让我没脾气了，我把她找来，很平静地问她：“这是怎么回事?”

我以为她会非常尴尬。没有。她略一迟疑，面不改色地回答：“唉呀，我没注意到，漏掉了。”

我们彼此都清楚是什么原因，但她此时已经不再担心，因为成绩已经评定上交，不能更改了。

后来，得知她很快找到了工作，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我长叹一声：知识技能不足也就算了，道德人品差了如何为人师表?

功夫在课外

我们的大学，包括北大，正在培养一大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道，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我们的教育体制，正在培育“有毒的罂粟花”。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有一位大四学生，常常逃课，由于我很少点名，因此只知道有人缺课，但不知是谁。终于有一次点名，点到一半时，见他满头大汗匆匆从后门溜进教室。课堂上我一向火眼金睛，知道是他的同学发信息叫他紧急前来。

点到他时我特别关注，记住了他的模样。

那次点名他顺利过关，之后，他又一如既往地消失了。

后来，我在课堂上说，你们不了解我（他们大四时才遇到我），我一向不注重考试卷子，而注重平时认真学习，那些三天两头逃课，指望在期末考试（不少通过作弊）一举过关的人，在我的课上将彻底失败。我还举了个例子，我上英语听力课时，一位学生一学期都逃课，但考试他来了，而且考下来卷面成绩88分，我仍然给他判了不及格。有

老师告诉我，他可能不服，会告到教务处。我说，好，如果教务处认为我不对，那就出一个文件，说学生可以一学期不上课，只要考试能通过就行。教务处只要发文，我马上就给他打及格。另外，他如不服，我可以让他单独再考一次，如果他能在不作弊的情况下考及格，我愿意学校扣除我今年全年的奖金。我心里清楚，他这88分是怎么来的，听力试卷大多是“A、B、C、D”的选择判断题，语音考试教室又是很容易作弊的场所，只要有人传给他答案，他一分钟就能勾完达到88分正确的“A、B、C、D”。

有学生把我的这番话转给了那位逃课生，另外，大约有学生（不知是否也有他）终于了解到了我是怎样的一位老师，这一下他慌了。一天，我下课后他专门在过道上“恭候”我，一脸的谦卑满面的恭敬，身子仿佛都不能站直。

“谭老师，实在对不起，前段时间我没来上课。我不是有意的，主要是学校的事太多——”

“学校的事?学校什么事?”

“我可能要留校当辅导员，有大量的事——”

“那么你党员?”我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他想必是已经了解了我的“政治态度”，一下显得更加慌乱，头上几乎冒出热汗，那模样就像当年有人问我是不是“黑五类”家庭出身一样。

“是……是一年多前才……才加入的。”他吞吞吐吐地说。

“我们一周只有两次课，加起才几个小时，怎么就影响你去干事了?”

“老师，他们一叫我就得去，要留校必须要积极表现……。”

望着他那个模样，我感到的不是同情而是厌恶：“那你就去积极表现，我这两门课没有‘政治表现’重要。”

“唉呀老师，很重要呀！如果有两门课不及格，我就不能留校了。我已经挂了一门……那个老师也是……也是……”

“我们总共只有两个月的课，你就逃了一个多月，我怎么给你打成绩?”

“老师——”这位未来的辅导员满脸陪笑，极力讨好，那点头哈腰的样子让我想起电影《小兵张嘎》里那位在“皇军”面前的胖翻译官。

剩下的两周多时间，他好几次在教学楼外“碰巧”遇到我，每次都恭敬有加，并热乎乎地同我说话。以我的人生阅历，可能断定他是属于那种 “社会活动力”很强的人，这种人很适合这个社会，更适合我们的官场。

我很讨厌这种把功夫用在课外的“课外活动”，因此，两门课考下来，一门勉强给了他及格，另一门则判了“死刑”。

课一结束，各自东西，这事很快就不再出现在记忆里。

第二学期末，也就是他们毕业前夕，学校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我突然在会场上看到了他——这表明他已经大功告成了！

他也看到了我，但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

此时，我们已经不再是师生，而是同在这所学校的同事了。

师范生，阿哥有心来相会

一

我所在的学院，学生最多的专业是汉语师范，每届都有十几个班，600-800学生，我所教的课程，有好几门都适合在师范专业上，比如：中国区域文化、民间文学、少数民族风情等。为此，我要求了好几次，甚至保证说，我一定能让学生大有收获，如果学生有不好的反应，我马上退回。可是，学院那位分管教学的副院长就是不答应。

这样，我长期只能教人数不多的几个小班。

终于，有一学期，由于教师变动，师范的课实在排不下去，于是让我顶班。

我总算要给众多师范生上课了。只是，是大四的课，而大四总共只有两个月的课，从9月9日到11月10日，中间还有一个“国庆节”，课是我从未上过的新课——《儿童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

正当我赶紧找资料，准备备课时，电话响了，是管教学的副院长打来的。

“谭老师，你要上师范的课了，有些事要提醒你一下。”

“什么事?”

“你在课堂上说话要注意，不要传播负面的东西?”

“什么是负面的东西?”

“唉呀，你明白的。总之，要给他们积极的、正面的引导。他们毕业后绝大多数都要当老师，政治上不能犯错误。”

“你是说我要误人子弟?”我一下子来了情绪。

“谭老师，我以前从没有对你这样要求过，但师范不同，学生多，更主要的是，他们今后也要当老师，要教学生，必须要与当局的标准和要求保持一致……。”

这位领导说了一大堆，让我觉得，仿佛我若不听她的，就要危害学生。

我没有同她争论，因为这不是她的刁难，我们是社会主义的课堂，“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仍然是办学的宗旨。而且，学校容忍我的叛经离道已经算是网开一面了。副院长也没说错，这的确是领导第一次对我告诫，我一向在课堂上张牙舞爪，他们都从未提醒或者警告我。现在看来，让我面对今后要当教师的近700个学生，领导真的担心了。

可是，你们为什么没有一点自信呢?你们不是按党的要求和标准，给了他们整整三年的“正面教育”吗? 我匹马单枪，能颠覆那众多的马列课、党团教育、“正能量教育”?还有，就算我全部是“负面教育”，也只有两个月呀。是你们太高估了我的能量还是你们对你们那套教育功效太没有自信?

当然，我也明白了学院领导为什么一直不让我给师范生上课的原因，除了他们今后要当教师这个特殊性外，人数众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一向又臭又硬，坚持给学生“负面教育”，学校一时拿我没办法（当然后来有办法了），因此让我教几个小班，从

而把我的“危害性”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二

2016年9月，我终于在重返校园的第八个年头，登上了师范专业的讲台。

两门课我都没有教材，当然也没要学生去买教材。西文现代派文学，博大精深，流派众多，背景复杂，要给学生讲明白既费力也费时，几周时间、每周一次（课）显然是蜻蜓点水。而儿童文学对今后主要当小学教师的师范生来说，是一门重要的课，可学校却把它放在大四的仅仅两个月时间里。这种安排分明是打发学生。

可是，我不愿意打发学生！

我想在他们最后的学习时间里尽量多给他们一些真正有用的东西，同时，也尽量给他们一些启蒙。

首先就是不准逃课和上课时必须认真听讲。

大四的学生通常都比较懒散和“无所谓”，也就是我们说的比较“油”。还有，此时他们的心思往往已经不在学习上，而在想着联系实习，考研，甚至开始寻找工作了。学校也清楚这种状况，因此也“无所谓”，这两个月的课都是容易通过的考查课。

据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的三把火是：一，不准缺课；二，不准迟到；三，不准上课玩手机。

从学生们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没把我的话当回事。尤其是第三条，真要如此简直是要他们的命，大学几年，不玩手机（包括上课时），青春都索然无味了。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学生，有一些课程，如马列、时事政治等，学生不玩手机怎么熬?还有，我们有不少教师，讲课言之无物，表达枯燥乏味，手机，便成了学生渡过这“艰难岁月”的“良师益友”。这种习惯，到了大四，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扭转了。

我不管，令出必行，只要发现有抗旨行为，我便拍桌瞪眼，气壮如牛。

对了，我多年坚持游泳，身体强壮，个子虽不高，肺活量却很大，尤其是激愤起来，声震屋顶。师范的学生从来没有遇到如此缺乏素养的老师，震惊之余，群情激愤。

事后我才得知，十二个班的学生，同仇敌忾，虽然课堂上敢怒不敢言，但课外却是骂声一片。而且，他们毫无顾忌地把他们的愤怒宣泄到网上的班级群里。

学院领导自然注意到了这汹汹的民情，但很奇怪，他们没有找我谈话。

是因为知道我是严格管理不好多说，还是清楚我是野牛脾气不便多惹?

或者，哼，你不是很牛吗？瞧你被骂得——

三

西方现代派文学所反映的社会背景、精神危机、人性异化等与中国眼下的社会状况和精神状态有很多可对接的地方，比如信仰丧失、物欲弥漫、焦虑浮躁、冷漠麻木等等。我在讲课时，把课文内容同我们的社会现实以及学生们的认知、感受结合起来。比如在讲象征主义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鸟》时，在介绍了梅特林克列出的几种幸福观后，

我便问学生我们社会（包括学生们）现在普遍认同并奉行（或者说流行）的是哪种幸福观；我们如何来认识梅特林克提出的“如果科学的探求不是源自对真理本身的热爱，而是为了满足人膨胀的物欲，那人类社会只能离幸福越来越远。”；为什么说“幸福只能向内寻求，只有在领悟了内心的法则之后才能发现生活中的幸福。”等等。

又如在讲奥尼尔《毛猿》时，我从分析现代人在工业文明中丧失自我的悲剧，引申到当下我们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下精神和道德的危机。在讲卡夫卡的《变形记》时，我从现代社会“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以及人的孤独感，谈到中国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得与失。在讲叶芝的名著《驶向拜占庭》时，我说，诗人明确地表示瞧不起那些享乐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不懂得生命的真谛而一味沉湎于感官世界的享乐，忽视了永不衰老的精神产品，不懂得永恒智慧的价值。现在我们的年轻人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同时，在讲解一些作品时，我作了一些补充。比如讲《驶向拜占庭》时，我先从英国诗人史蒂文生的《安魂曲》《REQUIEM》和丁尼生的《渡过沙洲》（CROSSING THE BAR）讲起，让学生感受和欣赏一下西方世界（也是基督教世界）对生与死的心态。讲完课文后，我又对学生朗诵普希金的诗《纪念碑》，让他们进一步体会生命的死亡与对永恒的追求。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
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
我将永远光荣不朽，直到还只有
一个诗人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在讲解这些大师们的诗歌、小说、戏剧、绘画时，我柔风细雨，和蔼可亲，与“严加管理”时的张飞形象判若两人。学生很惊奇我这种两面性。其实这很好理解，比如在讲解叶芝《当你老了》（WHEN YOU ARE OLD）一诗时，你的心怎能不柔软?

讲儿童文学时，除了那些“儿歌”、“寓言”、“童话”等等之外，我着重强调讲了要培养儿童的爱心，包括对自然的敬重和热爱、对动物的关切和爱。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在三峡采访时，看到一个小学生用细铁丝栓在一只鸟的腿上，抡起来当空飞旋。鸟儿腿被勒断，凄声哀鸣。我阻止他，他不以为然，在鸟儿的惨叫声中玩得十分开心。我对学生们说，从这个小学生身上，我想到他的老师，他们虽然给了他大量的爱党爱国教育，但是，一定没有给他热爱自然，关爱生命的教育。对动物生存权的尊重，是对人权尊重的延申，一个可以残忍虐待动物的人，也往往可能残忍地对待他的同胞。你们今

后要当老师，请你们不要仅仅把它当作一个谋生的职业，你们将面对无数成长的心灵，要给他们爱，并教他们去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神圣的使命。希望你们记住我的话，拜托了。

（课后我给他们推荐了我放在网上的一篇文章《Lili》，那是我写的纪念我死去的猫的。有的同学读后泪流满面。）

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还见缝插针地给他们补充一些我觉得很有益的东西，比如讲泰坦尼克号沉船时的短片《责任比其它更重要》；讲一位中国留学生在欧洲逃票的真实故事《聪明与道德》。前者我着重给他们讲人生需要一种崇高的责任感，一种让生命升华的神圣；后者我分析偷奸耍滑、不讲诚信的可耻与危害。

四

两个月的时间转眼即逝。

考试结束后，同学们纷纷围着我合影，一个个依依不舍。每个班都热切地请我一定要参加他们的毕业合影，一些班还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毕业聚餐。

从骂声一片到依依不舍，如此转换在短短两个月里是如何完成的呢?

是学生们理解了我的良苦用心——急切地渴望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要努力的方向、做人的原则，以及在最后的时间里能学到一些知识。

结束时，我叫学生写一篇听课的感想，唯一的要求是说真话，不要怕得罪我。

从学生们交上来的文字中，当然有表示不满的，特别是对我“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的不满。比如有同学写道：

有时候您的思想太过极端了：听了您的课，不光是我一个人，几乎所有学生都认为您反共反社会主义……。在现在的时代背景下，没有哪个政党可以做得比共产党更好了，只要共产党上梁是正的，那它就不会消亡，人民就不会起来闹革命，那它就有存在的价值……。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了，种族歧视也没有被消除掉呀。请多给我们这个国家一点时间，多给一点宽容，以后，真的会越来越好的。您还说，社会主义建立后整死了千千万万的人，那资本主义建立的时候，贩卖黑奴，在亚非拉建立殖民地的时候，杀的人就不多吗？西方那么多次经济危机，饿死的穷苦百姓就不多吗?

我觉得，共产党现在做得还行，即使有不太好的地方也是可以改正的，换一个党派来治理中国也不一定会比共产党做的更好。而如果换党的话中国又会陷入动乱之中，那又是一个悲剧了，还不如监督共产党做得更好。

（很天真!谁去监督?如何监督?）

纵观历史，哪一个王朝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控制手段呢？与国外相比，今天的人们还是比较幸福的，这是中国现在最好的一点了。

从您的授课来说，在知识层面肯定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在三观上，尤其是在对中国本身的态度上，我是不认同的。每次听到你对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贬低，我的心里还是挺反感的。比如你说国外没有狗肉节，可他们也吃（狗）的，而且他们过火鸡节，巴黎也有小偷…… 。

我是这样回复的：

你从小学（甚至幼儿园）起，受中共的洗脑教育十多年了，我只有短短的两个月，我无法让你和你们明白。好在你们的人生路还很长，你可保留你的文字，今后当你的认识水平提高后再看。

我一再强调要多读书（不是读教科书），如果没有对中西方的文明和历史有全面的了解，你是不可能有真正全面的认识的。

但绝大部分是赞美之词，而我感到那是出自他们的真心。简单梳理一下，有这么几点：

排在第一的就是他们最初非常反感我，但到结束时却感到非常遗憾——如果在大一时就遇到我，他们现在就完全不同了。

比如有学生写道：

起初，我是不喜欢谭老师您的，你总是打击我们，说我们毫无灵气，为了考研而死读书，还说我们拒绝智慧之光的照耀……（注：我如果是在美国当老师，说这些话我会立马被学生和家长投诉并被校方开除！）

可是，有一次您看到我们低头玩手机时，愤怒地一拍桌子，让我震惊了。我在您脸上和眼中，看到了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焦急和怒气，这让我内心受到很大的震撼。接下来，您的课堂让我内心受到更大的震撼，因为每次都给我们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每次都深感到自己的无知。我不禁问自己，这几年到底干什么去了？有多少日子是呆在寝室里看韩剧、电视剧来打发时间?这时我才真真觉得您说我们苍白是有道理的（只不过这些话从来无老师敢这样说）。我们确实很苍白，就像叶芝《驶向拜占庭》所说，我们就是那沉湎于物质世界享乐的年轻人。

如果要谈最大感受，那一定是“在你们苍白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灵气”这句话点醒了我。您的这句话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不断地提醒着我反省我的大学四年时光是如何度过的。

我们所有的遗憾都归因于“相见恨晚”，为什么没有在大一、大二、大三时安排您的课?为什么在临近毕业才遇见您这样耿直的老师？为什么最后才从您那里得到我所想要的精神食粮？为什么会这么想要重回大学时光？如果能在大一的时候遇见您，我相信我会产生巨大的改变，我肯定会改掉身上许多的陋习，我相信也会培养起坚韧的意志力……。

学生们感受很深的第二点就是在讲课时传授的一些做人的道理。

比如有学生写道：

谭老师让我们明白了，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是责任心和爱心，这也是人一生中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还要学会保护学生的好奇心等等。谭老师不仅仅是把知识传授给我们，而且还从思想上启发我们，让我们重新树立了价值观。所以，我下定决心，如果我以后成为一名教师，一定要培养拥有创造性思维、独立的思考、标新立异的观点的学生。

以前我家里养了一条狗，名叫“白虎”，我和弟弟常常恶作剧，在寒冷的冬天把白虎引到坝子底下的烂水沟里，让它变成“花虎”。白虎也因此生过病。后来我上学住校，不常回家，但每次回家它都会朝我拼命地摇尾巴。可是我讨厌它飞舞的毛发，不让它跟我呆在同一间屋。白虎趴在家门口，眼角像是有眼泪……。约一年后，回家听说白虎被人打死了，我也没有追问。

谭老师教育我们要有爱心，我从小到大听这个名词，耳朵都听出茧了。可是谭老师不同，他是我上学以来第一位让我感受到十分真实的老师，他的一次次发怒、一次次训导，都在我内心烙下了深深浅浅的印迹。他让我回想起白虎，感到特别的内疚……。现在，我真正的深深反省，也开始在有意识地改变一些坏习惯。我感觉蛮好的，像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得到了灵魂的救赎一样。

我是重庆本地人，可我对抗战时发生在重庆的那段悲壮历史一无所知。看了视频之后，我感到很气愤，为什么要刻意回避那段历史？我买了谭老师的那本《血火与堡垒》，感觉非常震撼，越看我越觉得遗忘历史是可怕的，但掩盖历史更可怕。……今后，我会对外地人讲重庆那段历史，传承抗战时重庆的精神品质。

讲台上的我

特别喜欢您说的这句话“在要求别人多么优秀时，为什么不先要求自己呢？”“你们都想找一个优秀的丈夫（或妻子），也希望今后自己的子女优秀，但为什么你们不先把自己变得优秀?”……我觉得，短短两个月谭老师教给我们的足以影响我的一生了。

后来我明白了，你苦心孤诣的为我们讲解各种事情的真相，就是要重塑我们的思想，要我们找回最真实的自己，唤起我们人性中最基本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不让我们活在欺骗和谎言之中，并对我们寄予深深的希望。每次上谭老师的课我都感觉自己在进行一场思想的洗礼，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

我发现相对于教给我们知识，您更在意教我们如何做人——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中国人。您迫切希望在这短短的两个月里把很多很多的东西交给我们，您的凛然正气感染着我，我将来就想成为您这样的老师，一个能从思想上灵魂上教育学生的老师，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自己的学生。

大学四年，我和其他男生一样，也没少逃课。但是您的课，我没逃，因为我不想缺失一次提升自己的机会。我在“西方现代派文学”试卷中的最后一道题中提到，您比郭德纲厉害，因为在我这些年的求学生涯中，您是第一个把课讲得如此美妙，如此有感染力……。您让我在《青鸟》中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在《驶向拜占庭》中明白了不要去挥霍青春，以及现代年轻人缺乏的是什么……。

《泰坦尼克号》那个短片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体会到人格魅力的强大震撼，看得我喉咙发痛热泪盈眶却又不敢哭出来。那么多的人，在面对灾难时所做的决定，体现了一个民族高尚的道德品质。记得其中一句话“为保卫自己的人格而战，这是伟大男人的唯一选择。”看到这句话时内心百转千回，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悟：是呀，我们终将归于尘土，但有些东西它是可以永恒的。

眼下对别人要求严格的人很多，对自己要求这么严格的人却特别少，但老师您做到了。比如，那么寒冷的冬天，您能跳进江里游泳锻炼，而且坚持这么多年，那种顽强的意志确确实实感染到很多人。我想，我在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会像老师那样坚持锻炼身体，保持“精气神”。

你在课堂上讲到，道德常常可以弥补智慧的缺陷，智慧却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最后一节课时，您还赠给我们的三个不要放弃：读书、锻炼、责任心。……如若我们不曾相遇，我便是一个求职路上风尘仆仆的普通毕业生，然而，现在的我，似乎心里终于有一颗种子种下，知道我究竟需要什么，应该追寻什么。

第三点是绝大多数同学明白了我为什么这么严厉的良苦用心。

从大一以来，你应该是最为严厉的一个老师，但是越到后面越发现，你是在教我们如何做人，老师给我们灌输了很多思想：诚信的重要性、要有爱心、养成读书和锻炼身体的良好习惯等等……。越到后面几节课，越能感觉到你的良苦用心和可爱之处。特别是最后一节课，以为是考完试就走了，但老师还抓紧最后一点时间来给我们讲很多道理，心里很感触，很感动。

我曾说，大学四年的青春是非常宝贵的，18（岁）、19、20、21不是81、82、83、84，浪费了这几年最珍贵的青春是一种罪过。但学生最为感动的是我提到一位学生母亲

给我的感受。

在最后一次课上，您说，您看到一位农村妈妈缴完高昂的学费，满脸疲惫地瘫坐在台阶上，您很心酸，因此您发誓，只要您站在讲台上，就要对得起学生的父母。当我听到这里时，特别感动，一直到下课，眼角都是湿润的。我也来自农民家庭，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拉着我的手说，不管家里多困难，读书的钱一定会想办法准备。我深知父母的不易，深知一个贫困家庭多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也深知一位负责的老师是多少家长的渴望……。在最后的那次课上，我更加坚信，我要成为一名教师，要回到我的家乡去，那里有很多农民对自己的孩子含有殷切的期望。我也在这里发誓——我也会像您一样，今后只要我站在讲台上，就要对得起学生的父母！

谭老师提到那位学生的母亲让我非常感动。我明白了作为老师最重要的是要有爱心和责任心，这同样也是为人之道，只有这样的老师才能培养出有爱心和责任心的学生，只有这样的老师才配站在讲台上。我们也终于明白了您的良苦用心，也开始理解了您的爱发脾气和严厉。我知道老师对现在的大学生现状有失望，但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一些学生。我想，您肯定不知道有很多同学也会因为您的这席话，成为我们今后走上三尺讲台后对自我的要求。在此我向您承诺，今后一定做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人，因为您让我知道人生应该怎样才算有意义。

还记得最后下课的那些掌声吗？那是我们现在唯一能送给您的礼物，感谢您，您这个叫谭松的男人。

读了同学们的这类文字，我想起我曾在课堂上当众责骂的一位男同学。

这位同学衣着华丽，头发时尚，一看，大约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富家（或官家）子弟。那天，我在讲台上滔滔不绝讲授，他在座位上频频梳理头发。我瞪了好几眼，他尤自沉醉在他的自恋中。我终于爆发，冲着他吼道：“你认为你长得很帅吗?这儿是课堂，不是美容店！”

我想，他也许会受不了，会当场同我干起来。但他没有，满面尴尬地低下头。

接着我说，什么是一个男人的魅力？不是他服装的华贵、面容的光亮，也不是他的出身他的金钱，而是他精神的高尚与内心的强大，是刚毅、是勇敢、是担当、是进取之志、是悲悯之心！……

由于与这位同学有这么一次“交锋”，因此我记住了他的容貌。我想，他虽然没有当场同我翻脸，但心里一定对我十分记恨。不料，结业后，我在过道上遇见他，他竟满脸笑容，很尊敬地向我点头打招呼。后来，我读到他交上来的文字：

回想我的大学生活，上课总是浑浑噩噩的，我以为我大四上课也会像以前一样，发呆，玩手机。可是，有一次上课，谭老师给大家播放重庆大轰炸，或许我的态度不认真，对待这么庄重的事情却没有一丝尊敬，手不自觉的开始拨弄头发，谭老师狠狠地批评了我，说得我当时很羞愧，但认为不该当众那样批评我吧。下课后，我静下心来思

考，觉得我错了。不过后来又想，虽然谭老师说得对，但他总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吧。我以为我这次是对的，然而我又一次错了。考完试后，他讲到一个疲惫母亲的事情，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他强制我们好好听课?是想让我们对得起父母。我也一下子想到了我的父母，突然发现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可是，现在大学也快结束了。不过，谭老师说的那些话，我都记住了，一个男人要有责任心，上进心，强健的体魄和强健的思想，我希望从此能对得起所有人，谢谢您谭老师，谢谢您骂醒了我。

我想，也许他一生中从来没有人（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对他这样当头棒喝，我的粗鲁可能起到了让他猛醒的作用。

最让人感动的是学生们表达了他们不忍分别的依恋之情：

最后一节课后，我坐在教室没有走，泪水流下来……好想让时间停住在这学期，这样离别就来得慢一点，悲伤也就少一点。但课程已经结束，谭老师也离去了，以后可能再也没人这样直白地说我们了……。

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想这会是我大学四年过得最充实的日子。最舍不得的是，在最后的几堂课，越来越让人感到弥足珍惜，往往还有心愿未了之感，十分不舍。

刚刚上完您的儿童文学课，可以说这是我大学的最后一课，很深刻，很感动，我会一直记得。下课后我坐在座位上，沉默了很久，有些伤感，有些激动，伤感的是为什么我们没在大一的时候被您教，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像您这样的老师，尽管您经常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的问题，甚至有些不留情面。……课上的您很严肃认真，课下您喜欢笑，笑得特单纯，可爱。今天最后都抢着和您合影，我也去了。想着这真的是最后一节课了就好舍不得……。

前几日轮到我们班拍毕业照时，我们的老师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都走了，或许他们有事太忙，但不管怎样，就觉得好心酸、好失落，大学四年，到最后毕业照上却没有老师……。只有谭老师您一个老师还留下来陪我们一起合影，当时，所有的同学都特别感动，特别欣慰。那一刻，我感到更加敬佩，您不仅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还以身作则做得这么好。

还有学生关切地提醒我：

最后说一句，虽然你说的都是对的但还是要注意下哦，毕竟还有摄像头什么的，小心一点总是没错的。

虽然很喜欢谭老师的性格，不做作，敢说敢为，但有时上课真的很为谭老师担心，

谭老师有的时候真的可以低调点。

有学生还写下我在告别时朗诵的诗：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失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这是您在最后一堂课时给我们朗诵的徐志摩的诗，确实很适合那种场景，突然觉得老师您好文艺好浪漫。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老师，让我眼角不禁湿润了，有一种好舍不得的感觉。

考试结束后，同学们纷纷围着我合影

唯一的一次给师范生的教学结束了，时间虽短暂，但我相信我深深影响了他们，他们会把这种影响传递在他们今后的教学中，也会影响很多学生。

我由此想到，教育是多么的重要，培养师范生的教师是多么重要，他们肩上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如果培养了一个合格的师范学生，今后他（她）又会影响多少中小学生！

可是，学院领导为了与当局“保持一致”的“政治正确”，阻断了我走向师范生讲台的路，那两个月的师范生课堂，成了我在学校唯一的经历。

我觉得，这是我在学校这些年最大的遗憾。

补记一：

两年前的此刻，我正在给师范的学生上课，而此时，我在异域他乡的一间平房里，独自品尝被“淘汰”后的落寞与孤寂。

无所事事，打开两年前师范学生给我的留言，读得长吁短叹。

当时，我正忙着做土改纪录片《血红的土地》，没有细读学生们的文字，现在无聊中才细细品读，深深感受到了学生们一颗颗真诚可爱的心。

我没想到在其他老师走后我留下来同他们合影（毕业照）竟让他们这么感动（可想他们多么需要老师的关心和爱）；没想到有学生把内心最深处的痛苦和悲伤向我倾吐；没想到有学生在我最后一次课后竟泪流满面不忍离去；没想到有这么多学生表示遗憾没有早一点遇到我；……

此时，我写下这些文字时，觉得心中充满了爱，对学生的爱。

可是，我永远失去了我热爱的讲台。

补记二：

读了师范学生的留言后，我更加强烈地感到了教育的重要和一个教师责任的重大。

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什么样的教育体制，有什么样的教师，这个国家和民族就有什么样的“人种”和未来。民国时期，在自由民主的校园里，培育了大量德智双全的人才；在“新中国”，党文化的“狼奶”，培育了亿万嗜血而疯狂的“红卫兵”；这些年来，强化洗脑的“爱党爱国”教育，又培育了新一代“脑残”。如果学生是师范专业，那么，他们今后在讲台上又将把这种“狼奶”和“脑残”灌输给千千万万的学生。这几年，我已经发现不少年轻教师具有了这种特性：他们把反美（国）当作爱国；把“与党保持一致”当作“政治正确”；把僵死的“标准答案”作为教学准则。更不幸的是，他们又受到当下社会上“物质至上、金钱第一”的影响，把教师这个神圣职业，简单地等同于谋生手段。甚至有的教师“以教谋私”——为了捞钱，丧尽天良，比如前面提到的有的中、小学教师把知识重点留到课外收费的“辅导班”讲授。

前些年我在采访上世纪五十年代反右运动和土改运动的亲历者时，一直有种深深的紧迫感：岁月每天每月都在“淘汰”那个年代的见证人，如果不抓紧抢救，我们将失去那段历史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年我又感到一种紧迫：如果我们再不改变教育体制，不容忍已经日愈稀少的具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教师，那么，我们将失去未来的“希望的星光”。

当然，我知道，改变教育体制的前提是改变一党独裁的政治体制，“天不变，道亦不变”。

话说到这份上，真有种绝望感。

“一票否决”

“……课堂上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各位老师要把握好分寸……我们不能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如果意识形态方面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开学第一天，学院党支部书记在会上传达上面指示，他面色严峻，语气凝重。

“吃饭，砸锅”论早已听过和读过，但当面被耳提面命严重告诫还是第一次，而在座聆听教诲的大多都是教授，副教授和讲师。

告诫会开完后我直奔嘉陵江，扑通一声投江而去，让三月冷冷的江水洗去身心的热燥。

刚从水里出来就接到一位相好的老教授的电话，说想找我到饭馆喝几杯。

心中正有些块垒，想借酒消解，于是我两在一家“串串香”里把酒对饮。

“学生要监控汇报教师；教师要监控汇报学生，这成什么了？！”该教授几口烧酒下肚，脸色大红粗气扑面。

告诫会后，我想到自己以往一贯没注意“什么话不该说”，有关记录上一向劣迹斑斑，因此打定主意这学期一定听党的话，乌龟缩头。

可惜，烧酒乱性，再加上对饮者煽风点火，我又开始心旌摇荡。我说，我重返讲台

九年了，上了十余门不同的课，每月挣的都是自己“站台、卖身(声音)、吃粉(笔灰)”的血汗钱。这学期就要上五门不同的课，其中两门新课，为此，我常常备课到深夜。我一直认为我是靠自己辛苦劳动挣的饭吃，怎么成了吃共产党的饭呢？

酒喝完了，走出“串串香”分手时，老教授依然郁闷，我依然困惑。

冷冷的夜风，从江边吹来。头脑依然热呼呼的一片乱麻，思索而又不解真乃人生一大痛苦。

几十年前，我在文革时的课堂上饱受学校的教育：“我们每说一句话都要看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看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每走一步都要看是否走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

班主任老师强调，这是成为一个革命接班人的必备条件。

十余岁的我很想成为革命接班人，决心照此办理。可是，我很快发现我智力不足，无法判断这一件事、那一句话是否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比如，我很想去找一个庙里的和尚练武术——为了打架——我因为“出身不好”经常受人欺负；又如我说过：某某燕子好可爱——她是我们班上很漂亮的一个小姑娘。……

几十年过去了，中国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是，我怎么又陷入了十多岁时的困惑？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呢？是我白长了几十岁还是社会又回到了几十年前？眼下我上五门不同的课，一个月六十多节课要说多少话呢？万一不小心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呢？这可不是件小事，领导在告诫会上强调：“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一票否决！”

我理解，这“一票否决”，轻则丢掉吃饭的饭碗，重则要请去吃另一种饭了。（你不是已经吃过一次了吗?）

冷冷的夜风从江边吹来，突然，一道灵光如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闪亮在我愚顽不化的心头。

是啊！我是吃的党的饭呀！我怎么老是想到饭是自己挣的，怎么没想到饭碗是谁给的呢？以前你不是认真读过周小平同志“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的大作吗？“爱国爱党”是一体的呀，没有党你又是什么呢？党可以让你拥有这碗饭，也可以砸掉你的这碗饭。北京大学的焦国标老师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丢掉饭碗，没饭吃了吗？吉林艺术学院的卢雪松老师不是被学生举报没走在党的路线上而被掀下讲台差点去吃“另一种饭”了吗？

……

由此可见，这碗饭的确是党给的。因此，推论下来，我吃的的确是党的饭！

想通了这个道理，我一下子快乐起来，并为自己以前“吃饭，砸锅”的恩将仇报行为深感羞耻。

……

我哼着从小就熟唱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回到家。

老婆看见我久违的笑脸，很是惊讶。我心宽体胖地告诉她：“好了好了，我不再胡思乱想了，今后党叫干啥就干啥！好了好了！”

当天晚上我睡得十分香甜，无忧、无虑、无思、无梦，一觉睡到大天亮。

第二天老婆说：“你昨晚的鼾声好独特啊，像猪圈里熟睡的肥猪。”

注：这篇调侃文章写于2017年初刚开学时，四个多月后，现实的铁锤落下，我终于被“一票否决”了。

鞠躬与合影

一

深秋，大四学生最后一次上课了。11月4号，我向我教的两个班：汉语国际教育和文化传播班的同学告别。

上午，汉教班的同学全部到场。从大二起，我教了他们两年多，共教了五门不同的课。该班出勤率是最高的，两年多来，除了因病因事，几乎从无逃课现象，而且他们听课也很认真。记得在讲佛陀手印时，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模仿，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活泼可爱。我常常回想起那一幕，一种单纯的快乐，细细密密爬上心头。

最后两节课，他们像刚入校的新生一样全神贯注。

“老师，你要告别讲台了吗？”

“老师，我们即将走向社会，你给我们一点建议好吗？”

“老师……”

我一一回答了学生们的最后提问。我感到了他们即将告别和即将开始时的复杂心情：有依依不舍，也有困惑茫然。

我十分理解他们，但我仍直言相告：你们要面对的是一个经济下滑、人心败坏、公平缺失、道德沦丧、乱象丛生的社会；你们既要面对严峻的就业（生存）问题，也要面对善恶是非的做人选择……。

我在黑板上写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的名字，告诉他们，丛教授有一个在2013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标题可以是“当面对选择时，请站在正义一边。”，让他们课后去网上查读。

课间没有休息，彼此都珍惜这最后的课堂时光。

我朗读起我以前写下的文字：

“……风雨年年，渴盼的心灵在冷漠的大地上焦灼地驰骋，从无奈奔向无奈。

……夜静时分，双膝跪地，举臂向天，祈求赐予一次正确的选择——”

我把最后一句话印在屏幕上，说：“让我们一起朗读吧。”

“以尉蓝色海水中最纯美的分子，以黄土地中最珍贵的原素，捏合成华夏民族全新的文明走向！”

朗朗的诵读，像旷野里教堂钟声回响，透彻心灵……

下课铃声响了，这熟悉的、伴他们几年青春时光的铃声，此时，已是告别的最后乐音。

“起立！”不知谁叫了一声。

全班同学应声而起，冲着讲台上的我深深鞠躬……

二

晚上6点50，我一如既往走向第三教学楼。

夜色苍茫，雨意迷离，凉凉的秋风在树丛中回旋低吟。

这是又一次告别之行，心中有种奇怪的感觉，仿佛一步步迈出的，既是向学生告别的步子，也是向我这段人生作别的行走。

一进教室，学生们就说：“老师，我们来合影吧”。她们（全班都是女生）知道这是分别之夜了。

我继续讲上次没讲完的俄罗斯巡回画派：克拉姆斯柯伊、苏里科夫、萨夫拉索夫、希施金、库茵芝……。

我把列维坦留到最后。

“这位只活了40岁的伟大画家最喜欢画秋天。俄罗斯的秋天，在迷人的美景里，隐示着后面的严冬。列维坦在大自然‘年年岁岁花相似’的永恒美丽里，感到‘岁岁年年人不同’的人生喟叹……。因此，他的风景画比库茵芝更深一层内涵，那就是在宁静的美丽中蕴含着强烈的、也有些悲怆的生命感悟……。”

从《弗拉基米尔大道》到《深渊》，从《金色的秋天》到《傍晚的钟声》……最后，我以《墓地的上空》（又名《在永恒的安宁之上》）这幅著名的油画结束。

《在永恒的安宁之上》

学生们敛息屏声，全神贯注，完全没有大四学生的那种“散”。当我讲完后，一位学生一声叹惜：“老师，好想继续听你的课。”

我从那怅然若失的脸上，读到了她们告别大学课堂的复杂心情。

这是一个让我十分感叹的班级。

一年前，我在《民间文学》的课堂上与她们初次相遇，已是大三学生的她们不仅学识苍白，而且反应冷淡。我慷慨激昂，她们微波不兴；我竭力引领，她们面无表情。

我面对的是青春鲜活的学生还是苍老麻木的老人？

一次，讲到半途，望着毫无“灵动”的一潭死水，一向情绪化的我突然说：“我想终止这门课的讲授！我去向院领导反应；你们去向辅导员说明。”

这种冒失举动是我教书20年的第一次，想必也是她们的第一次遭遇。

她们猝不及防，一时惊呆了。

教室一片沉寂。半晌，前排一位女生（后来得知她是班长）用细弱的声音说：“还是把它上完吧。”

从那以后，她们开始有变化了。

看来，面对一潭死水，和风细雨是不起作用的。“太情绪化”这个大缺点居然帮我“拯救”了她们。

（一年后她们才对我说，多年僵死的教与学，已经把她们打造成这个样子了，她们早已习惯死气沉沉的课堂状态，也没有任何老师觉得有何不妥。）

第二学期给她们上《影视文学》时，对这门课一窍不通的我，只得把它变成一门赏析、分析和讨论课。嗨，没想到，这居然启发了她们被压制的灵动性，一个个越来越鲜活，课堂上的互动越来越活跃，以至每次给她们上课竟觉得赏心悦目。

最难忘的是“5•12”七周年时给她们讲地震灾区的情景，最后放周云蓬的《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时，我“情绪化”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下课铃响了，几个同学走到我面前，望着我的泪眼，哭成一片。

（晚上，学生发来短信：“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老师在课堂上流泪，我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

告别的时候到了，不会再给她们讲课了。

全班合影，单独合影……

离情依依，夜色浓浓……

告别了，我教过的学生

过去的，都会是美好的回忆？

寒冷与火热、郁闷与欢畅、失望与渴望、温润与激愤，在心中交替与交织，组成我教书生涯矛盾、混乱而又复杂的心态。下面两段文字，一段写于2014年冬，作为此书初稿的结尾；一段写于2018年夏，作为“局外人”甜美的回忆。

一，天，越来越冷

快到期末，又一门课结课了，这门课（《西方文化概论》）我已经教了三届学生，自觉越讲越自如，并且，我不断加入了与中国的一些对比，让人思考的地方也越来越多。

可惜，学生的提问越来越少。

一学期教下来，全班（除了一个来旁听的学生）没一人来拷我的课件，课间课后也没人提问。

到这所学校后我教的第一届学生是09级，当时，他们不仅课内课外问个不停，而且还“打”上门来，多次同我通宵长谈。

10级的学生上门少了，但每次课后（尤其是新闻系学生）都追着我不放，一个接一个地提问。

11级开始“安静”了；

12 级更“淡定”；

13级有过之无不及；……

课内课外，终于归于一片沉寂。

学生们，仿佛越来越向小学的乖孩子发展，越来越远离大学的活跃与灵气。

这是我这所学校的独特个别呢还是整个教育园地的普遍现象？我没有调查，没有答案。

我只是实实在在感觉到：天，越来越冷。

教室里的监控摄像已经运行近两年了，辽宁日报“党的喉舌”们也登场指导全国大学老师、教授们该如何讲课了，我身边的老师们越来越同当局“保持一致”了；“六•四”之后中共从娃娃抓起的“治国良策”也越来越收到成效了；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召开关于加强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会议了；……

教室内是越来越“听话”的冷寂，课堂外是越来越响亮的呼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校园内是越来越僵硬的“残次品”，媒体上是越来越热闹的“中国梦”；……

那会是一个梦吧？

美梦还是噩梦？

二，心，依然充满希望

学院又安排我讲一门新课《中国少数民族风情》，我又愉快地接受下来，为什么？因为这是我喜欢的领域。

没有教材，以前这门课据说是门实践课，让学生们自己动手，以“表演”的形式来完成。

我不愿意这样，因为这很可能流于一种形式，学生中来自少数民族的很少，而且不少少数民族已经汉化了（如土家族），年轻人基本上不知本民族的文化。更重要的是，中国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博大精深，应当让学生从这门课上学到相关的知识。同时，也通过这门课，让他们真正明白，什么是由衷地对这片土地和文化的热爱。（而不是那洗脑的“爱党爱国”教育）

网上有一套相关视频出售，昂贵的价格，让我认为它一定是精品，赶紧买来。

一看，大失所望！

一群摄制人员，浩浩荡荡，周游“列国”，一个个走马观花、蜻蜓点水。我仿佛看了一段又一段旅游风光介绍。那个解说词和播音尤其让人难受，像是一大堆廉价的广告推销用语，千篇一律地堆砌在每一个少数民族头上。没有历史的厚重，没有文化的悠远，更没有题材的独特视野和文史的深入挖掘。我长叹一声，一群胸中没有文化、眼里只有金钱的人，来做这种题材，一定会把一块原本厚重纯净的天然金矿，涂抹成一个浓装艳抹的橱窗展品。

我几乎把整个寒假都花在这门课的准备上。记得赵林教授在编写《西方文化概论》时说：这真是一场愉悦的心灵之旅。我在备这门课时，也是如此。那悠远的历史、那独特的地理、那丰灿的文化、那多姿的风情，像一股股山间的清泉，轻盈盈，淌过心田，荡漾出一种悠然心会的喜悦。

学生是汉语国际教育大二的学生，我第一次与他们相遇，很欣喜地发现，他们上课很认真，求知欲也很强，每次我走进教室，大多学生已早早到达，眼巴巴地盼着我讲课。

虽然没有教材，但课件我准备得很充分，图文并茂。还有，这些年我亲自走访过不少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在《中华手工》杂志工作时，不仅行游广泛，还到过一些保持着独特风韵的村落。比如在横断山脉深处，有仍保留着一妻多夫制的藏族河坡乡；又如在湘、黔、桂交界的偏远之地，有依然民风清纯的侗族山寨……。

每周我讲一个少数民族，学生不知下一周是哪个，倘如有学生因事缺了一堂课，他（她）总是觉得很遗憾，追着问上次课讲的什么。

讲这门课又体会到一种双重的愉悦：一是在艺术文化历史的画廊中徜徉，心旷神怡；二是与学生台上台下交相融合，悠然互动。在我所教的各门课中，《中国少数民族风情》让我最深刻地体会到教书这个职业妙不可言的意义和快乐。

这门看似轻松愉快的课对学生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有学生说，他萌生了强

烈的走访那些山川河流、乡村山寨的渴望；有人说，他一下子明白他毕业论文要写什么内容并且很愿意去研究了；还有学生说，她以前一直不知道这辈子想要干什么，现在她知道了：研究丰富多彩的苗族服饰和相关文化。

我很感叹，倒回去几十年，我也愿意作这种选择呀，我骨子里原本有大量的“艺术细胞”。可是，早些年，命运让我天天拥抱那我毫无情爱的英语，一大堆单词、音标、语法，让我的青春黯然失色；这些年，使命又让我又年年沉陷在土改、反右运动的采写中，一大堆苦难、血腥、残暴，让自己的心灵疲惫不堪（还让中共当局恼怒不已）。

这门课，是我在学校上的最后一门新课，2017年7月3日上午，我改完了这门课的试卷，在教务网上登完了成绩。黄昏时分，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我终于被扫地出门了

2017年7月3日，极其艰难的一学期终于结束了，下午6点多钟，我轻松愉快地来到江边，准备游泳。

说“极其艰难”，并不是指教学繁重，而是指这学期发生的那一连串让人身心劳顿的事。比如，为做土改纪录片《血红的土地》时的心惊肉跳和东躲西藏；为香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纪念会被公安的步步追逼；为成为“不安定分子”被校领导的约谈告诫；为写文章替方方的小说《软埋》辩护被“爱党爱国”人士的围攻和漫骂……。

现在这些都过去了，这学期也结束了，后天，我将登上火车，去秀山县进行约定的一次民间采访。

正要下水，手机响了，是文新院一个辅导员打来的，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谭老师，你被学校解聘了，请你明天来办离校手续。”

虽说这些年我常常想到我会是这种结局，但当它真的陡然降临时，我仍然心中一沉。

没有任何人事先找我谈一次话，大大小小的领导们早已心知肚明，但他们一个个不动声色，等我把最后一门成绩登完、待学生全部离校后，突然下手——派一个管理学生的辅导员向我宣布“死刑”。

从水中出来后，我匆匆赶回寝室，决定第二天马上离开。

此时，我已经不计较学校的作法“太冷漠”，而是担心当局会突然下手又一次把我抓捕入狱。我半个月前的那两篇文章公然披露土改的血腥，为地主翻案，还挖苦了那三位大人物（其中有一位上将），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共要收拾我，易如反掌，加上我已有过被突然抄家和被抓捕的经历，因此，当天晚上我十分紧张。

我第一想到的是写一篇文章，以备不测。我晚饭都没吃，匆匆写下一篇小文，担心哪一天（明天？后天？）连写这种小文的自由都没有了。晚上十点，文章写好后，我赶紧传给在美国的朋友，吩咐她，如果我一旦被抓，就把文章发出来。

第二天，7月4号，我没去办理离校手续，也放弃了那张火车票，匆匆忙忙离开了学校。

下面是两个多月后，我在公众号上发出的那天晚上写的文章：

嘻，我终于被扫地出门了

黄昏时分，突然接到一个辅导员的电话，说我被学校解聘了，让我明天去办手续。

我的合同尚未到期（还有两年），也就是说，我被开除了。

校方的时间选得很妙：学生刚刚放假离校，我则刚刚改完最后一门课的考卷并登上成绩。

几乎“分秒不差”——既不会影响工作，也不会引起学生议论，这种闪电式的精准设计显示出一种独到的管理水平。

其实，我不应对学校有丝毫怨言，相反，我应当感谢学校——直到现在才开除我。

他们忍受了多久！

我知道，按照现行的标准，我远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首先，上面一再要求教师的言行要“符合标准”，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一定要把握好（尤其是在课堂上）。领导专门开会强调过：意识形态出了问题，一票否决！

可惜，我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一直没有把握好，课堂上往往讲着讲着就偏离了“正确路线”。所以，“一票否决”落到我头上，一点不冤枉。

其次，我又老是给学校带来负面影响。比如，前几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演讲川东土改，给学校造成了很大的不良后果。（那次，学校找我谈话时，我就很内疚地表示：“如果……我就马上走人。”但学校却大度地包容了我。）又如，上月初（6月2号），校领导已经给我打了招呼：“不要惹事。”我也表态要老老实实做人。不料，一遇到有人打上门来，我又没忍住，加入了因小说《软埋》而引起的论战。这一下又惹得鸡飞狗跳，一大群“爱党爱国”人士不仅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而且又连带影响了我任教的学校。

我要是校方，为了保障意识形态不出问题和经济效益不受影响，也要开除像我这样的害群之马。

记得前些日子那些骂我的“爱国人士”曾怒气冲冲地说：我们的大学里居然容忍这样的教授存在！

现在，他们可以消气了。我早就知道他们一定会赢。

学校的荷花池，对面就是我上了七年课的教学楼

离别前，有什么感想呢？记得当年北京大学焦国标副教授（他也在文学和新闻学院）因写了《讨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解职。好些天，焦教授心情苦闷，郁郁地围着北大未名湖游走。

我们学校没有湖，只有一个荷花池，但我不想围着它游走，因为我这辈子曾经历七

次下岗，一颗破碎的心已经体会不到苦闷了。

这一次，是最后一次下岗了！

从23岁登上大学讲台到今天（2017年7月3日），我前后总共在讲台上站了22个春秋，是我这辈子干得最长的职业。

22年，有多少爱恨情愁！

三年前，预感到随时会被赶下讲台的我觉得应当留下点痕迹（也算是纪念），因此，我一口气写下了十多万字的“心路历程”——《爱恨交织——一个高校教师的手记》。也许，有一天，人们会读到这些文字。

唯一让我感到不舍的是我教过的那些学生，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15级的学生（本期我教了他们三门课）。难忘他们上课时那全神贯注的面孔、那充满了求知欲望的眼神和师生台上台下的美妙呼应。教师这个职业最滋润心灵的，就是每当你走进教室时，看到一双双期待的目光，还有告别时，那依依不舍的合影。15级的学生期末时曾急切地问我下期是否还教他们，他们表示（包括传来的文字），盼望我能继续给他们上课。本来，学院下期已经给他们排了我的两门课——《西方文化概论》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但现在，永远不可能了。

她曾是我教过的文新学院的学生，川大研究生毕业后专程来看我。我们在文新院门前合影，这成了我在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张照片。

前几天，在给大三学生（14级）的最后一节课（当时不知道那也是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节课）时，我向他们道别的语言是拜伦的一首诗：

爱我的，我致以叹惜，
恨我的，我抱以微笑，
任凭天空乌云翻滚，
我准备接受任何风暴。

这是拜伦告别故土时的最后一首诗。

后来，他长眠在希腊的崇山峻岭中。

2017年7月3日夜

注：此文在新学期的教师节前一天发布后，在海内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短短十来个小时，点击量达到近六万。当然，它也只存活了十多个小时。

沉默与喧嚣

当学生们得知我被解聘后，反响激烈，还有学生失声痛哭，当然更多的是给我传来信和信息，表达他们的强烈感情。校方对这种表达也要强行压制，辅导员强令学生们不准在网上议论。网上则把学生写的赞扬我的文章封杀了。因此，学生虽然不满，但社会上（甚至校园里）听不到一点声音。

另外，全国两千多所高校，无数教师，没有一个公开站出来声援更没有一声抗议，这个庞大的群体集体沉默。是他们不知道吗?不是，我被开除的事海内海外已经传遍。不过，我能理解这种沉默。1949年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的身心打压前所未有，1989年的坦克机枪和随后的利益收买（大棒加胡萝卜）更是剿杀和消解了残存的血性。

可是，去年中共大抓“709”律师，律师界一片抗议之声；今年中共大肆封网封号，无数网民奋起抗争。更记得1987年中共处分刘宾雁、王若望、方励力之时，全国声援之声汹涌澎湃……

但眼下的高校，风平浪静。

另一方面，网上咒骂我的话语风起云涌，热闹非凡，甚至把我祖宗八代都扯出来骂了。汹涌的“民愤”让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侵占了钓鱼岛的日本鬼子。

我在这儿不想引用学生们让我十分感动的留言，而引用几条赞扬党“为民除害”的欢呼，这种文字绝不会被删被封，因为它们背后有强大的“党妈妈”。

“不跟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走，凭什么让你教共产党的学生？！你失去这碗饭，没冤枉你。13亿人的中国，没有一个主流的意识形态，你觉得能搞好？！搞不清楚这点，你也没什么才学和思想水平。搞政治，你要上为国家想，下为自己家庭想……。”

“这个学者脑子有泡吧。土改血腥？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建立在血腥之上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武装夺取政权，就是血流成河。建立新政权，土地格局和利益蛋糕，必然也是用革命方式重分，这个也需要研究吗？！”

“记着‘胡汉三’（注），当年有人只记了笔记（叫‘变天帐’），抓住就杀了，你这个教授很幸运，弄本‘变天帐’（指我写书为地主翻案），只是被撤职。”（要我“谢主龙恩”——不杀之恩?）（注：“胡汉三”是中共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恶霸地主”，这儿指我是“反攻倒算”的坏蛋“胡汉三”。）

我把网上铺天盖地对我的漫骂发给我姐姐（没敢给我妈），姐姐读后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我一点没事，嘻嘻一笑，因为这在眼下的中国太正常了，共产党倾移山之力，文治武功多年，不培养亿万“党国粉丝”（也叫“小粉红），实在对不起纳税人的亿万银子。我单枪匹马，能影响几个学生?

由此想到，倘若有一天此书问世，我会挣来多少“正义”的批判和愤怒的咒骂?

到越南“练摊”

失业后曾想找点事做，朋友说他亲戚要到越南办厂，不妨先去看看。我对越南是有感情的，因为我人生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就是越南人，那一年我才十八岁。眼下反正没事干，不妨去看看。

这一看，工作没干成，留下了这篇文章。

被学校开除后，朋友说，你去找有关部门好好认个错，否则，没有任何学校敢聘用你。

我不知道该认什么错，虽然没错（没罪）也要认错（认罪）是我们的悠久传统和惯例，但我决定还是放弃这一条阳光大道。

那么，走哪条路呢？不挣钱呆在家里过休闲生活好像还早了点，况且我精力还充沛，况且有人还说我看上去只有四十多岁。

一位朋友给我指了条路，到越南去看看，那儿一千人民币值三百多万越南盾，转眼我就会有百万富翁的感觉。

正走投无路的我病急乱投医，于是匆匆来到越南西贡（现在叫胡志明市）。

考查了几天后，初步感觉是来对了地方。首先，街上到处都是我从小就熟习的标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还有那鲜艳的五星红旗（虽然只有一个星），这样，虽身在异国它乡，但有一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还有，流经胡志明市的湄公河，是发源于我们伟大的祖国，于是，我日日夜夜喝着的，是来自祖国故土的滋润，这两点对于从小饱受爱党爱国教育的我是非常重要的。另外，越南紧邻中国，要往返破费不大，家中尚有老母，一声招唤可以随时回去。至于语言问题我发现不是一个大问题，胡志明市的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都会说点英语，我碰巧在大学教过几年英语，虽然忘得差不多了，但做点小买卖、问个路、住个旅店、回答个“YES”或“NO”还是没问题的。

接下来就得考虑做点什么，否则坐吃山空，况且我还没有“山”。（在学校干了七年，出门时，学校出于人道主义，补发了一个月的工资。）

我先打听了一下门面，租个门面坐在里面当老板比较上档次，可惜，那个租金让我望而却步。于是，不得不转向街头。

首先在街头同一个挑椰子卖的小贩沟通（先高价买了他两个椰子），询问进货渠道、日销售量，毛利润、净利润等等。对了，我还把他的挑子上肩走了一段路。我惊喜地发现，没问题，可以走十几里路不换肩！

可以走十几里路不换肩

接下来连续几晚上考查一个街头卖小吃的游摊。在买了她一份热辣辣的小吃再同她热辣辣沟通后，她同意我在她的小摊上练一下摊。

于是我坐在她的摊上找一下感觉。

人来人往，华灯如织……

倏地有些迷糊，仿佛梦回唐朝，恍然看到一个多月前还站在大学讲台上的我……

仿佛梦回唐朝……

一声听不懂的越语把我拉回到人间。

我释然一笑：官场上的官员都能“能上能下”，大学里的教授为什么不可以“能上能下”？从灯光明亮的讲台到华灯如织的街头，面对人生的如此转换关键是心态——且从功利得失的天平座上挣脱，看到沧海桑田的精彩舞台。

况且，如此转换也有家传——当年（1957年）父亲不就是一跟斗从官椅上栽下来，在长江边上的一个破烂菜摊上卖了十七年的菜？如今我一跟斗从讲台上栽下来，街头摆摊也算是子传父业。

对了，也许有人会问：要练摊、摆摊为什么不在我们伟大的祖国，而要跑到异国它乡？

说来有点不好意思，我毕竟上了点年龄，手脚不是很麻利，如果生龙活虎的城管来了，我收摊不及肯定会损失很大，跑得不快可能会挨一顿拳脚。

而在西贡，我发现，没有城管，小摊小贩占道经营，从没鸡飞狗跳！

从大学讲台到越南地摊

最后的“讲台”

一

2017年9月8日，教师集中，报道点名，准备开学。这时，我才到学校办理离校手续。

我先找到文新院的院长，说要向大家说几句话告别，院长同意了。

我站到讲台上，对共事了七年的同事们说：“我已经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会了，因为上学期末，我被解聘了。学校没有说理由，也没有任何领导打一个招呼，只有一位辅导员突然打电话让我办手续走人。当时我没有去，因为我不愿像这样默默地被赶出学校，至少，我要同你们打个招呼，告个别。假如一个农民工帮你抬了一台冰箱，走的时候也要打个招呼，说声谢谢。我在这所学校干了七年，待遇还不如一个打零工的农民工?这是不是也太冷漠了?但我不愿意冷漠，默默地走人不是我的性格，因此我等到开学，专程来向大家告别……。”

坐在前排的几位学院领导，没料到我是如此“告别”，脸色沉下来。那位据说有任务要专门“关心”我的党支部书记，偶然回头发现有老师在录像，阶级斗争觉悟一向很高的他马上站起来，一脸严肃地走到后面阻止。

这一下惹得我心头火起，我“砰”地一声用拳头捶在桌子上，冲着他吼道：“我马上要走了还不准留个纪念?！”

与我相好的一位教授要求发言，院长赶紧阻止，说今天时间很紧，一会学校领导要来检查。

我最后的话是指名批评分管教学的副院长，我对她说：“权力是个好东西，但也是把双刃剑，弄得不好也会伤到你自己……。”

说完，我向大家一声告辞后大步走出会场。

后面响起一阵掌声，是表达敬意还是表示终于送走了我这个“瘟神”？

不管怎样，我以“砰”的一捶，永远告别了我任教七年的文学与新闻学院。

我以“砰”的一捶——
——在学校宿舍里

二

我拿着解聘书，走进校长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进去，当然也是最后一次。

校长正在同新上任的人事处长谈话。

以前，我从未同校长说过话，经常找我的是负责“维稳”的校党委书记。

“X校长，我被解聘了，我来找你不是要你们更改决定，而是来讨个原因，解聘书上没有说明原因，七月份北师大解聘史杰鹏老师还专门发文说明了原因。”

校长低着头不看我，说：“这是学校正常的调整。”

“正常调整？”我直盯着他说，“X校长，我们都是成年人，你可能也知道我是个直性子，你就直率地给个原因，比如：‘不胜任教学’、‘违反劳动纪律’、‘贪污受贿’、‘道德败坏’、‘思想反动’等等都可以，总比没有好，至少让我死得明白。”

校长仍然低着头，旁边的人事处长和颜悦色地说：“谭老师，真的是正常调整，这次学校调整的范围很大，比如我也是刚调整到人事处长这个位置上。”

到这个时候了，面对一件明摆着的事，他们仍然没有一点勇气说真话，这是一种修养吗还是给我留点面子？我真希望他们坦坦荡荡地说：“你同北师大的史杰鹏一样，都是意识形态出了问题。”我一点不会抱怨，因为这不怪他们，我惹的事多，加上习近平上台后猛开倒车，在高校里，首先就要把像我这种人辗死。

面对他们的这种“修养”，我没有领情。我说：“我在学校七年，上了十二门不同的课，这一点教务处有记录。你们一直都在关注我，也时时在收集学生的反映，你们能不能说出有哪门课学生反映我讲得不好？第二，七年来，我没有一次迟到、早退和旷课的记录，你们的监控录像可以证明。第三，七年来我从没有到外校去兼课挣钱（学校有不少老师这样做），我把全部精力都投入了本校的教学中。第四，学校很讲究科研成果，我曾问过前任人事处长，学校还有没有其他老师出版过十几本各类著作，人事处长回答，据她所知还没有。也就是说，目前还没有超过我的。第五，就说身体素质，我年年冬泳（全校一万多师生，仅我一人），身强力壮，一天上八节课没有倦容，七年来没有请过一次病假。第六……”

我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八条我的“先进事迹”，然后盯着校长说：“但是，你们把我‘调整’出局了。”

校长一直不看我，其实，我并无责怪之意，只是我的性格，不吐不快。当然，对学校派一个辅导员打发我走人的那种冷漠和只多发一个月工资的那种吝啬，我颇有些耿耿于怀。

在校长办公室的这一通“宣讲”，是我在这所学校的“最后一课”。从此，我离开了我任教七年的校园、我所热爱的教师职业和我前后站了22年的讲台。

从此，我离开了我任教七年的校园

葬火

夜晚，我独自来到郊外的一个山坡。

山风习习，星光点点。远处，传来几声狗叫，四下，沓无人踪。

山那边，都市的万家灯火一如既往地展示着它的辉煌与荣华。

我把一大抱纸卷放在空地上，它们是我这些年来在教学中的点点积存，包括一大堆课表、点名册、听课本、笔记本等等。

我掏出打火机，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

火，燃起来，一张张布满表格和文字的纸张在火焰的威烈下无可奈何地灰飞烟灭！

升腾的焰火，是它们灭亡前发出的最后光亮。

突然，我看到一张空白卷子上我写下的文字，它密密麻麻，其间还有红笔点画。

我慌忙把它抓起来，这是我在教书生涯中写下的最后文字——“汉教15级在考试中暴露的问题”。

上学期我教了该专业三门课，学生听课很认真，也有很强的求知欲，我很喜欢他们。可是，在批改考卷时，我发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感到他们还没有打开心智，仍然是僵死应试教育下的思维方式和答题方式。我针对他们的答卷，一一列出问题，准备在下学期上课时分析讲解，让他们明白该如何调整学习方法，怎样开发自己，从而在大三时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下学期，我原本要给他们上两门课，我也打算通过这两门课扩展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思维，尽量摆脱应试教育造成的那种僵化和死板。

可是，不会再有下学期了。

我撕碎手中的卷子，一点点投入火中……

教室，和我教过的学生

告别教师和教师节

2017年的教师节马上就要过去了，我整天都在挣扎：写不写点什么。

写吗，昨天、前天发出的文章都只存活了十几个小时，尤其是是昨天的文章，我既没惹事生非，又谦卑地殷情陪笑，可是，仍然夭折，寿命甚至比前天的还要短。想起以前读过的诗句：“漏船载酒泛中流”，“未敢翻身已碰头”。还有，现在自己已经不是教师了，再写是不是有些自作多情？

当年教师节我当选优秀教师时

可是，不写吗，它又伴随了我几十年，每年，我都心花怒放地享受着青春学子们一声声让人返老还童的问候和祝福。还有，我曾经当选过第一个教师节时全校十大优秀教师之一，记得学生们兴高采烈地说：“哇，教我们的是一个全校的优秀教师！”那曾经是我这辈子所享受过的最大荣誉。（可惜后来我不争气，江河日下，再也没有达到那种荣耀的高峰。）因此，作为我人生一个少有的闪光亮点，教师节理应值得我永久的纪念。

正在写与不写之间彷徨犹豫时，突然在微信上看到一张如董存瑞高举炸药包的图片，上面配的文字刹那间让我血涌泪奔——正如当年我在电影院看到董存瑞振臂高呼：“为了新中国——”

是什么文字呢？

“衡量一名教师是否称职的两条基本标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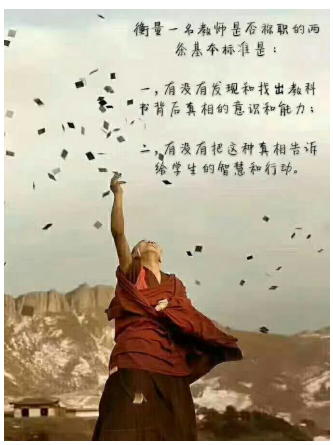
一，有没有发现和找出教科书背后真相的意识和能力；

二，有没有把这种真相告诉给学生的智慧和行动。”

我的天，我些年来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在做一名“称职的教师”呀！

结果呢？

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我一个跟斗栽下来，从此告别了教师和教师节！



教师节，一位毕业生的来信

2018年教师节时，我已经流亡到了万里之外的异国它乡，仍然收到不少往日学生的祝福，这让我很感动，尤其是一位已经毕业的学生的来信，让我孤寒的心充满了温暖。

亲爱的谭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

虽然我早已毕业，您也因为社会的种种而遗憾地离开了教师岗位，但是在我心中，您永远是我的老师，永远是一名最优秀的教师。自今年年初时和谭老师有邮件交流之后就渐渐断了联系，但是每当看到来自社会的新闻报道的时候，总是能想起您，您的真实，您的赤诚，似乎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却让我深深感受到，只有像您这样的人，才是真实的人。

最初得知您被学校强行卸下了岗位，内心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情感，非常复杂，又觉得这个社会非常地可笑。好的老师被夺去最爱的工作，他们夺走的不仅仅是您最爱的工作，还有千千万万渴望得知真相的孩子们的教诲，而留下的，却是那些打着共产主义旗号却正做着龌蹉事情的“老师”，这是一个社会的遗憾，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哀。

从蔡蔡那里收到了您的文章《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回忆起您曾经给我们讲过您曾几度想放弃教师这份工作，却仍然坚持了下来，感谢曾经将您挽留回校园的育才学院的师兄师姐，才让我这个愚昧的“共产主义接班人”遇见了您。因为您讲述的“真实”，将我从愚昧的沼泽中拉出，重见了应该看见也必须看见的“社会”，谢谢您谭老师！虽然您与我们之间只有短短的4年师生情，但是您的教诲却影响着我们的一生。

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您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您的心在这片土地上扎的根，您在这片土地上抹下的每一滴汗水，您在这片土地上教过的每一课，都能够深深的感受到您的热爱和赤诚。每读上一行字，内心的沉重便加剧一分，那是怎么样的痛苦呢？也许我永远都体会不到。那份要远离故土的悲情我却从谭老师您的文字中感受到了些许。“正是由于这里出现了不幸，我才更加热爱这片土地。”我仿佛看见了谭老师在大学给我们讲汶川大地震时的身影，仿佛看见了您在夜里独自写下许许多多悲壮而有力的文字，仿佛看到你在登机前回头看了看这片土地的留恋……。我无法感同身受，却深深的体会到了您文字中带来的悲痛。写到这里，泪水不禁然间流下，那份对祖国的热爱似乎被您的文字勾勒得更加的生动而鲜明。不能教书，不能写作，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已然被夺走，您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呢？无法想象！我也无法想象您是在怎样的内心挣扎之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离开，继续战斗！

我从不认为《长寿湖》是一本难看的书，相反，我觉得它是一本好书，因为在书里我看到了“社会”、“人性”和“人心”，它让我无数次的悲痛交加，泪流满面，它让我了解到了我从来不知道的“1957”，它让我了解到了从不知道的“同胞战争”。它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是怎样的！

是的，也许谭老师的爱国方式和“大众”不同，但是我发现这样的方式似乎才是

真正的爱国。在这片土地上，您对生命的喟叹，您的感怀，您苍凉的泪光，您的心痛忧愤，您不离不弃的坚守，您的悲狂，您的惆怅又有多少人能够晓得呢？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他们只看到了您文字对他们的威胁，被权利和金钱蒙蔽了双眼，又怎能看到您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眷念和热爱呢？您在长江边久久徘徊，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理解、看见。您做下决定时背负的痛苦无人知晓，您的离开悲情而壮烈！

也许您今后不会再站上讲台，可是我相信受过您教导的学生们，总会有人将您所说的每一句话放在心中，总会有人因为您的满腔热血走上与您一同战斗的路！而我，也会在您所爱的这片土地上与您一同战斗！您是最值得尊敬和敬重的老师，也是我一生的老师！在这里，请让我对最优秀的教师道一声感谢——谢谢您！

谭老师，愿一切安好！

学生欧X 二零一八年九月十日

给09级对外汉语最后一次课后学生拍摄并送给我的照片

附：我流亡美国后第二天写下的文章（也是这位学生读到的文章）：

自由天空下的第一行眼泪

一，TO BE OR NOT BE

飞机，腾空而起，下面，是我生长的故土和日夜陪伴我的长江。我将脸紧紧地贴在玻窗上，俯视这一片让人魂牵梦萦的土地。

这是我生活了大半生的土地，我人生的根，已经深深扎在了他的岩石和泥土之中；这也是我苦苦坚守了多年的土地，强烈的爱恨情仇抵御了一次次绝望中想转身离去的冲动。

2003年，我在《长寿湖》后记中写道：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感召——苦难的感召，仿佛苦难催生了一种深沉悲壮的情怀，唤起了内心金戈铁马般的冲动，这种情怀和冲动，无法在新西兰田园牧歌的风情中得到释放，无法在澳大利亚洋房别墅的华美中获得满足，正如江南桃红柳绿的沉醉，不能取代大漠孤烟的苍凉、长河落日的悲壮所唤起的那种深层感动和震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一个荒唐人的梦》中说：“正是由于这里出现了不幸，我才更加热爱这片土地。”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里说：“如果我们能以自

己的见证为下一代留下我们那个时代分崩离析的真实情况，哪怕只是一点半星，也算我们没有完全枉度一生。”

写下这段文字到现在，14年过去了。

坚守？还是放弃？到最后一刻我都在犹豫。

从讲台上被赶下来之后，我曾打算用这种不上班的空闲，再干一番我所渴望的事业。我的经验、意识、能力、勇气，甚至身体素质，都能保障我在这块土地上大干一番，而这又是一块极其“肥沃”、遍地“题材”的土地！可是，我迅速发现，眼下已经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保障——安全。一旦被他们盯上了，行动的自由便丧失了。身份证、手机、银行卡，这几样现代人生活最重要的随身必需品，成了监控你一举一动的得力武器。

书，不能教了；号，被封了，采访，难以进行了，连与朋友聚会都要“传染”对方。怎么办？坐在家里读书写作吧，这原本是我的本行。

可是，有多少人体会过“砰砰砰”敲门声所引起的那种心惊肉跳？有多少人经历过把自己的文字和作品像赃款一样东藏西躲的紧张和慌乱？

其实，我不是觉得很累了，想放弃了，要逃离了。不是！最无奈、最痛苦的是发现自己“武功”被全废，成了一个不能讲课，不能写作，不能采访，甚至不能安心读书，没有基本安全感的僵尸！

我曾自以为自己是个不怕大牢的勇士。我曾在《长寿湖》的后记中写道，如果判我几年大牢，我不会白坐这个牢，出来后，我会写出一部像《长寿湖》一样难看的书。现在看来，我是太naive了。今年刘晓波、彭明、杨天水等相继在大牢中的重病不治，让人彻底明白了：不要以为手中的笔是锐利的武器，有人会让你的肉体连同你的“锐笔”一块“病亡”。

明白了这个道理，绝望，从地底升起，消解了我苦苦坚守的最后决心。

二，爱国

我常常受到爱党爱国人士（其中还有个别我的学生）的责骂:“美狗”、“卖国贼”、“汉奸”。现在他们更有理由了，你果然投奔美帝了。

什么是爱国呢？好像标准只有一个：赞美加歌颂。

同现在的学生和年轻人一样，从小我也饱受“爱国主义”教育：邱少云、刘胡兰；白公馆、渣滓洞；义和团杀洋人、太平天国闹革命；冷月英妈妈坐水牢，高玉宝叔叔讲鸡叫；……

当然更有爱党教育。爱党爱国被搅拌为一体，煮成一锅红色浆糊，灌满了千千万万稚嫩的大脑和成长的心灵。

爱国，一旦成了一种“主义”，它可能就是一种“主义”，而不是那种透彻心灵溶于血液的天然。

奔走在祖国广袤的大地，触摸中华悲壮的沉淀，无需谁来“教育”，自然生出那份沉甸甸的情感——

它是穿越千里长江，手抚纤夫遗痕的生命喟叹，
它是伫立黄河岸边，面迎西风夕照的历史感怀；
它是大巴山老农一杯苦涩水酒映照的苍凉泪光，
它是窑洞里大娘一碗高粮米饭唤起的身心温暖；
它是传统消失人亡艺绝时仰天长啸的心痛，
它是山川残破江河色变时慷慨悲歌的忧愤；
它是面对贫穷和苦难时不离不弃的坚守，
它是目睹丑陋和罪恶时热血裂岸的悲狂；
它是冷泪长歌飘荡在旷野冤魂中的母性悲悯，
它是横刀跃马驰骋在暴政王宫上的壮士豪情；
它是高原的寒风吹来辽阔河山的千古惆怅，
它是诗人“祖国啊，你用伤痕累累的乳房哺育了我”所触动的深层柔软；
……

2017年10月7号，我采访完秀山县一位老人胡祖暖之后，独自前往湖北，寻找他当年同他恋人最后分别的地方——咸丰县看守所。

从秀山到黔江，从黔江到咸丰，一路上云雾缭绕，峰峦叠嶂。当年，1963年，胡祖暖就是同他19岁的恋人杨秀萍姑娘，沿着这条山路徒步走向他们悲壮的永别。我注视着沿途的群峰山峦田野村庄，想到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一种由苦难催生的深沉和山川唤起的热爱，交织奔涌，排山倒海涌上心头。

中华民族百年的血泪沧桑啊，我不幸看到了你喧嚣下面沉默的真实，我有幸读到了你遗忘后面苦难的记忆。

一路上我都在犹豫挣扎：我真的要离开这片土地和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吗？

最后一次采访是11月5号，川东奉节县。野夫兄热心地为我找到了土改时被烧烤的彭吉征的家人，我当即前往。

采访完彭吉征的儿子后，我独自下到长江边，注视着早已不再奔流的三峡江水。

深秋的阳光暖暖地洒下，峡江的红叶静静地摇曳。我在江边久久徘徊，这时，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要离开这陪伴了我一生的长江。

只有我自己知道，为什么我在江边久久徘徊。

离开前的最后一夜，我又翻开郑念的《生死在上海》。二十多年前读到这本书时，她告别故土的描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透过蒙蒙的雨帘，我看见壳牌公司的大楼和我原来办公室的窗口。那过去的岁月，竟然如梦幻一般。船渐渐加速，黄浦江渐渐远去……我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

郑念1949年回到了她热爱的祖国，几十年后，她从大牢中出来，家破人亡，她唯一的女儿梅平惨遭毒手，尸骨无存。

郑念孤独而绝望地走了，那是1980年9月20日，距今已经37年。

三，母亲

2017年11月20日，我离别的前一天。这天，重庆气温陡降，风雨交加。

这时我才去告诉母亲，我要走了。我不敢看她，怕她受不了。这些年来，母亲独自住在养老院，一直是我去看望她关照她，是她的最大的安慰和依托。当我告诉她第二天我要走了时，母亲并未露出我所担心的那种反应。她沉默片刻，很理解地说：“走了好。”看来，我虽然是她最大的安慰和依托，但也是她长期的“心病”和“负担”。

“这些日子我电话都不敢给你打，怕他们追踪到你的行踪。”母亲说。

同去世的父亲一样。母亲在很年轻（18岁）时，受中共《新华日报》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的感召，在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开始了提心吊胆的地下工作。“新中国”到来后，母亲仍然提心吊胆，批胡风、反右派……尤其是文革期间，批斗、逃亡……我亲眼目睹了那些年她的提心吊胆。

我父母年轻时

这些年来，晚年的她又为我提心吊胆。十余年前，我从狱中出来后她对我说：“我没法阻止你，因为你做的是对的，当年我同你爸也是这样在做，这样在追求。但是，作为一个母亲，多么担心……”

母亲掏出钥匙，打开抽屉，拿出她的全部积蓄——十余张存折。存折零零碎碎，五千、一万、两万。“你出去后花费大，要尽量多备点钱。”

我不要，说这些钱换成美元也没多少，而且我第二天一早就走也来不及换了。母亲坚持要给我，仿佛不这样我就会流落街头，她就更加不安。

什么是一颗母亲的心！

我没带身份证，只有她亲自去取。于是我扶着90高龄的母亲在风雨中走进一家又一家银行，取出她一点一点存下的五千、一万、两万。

近黄昏时，我同她告别，她站在养老院大门的外面。初冬的冷雨悄无声息，飘洒在她花白的鬓发和苍老的脸上。

我一再叫她进去，她不肯，怔怔地望着我。我不敢看她，怕看到一行苍凉的老泪，从此成为我心灵上凝固的悲伤。

到西雅图的当天晚上，对朋友谈起同母亲的告别。

突然，泪水夺眶而出！

多年来，我在这块沉冤浩浩的大地上奔走采访，心灵早已被种种悲情和苦难打磨成钢，炼就了一种超强的耐压能力。可是，分别时，母亲冷雨中无言的凝视，竟让人肝肠寸断！

我双手捂脸，失声痛哭。在刚踏上据说是自由的国土时，不是一声自由的欢呼，而是一行悲痛的眼泪——既为生我养我的苍老母亲，也为我爱恨交织的苍茫大地——祖国母亲。

2017年 11月22日于美国西雅图

爱恨交织（结束语）

从小缺失儒家中庸打造，饱受中共“狼奶”喂养，后来又没真正走进基督，领受圣经谦卑教育的我，一向特立独行，口无遮拦。在任教期间，上上下下，我冒犯得罪的人不少。那些“大人们”就不用说了，就是学生中也有按纳不住的。下面是一位学生写在纸上交给我的文字：

（谭老师）七宗罪

一，不诚信：当众宣布（上课）不点名，（但）出尔反尔。

二，不真诚：自诩为人师育人，实则待人不真。

三，不谦虚：自标功绩，自称完人。

四，无师德，不包容：当众指名点姓谁谁挂科，虚称学生不尊重，实则无师德。

五，卖国叛国：虚为国献计育人，实则一美分狗；虚为充满理想，实为认不清发展实质。

六，不识真伪，信口雌黄：课件不认真，非本人亲做，不辩课件真伪，想当然定一家之言。

七，自标为先驱：虚让众生评过错，实则以此行为塑形象，满足自身堕落心理。

综上所述，理应驱逐出国！

10级新闻2班XX

注：在给新闻10级的课上，我把这位同学对我的骂语（这也是我教书20余年来唯一收获的书面骂语）一字不改地展示在屏幕上，并当众朗读。我未加任何评说，只说了一句话：搞新闻的，应当有这种不怕“犯上”的胆量。”

只是，该同学一如既往地逃课，没亲临现场听我朗读他的批判稿。

也是在这个班上（两个班上百人一起上课），一位同学因我要离开了，专门准备了一个笔记本，一定要我给她写封信，下面是我写在她笔记本上的文字：

小刘你好，

你叫我写点什么，面对这个厚厚的笔记本，该写什么呢？

此时此刻，杂乱无章的思绪、感想滔滔地涌上心头，我就杂乱无章或者说天马行空地写一通吧（好像我上课也是杂乱无章兼天马行空）。

你们都感到我是一个很激愤的人，这是事实。其实，我原本不是这样。我从小喜欢音乐、美术、艺术，也温文尔雅。不幸的是，我生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从小目睹家仇国难，慢慢地，心头就堆积了大量的悲愤，后来从事媒体，采访几百人，更是加重了这种悲愤——或者说“激愤”病。眼下，很多人“审恶疲劳”，血冷了，心麻木了，于是也就平静了。我也想这样，可是一直没做到。

我的一个错误是把这种激愤带到了课堂上，而且赤裸裸的，不讲策略、不讲方法。作为一个老师，这是不应当的，这真是我的错。

还有就是我很性急，恨不得一下子达到效果。这也犯了教书的大忌，特别是面对整个教育体制造就的铜墙铁壁，这种性急，只能适得其反。

还有很多其他问题，就不一一说了。总之，我觉得自己有些像唐吉科德，虽然英勇无畏乱冲乱闯，但却不识实务可悲可笑。

我这一生品尝过很多次的失败，也许，失败太多了就需要用自夸来找到生存的勇气和心理的抚慰。我如果告诉你我内心一直有一种沉甸甸的失败感、挫折感和绝望感，你可能无论如何都不相信。但这是事实。

鲁迅有篇小说《孤独者》，主人翁魏连殳好几次发出狼一般的、绝望的悲嚎。多年来，我用整个身心去体会他的这种悲嚎，并在心底发出阵阵回响。

这个社会需要戴着面具生存，此外，谦卑、理性、平和、含而不露等，是我们推崇的做人原则。对于前者，我十分厌恶，对于后者，我一直没做好。赤裸裸的不穿衣服，虽然真实，但却不雅观，甚至难看。

近来我不时在想，我是该强迫自己改变，还是该用远离人群的方式来逃避——或者说，自我保护？

后天就是我们最后一次上课了。我知道我不会再教你们了。过去的一年我扪心自问，我是用了心的，没有偷懒。但是，由于我自身的原因，我没有教好。更要命的是，我觉得我今后也会教不好，因此，我决定放弃。

感到欣慰的是，班上有不少像你这样勤奋、认真和可爱的学生，我不会忘记你们。但愿多年之后，你也还会回想起一个人——

他张牙舞爪锋芒毕露但却怀揣着沉甸甸的真情；

他自以为是毛病众多但却坦露出赤裸裸的本色。

BEST WISHES!

谭 松

2012年6月12日

深切的爱

22年的教学，是我人生中干得最长的职业，虽然以被赶下讲台作为结局，但觉得有沉甸甸的收获——一段爱恨充盈激情洋溢的人生。

大量学生言真意切的留言，像甘冽的清泉，淌过我疲惫而焦灼的心田。我且以学生的一篇文字，作为这本小书的结尾吧，是一种苦涩的自恋吗？也许。但此时，心中被充满的，是一种依依不舍的感伤和对我所教过的学生的——深切的爱。

谭老师，我的最后一次作业

这是我的最后一次作业，我想说的不仅是对这门课的感受，更多的是大二以来上谭老师所有课程的总体感受。

记得刚踏入大学校门的我，思想意识都不成熟。大一，生活虚度，没有遇到一个像样的老师，没有一个能给我心灵和思想上的启发。每天我都浑浑噩噩，心中不免对大学好失望，有时候感慨："难到我的大学就这样毫无意义地度过吗？"直到升入大二，这种想法才有所改变。

谭老师，您从大二开始带我们，带了我们三年。从您教我们的第一节课，我就知道您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老师，是有一种刚毅品行在内心的老师。果然，上您的课是一种享受，您对艺术、对生活、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比任何人都深沉……

您给我们的那些精神品质的感召，值得我一生来学习。那种精神是贯穿始终的，每一门课都会让我有一些内在的感动和启发，也在无形中塑造着我们尚未成型的人生观、价值观。精神是巨大的，指明了我们黑夜中的方向。

课堂上，您把真实的历史和浩然正气传授给我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之前的东西都白学了，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思想，不能人云亦云。我们按着从小被灌输的思想来看待事物，带着一种明显的主观臆断。只有真实了解历史，才有资格来评判它！您所讲的所有课程都贯穿了您的思想，您身上透露着一种"真"，那是一种我们民族在城市的喧嚣中逐渐失去的东西！

我对您的写作语言极为欣赏，没有博览群书，没有丰富的阅历和经验，怎么可能写出那样既优美又深刻入心灵的文字。从中，我感到您对这片土地的满腔热爱，但因期盼它变得更好，又不得不痛心地揭示现实的虚假与丑陋。

您治学严谨，一张张图片，一句句文字，都来自您的精雕细琢。您本着良心做事，是一个不多见的好老师，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精神上的导师。

转眼大学四年即将结束，回想起上课的那些点点滴滴，不禁使人满怀伤感和留恋……

老师，即将与您道别，离愁别绪涌上心头……我想多年之后我还是会记得大学四年中，有一个老师用他的精神浇灌了我的灵魂，有一个正直、真实、洒脱、敢说敢做的老师，他的人生充满传奇，他的名字是——"谭松"！

对外汉语11级1班李吟霜　2014年11月

我教过的学生——**再 见**

后记

2014年，随着整个政治生态往“文革”大步回归，校园内言论自由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一年，教室里的两个摄像头打开了录音功能，教师的一言一行被记录在案；这一年，党报派出记者潜伏高校教室，收集教师“思想动态”；这一年，学院对教师评定，我被分管教学的副院长评为全院倒数第一；……

“秋江水冷鸭先知”，我预感到，像我这种人，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完全可能在某一天被赶下讲台甚至锒铛入狱。于是，我决定抓紧时间写下一些在学校的见闻和感想，作为我教书生涯的一个留存和纪念。

初稿在当年的年底完成，当时还写下了后记：

2014年最后的时光即将逝去，在过去的9个多月里，我断断续续写下这些杂乱的文字，是为我身内交织涌动的爱恨情仇、是为身外这块园地立此存照、更是为一种焦灼而近乎绝望的“呼救挣扎”。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永远怀抱的那份期盼，又在这新旧交替的时刻热辣辣地燃烧。可是，“最寒冷的冬天到了，希望的春天会来吗？”——这句话，是我在2003年岁末写《长寿湖》后记时写下的。

如今，整整11年过去了，天，却越来越冷。

有毒的食物，摧残了身体；有毒的教育呢？祖国的未来被摧残了呢？

希望的春天在哪儿？！

写下这段文字后，我又在校园里存活了两年半。

此时，我已经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流浪了整整一年：从西雅图到旧金山，从旧金山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

自由的风，扑面而来，吹走了淤积的恐惧，那因对声音（尤其是敲门声）超级敏感而引起的失眠症也随风而去。

这是一块全世界人人向往的乐土呀！

洛杉矶的“月子中心”生意兴旺，大量中国妇女花巨资来这儿生下她们的“美国公民”；各个学校华裔学生人数众多，一个个前赴后继涌来接受“资本主义教育”……

可是，我为什么找不到投身自由女神酥胸柔怀的兴奋和沉醉?那大洋彼岸山川原野的朝风暮雨更加触动心中的爱恨与悲欢。尤其是，多少个夜晚，梦回万里，熟悉的铃声牵引我飘浮在一片目光闪烁的迷幻中……

“你要尽快把你的过去忘掉，这是个很实际的国家，不要多愁善感，不要提过去的辉煌，一切从零开始。”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多年的朋友们对我耳提面命。更有人

为我指导多条生存之路：送外卖、守仓库、当保安、开UBER（“的的车”）……“在美国，只要你勤奋，就能生存下来。”他们说。

人生一路奋斗走到此时，终于回归其最现实的本质——挣钱吃饭活下来?

可我总是情不自禁把目光投向那片土地。一个月前，得知公安闯入北京大学公然暴力殴打和抓捕学生！接着又传来消息，我的家乡重庆市英勇竖起大旗——恢复毛泽东时代邪恶的“高考政审制度”！

血一阵阵奔涌，我放声大骂……

人生一路奋斗走到此时，终于获得了我渴望的言论（放声大骂）自由——可是，身边没有人听。

我能清除那过时的“文化认同感”和“故土归属感”、消解那所谓的“历史责任感”和“道义担当感”，一步步走在“求绿卡、当公民”的“康庄大道”上吗?

加里佛尼亚海边，夕阳西沉，天际晚霞燃烧。那一片血红的后面，是大洋彼岸的东方故土。凝目良久，我仿佛又看到峡江夕照下那悲壮的深沉和宁静。我多年来在那儿奔走，那片土地和土地上的悲情与苦难，给予了我一种生命的厚重。

旧金山CHINA BEACH的沙滩上，两位“老外”前来同我握手，赞扬我在冰冷海水和滔滔大浪中的勇敢。我在终于找到了一点存在感之后突然有种悲哀——你就是逃到这儿来展示你的“强壮”和“勇敢”?

伫立好莱坞山坡上，望苍穹下连绵群山，感到一种苍茫的美。可是，它没有让我思绪飘逸，没有产生一种惆怅和沉思，一种透彻心灵的感动。 也许，是这片美丽的新大陆缺失了数千年旌旗猎猎、悲风浩浩的壮烈；缺少了黄土地那悲欢离合、烽火狼烟的厚重。尤其是，它没有我曾耳闻目睹的那一幕幕鲜血加鲜血、苦难加苦难、尸体加尸体的人间悲剧。

黄色的校车来了，众车让行，学生们一个个活蹦乱跳；
豪华的官车来了，众车让行，官员们一个个耀武扬威。
美国的民众不满了，总统惶恐，鞠躬检讨；
中国的民众不满了，领袖大怒，抓你入狱!
……

同一个星球上，我们让这种巨大的反差继续一代代延续下去吗?同一个苍穹下，我们只能在专制独裁的淫威下遥望彼岸的民主和自由?浩浩十几亿国人，有多少人能把子女送到美国?那亿万不得不接受“狼奶”毒害的学生们呢?我们一个个都逃离了，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享受着“绿色的”食品，把一切的一切都留给亿万学子和儿孙后代，让他们去承担，让他们去经受?

正写到此时，读到“中国媒体的良心”马云龙12月2日75岁生日时的“自我告白”。他在告白中说：“我不想走（出国），我想死——我最后的岗位，是在最后一个

自由街垒的顶上，战死。”“我最终倒下的地方，一定在这片土地上，这是我早年定下的最终结局的方式。我们的使命，就是替那些没有活到今天的人，看一看这最后一幕的场景，在帝国的废墟上，浇下最后一杯酒……”

老马的这些文字，让我感动，更让我羞愧！

2012年3月，我请老马来学校给新闻系学生演讲，当天夜里，我们在学校我那间小屋里热血沸腾——认为中国即将大变，我们要为这种大变冲锋陷阵！

如今近七年过去了，75岁的老马仍在那片土地上苦苦坚守，我则逃亡了……

在2018年新年的第一天里，我在西雅图那间冷寂的空房里，独自朗读我前一天写下的文章：

2018，你好吗?

我能听见新年的钟声吗，在异域它乡这间低矮的小屋里?

漫天的飞雪，在新旧交替的夜空里挥洒着寒冷的迷乱。

心中那一团期盼的炉火又在熊熊燃烧，它炽烈的焰火照见我泪光迷蒙的双眼。

期盼，刻骨铭心的期盼，飞越太平洋万里波涛，奔腾回荡在我那魂牵梦萦的苍凉大地。

2018，你好吗?

讲台上的诵读，此时已是遥远的回忆，但那华光四射的诗句仍让我热泪盈眶：

“给我吧，你疲惫而贫穷的大众
你蜷缩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人们
那些在你拥挤的岸边被遗弃的不幸者
那无家可归、饱受磨难的人们，都给我吧
我在金色的大门，高举自由的明灯！”

如今，我跨越万里波涛，来到你的身旁自由地呼吸。可是，你高举的火炬为什么没有化解我眼中绵长的忧伤?“哪儿有自由，哪儿就是祖国”的千古名句，为什么没有拂去我心中刻骨的乡愁?

逃离了故土的恐惧，又拥抱流亡的寒凉。2018，你将怎样帮我翻过我生命中这沉重的一页?

都说“寒冷的冬天来了，希望的春天还会远吗?”我在这动人诗句的抚慰下，年复一年，从希望走向失望，从寒冷走向更加寒冷。

2018，我将如何迎候你，期盼你?

在这我听不见钟声、望不见故土的雪白大地上，我别无选择，唯有把这陈旧的美丽

期盼，作为抚慰我、拯救我的圣殿烛光！

2018，你好吗？

你能否作一次正确的选择，在万古不变的沉闷里，在红歌颠狂的绝望中，在“岁月静好”的死寂下，奋身而起，面向自由的火炬，开辟出华夏全新的文明走向?!

还会有多少中华的优秀儿女，祭献在奔赴自由火炬的路上？我不愿做铁窗下又一个病亡的殉道；心中燃烧的，是金戈铁马、仰卧疆场的壮烈！

2018，在你365个日夜里，无论是寒风凛冽的清晨，还是血色厚重的黄昏，你一声战斗的号角，将是我生命中神圣的召唤！

2018，我向你虔诚地跪拜：

归来，归来！不要让我等到满头白发，步履踉跄；

归来，归来！不要让父兄前辈的啼血期盼，又化作子孙后代的无奈哀叹；

归来，归来！让我在生养我的辽阔大地上，燃尽我生命的最后焰光！

2018，你好吗？

朗读完，我双手颤抖，泪流满面。

2018年12月6日于美国拉斯维加斯